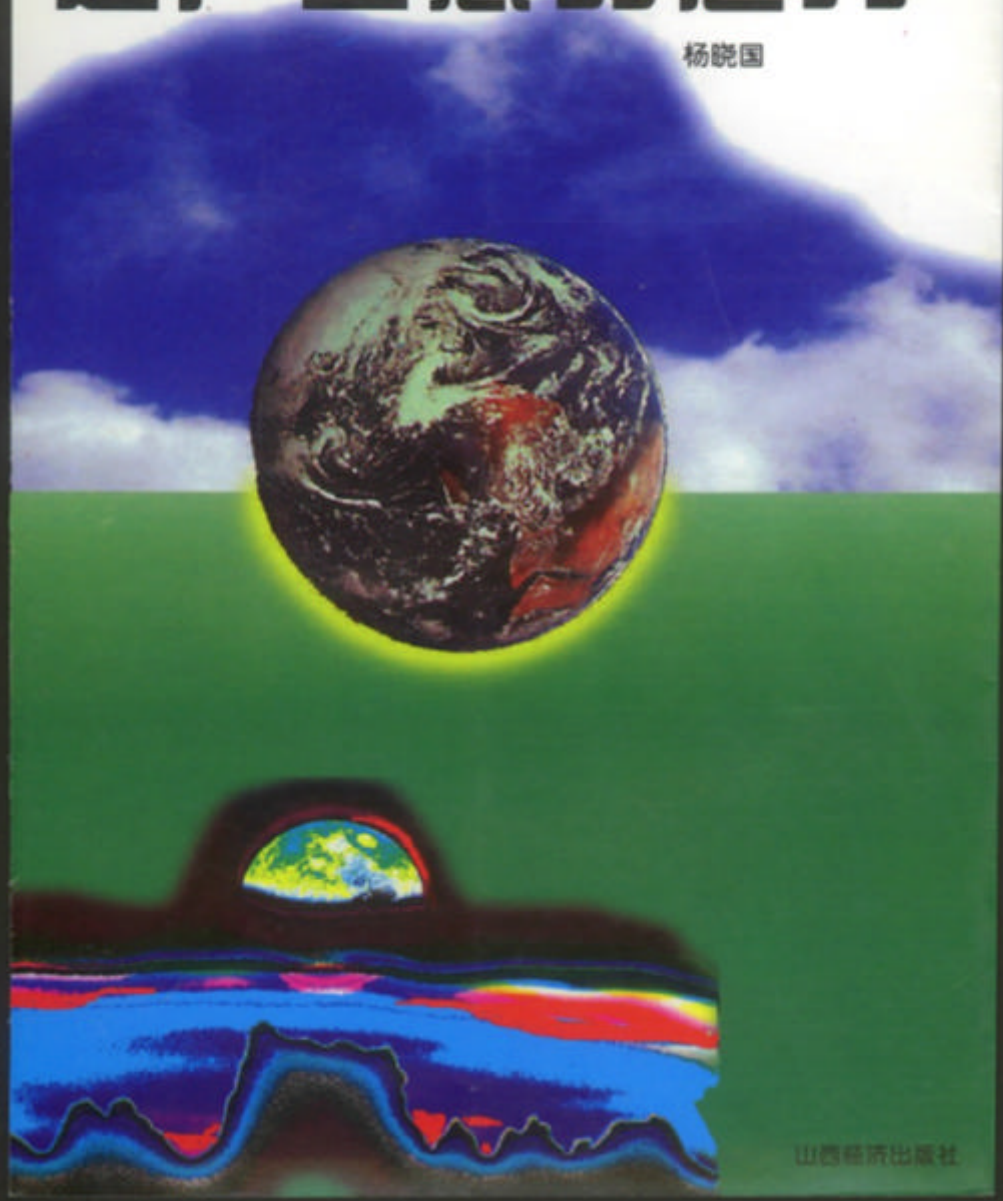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Series

生态经济丛书

主编 王文学

遗产生态的魅力

杨晓国



山西经济出版社

《生态经济丛书》内容提要

1.《世界未来纵横说》

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大调整，伴随着生态环境危机日趋严重。为拯救人类生存形成的“百家争鸣”思潮，是生态经济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持续发展思想的渊源。从 19 世纪马尔萨斯“忧伤的科学”，到 20 世纪的罗马俱乐部——全球问题预言者的集合体。对人类未来比较悲观的看法。挑战者的出现，与《增长的极限》论争，用一个新角度看世界：人类只要与自然和谐相处，长期趋势是美好的。对人类未来比较乐观的看法。

悲观与乐观的趋同，经济学与生态学的融合，经济——技术——生态的统一，从经济增长到持续发展。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持续发展思想，当代乃至 21 世纪的主流经济学科。

2.《走向未来的战略》

1992 年 6 月巴西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标志着生态经济学理论思想变成了世人的共识，纳入了世界各国政府的决策。人类未来发展战略的抉择。传统发展战略的反思，新的发展战略的寻求。持续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观，经济与生态协调观，全球意识。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涵。控制人口膨胀，资源永续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可持续消费，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粮食供给，保护环境，消除贫困，国际合作，前景展望。

3.《中国大地的压力》

地球家园中的最大一个家族——中国人口总量大国与资源相对小国的矛盾和压力。

膨胀的人口压力。严峻挑战，发展困惑，伟大的计划生育政策，光明发展前景。

不可再生资源的压力。耕地减少，土质退化。生命之水，缺水之国。为了明天的富饶，建立一个节约的社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压力。森林、草原、水土、风沙和物种方面的问题严重；城乡环境质量不断下降。觉醒的人们，寄望于明天。

4.《黑色绿色的岔口》

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与环境污染加重的阶段，面临决策的十宁路口；重蹈“ 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还是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同步的新路。

岔口上的抉择。传统发展模武受到挑战，抓住转变战略的机遇，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新战略。

绿色世界的目标。发展与环境的统一观。未来的生态农业、绿色工业、清洁优美的城市。创造绿色世界之路。绿色世界的蓝图，运行规范、政策；新世界的火车头——科学突破，技术进步；做绿色世界的合格公民。

5.《资源与财富大国》

新技术新产业革命将突破传统的资源与财富观念，21 世纪的中国将成为一个新的资源与财富大国。

认识资源的辩证观。资源的更新与替代，资源优势的动态观。

科学技术与产业革命。解放“ 第一生产力 ”，产业革命的三维效应，新世纪的曙光，科教兴国战略。

从资源大国到财富大国。未来新产业领域和特点，生物科学的回归与统治，向科技“ 制高点 ”进军，东方大国再度辉煌。

6.《古代沧海的变迁》

地球外壳的演变，人类与生态的进化，山西省域由远古沧海变为近代煤海，实为典型例证。

史前共生共荣的生物圈。从龙骨说起，煤与森林，第四纪的生态环境。

原始人依附于自然。神农、黄帝，火、石、陶器，采猎、农业与生态。仰韶——龙山文化，尧舜社会，向自然索取升级。古代农耕的经济与生态。由新石器到铜铁工具，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由农耕到工商业，由屯田到人口重压，毁林垦田，灾害频繁，生态恶化。绿色高原变成黄土高原。

7.《近代实业的评说》

近代社会的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极度恶化。山西省域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社会进步与环境破坏有喜有忧。地貌变色的思考：怎样由绿变黄，又由黄变黑？！近代实业的福与祸，当代工业建设的得与失。“ 乌金墨玉 ”之乡，工业文明伴随着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煤炭工业为龙头的重型结构：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益的资源型经济。

近代农业的成就与忧患。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农村经济增长，农业生态恶化，两个系统的冲突与矛盾。城市建设的快与慢。近代中心城市，现代“ 城市病 ”。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心，与生态环境负荷中心

相互制约的特殊复合系统。

环境文明的曙光：保护山西的明天，再创绿色生态高原。

8.《自然物流的一角》

开发利用可再生资源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山西省域的资源优势：以煤炭为主的不可再生的矿藏资源，其他可永续利用的自然资源的丰度及其利用前景。

支柱矿产——煤炭资源。中国能源的“明珠”，晋人的“财源”；有限资源枯竭的预警，经济开采时限；负效应——黑色与沉寂。

人类的根——土地，广袤多姿，人口负荷，流失严重。生命之源——水，极度缺水的危机，水质普遍污染。人类的近邻——生物，林草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开发利用和保护很差。大气的变幻——气候，复杂要素丰富，利用不充分，自然灾害频繁。珍惜稀有资源，节约有限资源，开发可永续利用的资源。

9.《遗产生态的魅力》

生态文明将是 21 世纪的特征。山西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生态资源极为丰厚和珍贵，是新世纪最有魅力的一种生态文明资源。

遗产的生态意识——人类的新觉醒。世纪遗产公约，遗产政策与行动。

文化遗产生态资源：史前远古人类，古战场，古城址，宗教石窟，壁画雕塑，民居建筑，寺院庙宇，古墓帝陵。

自然遗产生态资源：神奇“界标”，森林遗景，河流渡口，湖泊遗迹，泉木瀑布，宕溶洞穴，动植物化石群，地下煤海，盐湖景观，温泉地热，清凉气爽，高山草甸。

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因缘，保护、开发和利用，展望生态文明的前景。

10.《新世纪发展之路》

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求索新世纪发展之路。21 世纪的山西省域选择什么样的新支柱产业，向什么样的经济大省或强省发展？

大文化商品的价值。从一座煤矿说起，看不可再生资源的优势和价值；从一座古庙的文化，看可永续利用资源的优势和价值。

绿色文化产业。以太阳能转化为基础的可再生资源，建设绿色产业体系；以人类文化和自然遗产为基础的永续利用资源，建设文化产业体系。

基础设施产业。引黄水利配套工程，交通网络图，信息“高速公路”，

避暑避寒山庄。

生态文明的环境与消费。绿色能源，绿色食物链，清水流域，生态良性循环。生活消费升级：19 世纪的庄园，20 世纪的大厦，21 世纪的绿地。

“巨人”型经济结构。大文化产业为头，绿色支柱产业和基础设施支柱产业为双腿。实现中上游的财力、上中游的收入、上上游的环境——文化生态经济大省＋新能源大省＝持续发展实力强省。

《生态经济丛书》总序

（一）

世纪之交正向我们走来。在中国的大地上奏响了两个时代的强音。一个是来自国际社会的声音：世界人民将迈着怎样的步伐走向 21 世纪？199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世界首脑会议，通过的《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议程》，表明各国政府达成了一个共识：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全面实施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在世界上率先履行这项国际责任和义务， 1994 年 3 月 25 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人民将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保护好地球环境，创造一个能让人类安居乐业的家园。另一个是来自中国社会的声音：中国人民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迎接新时代？1995 年 9 月 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实现达小康目标的第二步战略任务，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这个纲领性的文件，为中国人民展示了跨世纪的宏伟蓝图，指明了迎接新时代的方向。

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前进的永恒主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目标，就是要把世人梦寐以求的这个主题，通过能够遵循的纲领，能够实施的方案，能够执行的政策，能够操作的方法，实现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既能满足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需求，而又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造成危害的新时代。

这套《生态经济丛书》（下简称《丛书》）就是为了响应时代强音的呼唤，面向广大群众，宣传普及当代最新的一门科学知识——生态经济学，希望有更多的人掌握这门科学，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乃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就是我们组织编写这套《丛书》的宗旨。

（二）

生态经济学是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象征。

它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相互交叉、渗透、有机融合而成的一门新兴综合性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生态经济系统。它把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视为一个整体并揭示其相互作用的规律性。这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个飞跃。本世纪 50 年代以来，世界性人口猛增、环境污染、食物短缺、能源紧张、资源破坏等，形成了令人震惊的环境问题，向人类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

钟。随之世界上出现了第一次为拯救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科普宣传高潮。在短短的 20 年里，一大批论述人口、环境、资源方面的科普著作和理论专著，如《寂静的春天》、《封闭的循环》、《只有一个地球》、《2000 年的忧虑》、《立足于地球》、《增长的极限》、《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我们需要一门新的经济学》以及《生存的蓝图》等相继问世。同时形成了广泛动员和广泛参与的大讨论，并且对人类未来前景的看法，大体形成了比较悲观的和比较乐观的两种思潮。不同观点的争论归结到一点：人类能不能从环境危机中拯救自己而且生活得更好。生态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国际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是国际生态经济学的创立人，他在 60 年代发表的《宇宙飞船经济学》一文中，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比喻为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渺小的太空船，警告人们：不能继续贪得无厌地消耗它的自然资源了，否则它就会很快失去控制！他提出的节约地利用资源，控制好飞船航向的主张，引起了世界的巨大反响，涌现出包括前苏联经济学家梅林斯基，和英国生态学家爱得华·哥尔德史密斯、罗马俱乐部创始人意大利奥雷利奥·佩西博士、中国经济学家许涤新教授、日本池田大作博士等一代国际著名生态经济学家。

当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类认识世界的不断突破，推动了生态经济学的发展。从 1984 年 10 月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提出《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的报告，到 1990 年 5 月成立国际生态经济学会，人们达到了一个共识，就是人类必须建立一个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就是持续发展思想。这就为人类解脱生态环境危机提供了新的发展思维和新的发展对策，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世界未来的悲观看法。

最值得庆幸的是，联合国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全球的共同战略，纳入了国际决策，变成了世界各国政府的行动纲领，这标志着生态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代乃至 21 世纪的主流经济学科。与此相适应，第二次环境与发展的科普宣传高潮也在到来。这次宣传的重点，将由唤醒世人危机的警钟，转为鼓舞世人进军的号角，在拯救环境危机中创建美好家园。

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就是为了顺乎时代潮流的昭示，参与第二次环发科普宣传新高潮，充当向新世纪进发鸣锣开道的号角，启迪和引导人们走上以生态经济科学为指导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

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强盛的基础。这套《丛书》就是为了适应这一需求，采用喜闻乐读的形式和题材，从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阐述评介生态经济学的产生背景、思想渊

源、观点论据、理论核心、战略对策以及实证案例。从而达到用这门科学理论武装人们，提高环境意识和生态觉悟，鼓舞人们自觉自愿地投身到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创建未来的伟大事业中去。

这套《丛书》放眼世界、面向未来。它是在当代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城市、生态技术、生态伦理、生态教育、生态哲学、生态医学以及人口生态学、灾害经济学等多分支学科的思想精华和实验结晶、综合归纳而成的一部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科普专著。特别是把中国和山西省域作为实证案例，既充实丰富了《丛书》的内容，又突出显示了它的特色。世人旨知，中国是地球家园中的一个最大的古老家族，山西省域又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两个案例不仅在人类文明与环境演变方面具有代表性，而且在现代社会与生态资源循环作用方面也具有典型意义。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生态和资源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中国，特别是在以煤炭能源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山西省域，把保护环境、生态和资源与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紧密结合起来，尤为重要和迫切。

这套《丛书》的内容结构包括 10 个方面或侧面，也就自然构成了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各有侧重的 10 册专著。虽然每册专著都保持了各自的内涵、外延和风格，但是它们都具有理论性、知识性、经验性、政策性和资料性的共同特点。所以，可供领导决策、科学研究、理论教学、业务工作以及广大读者参考阅读。

（四）

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进行科学实验，在国际上仅仅有 20 多年，在中国也不过 10 多年的历史，虽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而且被世人公认为当代和未来的主流经济学科，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正在成长积累过程中的年轻学科。在理论和方法的诸多领域，还有待于开拓和深入，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在《中国 21 世纪议程》公布之后，中国科学院于 1994 年 6 月编制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科学院优选项目计划》，初步确定了 11 个优先领域、 140 多个优选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 1995 年 5 月也成立了生态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这就标志着生态经济学研究，从暂学思辩进入了应用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新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将成为解决和解释生态经济问题的主要工具；能量转换中的价值流分析将成为生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诸如此类的新动态、新成果和新观点，没有也不可能都写进《丛书》中去。

编写这套《丛书》的倡议，是在 1993 年初山西省生态经济学会成立暨首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来的，随即得到了山西省领导同志和富有经验的老领

导、老专家的大力支持；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农经学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术权威单位的著名学者、专家和教授热情鼓励、精心指导；山西经济出版社的领导热心帮助策划；山西省 20 多个单位的 60 多位领导、专家和学者鼎力合作，经过一年酝酿筹划，两年撰写、统编，基本完成了《丛书》的编写出版任务。在此特向所有为《丛书》编写出版付出辛劳的各位女士和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这套《丛书》无论在理论观点和知识体系方面，还是在论据资料和引证案例或其他方面，都会有错误、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生态经济丛书》编委会

1996 年 1 月

遗产生态的魅力

导　论　文化自然遗产资源与世界生态

自从人类文明起源之后，人类从来没有像进入 20 世纪以来这样迫切地关心自己所处的这个空间环境，这样密切地注意原本和自己共存于一起的所有空间环境中的物类的存在状态：宏观的或者微观的，自然的或者文化的，有形的或者无形的（如大气质量），过去的或未来的。人类之所以这样重视和自己共存的所有物类的存在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人类已经注意到自身存在的环境正在产生着种种危机。人类想从同在一个空间环境中的物类那里找到自身生存状态的影子，以寻求种种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生态借鉴。正是从这里，人类和所有与其共存物类之间产生的具有共生环境特征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产生的所有经验和知识，也就形成了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生态科学的基本理论。

在当代人类的心目中，世间共存于同一空间环境中的所有物类，如能永恒地保持一种平衡和谐的共生状态，那肯定是一个理想与美好的世界。

而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美好理想，一种正由数十亿人共同追求的美好理想。横陈在这种美好理想之前的，则是当代人类还无法洞彻的各种各样的生态问题以及生态矛盾。例如人所共知的事实，当代世界人口正在不断地急骤膨胀，而各种自然资源和许多与人类共存的生物物种，却在迅速消耗殆尽或者濒临灭绝。世间人口数量与世间人均资源占有量之间，已经形成一种难以弥补的空落与差距，遂使“生态经济学”这一典型的新世纪观念应运而生。不能不特别指出，如从另外一种角度审视，当代世界性的市场经济狂潮，无疑也为生态经济学这一世纪之“胎”的呱呱坠地充当了“助产婆”的角色。

也就在这种商品与市场创造的世纪性的契机中，世界规模的旅游经济与观光产业正迎着潮头蓬勃兴起，人类有史以来不断积累起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和许多散布于地球各个角落的原始自然遗产，于今已毫无疑义地真正成为当代人类经济市场角逐中被十分重视的一种时髦经济资源或特殊商品，“旅游生态”与“景观生态”业已成为 20 世纪之末最新潮的经济理论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专门概念。国际间成立了很具权威的国际景观生态协会一类的组织，而且出现了像国际景观生态协会副主席佛曼（Forman　R，T，）和高德（GodonM.）所著的《景观生态学》那样的理论专著。

人类从类人猿发展到智人阶段，所走过的历程少说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而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这个自然环境的形成时间之久远，人类则已经无法予以确计。何谓“文化遗产”？在此无疑是指人类起源以来，由人类行为促使形成而又在人类和自然双重作用之后孑遗的典型可见事物，诸如自石器时代以来保存至今的各种原始文化遗迹、城堡古建、陵墓寺庙、园林雕塑、名人故居、战场遗址等等。什么是“自然遗产”？在此无非是指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上的，依自然发展规律而形成的，但又在自然与人类双重行为作用之下孑遗的一切可见之物体，诸如森林、草原、海洋、河流、峡谷、湖泊、

奇异山峰、泉流瀑布、岩溶洞穴、珍禽异兽、奇花异卉、高山草甸、自然天险等等。

显而易见，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毋庸置疑早已成为世人心目中全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完美地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不但是维护当今世界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而且也是藉以总结获知已逝历史时代生态状况的重要渠道及物质依据，同时，还可以为制定未来世界的生态远景规划，提供最为实际和富有成效的实物借鉴。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若与一些老牌的工业发达国家相比，大规模的工业污染和资源消耗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问题，可以说是稍稍来迟了一步。当然，在有关生态治理的对策性战略研究方面，我们也明显落后于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其中，文化与自然遗产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问题，对我们许多人来讲，即是一个非常新颖的社会性课题。

有关文化与自然遗产生态的研究方法，应该有多种方式或多种角度，比如可以从其类型结构进行，也可以从其地域结构入手。若从类型结构讲，文化与自然遗产显然属于景观生态这一理论范畴。而现在在这里，我们却是先从一个具有典型规模和典型意义且地理特征十分明显的生态区域开始研究与探索。这个典型的生态区域，即是处于中国版图中北部的山西省。自古以来，人类根据其地形与地貌的总体特征，又常常习惯地称它为山西高原。也许是由于地理方面的封闭，山西这块大地自古以来常发生一些历史与文化的特殊事件，在自然变迁上也出现过许多生态之谜。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演进，使后人常常对山西大地知之甚少。中国当代散文家余秋雨先生的一篇《抱愧山西》，行文朴实，感情真挚，大作面世之后，立即令各界（首先是山西人）哗然，说明这难得的文章，多少真实地揭示了历来国人对山西总体认识的一种典型心态。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先生的笔触所及，实际已经触及到了山西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生态问题。就在这一点上，更使许多人（首先还是山西人）读过此文之后，即使掩卷许久，而心中不免时时产生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许多人的心绪实际上都在寻求一种东西，那就是寻求山西高原上的遗产资源在整个中国遗产生态天平上的价值与位置，寻求它在整个世界遗产生态天平上的价值与位置，乃至寻求其永恒。

第一章　遗产生态意识——人类在 20 世纪的新觉醒

如果没有上世纪末冷兵器在大多数国家的逐渐消失，而新式火器又迅速装备了一些战争狂人的话，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能不会给人类社会造成那样大规模的浩劫，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如果瓦特不去发明蒸汽机，爱迪生也不去倡导集中供电一类的创造，可能就不会出现对石油、煤炭以及各种矿产资源的占有垄断权利而形成全球性的能源掠夺，还或许根本就不会出现当今世界成千上万座工业大都市以及由此而发生的种种环境污染；如果地球上的总人口数量能够永远控制在 19 世纪末 16 亿人的水平，而不是如今 60 亿人的规模，那么我们人类也就不会为了吃饭而将大片大片的原始森林伐光毁尽去改种粮食作物，以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今天全球性的大气循环紊乱失调，水源涵养机能衰退，水土流失，江河断流，泉水枯竭。

作者无意诅咒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实际上当人类在为各种经济指标上升和商品疾速丰富而感到某种欢乐和亢奋之时，为生态方面的恶化而产生的反思情绪，也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人类自身。这种与发展共生的生态反思，即是许多新的觉醒的酝酿和启始。

第一节　世界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组织——一次全球性的启蒙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鉴于战争的破坏与自然的灾害，以及由于人口增长和工业社会造成的环境灾难，许多国家的有识之士越来越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许多优秀自然文化遗产的安全而担忧。如建于公元前 3000 年以前的世界宗教圣地耶路撒冷古城，即不断受到中东战争的威胁；又如位于埃及尼罗河畔的努比亚神庙遗址，因为受到了水害的侵蚀而引起联合国中 50 多个国家的关注；由于贫困与经费不足，存在于非洲的困难显得更为突出，如属于埃塞俄比亚的塞米思国家公园、津巴布韦的萨比与切俄雷天然动物园和坦桑尼亚东南部的塞卢斯狩猎保护区，以及像扎伊尔加兰巴国家公园那样一些保存有稀世动植物的地方，也都受到人为侵害或自然侵害。

除了关心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优秀自然文化遗产外，许多科学家和政治家甚至认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历史遗存也应该予以保护，例如那座位于波兰南部因德国纳粹在此残杀了 400 万和平人民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正是由于在这样一种全球性的对世界各地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关心与担忧气氛之中，　1972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2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法国巴黎举行第 17 届会议，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并决定同时成立世界遗产组织，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隶属下的世界遗产委员会。这个世界性的遗产委员会的基本义务和职权是，对加入世界遗产组织各个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进行严格审定，然后将审定合格者世界遗产公约的标志，它象征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央的正方形是人类创造的形状，圆圈代表大自然，两者密切相连。标志呈圆形，既象征全世界，也象征要保护[1]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此同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又设立了专项保护基金，在全球范围内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各个国家的著名文化自然遗产项目，实施有计划的保护措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那次会议上所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规范的书面语言准确地界定了世界遗产组织计划给予保护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标准范围。

公约第 1 条就明确指定了世界文化遗产所应包括的内容：

> 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

公约第 2 条又明确指定了世界自然遗产所应包括的内容：

---

[1] ①《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

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①]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世界遗产公约的出台和世界遗产组织的宣告成立，对整个人类的生态观念来讲，无疑成为一次成功的全球性的启蒙，这种启蒙从而使当代人类的生态经济科学更加趋于完善，也更加成熟。

从世界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组织 1972 年 11 月在巴黎诞生的那个时刻起，到 1991 年年末的时候，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全世界已经有 68 个国家成为世界遗产组织的成员国，而这些国家获得世界遗产证书的具有世界知名度的文化与自然遗产项目的总数，已经多达 323 项。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世界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组织的诞生，这项富有成效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的工作不只是仅仅保护了全世界的一大批著名文化与自然遗产，而令人惊叹的是它还为世界和平与全球性的学术文化交流起到了一种“添加剂”或“润滑剂”的卓越作用。世人皆知的事实还有，由于许多著名的世界级的文化与自然风光名胜在此之后得到极为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又极大地促进了全世界的旅游业与观光业的蓬勃发展。在全球，诸如埃及努比亚遗址和金字塔，希腊奥林匹亚古遗址与雅典卫城，以及法国的凡尔赛宫和南斯拉夫的斯科契扬岩溶洞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历史中心与美国的黄石国家公园，这些有世界著名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地方，无一不成为当今国际旅游大潮中千万游客心中向往的观光盛地。可以说，1972 年后所开始的世界性的文化自然遗产保护及利用之举，对世界各国的国际旅游业来说，确实是造就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契机。根据国际旅游组织公布的统计数字， 1969 年时，全球参与国际旅游的年人数是 15 410 万人，而当年的国际旅游总收入仅 154 亿美元。从那时到 1987 年，时间仅仅过去 18 年，但 1987 年全球参与国际旅游的年人数竟一跃而达到 35 500 万人，当年的国际旅游总收入则飞速增长到 1 500 亿美元，几乎是 1969 年的 10 倍。1987 年 9 月 27 日，世界旅游组织秘书长帕尔在这个“世界旅游日”上致辞说：“到本世纪末，旅游业将成为世界第一产业。”实际上，在距离本世纪最后三五年时，全球国际旅游业年总收入已经突破了 2000 亿美元，每年各国出国旅游的总人数也已经突破了 5 亿人的标线。

于是，旅游业凭藉着遍布全球各个角落的文化自然遗产资源，创造了 20 世纪末叶真正的经济奇迹，这一切使很多人认识到旅游业和观光业可能是未

[①] 《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内容共 8 项 38 条。

来不再疲衰的一项“朝阳产业”，人们也从获得保护利用的大批文化自然遗产这一由举世之力才得以挽回的生境区中，领悟到那些曾经貌似陈旧破败或形近偏僻荒蛮的大量文化自然遗产，竟然也能成为一种足可转化为巨大商品市场和经济实力的特殊魅力型资源。

本世纪 70 年代由联合国出面一先一后成立的世界遗产组织与世界旅游组织，[①] 20 多年来确实以其广泛的实践和创造的佳绩，成为一次全球性的启蒙。这种启蒙不但充满生态之灵，而且充满经济之灵。不言而喻，它无疑要给未来这个星球的人类生活和社会秩序带来深远的影响。

[①] 1972 年世界遗产组织成立后，1975 年联合国又成立了一个政府间的国际性旅游机构，即世界旅游组织。到 80 年代初期，该组织已经拥有 100 多个成员国。

第二节　中国的遗产政策与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于 1978 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组织的。然而，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政府对保护文化自然遗产资源已经有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具体措施。如在 1956 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时，就通过了关于“在全国各省（区）划定天然森林禁伐区，保存自然植被以供科学研究的需要”的提案。到了 1959 年年初时，国家林业部则更为明确地规定：在“有条件的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划为自然保护区，禁止狩猎，建立科学研究机构进行鸟兽与狩猎的科学研究工作。”[①]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方面，也早在 1961 年时中国政府就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哲行条例》，并于同年 3 月 4 日首次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 年 4 月时，国家文化部又颁发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

进入 1978 年以后，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进下，中国政府对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的保护及利用工作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有关部门在这一方面已经颁布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些制度是：①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②历史文化名城制度；③风景名胜区制度；④自然保护区制度；⑤森林公园制度；⑥旅游度假区制度。

以上 6 项有关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的国家制度，分别由政府的文物、建设、林业及旅游行政部门施行管理，而每项制度又在实施中采取了分级管理的办法。例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就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区别；风景名胜区制度则有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省级风景名胜区的区别；同样，历史文化名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以及旅游度假区也都有国家级与省级的区别。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各省区达到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与旅游度假区的总数，已经多达数千处，几乎遍布全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中国政府对境内潜在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仍在进行大量的调查与发掘工作，随之而来的将是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保护利用事业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中更加深入的发展。中国文化自然遗产财富将会展现出更辉煌的魅力。

[①] 《自然保护区工作手册》，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三节　世界遗产中的中国部分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认为：“保护不论属于哪国人民的这类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而且“考虑到部分文化或自然遗产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

为此，世界遗产组织在其工作序列中专门设立了《世界遗产目录》，凡属于世界遗产组织的成员国均享有将各自国家重要的文化与自然遗产项目申请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权利，而世界遗产组织则有权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成员国所申请列入《世界遗产目录》的项目给予考察与审核，凡经考察审核确实达到规定标准的，该申请项目方能得到一份由世界遗产组织颁发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证书》，而后才能获得对该项目提供的资金或技术援助与保护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1978 年加入世界遗产组织之后，积极履行了世界遗产公约各缔约国所共同制定的成员国应履行的义务，陆续向世界遗产目录提供优秀申请项目。至 1996 年底，中国获得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证书的项目已达到 16 项。它们分别为：

万里长城；
北京故宫；
敦煌莫高窟；
秦始皇陵及其兵马俑；
山东泰山；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
安徽黄山，
湖北武当山；
山东曲阜孔庙孔府孔林；
河北承德避暑山庄；
四川九寨沟；
四川黄龙风景区；
湖南武陵源风景区；
西藏布达拉宫；
江西庐山；
四川峨嵋山·乐山大佛。

除以上 16 项著名文化与自然遗产已被《世界遗产目录》接收并获得世界遗产证书之外，目前正在向世界遗产组织申报的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项目还有多处。例如具有悠久历史的以水城著称于世的苏州古城与桂林山水中的漓江风景区等。其中，中国境内仅存的几座古城之一而且城墙设施保存极其

完整的山西平遥古城，也已成为世界遗产目录的待批项目。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中，中国的文化与自然遗产项目已经成为整个世界遗产目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　山西文化遗产生态资源（上）

传说夏时禹分九州，冀州是为天下九州之首州。至于冀州之地域，历来史地学家又都相信，春秋之后之三晋即今日之山西，乃为古冀州的基本领地范围。故《吕氏春秋·有始览》则曰：“西河之间为冀州，晋也。”南宋时建阳（今属福建）人蔡沈，学者们称其为九峰先生。他用于专门攻读研究《尚书》的时间就有数十年，所以对于夏商周三代之事尤为通晓。他在《书集传》中写到古冀州地域时，也认为：“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东，豫河之北。”这里所讲的三面之河，其实是一条河，那就是黄河，只不过他把位于今山东和陕西、河南的黄河分别称作兖河、雍河、豫河而已。由此可知，所谓古冀州的地面，也确实包括了今山西省的基本范围。

我们中国人从来又把自己称作华人或龙的传人。当代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认为，所谓“中国”一词出现的最早时间当在夏代（距今约 4000 年）以前的尧舜禹时期，而他们的活动中心即最早的“中国”所指，也就在今天的山西南部一带。所以，苏秉琦先生说：“我们讲晋南一带的‘中国’一词就把‘华、龙’等都包揽到一处了。”[①]根据近年来新石器时代考古成果的证明，发生在大约 7000 年前的辽西红山文化与同一时期发生在我国中原地区的颇具规模的仰韶文化，后来（距今大约 6000—5000 年前）即在今天的山西高原北中部相撞击，遂产生了悠久的中华文明的源头。

“山西”，作为隋炀帝时期就已出现的一个历史行政区域，虽然数千年来其行政名称随着朝代的更替常常发生变换，然而其基本地域范围则无太大的区别。直到元代又置河东山西道宣慰使司，明初洪武元年（公元 1368 年）改置山西行中书省，从此之后山西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省区，遂逐渐固定规范下来。

谈及对山西地理历史形势之分析，言简意赅莫过于明末清初人顾祖禹的论述。他说：“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又说：“吾盖征之春秋之世，而知所以用山西者矣。”[②]他甚至可以从夏商周开始经两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两宋元明清，去分析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或军事，或政治，或经济，在他看来，整个一部中华史，“非晋之大有造于天下也”!他一再发出迴肠荡气般的感叹：“山西之形势诚重矣！”[③]

雄踞于我国北方的山西高原，作为一个地理单元它充满了丰富独特的生态风格，而数千年来华夏民族在山西高原上创造并遗存的无数处文化遗产资源，则更使世人感到璀灿无比。

[①] 《中国建设》，1987 年第 9 期。

[②] 《〈谈史方舆纪要〉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99—200 页。

[③] 《〈谈史方舆纪要〉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01、207 页。

第一节　史前与远古人类文化遗存

根据古人类学家的研究和考古学家的发现，人类诞生至今，大约已有数百万年的历史，而有文字确实记载或传说口碑的人类文明史，在我们中国据知也有 5000 年以上。

世人通常习惯于称呼山西高原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或者是华夏民族的摇篮之一，其原因并非仅仅因为自古以来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世世代代传承着许多关于中华先祖（诸如尧舜禹等）的美丽传说，而且迄今为止，现代考古的诸多发现，也足以说明山西高原的确曾是史前与远古人类活动的中心区域之一。

也许正因为“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一类远古传说的影响力，山西高原从本世纪初就成为中国第一批现代考古学家首先关注的地区。1926 年的农历春节前后，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李济先生，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山西省夏县西阴村一带进行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的调查。不久又组织了一次对该遗址的发掘，这实际上也是由我们中国考古学家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第一次真正独立主持的考古发掘活动。

70 年前李济先生主持的这次对西阴遗址的发掘，虽然只开挖了 8 个 2×2 米的探方，却获得了足足 60 多箱属于仰韶文化时期庙底沟类型的遗存陶片。其中仅第 4 探方中出土的陶片数量就有 17　372 片之多。最使人意外的是，在这次发掘中发掘者竟获得了半枚属于大约近于 5000 年前由人工切割的蚕茧化石。这一消息曾经震动了当时的中外考古界和文化界。直到一年多后即 1927 年，当李济先生回忆到他们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这次惊人发现时，仍然清晰地保留着他们对西阴遗址的第一次目测印象：“我们于 21 日（1926 年 3 月）离开运城，　22 日到达夏县——传说中的夏朝王都。据传大禹庙以及禹王后裔和许多著名大臣的陵墓都在这里……可是，在我们寻访这些陵墓的途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河头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①]1994 年 10 月到 11 月间，为了迎接 1996 年“西阴村遗址发掘 70 周年暨李济先生百岁诞辰纪念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们再一次来到西阴遗址，在当年李济先生发掘地点以西百余米处进行了又一次发掘。这次发掘共开 5×5 米探方 7 个，又继续清理濠沟、房址、陶窑、灰坑共 40 余处遗迹，复原了陶器百余件。考古学家们认为，此次发掘较 70 年前的那次发掘其内容更为丰富，而且基本摸清了西阴遗址的面积在 30 万平方米左右。1926 年李济先生首次发掘的位置属于该遗址的居住区范围，而 1994

[①] 转引自《考古》，1983 年第 8 期，第 764 页。“袁先生”指当时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先生。“交头河”在今临汾市东南，当地曾发现有仰韶时期陶片遗存。

年这次发掘的地点当为该遗址的制陶场所。至今为止，虽然还未发现该遗址的墓葬区，但人们依据当地的地理环境分析，其墓葬区可能位于整个遗址的东北部位。根据对该遗址各方面的调查和发掘情况分析，西阴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大型先民聚落地，其年代跨度大约从庙底沟文化早期（距今约 5000 年前）直至二里冈文化时期（距今约 3500 年前），聚落单位延续时间当在 1 500 年左右。

有许多学者们已经呼吁，根据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惯例，应该将以往人们所称的仰韶时期的“庙底沟文化”正式易名为“西阴文化”。更有很多人认为，这样做也是对我国现代考古学的先驱李济先生暨中国现代独立考古发掘工作的发端是一个富有深远意义的纪念。

如果说本世纪 20 年代李济先生对西阴遗址的发掘尤如吹响了中国现代独立考古的一声号角的话，那么新中国成立后的近半个世纪，则应该真正称作中国现代考古的黄金时代。

1949 年之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于山西一省，仅在史前与远古人类文化遗存方面，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如下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如 1954 年发现了襄汾县丁村人文化遗址；1957 年发现了芮城县匼河文化遗址；1959 年发现了夏县东下冯文化遗址；1961 年发现了芮城县西侯度文化遗址；1963 年发现了朔州市峙峪文化遗址；1970 年发现了沁水县下川文化遗址；1973 年发现了阳高县许家窑文化遗址；1978 年发现了襄汾县陶寺文化遗址；1980 年发现了太谷县白燕文化遗址；1981 年发现了汾阳县峪道河文化遗址；1982 年发现了汾阳县杏花村文化遗址；1984 年发现了襄汾县大岗堆文化遗址；1987 年发现了忻州市游邀文化遗址；1990 年发现了大同马家小村文化遗址；1991 年发现了翼城县枣园文化遗存；1993 年发现了闻喜县坡头文化遗存……

以上列举的仅仅是分布在山西省境内至今已经发现了的非常典型的一些史前与远古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其中每一处都具有一定时期或类型的代表性。例如沁水县下川细石器文化遗址，它实际上代表了分布于与其毗邻地区如垣曲、阳城以及沁水诸县的 10 余处同一类型的细石器文化遗存。又如襄汾县陶寺文化遗址，属于同一类型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在临汾盆地与其近邻地区，已经被发现确认的多达数十处以上。其他如运城盆地的东下冯文化遗址，或晋中盆地的白燕文化遗址，也都属于它们所在地区一批相当数量的相同文化类型的典型代表。若将目前在山西境内已经发现的一系列史前与远古时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依照距今时间顺序给予排列，我们就会很自然地发现，从距今 18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直至距今 3500 年左右的夏代，几乎可以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前后衔接的史前时代的文化遗产“锁链”：

西侯度遗址，距今 180 万年；

匼河遗址，距今 100—75 万年；

丁村遗址，距今约 10 万年；

许家窑遗址，距今约 10—7 万年；

峙峪遗址，距今约 3 万年；

下川遗址，距今约 2.4—1.6 万年；

枣园遗址，距今 7000—4500 年；

白燕遗址，距今 5000—3000 年；

陶寺遗址，距今 4800—3200 年；

东下冯遗址，距今 4600—3000 年；……

山西高原上客观存在的这一个史前与远古时期古人类文化遗址的“锁链”，事实上从另外一种角度证实了两个问题，那就是一方面证实了山西高原从上百万年至数千年以前，从环境空间上讲它曾经是一个华夏民族先祖们的“乐园”，而另外一方面则证实了这个“乐园”存在的时间是如何的悠久而长远。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共发现距今约 13 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近 200 处，而其中仅在山西省境内发现的就有 150 余处，[①]约占全国同类遗址已发现总数的 3/4 还多。如果加上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类型遗址的数量，山西省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的总数则已经接近 300 处。山西高原实际已成为目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

在山西的近 300 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中，西侯度遗址是目前中国国内发现的距今时间最远的（约 180 万年以前）一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而丁村遗址则是中国国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中最富特色的一处。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就指出过：“无论在中国和欧洲从前都没有发现过类似的文化。它是在中国黄河中下游、汾河沿岸生活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文化。”[②]

如果说丁村遗址的发现在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方面具有世界意义的话，那么下川的细石器遗址发现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方面，就具有同等重要的世界意义。

1972 年和 1978 年的两次发掘，共在山西省沁水县境内历山脚下的下川遗址出土了上万件石器制品，其中许多制品说明在 2.4—1.6 万年以前，居住在当地的“下川人”已能普遍地使用复合工具。在这里发现的很多细石器，不仅适宜于复合镶嵌成带柄的刀、锯和短剑一类工具，而且还可以复合制成弓箭、标枪等较为进步的投射类武器。除此而外，在下川遗址中发现的磨盘、砺石和锛刃状的石器，还说明距今约 2 万年前的“下川人”过的已是一种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原始经济生活。“下川遗址的发现，表明远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细石器工艺已经成熟。下川遗址的细石器代表了旧石

[①]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 页。

[②] 《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1958 年版。

器时代石器制作技术的最高水平。”[①]

过去曾有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华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是来自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针对这种说法，曾经亲自参加过下川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王建先生则认为：“下川遗址的发现，更有理由认为，以楔状石核为特征的分布于东亚、北亚、北美的这一典型细石器（或称发达细石器）技术传统，应起源于我国华北一带。”[②]著名的考古学家与第四纪地质学家贾兰坡先生讲到下川遗址，直言这“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细石器文化遗址”。[③]

本世纪 70 年代初期，贾兰坡先生等又提出了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存在着至少两个系统的理论。所谓“两个系统”，一个是指以船头状刮削器与雕刻器为特征传统的“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另一个则是指以大石片砍砸器与三棱大尖状器为特征传统的“匼河——丁村系。”这两个系统在地理上的分布态势起码向我们的思考作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提示，那就是：西南延伸到秦岭山脉的华山脚下，东北则一直到燕山山脉的南端，而在这两者之间的广袤的山西高原，分明不就是一处已被现代考古成果逐步证实了的，并确实属于原始人类所钟情喜爱的一片史前石器时代文化自由繁衍的特别区域吗？

看来，答案应该就是如此。

人所共知，根据地质年代的计算，从距今 240—73 万年以前为早更新世时期。在早更新世时期，当时的山西高原除了太行、太岳、吕梁、中条、五台诸山脉的高峻山峰外，地质科学家们则认为后来山西中部的一系列盆地地貌在那时还是许多硕大的古湖，如大同古湖、忻定古湖、晋中古湖、临汾古湖、侯马古湖与运城古湖、三门古湖等。发现于晋西南的西侯度遗址和匼河遗址的古人类文化，应该属于这一地质时期。当时的“西侯度人”已能用火，因为在这里发现了被火烧过的骨类化石。依据发现的与“西侯度人”傍生的动物群化石分析，科学家们认为当时这里应该是“四季分明的疏林草原环境”。[①]

从距今 73—14 万年前，被称作中更新世时期。在这个时期，山西高原上的许多古湖泊进入萎缩阶段，一些古河道如后来的漳河、沁河以及三川河、昕水河等可能逐渐开始形成或完全贯通，但在中部几个大的盆地，则仍然保留着一些相当规模的湖泊。到目前为止，中更新世时期山西地区发现的史前古人类文化遗址极少，只在南部边沿地带发现了垣曲南海峪古人类文化的洞穴遗存，其中发现了石器制品、动物化石和用火痕迹。

---

①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 页。

② 《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44 页。

③ 《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2 页。

①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 页。

所谓“晚更新世时期”，是指从距今 14.5—1 万年前这样一个时间跨度。山西省过去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中大多数属于晚更新世时期。如距今约 10 万年的丁村遗址，距今约 10—7 万年的许家窑遗址，距今约 3 万年的峙峪遗址和距今约 2 万年的下川遗址等。据气候学家和地质学家考证，晚更新世时期的山西高原曾经经历了未次间冰期和未次冰期。冰期内当时的年平均气温可能比现在还要低 10℃左右，但是那时的古人类已经掌握了用火技术，并且可以用兽皮缝制衣服或搭造简单的居处，以抵御冬天或夜晚的寒冷。加上山西山地中石灰岩发育面积相对广泛，岩溶洞穴与岩棚的分布也就非常密集，这为当时的远古人类在储藏采集物与狩猎物方面，以及栖居方面都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条件。

当时代发展到距今约 1 万年时，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进入交叉期，从诸多方面分析，此时的山西高原已经进入原始种植农业的萌芽时期。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说过：“我国远古文化的发展分三个地段或阶段：即山林文化时期、山麓文化时期和河谷文化时期。具体地说，下川文化是山林文化时期，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似乎采集占很重要地位，它的后期应该是布氏分类中的食物采集时期，前仰韶文化是食物的生产时期，即农业出现后已发展了相当时期，并初具规模的时期。而在两者之间尚有四五千年的时间，就是山麓文化时期。如果以下川文化分布的高程为标志，它（指山麓文化时期）的分布地应在 900 米以下的山麓或山前坡地。我们相信，在这个高程的地段，我们会发现我们祖先最早从事耕植的遗迹。”他又说：“大概在一万多年前，分散在黄河中游泾、渭、汾、沁、洛诸河流域，高程较高的原边和山麓的氏族人群，他们在收集食物的活动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正是在这时，也在这些地方，我们祖先第一次开始了控制他们的食物生产，粟的种植史就开始了。”①

石兴邦先生的这一段著名论述给了我们很有益的启示。山西高原整个第四纪时期的生态变化，总的讲可以用这样几个显著的特征去给以描述，即由北到南的古湖群的萎缩，产生了无数条山间的河流和大量适宜于原始农业发展的山前坡地，随着冰期的最后消失，整个环境与气候越来越适宜于原始人类的生存和生产活动。截至本世纪 80 年代末期，山西省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接近 1 100 处。可以说，其中绝大多数都座落于一种背山面水向阳的山前台地的环境中。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观察，山西高原确实是原始人类聚集的一个密集地区。

本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山西境内的东下冯遗址与陶寺遗址先后得以发掘，因为这两处遗址密切相关着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所以山西高原上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再一次受到了中外考古界和历史界人士的关注。

东下冯遗址，位于 1926 年李济先生所发掘西阴遗址东北约 10 公里的地方。整个遗址分为东、西、北、中四个区，总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 1959 年遗址发现后， 1974 年和 1978 年首先发掘了东、北、中三个区，基本属

于夏商时期（距今约 3900—3600 年前）遗址。揭露面积 6723 平方米，还不到该遗址总面积的 3%，但已发现夏商之际的古城址 1 座，住房遗址 53 座，圆型建筑遗址 20 座，储藏室 14 座，灰坑 138 个，水井 5 眼，陶窑 5 座，墓葬 45 座。1980 年，考古工作者又发掘了该遗址的西区，属于庙底沟二期至龙山文化时期（距今约 5000—4000 年前）的遗存。又发掘面积 1 000 余平方米，发现了龙山时期的古人类住房遗址 10 座，灰坑 20 个。两次发掘的结果，东下冯遗址发现的古人类遗物主要为大量的陶器：鬲、斝、甗、瓮、豆、盘、尊、鼎、盆、罐、钵、甑等，种类十分齐全；其次则为石器与骨器类的各种工具，如斧、凿、镰、锛、刀、杵、铲、锥、镞、针与纺轮等；尤为可贵的是在该遗址中还发现了 19 件铜制的镞、刀、凿类工具，以及铸铜用的石范，还有古人类用作装饰品的骨簪与陶环等；而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在这里发现的一件打制石磐与大量带有钻灼痕迹的卜骨，以及在灰坑中发现的很多炭化粟粒等。

东下冯遗址中最典型的遗存是属于夏商纪年范围的古人类遗存，所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的发掘者们一致认为：“东下冯遗址正处在传说中的‘夏墟’范围之内，东下冯类型的大致年代又相当于我们估计的夏末商初，因此，东下冯类型遗存对探索夏文化和研究商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①]

自古以来，传说中的“尧”这个人物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这个地方就有着千丝万缕想理也理不清的关系。1978 年春至 1984 年冬，在距离古平阳约 50 公里的地方，考古工作者终于发掘了 20 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的陶寺遗址。消息传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个历来名不见经传的陶寺小村，其名声竟能远播中外。连祖祖辈辈住在陶寺村的村民们，谁也没有想到在村南那块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耕地中，竟然一下子发现了 1000 余座属于 4500—4000 多年前的古人类墓葬。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约 7 公里多的汾河东岸塔儿山西麓，总面积在 300 多万平方米以上，而已发掘的面积约 32 000 平方米，仅占该遗址总面积的 1 %多一些。在已发掘的 32 000 平方米中，其中 2000 平方米属远古人类的居住区，30 000 平方米则是先民们的墓葬区。

陶寺遗址已发掘的 1 000 余座墓葬，基本上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属大型墓，共 6 座，墓中随葬品最少的近 100 件，最多的达 200 余件；第二种属中型墓，共 60 余座，随葬品每座从 10 余件到 20 余件不等，且多为生活用品，如陶灶、盆、罐、斝、豆等；第三种属小型墓，数量最多，除 6 座大型墓和 60 余座中型墓外，其余全为小型墓。小型墓中绝大多数都无随葬品，仅有极少数随葬品也多属死者生前的佩饰物或随身武器与工具，如臂环、指环、骨簪、颈饰、石梳、石刀和石钺等。陶寺墓葬的发掘者认为该墓葬群的

[①] 《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15 页。

发现是罕见的。事实说明，从 1 000 余座墓葬所显示的严格等级来看，在距今 4500—4000 多年前，阶级与私有制已是客观存在。最使发掘者振奋的是，从陶寺 6 座大型墓葬中出土的 5 具鼍鼓、5 具特磬、5 具土鼓以及 4 具彩绘龙纹陶盘。特别是颜色还十分鲜艳的蟠龙纹陶盘，从它刚一出土面世的那一时刻起，就成为足以使人产生种种联想的一种圣品。

曾经亲自主持发掘陶寺遗址的考古学家高炜先生，对陶寺大墓中出土的彩绘蟠龙陶盘，曾有过一段谨慎而又中肯的论说：

> 陶寺的蟠龙正出在“夏墟”，它的年代属陶寺早期，距今约四千四五百年，因而很可能就是夏代开国以前夏人的遗存，或谓之“先夏文化”。当然，也不排除可能是尧舜时期某一个部落或豢龙氏部落的遗存。按照尧舜禹的传说，上述龙部落或豢龙氏部落与夏人同属一个大部落联盟。如他们的活动地域在陶寺一带，也就是说在“夏墟”范围内，其文化面貌应与夏人很难区别……都应是夏文化遗存。[①]

实际上，历史上有一个事实在这里被高炜先生所言中。那就是从陶寺往南去不到百公里，在今闻喜县礼元镇当地东南方凤凰塬下有一个叫“董陂”的古湖遗址，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六中称其为“董泽陂”。为什么叫“董陂”或“董泽陂”，据说即为舜时董父豢龙之所在。“董父豢龙”的著名典故其实早在先秦文献《左传》一书中就有过记述。

苏秉琦先生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有着两个重要的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个是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它们都有自己的根（祖先）、自己的标志。两者出现或形成的时间约距今六七千年，都是从自己的祖先衍生或裂变出来的。仰韶文化的一种标志是玫瑰花（包括枝、叶、蕾、冠或仅花冠）；而红山文化的一种标志是龙或仅龙鳞。”[②]苏秉琦先生进一步认为：不晚于距今 5000 年前的时候，“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与燕山地带的红山文化，通过一个类似‘■’形的通道进行接触、交流、撞击。山西的大部分地区正处于这一‘■’形通道上。”[③]苏秉琦先生从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期，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不止一次地诠释和宣传他的这一全新的学术认识。他不但宏观地指出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和山西、河北北部一带是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接触、交流、撞击的对接地区，而且具体地提出龙山文化中斝、鬲等典型的三袋足器的诞生，可能正是南、北两种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接触、交流、撞击的结果。苏秉琦先生还特别指出，位于山西中部的太谷白燕遗址和位于晋南的陶寺遗址的文化遗存，也应该是红山文化、仰韶文化甚至包括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等多种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晶。

---

① 《华夏文明》第 1 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2 页。

② 《中国建设》，1987 年第 9 期。

③ 《三晋考古》第 1 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2 页。

他一再希望人们注意：“小小的晋南一块地方，曾保留远自 7000 年前到距今 2000 余年前的文化传统，可见这个‘直根’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他进一步作出结论说：“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上面所引的这些话来源于苏先生 1987 年时为《中国建设》杂志当年第 9 期所写的一篇短文中。7 年之后，当 85 岁高龄的苏秉琦先生谈到这些研究时说：“80 年代考古工作成果两大项：一是经过山西省境连接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红山与仰韶）文化遗存的研究；二是辽西红山文化坛、庙、家遗址的新发现。科研成果的发表，以 1987 年《中国建设》杂志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最具典型意义。全文不过两千字，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同年《新华文摘》转载。转年（1988 年）高考作为语文‘阅读’试题，达到‘大众化、科学化’范文标准。1985 年 11 月在侯马召开晋文化讨论会的发言提纲、绘的草图；1987 年《晋文化考古》、《文物天地》发表的《给青年人的话》等是该文补充资料。”[①]

为什么这位老人要这样不厌其烦地一再讲到这样一个同样内容的问题呢？以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因为在“80 年代我们揭开了一个‘区系的中国’之谜，1987 年前后，我们又对中国文明起源之谜取得瞩目成果”。在这里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就在考古学家们努力揭示“区系的中国”之谜和中国文明起源之谜的科学研究过程中，遍布于山西高原大地上的 1 000 多处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对他们作出每一个科学的结论该是何等的重要和珍贵。难怪有的学者在晋南陶寺遗址和东下冯遗址发掘之后就断言，这两处重要遗址的发掘，实际上已经为确定“夏墟”及尧所封的“唐邑”之所在地提供了一个“铁证”。[①]

隋代刚立国时，也许是因为其乳母来自于河东，隋文帝就常常从长安过黄河到蒲州（属今山西永济市）巡游。隋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时，当时的怀州刺史李德林随从隋文帝杨坚又一次巡游了河东的蒲州。事后，他写了一首《从驾巡游诗》，其中有“大夏尧遗俗，汾河汉豫游”之句，可见 1 400 多年前这位古人是相信今天的山西南部一带就是尧所封的大夏之地的。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 658 年），皇帝的舅舅长孙无忌向朝廷建议祭祀尧于平阳。从此又可见，起码是在唐朝初年的时候，“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在当时的国人眼里，并无多少异议，而且已见于朝廷所行礼法了。

总之，如果说以上所举的这两个隋唐历史上的例子都基础于一种原始传说的话，那么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现代考古工作，则是立足于科学，正在一步

[①]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自序），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①] 《华夏文明》第 1 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5 页。

一步地接近于历史的本来情景。现在，科学家们把他们正在从事的这项艰辛的工作，已称之为一项重建中华民族史前史的伟大事业。

第二节　古代交通工程遗迹

访古之情与寻古之意，可以说人皆有之，只不过在讲到具体环境与具体人的时候，其深切的程度有所区别罢了。中国古来之州县方志，每每都专辟有“古迹”之卷，而一般“古迹”卷中又往往对各自地方有关交通工程之遗迹给予专记，以供后人瞻仰凭吊或抒发情怀，又能藉以教育晚生之辈，此乃我国 5000 年文明史上传承至今的一种优秀文化传统。在山西这块古老土地上，夏商周以降，交通工程遗迹尤多。古来多少有识之士，凡是临三晋大地者，无不为此叹为观止，而留下千古绝唱者更是代不乏人。如下面一篇：唐代浮梁处，遗牛制尚新。

一朝移岸谷，千载困风尘。
失水鼋鼍没，依城鹳鹊邻。
应无丞相问，倘与牧童亲。
世变形容老，年深战伐频。
无穷怀古意，舍尔适西秦。[①]

这篇典型的五言怀古诗，是明末清初的爱国学者顾炎武于清康熙初年在山西蒲州写的，题曰《蒲州西门外铁牛唐时所造以系浮桥者今河西徙十余里矣》。释其题意，即是：蒲州城的西门外有唐时造的铁牛，原本是系浮桥用的，但是今天的黄河岸已经向西迁移了十多里远，真是沧桑巨变啊！

人们很难想像一座城市会建在一条在世界上也堪称为特大河流的河道上，而且竟起码经历了约近 2500 年以上的历史。然而这的确是一个事实。这就是古蒲州。据史称，古蒲州的城址所在即古蒲坂，亦即舜所建都的地方。可以说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更是一个生态奇迹。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 721 年），蒲州又开始有了一个“河中府”的名称，这可能和它建在黄河河道之中有很大关系。古蒲州在唐代之前曾多次被黄河洪水侵袭过，所以到唐肃宗在位时（公元 756—761 年），肃宗即敕封江、河、淮、济四渎之一黄河之神为“灵源公”，并在蒲州城外西南处敕建河渎神祠，当时的河东节度使郭子仪亲自督建了这一工程。从此以后 1000 余年历朝历代多次重建重修，且香火旺盛，但是黄河的泛滥肆扰仍旧不断。明正德十四年（公元 1519 年）夏，经由民间筹资，仅一次在城西北 0.5 公里处筑护城坝，就用石匠 30 人，民工 300 人，并从中条山和吕梁山中采 1.3 米长、0.3 米宽、0.16 米厚的片石共 8000 条，然后用车、船运至蒲州；又买直径 0.27 米、长 5 米的松柏木料 7 000 根，铸“勾心铁”5 000 多公斤。之后先把木桩钉入河岸地中，再沿木桩层层砌石，在最顶层的石片之两端凿孔，加“勾心铁”相连

[①] 《顾亭林诗集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843 页。

加固。这次工程历时 5 个月，修护城堤坝 833 米。即使这样，也只平安了 30 余年。到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时，蒲州一带发生了一次大地震。震后，当时的陕西按察使王崇古（蒲州人）在其写的《重修黄河石堤记》中说：是时“夹河东西大震，城覆于隍，堤庙尽崩坏，河流直与岸平，每涨辄入城门”。之后几年内，黄河又于明嘉靖三十八年（公元 1559 年）和四十一年（公元 1562 年）两次东侵，一次淹侵城南古鹳鹊楼址，使西南城墙岌岌待倾，另一次则使大庆关（关在黄河河心中潭上[①]）民舍淹没过半。到了明隆庆四年（公元 1570 年）夏，一次更大的灾难降临了。黄河水猛溢数丈之高，河水先是从蒲州城的南、北、西三门涌入城内，随之又漫淹城之东郭，整个古城竟浸泡于滔滔黄泛之中。有关文献记载，这次水息过后，整个蒲州西城及其城垣四周随水积起的泥沙竟达数尺之厚。

从明万历八年（公元 1580 年）以后，一次又一次的黄河水患，终于使得蒲州居民中有了一些背井离乡、举家迁徙者。然而在灾害面前，大多数居民仍然留恋于这座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非但没有出走，反而从此年开始了又一次筑坝护城的工程。

堤坝的高度达到了 4 米、底部宽 1.3 米、顶部宽 0.67 米，迎水面石条层层相垒，并用铁链相勾，结为一体。为了再加固，又在条石内侧加块石 1 米，并搅掺了石灰上，且用米汤汁和石灰水浇灌砌实。3 年过后，到了明万历十一年（公元 1583 年），此项工程方始竣工，先后花费的银两多达 20 600 多两，新堤从南到北总长度为 4 400 米。[②]这是有史以来，蒲州城修护城堤坝工程规模最大的一次。此后，一直到明万历三十年（公元 1602 年）七月，一次特大暴雨又使黄河暴涨，致使停泊在蒲州西门外黄河中的 23 艘运粮船只沉没，损失粮食 8 360 多担。千年古城蒲州的命运像明王朝的命运一样，自此日益衰败。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 1644 年）明朝灭亡了。 19 年之后，也就是清康熙二年（公元 1663 年），顾炎武来到了蒲州。这位以反清复明为终生之志的学者时年已经 51 岁。这就是诗人写那篇《蒲州西门外铁牛唐时所造以系浮桥者今河西徙十余里矣》五言诗时的时代大背景。

没有蒲州古城无论如何也就不会有当年的蒲津渡浮桥与系桥的铁牛。实际上，在此地造桥的历史能够追溯到东周时的鲁昭公元年（公元前 541 年），史曰：“鍼适晋，其车千乘”，“后子享晋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车，自雍及绛”。[①]这里所谓“造舟于河”，唐代徐坚所著的《初学记》认为：“公子鍼造舟桥处在蒲坂。”而事实上公子鍼利用连舟所造的这座浮桥也是我国

[①] 山西古蒲州与陕西古朝邑县城之间黄河中之岛渚，史称中潭，岛上曾有居民与大庆关或称蒲津关。明隆庆年间河水西移后，中潭从此与东岸相接，岛渚亦从此消失。

[②] 《重修黄河石堤记》，《蒲州府志》，清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 年）版，卷二十。

[①]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270 页。

黄河造桥史上的第一座浮桥。历史上还有过东魏大统四年（公元 538 年）在此建浮桥的记载。[②]但是在唐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 年）以前，蒲州的连舟浮桥都是用竹索相连的。直到开元年间这次，才由唐玄宗亲自下令，改成铁索浮桥。桥之态势格外壮观，于秦晋两地间的大河之上对拽着八条巨型铁链，连舰在千艘左右，并在两岸滩头各分铸 4 条铁牛以作桥锚；每牛体长均在 3 米以上，重达 3 万公斤左右；且每牛又配以铁人、铁山，然后将铁牛、铁人、铁山全部焊接在一块硕大的铁板之上；铁板下又焊有 6 根直径 40 厘米、长 3 米以上的铁柱。这样，其实两岸的系桥铁牛锚（包括铁人、铁山等全部在内）的总重量都分别达到了 200 吨以上。唐开元年间建造的这座铁索浮桥竣工后，直到金代元光元年（公元 1222 年）金元战争中被火烧毁，500 多年间，堪称为我国历史上的一大名胜，以诗文颂其壮观者辈出不穷。

我国现代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曾赞扬“浮桥铁锚中以蒲津桥的铁牛锚最为有名”。另一位现代桥梁专家唐寰澄先生则说：蒲津桥“这是一个有实际功能作用的艺术珍品，是技术和艺术有机结合的典型，是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①]许多目前我们还能见到的历史文献都告诉我们，在唐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 年）改用铁牛及铁链系缆蒲津浮桥以前，蒲津浮桥则一直是由竹缆系连固定的。因为河水气势汹涌，特别是入冬至次年春初黄河流冰季节，竹缆系连的浮桥难免每年都要被堆积如丘埠的黄河流凌撞击所毁。中唐名相，也就是当年唐玄宗李隆基所用的河桥督造官张说，在桥成之后曾写有一篇《蒲津桥赞》，这是一篇不到 800 字的写得很美的散文。文中讲到开元以前的竹缆浮桥时说：“其旧制，横絙百丈，连舰千艘，辫修笮以维之，系围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冱初解，流澌峥嵘，塞川而下，如础、如臼、如堆、如埠，或■、或棍、或磨、或切，绠断航破，无岁不有。虽残渭南之竹，仆陇坻之松，败辄更之，不罄供费。津吏成罪，县徒告劳，以为常矣！”[②]

古蒲津桥所处的黄河河段，我们今天的水利部门称它为黄河小北干流，而黄河小北干流一年一度的“凌汛”则是亘古有名的。在历史上，这种黄河上特有的“凌汛”曾给两岸人民带来过难以计数的沉重灾难。直至 1996 年春节将至之时，黄河“凌汛”就又在距古蒲津桥址以南约 25 公里的河段上，酿成了最近的一次灾难。这最近的一次灾难造成了黄河两岸 20 多万亩农田被淹，1 万多人受灾，当地军民投入了将近万余人抢险救灾，兰州的空军部队则先后出动飞机 31 架次，投弹 576 枚。通过对黄河上业已形成的冰坝实

[②] 《通典·州郡典》。

[①] 转引自 1991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0 日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黄河古蒲津桥及唐开元铁牛展说明书前言。

[②] 《金唐文》，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277 页。

施爆破破冰作业，方转危为安。[1]现在我们再读 1200 余年前张说的那篇《蒲津桥赞》，可以想像，那长约 2 公里用竹缆系连几百近千艘木船而成的蒲津桥，从魏晋而至隋唐，几百年间，年复一年都要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黄河凌汛，都要面对那像山丘像坝埠一样的冰的洪流，要想安然无恙，该是何其难哉！张说所讲的“ 绠断航破，无岁不有 ”的景况，应该不是虚妄空构之语。至于他说到的虽然连年砍伐渭南地区的竹子，甚至包括伐运陕甘交界处陇山上的松树以加固不断被“ 凌汛 ”损坏的蒲津桥身，但仍然是供不应求。守桥的官吏因此而被治罪，每年的修补加固而告徒劳，这都成为习以为常之事，看来也均不是夸大之辞。

如果说古蒲州城城址被选择于黄河河道之上已是一个生态奇迹的话，那么，唐开元十二年以前，几百年间先民们以竹索、木材将成百上千艘木船连接起来，在一年一度的“ 凌汛 ”破坏中，费尽辛劳艰苦以维持一座 2 公里长的桥梁得以延续存在，那就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生态奇迹了。即使是唐开元十二年之后蒲津浮桥已由竹索系连改为铁索系连，而且两岸各用铁牛、铁人等重物特别镇缆，也仍然时有毁坏。如北未英宗治平年间（公元 1064—1067 年）时，已经改用铁索系连的蒲津桥又被暴涨的黄河大浪冲垮，连同河岸上的铁牛也被拉入河底淤泥中。《宋史》和明初李赞的《初潭记》一书中都很逼真地记载了这件事情。[1]可见，古蒲津桥的初建及其之后千百年间的维修护理保持过程，无论是从人类对生态认识史这个角度去看，还是从科技史的角度去观察，都具有非常突出的意义与价值。正如同济大学的桥梁专家陆敬严先生在他 1985 年所写的《蒲津大浮桥考》一文开首两句所讲的那样：“ 中国古代曾经创造出许多杰出的科技成果，不少已经得到发掘与整理，但有的则湮没至今，蒲津桥就是其中一例。 ”[2]再联想到本世纪曾因撰著了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而闻名于世界的李约瑟博士所讲到过的一个故事，即“ 直到 1675 年俄国沙皇还得聘请中国的桥梁工程师去工作 ”[3]的事实，回过头来看蒲津桥在古老黄河上的出现，也就不会觉得有什么惊奇之处了。

蒲州作为一座在中国古代史上几乎贯彻始终并留下了深远重大影响的历史古城，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时，终于因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而被它的最后一批居民放弃，从此之后，不但再无一家一户固定居民在此居住过，而且即使是那一片充满了古老沧桑之感的历史废墟，也几乎被当代的人们忘记。

而作为一座在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上出现最早的大型浮桥，它在历史上或人类生活中的最后消失，则要比蒲州古城的废弃早出 737 年，而且它

---

[1] 《光明日报》，1996 年 3 月 11 日。

[1]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3520 页；李贽：《初潭记》，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2] 《自然科学史研究》第 4 卷第 1 期，第 35 页。

[3] 〔英〕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 1987 年版，第 10 页。

的消失显得更为悲壮苍凉。《金史》载：金宣宗兴定六年（公元 1222 年），河中府（即蒲州城）守将侯小叔因出城与另一将领议事，元军将领石天应乘机奇袭取得河中府，并加固通往陕西的蒲津浮桥。这时，“小叔驻乐李山寨（在今蒲州古城遗址附近中条山上），众兵毕会，夜半坎城以登，焚楼橹，火照城中，天应大惊不知所为，尽弃辎重、牌印、马牛杂畜，死于双市门，小叔烧绝浮桥，抚定其众”[①]

元军将领取得河中府城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修建加固蒲津浮桥，其目的是能跨越黄河天险西南而下，以直取川陕河洛之地；而金将侯小叔收复失城之后又立即彻底焚绝蒲津浮桥，显然是为了断绝元军渡河南下之路，以保得金王朝的半壁江山。一代名桥蒲津桥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中而被最终损毁消失于历史的荒漠之中。有许多历史线索和迹象表明，与蒲津桥一起同时毁于金元之交这场战火的，还有那座几乎与蒲州砖城同时诞生的、建于南北朝末叶的古代中华名楼之一鹳鹊楼。斯楼原建所在位置，据知即在古蒲津桥以南不足 1 公里的黄河东岸和蒲州城西南角楼之间的地方。

历史的脚步从蒲津桥和鹳鹊楼的焚毁时算起，一眨眼又过去了 760 余年。1989 年 8 月 7 日，被黄河泥沙淤埋达 60 余年的蒲州古城西门外的四具系桥铁牛连同策牛之铁人，终于又一次得以露出泥沙而面见当今世人。本世纪 30 年代初时，据现在还健在的一位八旬老者所言，当时他还见到过四具铁牛中其中一具的牛角露在地面上，但近 60 年后考古工作者发掘这些千年古物时，它们竟已被深深埋在地面之下近 7 米的地方。

生态的变迁在这里几乎捉弄了后来的人们。虽然在我们的古文献中有关记载言之凿凿，但人们大多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物。当铁牛被河沙初埋之时，民国 16 年（公元 1927 年）时的永济县县长赵祖■就曾想挖泥沙而挽回铁牛被淤埋之大势，但终未如愿；1958 年、1960 年和 1961 年，当地政府也曾几次组织人力想通过挖掘泥沙找到铁牛，因为当时毕竟见到过铁牛的老者还多有人在。然而遗憾的是，曾经见到过铁牛的老人们竟已不能确指铁牛所在的准确位置，最后终告作罢。进入 80 年代之后，随着文化禁锢的枷锁被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所摈弃，加上旅游业的春潮涌动，一些文物工作者和已成凤毛麟角的旧时老者又想到了寻找唐代铁牛的事情。而令人难于相信的是，此时凡是听说到这件事情的多数人中，不免都已在心里打上一个问号：在哪茫茫无际、一片荒凉的沙滩之下，难道真有什么铁牛不成？该不是古人编出的神话传说讲讲而已？

时间推移所形成的某种无形作用在这里简直令人口张目呆。当覆盖在那千年铁牛之上近 7 米厚的黄河泥沙未被揭开之前，所生长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们之中，除了几个翻遍了文献资料和亲眼目睹过实物的老人之外，大家无法想像得到如今已是满目苍凉的泥沙世界，在 1200 年前竟会是当时大唐帝

[①] 《金史》，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671 页。

国最为繁华而且皇帝老儿几乎年年君临的通衢大道，而所谓通衢大道，偏又是一架由八条铁牛八尊铁人牵拽着的几公里长的铁索与木船连成的举世闻名的浮桥！

但是，事实又不断证明，随着人类社会生态意识的日趋成熟，包括人类对遗产生态保护挽救手段的日益先进，时间虽然可以将历史尘封，但同样也可以使历史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得以再现。

1989 年 8 月 7 日，深埋在黄河泥沙之下达 60 余年的唐代系桥铁牛蒲州部分共四具（另四具位于黄河西岸原陕西朝邑县城东门外），连同随牛作鞭策之状的四尊铁人与七星铁柱等，在文物考古工作人员经过一年又两个多月的勘探寻觅和艰苦发掘之后，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并面对世人。令人欣喜的是，在发掘唐代铁牛的同时，还发现了明正德十六年（公元 1521 年）镌刻刊立的《石津记》碑碣、禹王庙古遗址，以及明万历时刑、兵两部尚书王崇古所写《重修黄河石堤记》一文中讲到的号称“重城”、长 4 400 米的明代修筑的古石堤，继之又在地表之下深 14 米的黄河泥沙中探测到了堆砌高度 7 米左右的属于更早时代的古石坝和一些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等。

牛之壮兮若山峙，角矫矫兮触苍兕。
河流安兮天吴逝，牛戢戢兮载其间。
怒浪息兮无凌湍，东静魏埌兮西晏秦关。
不奔不斗从尔友，万岁千秋尔斯守。

以上《开元铁牛铭》，是清乾隆十七年（公元 1752 年）一位叫周景柱的浙江人从山西宁武知府任上调至蒲州府任知府时，面对千年铁牛所作的感叹。当时的蒲州古城在他的眼中已是一片破败之像，下车伊始，即不得不将贡院与府署互为迁换。其《新迁贡院记》中曰：“乾隆壬申，余自宁武移守蒲州视刺史，理所旷无居人，邻唯神宫，虽在城郭，若接垌野。”到城之西门以外，蒲津浮桥早已荡然无存 500 余年，唯留铁牛孑然岸上，所以他更叹曰：“嗟乎！自唐以后，历五代宋元，所谓开元文物之盛，久已荡为飘风，散为寒烟，不可复问。而是牛岿然杰然，未尝或改。吊古者将抚之以增永叹，睹之以成感慨。自是以往更数百岁，吾不知其尚屼焉奠置乎？抑亦终失而沦于波臣乎？或如辟邪天鹿毁于人乎？或高岸为谷而复于土乎？是皆莫能测也！”[①]翻遍历史上遗留下的地方文献，在历代封建官吏中能像周景柱其人这样沉思之深刻、出语之凌利者，着实盖无几人。他看到历经千年的几具铁牛，没有一般迂腐文人或官僚们那种虚伪粉饰，脱口而出者即是一连串重若千钧的惊问：铁牛啊，我真不知道也不敢想像你以后的归宿。也许你会永远像现在这样搁置原地作为大浮桥的一种永久纪念？抑或你又可能像大宋年

---

① 《蒲州府志》，清乾隆二十年（公元 1755 年）版，卷二十一。

间那样因洪水而沉入河底？或许你又会像常见的人们焚毁各种神器那样被后世的来人冶化而去？再不的话，也可能你会因为一次天地之灾如山崩地裂而深埋于泥沙之下？而所有这些，不都是我周景柱所能猜测想像到的呀！

历史不幸而被两百多年前的这位古人的最后一种猜测所言中。铸造于唐玄宗开元盛世的这些系桥铁牛，果然在周景柱知府写《开元铁牛铭》之后 170 余年的时候，被黄河泥沙彻底覆埋于 7 米深的地下，且一埋则 60 余年而未见天日。

古蒲津渡与古蒲州城一带的生态变迁是令人吃惊的。这种变迁不但使一座举世闻名的特大浮桥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磨难后荡然无存，而且还使一座比浮桥更为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在经历了无数次的地震和黄河侵蚀之后，其遗址竟几乎整体被泥沙封埋于近 6 米厚的地层之下。现在人们还能看到的仅剩下露在地表 1 米多高的城垣顶部，而被淤埋的城墙高度据知有 6 米多。公元 1933 年和公元 1934 年黄河接连两次暴涨，当时山西蒲州与陕西朝邑之间的河面宽至 15 公里。此次大水过后，原来河中的中潭岛终于被淤没，黄河河道西移达 3 公里以上，中潭岛上的中潭城、大庆关（即古蒲津关）等也被彻底冲毁。而在此之前，黄河河道在此处是一分为二的，中潭以西为西河道，中潭以东为东河道；古蒲津浮桥应该也是分为两段的，中潭（即大庆关所在之地）以西为西桥，中潭以东为东桥。沧海桑田即出现于这大河肆虐之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据说这一广为人们使用的著名口头禅，最早即是古人专对蒲州古城与朝邑县城之间这段不时摆动的黄河河道情景的描述用语。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如今已被放弃使用近 50 年的蒲州古城附近一带，仍然堪称为中国北方文物古迹的聚集荟萃之地。除了已被世人重睹风采的唐造系桥铁牛外，原古城城垣的 60%以上砖砌墙体和城中鼓楼基座等，也依旧清晰可辨。以古城遗址为中心，在其半径 10 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还散布着已经修复的著名古刹普救寺和即将得到修复的中国古代名楼之一鹳鹊楼、万固寺与栖岩寺，以及皇家祭祀大舜的舜庙和皇家祭祀西海、河渎之神的西海神祠和河渎神祠等。许多国内外人士在不断加深对古城蒲州遗址了解的同时，也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蒲州古城遗址及其周围这个古代文物遗产群落，极有可能像意大利的庞培古城一样，成为 21 世纪之初闻名于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新发现。与庞培古城不同的是，庞培古城是在公元 1 世纪时被维苏威火山喷发的岩浆和火山灰掩埋消失的，而蒲州古城则是在公元 16 世纪中叶的一次毁灭性地震后又被黄河洪水带来的泥沙逐渐覆盖消失的。两座古城相同的地方是，它们都一样诞生于公元前数百年的古老时代，而且都有着同样辉煌灿烂的文明积淀。

应该说， 1989 年唐代开元年间铸造的系桥铁牛得以发掘，已经标志着业已拉开了使蒲州古城再现其历史雄姿的序幕。这次发掘的重大意义，正如考古学界的人士所讲的那样：“ 蒲津渡遗址是一处具有丰富遗存的大型遗址，也是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涉及到古代渡口的发生、兴盛、

衰落的历史发展过程，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铸技术等方面的科技成就，亦直观地揭示出黄河泥沙淤积，河水升高，河岸后退的变迁过程，从而为历史地理、水文地质、环境考古以及黄河治理等方面提供了许多有用资料。”

千百年来，山西高原从来就有所谓“表里山河”之称。所以叫“表里山河”，可能有这样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山西高原以山著称，其总面积的65%以上应该说都由山地覆盖着，而且在这些山地中产生了大大小小近百条河流，这些河流又占去了中国华北地区河流总量的60%左右。二是隋唐以下，“山西”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单元之后，其省界至元明清之际逐渐确定，而且其自然封闭的特征尤其突出，特别是太行山和黄河又作了它东、西两侧与河北、河南、陕西之间的自然界标。这确实形成了所谓表里山河之势，也自然形成了山西与外界的山河阻隔之势。历史上，因为这种自然的山河阻隔，交通问题成为历来山西行政者的一大难题；而在许多军事家来看，山河阻隔偏偏又成为用兵却敌或藉以封建割据的天然优势。来自中国先秦文献中的著名典故“愚公移山”和“伯乐相马”，即是对山西高原由于山河阻隔而形成的交通困难问题最为形象的写照与客观反映。“愚公移山”应该发生在晋东南的太行山和王屋山一带，“伯乐相马”则描绘了在晋西南中条山和盐湖之间虞坂运盐道上发生的美好故事。这两个故事都使世人得以知晓山西历史上的行路之难。

具有2000年以上历史的黄河蒲津浮桥，是古人为了解决山西行路之难而发明创造的伟大壮举。而与此相同，“太行八陉”，则是古人在山西高原和华北平原以及中原大地之间作的另一交通工程惊世之举。

何者为“陉”？

南北朝时人裴骃《史记集解》认为“陉者，山绝之名。常山有井陉，中山有苦陉”。[①]顾名思义，“山绝”者也就是大山的断陷、断裂之形态，亦即山之峡谷。然而，此处所讲的“太行八陉”已不能被理解为狭义的自然山峡，而是经过人力作用之后被古人选择利用的山峡形态的道路。

太行山，古人又曾称它为五行山、王母山或女娲山。唐代萧德言等所写的《括地志》说到过“太行连亘河北诸州，凡数千里，始于怀州（怀州，今河南省沁阳县）而终于幽（幽州，今河北省与辽宁省交界地区），为天下之脊”。[②]太行山，像横亘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的一条巍峨长龙，自古以来，就以其天险雄姿，折服过多少英雄志士。三国的曹操北登太行，即因山道艰难损坏车轮而感到惊恐；曾指挥东晋大军以少胜多赢得了淝水大捷的谢安，虽只在山外远远西望了一下太行，竟引起了他对艰难人生的一缕愁绪。巍巍太行可以绵延数千里，然而古今却少有人知，可供世人东西进出于太行山腹地

[①]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811页。

[②] 《〈读史方舆纪要〉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08页。

的车马通道，在 20 世纪以前主要依凭所谓八条陉道。这“八陉”从南向北，其名称依次分别为：①轵关陉，山西晋城至河南济源；②太行陉，山西晋城至河南沁阳；③白陉，山西陵川至河南辉县；④滏口陉，山西黎城至河北磁县；⑤井陉，山西平定至河北正定；⑥蒲阴陉，山西灵丘至河北涞源；⑦飞狐陉，山西广灵至河北蔚县；⑧军都陉，山西天镇至居庸关。

“太行八陉”概念的最初形成，亦即人类有意识地开辟并利用它们，其历史时代现在估计起码不应晚于大约公元前 4 世纪中叶，就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如成书于战国时的《战国策》中有一节苏秦从燕国去赵国时对赵王的游说之辞，其中就有“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动”[①]一句。这里所说的“轵道”无疑讲的即是“太行八陉”中的首陉轵关陉。纵观历史，应该说，从 2400 年之前一直到近现代，人们对“太行八陉”的开拓利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在历代文献中都可以翻检得到。如在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 36 年）时，塞外叛将卢芳与匈奴、乌桓之军联合，多次侵犯汉朝边境，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令骠骑大将军杜茂和另一将领王霸屯守北疆，令他们“治飞狐道，筑亭障，修烽燧”，[①]致使匈奴、乌桓长期不能南下。又如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时，隋文帝杨坚为了有效地控制山西乃至中原的局势，为了经常亲幸巡视时的方便，于是先是在夏天的时候“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约两个多月后，他从太原南下，史曰，“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九月，己未，至济源。”[②]审视这两处记载，不难看出，其在太行山上开凿道路的位置，当不会离开轵关陉和太行陉的范围。

历代王朝在“太行八陉”的工程开拓方面不仅仅限于对道路本身的开凿与拓宽或平垫一类，而且在各陉的险要位置都加设了关隘设施，以备于攻防守御。这些关隘后来大多成为当地的著名名胜景观。直至今天，虽然许多关隘破败损毁几近殆尽，然而虽只留下些许遗迹，也已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据各种史籍文献所提供的线索，即使千百年过去，我们仍然可以知其名称与其基本位置。“太行八陉”中历代所建起的著名关隘在此分别是：“轵关陉有轵关，太行陉有天井关，白陉有五度关，滏口陉有黄泽关，井陉有娘子关，蒲阴陉有紫荆关，飞狐陉有倒马关，军都陉则有居庸关。这里，除紫荆关、倒马关和居庸关分别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与北京市境，其余前面 5 处关隘则均在山西界内。而所有这些关隘的主要建筑，除了娘子关、居庸关和紫荆关还存在一部分外，其余均已成为废墟或是遗址。“太行八陉”应该堪称为大自然与人类文化各自伟大作用相结合所产生的遗产生态方面的神圣杰作。从自然景观生态角度去看“太行八陉”中的每一陉道，在历史上莫

[①] 《国语·战国策》，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162 页。

[①]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1378 页。

[②]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5629、2634 页。

不以雄险而著称于世。曹操在《苦寒行》诗中有“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1]之名句。无论放在千年之前或是今天去观察领略，曹操的诗句其实均不为过。他在诗中所写的羊肠坂的位置，应该就在“太行八陉”第二陉（即太行陉）天井关的附近。关于这一点，明末清初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曾有精到的考证：“关之南，即羊肠坂道。”而且，他认为《史记·魏世家》中所讲的“昔者，魏伐赵，断羊肠”和《战国策》中蔡泽对应侯讲的“君相秦，坐制诸侯，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等，其实都是在讲太行陉上的这处羊肠天险。[2]“太行八陉”的陉道之险，还表现在其陉道本身之屈突狭窄的特点上。唐《元和郡县图志》讲到太行陉的宽度时，说其道阔仅 3 步，但长度却有 20 多公里。光绪版《山西通志》说位于灵丘县境内蒲阴陉的隘门峡谷陉道时，曰其“取道岩石间，路裁容骑”。[3]北宋时的地理名著《舆地广纪》言及飞狐陉，则描述其状是“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逦蜿蜒，百有余里”。所以，历史上常常用“咽喉”或“喉嗌”之词形容“太行八陉”的势态，确属贴切。直至近年，当我们亲身经过滏口陉与白陉等地时，置身其峡束崖逼之中，无不感叹万千。

作为太行山两侧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及中原大地之间的经济、文化通道，千百年来，“太行八陉”发挥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而在中国的军事史上，“太行八陉”发挥过的作用似乎就更为突出一些。如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 550 年时，齐庄公西伐晋地时，他的大军所走的道路就正是太行南端的孟门天险，亦即“太行八陉”中的白陉，其位置在今天的河南辉县与山西陵川县之间。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 394 年），后燕皇帝慕容垂挥师西进攻伐当时占据山西之地的西燕慕容永。慕容垂先将大军分驻太行山外邺城（今河北省临漳西南、河南省安阳以北）一带地区，屯军月余。西燕慕容永以为后燕军会从太行陉和轵关陉攻入，于是将守军几乎全部调往太行、轵关二陉，谁知后燕慕容垂却命令大军从滏口陉攻入。西燕军急召太行、轵关两陉守军回返，被后燕军在今山西潞城县一带围而聚歼。乱军之中，慕容永杀死自己的妻子后逃亡至长子地。不到一月，西燕驻晋阳守军又弃城而逃。在中国古代史上，这是一次攻守两军双方都利用太行陉道天险策划用兵的典型战例。除此而外，金灭北宋，元灭金，也都曾经先派精锐从山西北部南下，采取了夺取太行南部诸陉而后从此出兵包围其都城的方法，可见“太行八陉”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战略作用与重要地位。也许正因为此，古人才有所谓“若夫或主或臣，建功立宗，尤显闻于后世，则有决羊肠之险，堑此山之道”[1]的说法。将这句话译成今天的白话文，那就是讲，在历史上，

---

[1] 《三曹集》，岳麓书社 1992 年版，第 67 页。

[2] 《〈读史方舆纪要〉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32 页。

[3] 《山西通志》，清光绪版卷二十一，第 30 页。

[1] 《〈读史方舆纪要〉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11 页。

无论哪个朝代的帝王将相，若欲建功立业并闻名于后世者，那么他们就应该充分地利用像“太行八陉”这样的天险作出建树。所以，顾祖禹在 300 多年前讲的“夫太行之山千秋不异也，则太行之险亦千秋不异矣”[①]这句发自肺腑之中的感叹，当然也就成为后世传之不衰的一句名言。

经历了千万个春秋的“太行八陉”是中国北方大地上极为珍贵的自然遗产，同时也是印证中华文明史的少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千万年以来，围绕着“太行八陉”所在地域，曾产生了无数的自然风光类名胜，也产生了数也数不清的人文景观名胜。根据初步考察与探求，仅分布在“太行八陉”山西一侧境内的人文与自然遗产景观名胜，我们就可以举出如下许多名目。如轵关陉一带，就有道教名山王屋山和天坛山、海会寺、蟒河山、香岩寺、黑龙洞、九女台、石塘洞、紫微宫，唐代诗人岑参读书处青萝斋等；如在太行陉附近，则有孔子回车处、青莲寺、太行绝顶横望隘唐狄仁杰望云处、月院山、珏山、晋普山、黄龙洞、莲花洞、白石先生洞、万松山灵岩寺、羊肠坂曹操摧车处、郭壁温泉、郭壁水帘洞等；如在白陉一带，则有黄围山、黄围洞、二仙庙、崇安寺、箕子山、六泉洞、马武砦、刘秀城、工莽岭、灵岩寺等；如在滏口陉附近，则有龙门寺、大云院、金灯寺、东阳关、虹梯关、老顶山、广志山、昭泽龙洞、潞子祠、石勒寨、微子岭、砺峪洞、赤壁等；如在井陉一带，则有娘子关、冠山、浮山女娲补天炼石处、水帘洞、悬泉、药岭山石佛洞、藏山、方山唐李通玄著《华严论》处、试剑峰韩信庙、妬女祠等；如在蒲阴陉附近，则有觉山寺、太白山、觉山、舍利洞、隘门山、曲迴寺石像冢、杨六郎城、汤头温泉等；如在飞狐陉一带，则有白羊山、莎泉、水神堂、六棱山、壶流河、汉长城、加斗山铁裹腰封寨、望狐山、一斗泉、九层崖、天井寺、清凉寺、白羊寺、千福山北岳庙等；如在军都陉的山西界内，则有慈云寺、萧墙山、盘山、浮云山、吕仙洞、惊峰寺、黑龙洞、断云山、风神庙、青云山石鼓等。

“太行八陉”是数千里太行山上贯穿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及中原大地最重要的八个交通陉道，但它们并不是系连太行山左右的全部交通陉道。除了“太行八陉”从南向北，在山西省东部的阳城、晋城、陵川、壶关、平顺、黎城、左权、和顺、昔阳、平定、盂县、五台、繁峙、灵丘、广灵、阳高、天镇等 17 个市县境内，还有其他一些知名度不高的交通陉道存在，例如山西陵川六泉至河南辉县南寨的赤叶河陉道，山西壶关树掌至河南林州合涧的郊沟河陉道，山西左权至河北涉县的清漳河陉道，山西昔阳至河北赞皇的松溪河陉道，山西盂县御枣口至河北平山十里坪的滹沱河陉道，山西五台至河北阜平的龙泉关陉道等等。这些在历史上由人类踏走出来的交通陉道，大多与“太行八陉”那样的典型山峡陉道一样，多是人类利用自然峡谷河道的原有走向及其形态再施以人工作用后，逐渐开辟而缓慢形成的。

[①] 《〈读史方舆纪要〉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312 页。

黄河远缀白云间，我欲上天天不难。
三晋谁云通古道？人今唯见太行山。

上面这首题曰《古道通三晋》的七言绝句，是明末以抨击道学、反叛传统而著称的大思想家李贽的诗作。极富人生胆识的李贽其人，对世间的艰难虽然不曾畏怯，但面对巍峨太行竟然产主了一点点怯难疑问。在这里他发出了这样的诘问与窃窃私语：人说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么我若沿着黄河上天恐怕也会有路可行吧，可是人都说去三晋是有古道相通的，那么除了我面前这一望无际的太行山之外，古人留下的道路都在哪里呢？

这虽然仅是李贽的几句抒情之作，其实也是数千年来太行山两侧万千人类常发之心声。如果说李贽的诗句已使读到它的人感觉到心情上的沉重外，那么，明代初期被世人称作“吴中四杰”之一徐贲的“少时徒耳闻，今日亲在目，不识太行险，那识安居福”之五言警句，无疑是震聋发聩之绝唱了！

抚今思古，巍巍太行山依旧永恒，然而昔日的“太行八陉”则已经在发生变化而且有了巨大的成果。进入 20 世纪之初，先是在太原与河北正定之间铺设了正太铁路，从而使井陉天险从此无险可居，成为天堑通途；接着是在本世纪 50 年代之后，连续又在蒲阴陉、军都陉、滏口陉和太行陉等处铺设了京原（北京至山西原平）、京包（北京经山西大同至包头）、邯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太焦（山西太原经晋城至河南焦作）等铁路，同时，与这些铁路平行又建成了几条跨越太行山东西两侧的大型公路，于是，太行山两翼历史上形成的“行路难”问题得到了有史以来的一次根本性缓解。当历史跨入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时，随着新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太行山上的交通建设更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局面，距离飞狐陉以北不远处的大秦（大同至秦皇岛）铁路建成交付使用不久，一条位于轵关陉附近的侯月（山西侯马至河南月山）铁路，也将在近期竣工；尤其使当今世人特别关注的是，1996 年 6 月 25 日时，一条由山西太原伸向太行山腹地古旧关的高速公路又与京石（北京至石家庄）高速公路相连贯通。这一发生在“太行八陉”第五陉井陉古道上的交通变革，不但为 20 世纪这 100 年在太行山上出现的生态变迁写上最精彩的一笔，而更具意义的是，它同时也为 21 世纪的太行山生态经济的发展揭开新的一幕。

纵观历史前进的轨迹，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那就是历史无论怎样发展，“太行八陉”作为极为珍贵的自然与人类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价值将永远和太行山共存。

第三节　古城·古国·古故场

很长时间以来，历史学家已经习惯于将文字、铜器、城市以及社会分工、私有制与阶级、国家的出现作为人类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所以，对古城古国的研究与考察，就必然成为历史学家们进行人类文明起源研究和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于古战场，无疑是古城古国发生过程中出现的共生物。那么，自然而然，当人们对古城古国进行深入观察之时，古战场也就同时引起今人的很大兴趣，因为人所共知，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相比，攻城掠地对古代战争显得更为重要一些。

山西大地上有许多古城古国古战场。传说中山西最古老的城址应在古人传说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和禹都安邑，然而除了千年口碑，毕竟无法用真实的遗存去证实它们的真正存在。到目前为止，在山西境内能够确实认定其为最早古城址的当是东下冯夏至商时代的古城遗存。经 C_{14} 年代测定，东下冯古城距今约在 3900—3500 年。而据对中国历史纪年的推算，距今 4100—3600 年前约为中国的夏时期；也就是说，东下冯遗址的古城应该属夏末商初所建。这处 3500 年以前所建古城的遗存在千百年后当人们再一次发现它的存在时，虽然已被深深地埋于地层之下，但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过程中，其实际构筑技术已使人们颇为吃惊。它不但表现出了 3500 年前当时的人类已能熟练地掌握夯筑技巧，而且从城墙外侧仍然清晰可见的城壕遗址上，使当代人类得以了解中国的城市建筑文化，早在公元前 15 世纪以前已经基本奠定丰实的基础。

古城是对古国存在的最原始最雄辩的证明和写照。东下冯夏至商时代古城遗址的发现估计只是山西此类发现的先声而已。苏秉琦先生认为：“大致在距今 4500 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之下，晋南兴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①]

正是基于这一经过大量艰苦考察和深思熟虑后所形成的理论，苏秉琦先生所以又断言：“古国、方国遗存如何去找？我看山西有其有利因素，那就是‘夯土’。”“具体地说在晋南一带古国、方国定有夯土的存在，即使不是城墙也会有宗庙宫室的夯土基址存在。因此，找到夯土，就成了找古国、方国遗存的一种简捷、准确的手段。”[②]

而早在苏秉琦先生发表以上讲话的大约 9 年之前，即考古工作者在东下冯揭示了那座相当于夏末商初时期的古城之后 10 年时，山西南部垣曲县境

[①]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3 页。

[②]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0 页。

内又有一座距今大约 3500 年属二里冈时期的商代古城遗址被揭开了它那神秘的历史面纱。垣曲商城位于黄河北岸距河极近的位置，其面积约为 12 万平方米。在城内中部稍偏东的地方，发现了大型夯土台基。考古界一般认为这些夯土台基从其规模与形制观察，应为商时的大型宫殿或商时人们祭祀祖先的宗庙遗址。大约成书于 2400 年前的《左传》中曾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①]看来，垣曲发现的这座商城极有可能是商代早期都城中的一个。商人建都历来就有“前八后五”之说，即在商汤灭夏以前的先商时期，商据说就将其都城迁徒过 8 次之多，而在商汤灭夏之后，商又将其都城迁徙了 5 次。所以，一些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中已有人提出了垣曲商城极有可能即是“汤始居亳”[②]之亳城。说来则非常有趣，就在考古工作者发现的垣曲商城附近，直到现在还仍然保留着一些与“亳”字有联系的古代地名，例如上亳城与下亳城。《孟子·滕文公下》又说：“汤居亳，与葛为邻。”而在距垣曲商城大约 50 公里之外的闻喜县汤王山下则又有葛伯寨，清以前学者有人以为即汤伐夏桀时葛伯阻兵之处。

垣曲商城发掘之后，发掘者发现此城竟有瓮城的遗迹。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的考古学家董琦先生说，过去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古代在城门之外加筑瓮城的作法始于唐代；但到了本世纪 80 年代后，因为在内蒙古境内发现了城障遗址中的瓮城遗迹，所以就又把中国瓮城的起始时间提前到了汉代；现在，“垣曲商城瓮城遗迹的确认，将我国瓮城设施出现的时代提早到了 3500 年前的商代早期。在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③]

近百年来，首先因为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与破译，随之而起，对商代历史的研究也愈加广泛而深入，其中对商代方国的研究尤其引人注目。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就都认为，殷商时的很多著名方国其地理分布的范围应该不出于山西高原这个大环境。如亘方、■方、土方、沚方，鬼方和■方、龙方、黎方、苦方、吕方、申方等等。苏秉琦先生确认：“夏商时代晋南地区定有自己的方国文化”，“如果这里没有相当发达、相当重要的方国文化、方国文明，周天子把叔虞封到这里来建立晋国就是个谜。扩大些说，晋南应该有大的方国，那么晋中、晋北就不会有吗？”[①]未来的考古发现可能会充分地为苏秉琦先生的这段话添上一些切实完满的注脚。

山西历史上古国最为鼎盛发达的时期当然还不是夏商时期，其鼎盛发达的时期应该是在历史的步伐踏入西周以后，亦即公元前 11 一前 8 世纪末那一阶段，距今约 3100—2780 年前。那时，也不仅只发生了一个周成王封叔虞于山西高原古唐国的故事，事实上是周王室把一大批他们的贵胄子弟都派

[①]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42 页。

[②] 见《书：商书序》与《史记·殷本纪》有关记载。

[③] 《文物季刊》，1994 年第 4 期，第 42 页。

[①] 《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0 页。

封到了这里，其中较为著名者就有：原国，为周文王第 16 子的封地，在今沁水县西北；虞国，周文王侄孙的封地，在今平陆县东北；杨国，周文王庶子伯侨封地，在今洪洞县东南；霍国，周文王第 6 子叔处封地，在今霍州市；耿国，周初王室子弟封地，在今河津市东南；郇国，周文王第 17 子封地，在今临猗县；阎国，晋成公子懿的封地，在今运城市东；贾国，叔虞少子公明的封地，在今临汾市东南；芮国，周成王时王室子弟封地，在今芮城县……

很明显，以上所列周初王室姬姓子弟的封国大多分布在现在的山西南部地区。到春秋时期时，这些同室封国几乎全部被叔虞的后人燮父所创立的晋国所灭。

西周初年在山西高原上的封国事实上也有例外的异姓国。例如赵城，即是周穆王赐封给伯益的 13 世孙造父的，造父的 4 世祖恶来曾因给殷纣王卖命被周武王杀于霍太山之下。但这并没有妨碍造父的被封，因为他将他最好的马献给了周穆王，并亲自为穆王驾御并由此获得了信任。司马迁笔下所谓“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①]后来的赵氏家族成为晋国的贵族。三家分晋后，由赵氏家族建立的赵国，曾成为东周战国七雄中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建在太原西南 30 公里处的晋祠，屋然其始建年代已经无法考证，然而从祠内还保留有周柏一点来看，则极有可能是三家分晋后由赵简子为纪念或祭祀唐叔虞而创建的。当时的山西中北部已是赵国的势力范围，今太原地区则是其政治中心之所在。再如冀国，位于今安泽县境内，为西周初周武王给唐尧后裔的封地，春秋时期被晋国所灭。今安泽县冀氏地名应为其文化子遗。又如黎国，当在今黎城县境内，同样也是周武王灭商后封先代遗民时封给尧的后代的领地。

据说，西周初年“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立 71 国，其中兄弟（周公的兄弟）15 人（一说 16 人），同姓 40 人，周子孙一般都得到封地，做大小诸侯”。[②]与许多地方相比，山西高原堪称为当时周天子分封诸侯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可以与其相匹配的，可能只有黄河中下游的中原与齐鲁之地。然而，由于调查发掘的规模关系，迄今为止，和对商代古城遗存的发现一样，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古城遗存目前在山西发现还为数不多，只在今曲沃县天马——曲村一带、闻喜县上郭村和平陆县东北张店镇附近，发现并发掘初步证实了西周早期晋国都城故绛、曲沃故城和虞国故城的确实存在。

令人欣喜的是， 1991 年的初夏季节，潞城县当地的文管部门在县城附近突然发现了商末至西周间的古城遗存。经过洛阳文物钻探公司的试探，在 13 米的地下探明了商周古城墙 3000 余米，而且该古城是双层城垣，外垣上

[①]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779 页。

[②]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 1 册，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74 页。

还发现了五处烽火台遗迹。如果估计不错，这座古城当是西周时的隗姓赤狄潞子之国的文化遗存。

目前在山西境内发现的东周魏国时的古城址，最著名者即为遗存于今夏县禹王村附近的约建于公元前 380 年的魏国都城安邑古城，以及比安邑古城还要早 300 余年的位于今芮城县城以北 2.5 公里处另一座古魏城。《史记》载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 661 年）晋献公灭古魏，于是又“以魏封毕万，为大夫”。当时晋国掌管占卜之事的官吏叫郭偃的当下即预言：毕万这个人今后可要不得了喽。万，这是一个表示圆满的数字；魏地，这也是一块亘古有名之地。现在献公把它赐封给毕万，真乃是天意也。周天子管辖之民以“兆”为数，各个诸侯管辖之民则以“万”为数。毕万所得，实属天命，其人之后，必成大事矣。另外一位叫辛廖的人也为毕万占卜，同样认为毕万“吉孰大焉，其必蕃昌”。

毕万是中华古姓“魏”姓的始祖，也是后来战国七雄中魏国的先祖。果然，从晋献公封毕万于魏地，时间大约又过去了 285 年之后，晋国终于在晋静公二年（公元前 376 年）被魏毕万的后代及韩赵彻底瓜分，史曰“三家分晋”。今天我们能见到的魏都安邑古城遗址总周长约为 16 000 米，总面积则为 13 平方公里，其始建年代约在魏武侯时期，当时晋正处于被韩、魏、赵三家最后瓜分的濒危时期。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芮城境内的古魏城遗址，则是西周初年时所建之物，毕万封魏则在此城建成许久之后。我国古代经典《诗经·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篇所记载描述的风物，应该是西周初年时古魏地的真实风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山西境内最著名的一次考古发现莫过于“新田遗址”，即被称作“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的调查及其发掘。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晋国最早的都城已不可考，到晋穆侯时（公元前 811 一前 785 年在位）则有晋都迁至绛邑的记载。晋景公十五年（公元前 585 年），此时的晋国已经显露出走下坡路的衰败迹象。晋国公室决定再度迁都，有人提议可迁至郇、瑕氏之地（今运城地区临猗一带），但当时的新中军将韩献子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郇、瑕“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①]于是，晋景公听从了韩献子的意见，在这年的春四月将晋都迁往“新田”。“新田”作为晋国的最后一个都城，历经了景公、历公、悼公、平公、昭公、顷公、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和静公等共 13 代晋公政权。直至公元前 376 年晋国被韩、魏、赵彻底瓜分，历时计 209 年。曾经称雄一时的春秋五霸之一晋国的由强盛而衰亡，实际是在新旧绛邑完成了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的。西周以下， 3 000 多个春夏秋冬，当初晋国的都城，无论是“翼”，还是“绛”和“新田”，究竟在什么地方？过去无人能够说清。一部晋国史，甚至从周成王“桐叶封弟”所

[①]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153 页。

封之“唐”就开始争讼不已，千百年难以定论。

这一历史之谜一直到了新中国成立 8 年之后，即公元 1956 年时，才终于有了一个开始揭开谜底的机会。这一年，考古学家在今天的侯马市西北郊外找见了晋国后期时的都城新田古城的真正遗址。据后来的测量，这个新田遗址东西横跨达 9 公里，南北则纵宽计 7 公里，其文物遗存的实际面积约在 40 平方公里以上。此规模在全国已发现的东周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遗址中，实属不易见到的奇迹。整个侯马晋国都城新田遗址，原来系由牛村、呈王、平望、台神、北坞、白店和马庄等多处古城聚叠而成。考古学家在发掘过程中，根据这些古城遗址所处位置及其形制与文物遗存状况，曾经对它们分别进行探索与研究。如在牛村古城遗址中发现了高于现在地表 6.5 米而且顶部有 1 米多厚建筑物坍塌堆积的夯土台基。考古学家认为这里曾是一处属于公元前 6 世纪末至公元前 5 世纪末时晋国的大型宫殿基址。也就是说，牛村古城应该是晋国古都新田遗址的中心部分。平望古城和白店古城在整个新田遗址多处古城遗址中，可能是最早建成的，甚至有的考古学家认为白店古城即是晋国都城由绛邑迁来之前的古“新田”所在，而牛村古城与台神古城则是晋景公之后晋都扩建时新增拓的部分。考古学家还指出，台神古城外的夯土台基极有可能即是当时晋国祭祀汾水之神台骀的遗址所在，因为直到今天，在夯土台基西南处仍还保留着一座建于明代的台骀庙。当地村庄以“台神”命名，似乎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这种推测。更有一些考古学家根据古文献的记载与古城遗址发掘现场相比较，甚至具体地指出了北坞、马庄、白店三座小城有可能当时分别属于晋国六卿中的赵氏、范氏与中行氏。因为“侯马盟书”的发掘地点距离呈王古城较近，所以又有人以为呈王古城有可能即是主持盟誓的赵简子的“赵氏之宫”之所在。

侯马晋国古都新田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从 1956 年正式开始的，前后进行了近 30 年，至今这项工作仍未真正结束。当新田遗址的发掘工作进入第五个年头，即 1961 年 3 月 4 日时，经由国务院批准，山西侯马晋国都城新田遗址被正式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号 146）。

侯马晋国都城新田遗址的发掘，在本世纪的 50—60 年代曾经引起国内外有关方面的极大轰动。其中尤其是发掘自 40 座祭祀坑中的 5000 余片圭形玉质朱色书写的盟书誓辞，还有发掘自牛村古城之南东周铸铜遗址的 3 万余块铸造青铜器皿的各种式样的陶范，最使当今世人惊叹。

山西南部中条山的铜矿开采及其冶铜业的起始年代，可能要比我们历来在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实际记载要早出相当长的时间。夏县东下冯遗址中出土的铜凿、铜镞和铜爵，似可说明早在夏商时期的山西南部即已步入青铜时代。侯马晋国古都新田遗址 3 万余件铸铜陶范的出土，则毫无疑义又为晋西南“绛铜”的辉煌历史增添了另外一层灿烂的光彩。新田晋国铸铜遗址中出土的铸铜陶范，不仅仅在单位出土数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在器形与纹饰等工艺质量上也表现出同时代同类型出土物的最高水准。3 万余件陶范中，有 1/3

属带花纹陶范，可辨器形者计 1000 件左右，分别属于数十种器形。侯马晋国古都新田铸铜遗址发掘之后，这些年来很多考古学家以新田陶范对比过去全国各地出土或存世的东周青铜器实物，竟又有了许多意外的新发现。人们不但发现在山西境内有如 1949 年前后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和 1988 年太原东周大墓中出土的许多精美青铜器，原来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来自于 2500 多年前的古晋都新田手工铸铜作坊，而且事实还证明，在今天的河南、河北、陕西、内蒙古、四川等省区也同样发现了明显出自侯马晋国铸铜遗址的青铜器皿。《新唐书》中曾记唐天宝年间朝廷厚价募工在全国增铸铜钱的史实。是曰："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①]当时唐王朝每年所铸铜钱中的大约 1/3 竟都来自绛州（治所在今新绛，唐时今侯马市四境均属绛州辖）。侯马新田铸铜遗址中所发现的 3 万余件铸铜陶范，不仅从一种全新角度让今人从此认识到了东周以前古晋大地冶铜业已高度成熟，而且即使是对《新唐书》中有关盛唐铸造铜钱"天下炉九十九，绛州三十"的记载，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佐证。它至少证明在古代绛州的土地上，其冶铜业确实是有悠久传统的，《新唐书》中的有关记载当然也非虚妄叙述。

侯马晋国都城新田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当年震动了国内外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如郭沫若、陈梦家和唐兰、苏秉琦等。 70 年代初新田遗址范围内的上马村发现了近 1 400 座东周墓葬，苏秉琦先生当时提出要一个不漏地发掘。20 年后，苏秉琦先生又积极奔走并倡导要把晋文化考古作为大课题、大事业去抓。对古晋大地，他确认："周初封叔虞于唐（晋）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现在我们在曲村——侯马一带发现的约当殷周之际到春秋战国之际的一片遗址，就是当时晋国所在之地。"②事实已经证明，到目前为止，仅经过科学调查与发掘而给予确认的春秋战国以前的古城遗址，在山西全省已有大约 20 处以上。即如：

赵康古城遗址，襄汾县；　　大马古城遗址，闻喜县；
西周魏城遗址，芮城县；　　杨侯古国遗址，洪洞县
晋阳古城遗址，太原市；　　曲沃古城遗址，闻喜县；
晋都绛邑遗址，翼城县；　　高梁古城遗址，临汾市；
春秋虞城遗址，平陆县；　　汾阴古城遗址，万荣县；
长子古城遗址，长子县；　　潞子古国遗址，潞城县；
魏禹王城遗址，夏县；　　上郭古城遗址，闻喜县；
阏舆古城遗址，沁县；　　东下冯商城遗址，夏县；
南关商城遗址，垣曲县；　　晋都新田遗址，侯马市；
安邑魏城遗址，运城市；　　羁马古城遗址，芮城县；
解梁古城遗址，临猗县。

[①] 《新唐书》，中华书局 1925 年版，第 1386 页。

除了以上所举出的这些已被确认的战国以前的古城遗址，仍有更多的属于战国以前的古城遗址有待于我们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在山西境内去一一地考察确定。有关此方面的线索不但存在于历代的古文献和古方志，而且同样存在于山西 15.6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各个地方及角落。它们尤如一个又一个历史文化之谜，期待着后来的有识之士和具备了科学慧眼的人们去识别鉴定。

秦汉以下，中华民族的历史进入了近古时期，其后时代的古文化遗址及遗迹在三晋大地之上可以说更是密如繁星，随处可见，其中古代城池遗址尤多。正如清末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所记：“晋在三古上，盖神圣之所钟，皇帝王霸之所骈萃也，迭作都京，即散地名，见载记者甚蚤，亦甚蕃。洎汉唐来，益多闻人甲族，胜迹殆不可殚述，又治世恒为股肱郡，分裂则戎马冲，故城废垒，所在多有焉。”[①]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首先分天下为 36 郡，其中太原、河东、上党、雁门 4 郡郡治都分布在后来的山西省界内。到两汉结束时，此种古郡在山西高原上增加到了 6 个，即除太原、河东、上党、雁门 4 郡郡治外，又增加了西河、定襄两郡郡治。总的来讲，从秦至东汉末年的将近 500 年时间里，在山西这块古老大地上，古城古国的营造虽然仍有发展，但由于战争在这里的相对减少，以及政治中心的转移，与中原大地和古函谷关以西的关中平原等地相比，古城营造则显得有些沉寂。关于这一点，近现代以来的考古发现似乎也多少可以作些证明。一些史籍文献中同样都可透露出些许线索。如秦至东汉末年的河东郡郡治之古安邑，到东汉兴平三年（公元 195 年）时，这一中古名郡的宫阙城池，恐怕是早已破败失修了很长时间。《后汉书》与《三国志》中，史家都记载了这样一个历史情节。是年冬十二月，在李傕的追逼下，杨奉与韩暹挟持汉献帝刘协从洛阳落荒出走。“天子走陕，北渡河，失辎重，步行，唯皇后、贵人从，至大阳，止人家屋中。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车。”[②]此处所说的太阳，在今平陆县。《三国志》中的这一情节到了后来罗贯中的笔下，写得更加生动：“上御车马至安邑，又无高房，帝后所居于茅屋中，又无门关闭，四边旋插荆棘篱落，帝与大臣议事于茅屋中。”[③]这里虽已是小说家笔法，多少有些夸张，然而若以其和《三国志》中“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车”相互印证的话，当时河东古郡郡治的荒凉凄惨，应该是一种真实的写照。

魏晋以降，山西高原则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战争与政治活剧频繁交替上演的最为轰轰烈烈的大舞台及策源地。特别是从西晋末年经北魏、北齐、北周，

[①] [清]王轩等纂修：《山西通志》点校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3661 页。

[②] 《三国志》，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86 页

[③] 《三国演义》，黄山书社 1934 年版，第 76 页。

直至隋唐五代以及赵宋王朝的兴起。　700 余年间，先后如公元 4 世纪初期刘渊在左国城（今离石市北）建立的匈奴刘汉政权，稍后以山西坐养渐大以至羽翼丰满兴起了石勒后赵势力，公元 385 年由慕容永在晋东南长子建都立西燕鲜卑政权，北魏天兴元年（公元 398 年）又一鲜卑骄子拓跋珪在平城（今大同市西北）正式定都，史称“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并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①]等。北魏之后，东魏高欢、西魏宇文泰、北齐高洋、北周宇文觉及至隋文帝杨坚和唐高祖李渊父子，无一不是首先利用山西表里山河渐次养大，形成其强势，由小而大遂能克敌致胜。李唐王朝 290 年的历史，虽然建教长安，仍将太原作其北都，将蒲州为其中都。后梁朱温亡唐，五代继兴。除后梁以外，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几个短命政权的开国皇帝如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也同样发迹于山西的北中部一带。这种群雄辈出于三晋大地的特殊政治现象，致使北宋的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赵炅在继承了哥哥的宝座之后，竟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979 年）的 5 月中旬纵火焚烧了晋阳古城，接着又于次年四月引汾河大水倒灌该城，使这座北方名城在公元 10 世纪末几乎成为一片废墟。据民间传承下来的传说所云，宋太宗水淹火烧晋阳城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他的眼中此城是一座出“真龙天子”的“龙城”，他以为该城东北远郊的系舟山是为“龙角”，而该城西南郊外的龙山和天龙山则为“龙尾”。所以，火焚水灌之后，赵宋皇帝仍然心有余悸，甚至从那时开始，太原城内再也不许建十字街，而只准建丁字街。　200 余年后，金元时期的大诗人元好问写过一首题曰《过晋阳故城书事》的长诗，诗中有“汾河决入大夏门”，“争教一炬成焦土”和“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等名句，即是对这一惊人魂魄的历史事件的追述。在诗的末尾两句，诗人慨然长叹，疾呼曰：“几时却到升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①]可见，直到公元 13 世纪时，当时的晋阳古城可能仍是一派残破景象。事实上，晋阳古城的彻底重建，现在看可能到了明代初年以后才真正得以实现。正像我们前面所叙述的那样，由于从魏晋至隋唐五代及至北宋，山西在 700 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再度成为中国古代战争与政治争持中的重要地区，所以，相应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古代城池的营造构筑，也就再一次进入了一个活跃时期。从许多历史文献和地方志类的档案材料中，我们均可以找寻到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例如：

阳城，北魏兴安年间始建；	孝义城，北魏始建；
夏县城，北魏太和年间建；	五台城，北魏始建；
忻州城，北魏熙平二年建；	寿阳城，西晋时始建；

[①] 《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33 页。

[①] 《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91 页。

武乡城，北魏太和十五年建；
安邑城，北魏始建（今运城境）；
长子城，东魏慕容永始建；
垣曲城，西魏大统三年建；
祁县城，北魏时并州别驾分瓒建；
万泉城，北魏天赐年间建；
乐平城，北齐建（今昔阳境）；
岳阳城，隋大业二年建（今古县）；
盂县城，隋开皇十六年增建；
稷山城，隋开皇十一年建；
辽州城，唐武德三年建（今左权）；
绛州城，隋开皇三年由玉壁徙建；
太平城，唐初建（今襄汾境）；
蒲县城，唐武德元年建；
高平城，北宋开宝六年建；
永和城，唐贞观十一年徙建；
乡宁城，北宋皇祐三年徙建；
襄陵城，北宋天圣元年建；
闻喜城，唐元和十年刺史李宪建；
翼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徙建；
浮山城，五代后唐长兴年间建；
太谷城，五代后周显德四年建；
平定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建；
保德城，北宋淳化四年始建；
汾西城，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徙建；
静乐城，北宋熙宁年间增建。
沁水城，隋开皇年间建；
蒲州城，北魏始建；
榆次城，隋开皇二年建；
陵川城，隋大业年间建；
岚县城，隋大业十年建；
灵石城，隋开皇十年建；
屯留城，唐武德五年建；
荣河城，隋开皇年间建；
潞城，隋开皇十六年建；
曲沃城，隋开皇十年徙建；
石楼城，唐武德二年建；
潞安城，隋开皇年间复建；
隰州城，唐武德元年建；
虞乡城，唐武德元年建；
泽州城，唐贞观初建；
襄垣城，唐武德初年建；
应州城，唐初建；
临晋城，唐天宝二年建；
猗氏城，唐兴元元年建；
浑源城，五代后唐时建；
芮城，五代后周年间建；
绛县城，唐武德元年建；
文水城，北宋元符年间建；
灵丘城，唐开元年间建；
交城，唐天授二年建；

以上所列举的 57 座古城，已基本确切地知道它们营建的年代均在公元 3—11 世纪这一历史范畴中。到目前为止，这些距离现在约 1700—900 年前的古城，除了极少数我们还可见到一些遗迹之外，可以说要了解它们的历史全貌已早无可能。如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的有关北魏泰常七年（公元 422 年）拓跋嗣“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和第二年“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①]的线索，考古工作者已经在今大同市北上皇庄经马家小村至马铺的一带，发现了长达 5 公里的古城夯土遗迹，有的地段墙体残存高度还有 5—6 米，他们初步认为，此遗址应该即是北魏平城的外郭城垣遗存。又如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日益兴起，人们在宁武县境内又逐渐注意到了一座几乎被历史遗忘的

[①] 《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62、64 页。

古代城垣，这就是兴建于北宋初期的古宁化军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几经修葺与近千年的沧桑变迁，但其城垣的基本轮廓与城内的基本布局却依然可见。我们数次到城内考察，一些古老的砖石建筑构件随处可以遇到。在城南约有半公里远的庄稼地里，一位村民因收秋庄稼而从地下发现了大片共有上百块之多的宋代铺地方砖。根据考证，这块发现宋代铺地方砖的地方，在北宋时原来是一座大寺院。古宁化军城原有南门、北门、西门，而无东门，整座城依山势而建，西门之外数十步即是汾河。三座城门目前还能看到南门与北门及其瓮城的基本形制，西门则已彻底毁圮。从遗存下来的南门观察，明代万历年间曾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因为从坍塌的部分墙体上可以明显看出，在宋城的墙体上明万历时曾加包过一层厚约 1 米的砖层。这里特别珍贵的是，我们在已毁的宁化古城西门之内，还发现了三孔非常古老的窑洞。当地的老年人向我们介绍说，这三孔古窑洞是在李自成起义军攻打宁武关之后不久，在厚厚的垃圾层下发现的。发现后从清初直至民国初年，这三孔古窑洞一直由戍守古城西门的兵丁所驻扎。三孔古窑洞中有一孔里面还有很深的地洞，估计是战时藏兵所用。根据古建筑专家的初步考察，这三孔古窑洞应该是宋代的建筑遗存。宁化古城规模不大，整个面积不超过 15 万平方米，此城在历史上曾几次作为宁化县或宁化军治所而存在。城内只有一条南北向的街道，街宽不到 10 米，长约 300 米。街的北端为古代宁化戍守行政长官的衙门所在，街的南端尽头即是宁化军城南城门，南城门外又有南关。南关自古以来居民较多，非常繁华，至今仍然能够感觉到一仲古市井的气氛。当地传说隋炀帝在公元 6 世纪末至 7 世纪初，几次来宁武天池畔的汾阳宫避暑，首先就在宁化古城南关这块地方落脚，至今当地居民仍然经常在地下发现古物。

建筑用砖的出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的战国晚期，但是将砖用于古代城垣建筑的时间却要晚得多。现代考古工作的实践证明，至少在隋末唐初时我国许多地方已经有用砖包砌城门或城墙转角处的情形出现，而城垣主体部分则仍然沿用夯土版筑的营造作法。各种古籍文献的记述表明，大规模地用砖包砌城垣应该是从北宋时期才开始的。北宋晚期画家张择端在其著名的绘画作品《清明上河图》中，曾真切无误地用写实手法描绘出一幅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用砖全部包砌高大城楼的画面，即是一个雄辩的证据。过去，曾有人传说蒲州古城的用砖包砌城垣是从北魏时开始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科学的考古结论来证明这一传说的真实性。使人感到兴奋的是，假若认识无误，宁武境内古宁化军城垣南门内层用砖就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发现。因为，张择端笔下《清明上河图》中那座北宋砖砌城楼，毕竟只是一幅图画，而且画的是当时天子脚下繁华都城的事物，而古宁化军城垣南门内层的北宋用砖，却是当今仍可见到的一处可遇而不可求的弥足珍贵的历史实物遗存。

从中国古代城垣建设发展史的角度来讲，朱明王朝无疑是一个伟大时

代。正如有的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的研究者们所讲：明初“曾兴起一个大规模的筑城高潮。各大中小城市，普遍改造或加固城垣，或新建一些设防城市。今天保存下来的旧城市的城垣大多数是在明初经过改建、扩建或新建的。有些城墙普遍加砌砖”。[①]明代在山西境内设有近百处府、州、县行政治所，有关当时这些治所所在城市城垣建筑方面的文献记载，足可对以上引文作出一个很好的注明。例如，仅明太祖朱元璋所执政的洪武年间（公元 1368—1398 年），短短的 30 年时间内，山西辖境内即有如下一些城市的城垣得以改建、扩建或者新建：

太原城，洪武九年扩建砌墙；　交城，洪武三年扩建；
岢岚城，洪武七年扩建；　平遥城，洪武三年重建；
屯留城，洪武二年扩建；　襄垣城，洪武三年改建；
壶关城，洪武二年改建；　沁水城，洪武年间重修；
泽州城，洪武十四年改建砌砖；　和顺城，洪武二年重修；
沁州城，洪武十一年扩建；　平阳城，洪武初年重建；
曲沃城，洪武二年改建；　蒲州城，洪武四年重建；
解州城，洪武初年扩建；　芮城，洪武初年增建；
绛州城，洪武元年重修；　永和城，洪武初年重修；
灵石城，洪武年间重修；　怀仁城，洪武十六年扩建；
大同城，洪武五年扩建砌砖；　应州城，洪武八年新建；
阳高城，洪武三十一年新建；　广灵城，洪武十六年重修；
天镇城，洪武三十一年重建；　朔州城，洪武三年改建；
朔平城，洪武二十五年新建；　左云城，洪武二十五年新建；
偏关城，洪武二十二年新建：　忻州城，洪武三年重修：
代州城，洪武六年改建砌砖；　静乐城，洪武四年改建。

需要再一次指出，以上列举的仅仅是对朱明王朝建国之初朱元璋这位开国皇帝在位时山西境内城垣建筑工程的一个粗略统计，而事实上在整个明王朝 276 年的历史中，可以说其城垣建筑工程在山西高原的大地上是无时不在发生着，其中明代宗朱祁钰在位的景泰年间（公元 1450—1456 年）尤其为甚。在这 7 年时间中，山西近百处城垣中大约有 1/3 以上的地方都在大兴土木以整修加固当地的城垣；而在万历年间（公元 1573—1620 年），山西境内州县以上的所有城垣，则几乎全部均用砖石包砌加固完成。辅佐朱元璋统一天下而最后又被朱元璋使人毒死的明代开国元勋刘基，曾经写过一首《筑城词》，词中有“愚民莫可与虑始，见说筑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踰，挈家却向城中居。寄语筑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须足食仍足兵，不然剑阁潼关且

[①] 《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8 页。

难保”[1]这样的句子。其内容形象地反映了明初大规模筑城时一般平民与官僚阶层两种不同的心理，当然也证实了当时无处不在营造城垣的真实的时代与社会状况。

从整个历史长河中去观察某一个朝代，真是其兴也速而其亡也速，同样从整个生态空间去审视某一类事物变化时，也一样表现出其生也勃和其败也骤的某种规律。明代的灭亡到现在才不过 350 余年，即使如刘基那样具有雄才伟略的旷世人物，谁又会预料得到呢？仅仅就在明亡 300 余年后，当时全国数千座古城，其中也包括山西境内的近百座城垣，竟然会在数十年内突然地消亡殆尽，致使能够幸存下来的三四座较为完整的古城在偌大的中国乃至世界，成为稀世珍宝。

这其中就有山西平遥古城。

平遥古城 1986 年 12 月 8 日由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1988 年 1 月 13 日国务院又公布平遥古城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目前我国仅存的 4 座古城（即陕西西安、湖北荆州、辽宁兴城与山西平遥）中，平遥古城是古时城体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座。不但其城墙保存完好，而且城中街巷、旧时衙门店铺等也基本维持着旧有格局。而在这 4 座古城中，平遥与西安的城墙又最为古老，都为明洪武三年所重筑。另外两座古城，辽宁兴城建于明宣德五年（公元 1430 年），湖北荆州则为清顺治三年（公元 1646 年）所重建。得以完好保存的山西平遥古城，将有望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属下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机构颁发的世界文化遗产证书。这座重建 626 年之后的历史文化名城，将从此得到全人类的共同保护。

从一定意义上讲，城垣的出现应该是人类战争的产物。对所有研究人类文明起源的人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共同的结论。换言之，古代城垣与古代战场，应是人类文明出现过程中发生的一对孪生事物。

山西大地就布满了古战场。

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开篇就写到了我们中华民族史上最早的两次战争，这两次战争一次是黄帝与炎帝之间的大战，另一次则发生在黄帝与凶暴的■尤之间。两次战争据说前者发生在阪泉之野，后者发生在涿鹿之野。究竟阪泉之野与涿鹿之野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2 000 多年来史家众说不一，但较权威的有两种说法，那就是一种认为在今天的河北涿鹿，另一种认为在今天的山西运城盐湖湖畔一带。生活在公元 11 世纪的北宋著名科学家与政治家沈括在其著述中就曾说过：“解州盐泽方一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尤血。”[1]沈括一生，遍游天下。根据《宋史》记载，北宋神宗皇帝曾亲自向沈括询问河东解池盐运方略。沈括的回答言之凿凿，与《梦溪笔谈》一书

---

[1] 《全明诗》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3 页。

[1] 沈括：《梦溪笔谈·辨证一》。

中的叙述一样形象具体，可见他是亲自到过山西南部解池盐湖一带的。直到近现代时，解池盐湖附近仍有村落名曰“■尤村”，此与沈括所谓“俚俗”之说正相符合。当地村民为避■尤之恶，后将村名又改曰为“从善村”。无论黄帝与炎帝之战或黄帝与■尤之战，考其究竟毕竟距离今天太为遥远。对于有关此类战争传说，今人柴继光先生等则有一个全新的见解。他们认为，这些记载于历史文献之中或传承于民间的远古原始战争传说，可能正反映了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之初，各原始先民部落之间为了争夺或控制食盐源地遂产生的一系列战争的历史真实。基于这种见解，柴继光先生则得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结论，那就是如果这种为了争夺食盐源地的原始部落间的战争真的存在过，那么获得战争胜利的一方，“一方面可以促使本部族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用食盐作为部族间交换的重要手段，从而起到吸引其他部族，甚至导致前来依附的积极作用；这就成为尧、舜、禹走上部族盟主地位，先后在此立国建都之本。设若盐池不在河东，尧、舜、禹在此建都就要置疑了，华夏民族发展的历史也将会是另一种脉络”。[①]

确实，这真是一段极富唯物史观和极具说服力的总结性的理论。这一论述同时也走出了历来那种对中华民族的史前战争传说以一般神话动辄予以轻率否定的传统巢臼。更具积极意义的是，这种创新性的理论，对山西境内今后有关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及其早期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与黄帝战■尤、黄帝战炎帝一样，从五帝到夏商，我国古代文献中也同样记述了许多这一历史时期和山西这块地方有关的战争故事或传说，然而，均由于其年代久远，一方面缺乏可信的翔实记载，另一方面又无科学的考证结果，所以，这些传说中的夏商时的战争及其战场，至今无法确指。例如《列子》与《淮南子》中都讲到过的共工与颛顼争帝而怒触不周之山的地方，启伐有扈氏与汤灭夏桀的确切地理位置，诸如鸣条古陌的真正所在的问题，还有商代所伐鬼方、土方、■方与羌方的具体方位究竟是否就在山西高原等等。

西周一统之后，山西高原上封建有序，大部为姬姓相邻，诸侯国之间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可以说是礼宾相待，相对和平安定。当然在周文王伐商时，在这里也有过发生战争的例子，比如文王灭黎，当时的黎国即在今天的长治至黎城一带。此属商周之交时候的事情。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叔虞于山西西南部。关于这一时期山西高原上的社会状态，许倬云先生有一段论述：“唐叔的封晋，受当地土著文化的吸力，可能发生一些离心的倾向，以至晋国文化多少与中原有些不同。但是，从另一角度看，晋国在中原直北融合了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族群，无疑为周人确立了北面的屏障，若不是有西周早期立下的基础，晋国在日后未必能完成经营北方的工作。”许先生还讲：

[①] 《晋盐文化述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 页。

“晋国数百年对戎狄文化的交流，使晋国文化中呈现相当的戎狄特色。”[①]须知，这种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实际上是以和平的形式而获得的。

大约近 300 年的西周时期过去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时期的春秋与战国前后相继的两个特殊时代。诸侯混战，战火频仍成为这两个时代最令人注目的特征。这一特征反映在三晋大地上则更为触目惊心。其实在公元前 676 年晋献公执政之前，晋在中原诸侯之中并非强盛之邦。正如当时晋国的大夫郭偃讲的：“今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虽欲纵惑，未获专也。”[②]不是不想称霸，而是羽翼还未丰满。但从晋献公开始，晋国却逐渐强盛。数十年间，晋已兼并吞食了周围近 20 个弱小之国或戎狄部落，如霍、杨、董、韩、郇、冀、虞、黎、耿、魏、贾以及沈、姒、蓐、黄与骊戎、东山皋落氏等，相当于今天山西南部大部地区。至晋文公重耳归国主政时，他在后来史家所称的“春秋五霸”（即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之中，实际上已成最具作为的一个。此时的晋国在各种改革中将军事改革也作为重要内容，晋文公断然将旧有的两军之制改作三军编制，其军事实力已足可与毗邻列强相抗衡。从公元前 636 年之后，晋国与楚国之间发生的城濮之战，与秦国之间发生的殽函之战、令狐之战，及至后来的晋楚鄢陵之战等。这许多次著名的战役，主战场大多在今天的山西界外，但也有少数发生在今天的山西界内。虽然 2000 多年前的古战场多数已不能确指其所在，然而毕竟还有部分遗址仍能使当代人类认识与觉察。如近年由靳生禾与谢鸿喜两位先生考察发现的位于今芮城县风陵渡附近的羁马古城，即是《左传·文公十二年》一节中所说的“秦伯伐晋，取羁马”一战的古战场遗址之历史遗存。

事实上，我们在此所叙述的许多有关山西古代战争的历史，还给我们后人在汉语言中留下了另外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如汉语成语中的“唇亡齿寒”、“退避三舍”等即是。

从周成王三年（约公元前 11 世纪）唐叔虞封于晋，至晋哀公四年（公元前 453 年）韩、魏、赵三家分普，晋国存在了约 600 余年。晋静公之后，虽然晋作为周王朝的诸侯国已不复存在，但由晋而分解出的韩、魏、赵这三个新的诸侯国，历来的史学家却仍以“三晋”称呼它们，后来的山西高原从历史地理的意义上被世人泛称作“三晋”，同样缘于这一段历史。春秋时代的最后阶段，分布在中原大地及其近邻地区的较有规模的诸侯小国，当时的数量起码不少于 50 个左右。进入战国时期以后，在千百次的战争中，这些诸侯小国渐次被一批强国所吞并。强国中又出现了所谓“战国七雄”，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强国。韩、魏、赵都来自春秋时期的五

[①] 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131 页。

[②] 《国语·战国策》，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66 页。

霸之一晋国，三家公卿瓜分晋地，战国七雄称霸形势也就最终确立。

进入战国中后期以后，迅速崛起的秦国已经将其向东扩张的矛头主要对向关（函谷关）外的韩、魏、赵三国。在强秦的逼迫下，首先是赵国将其国都由晋阳（今太原西南）迁到邯郸；接着是韩国在公元前 375 年将其国都由平阳（今山西临汾）迁至新郑（今河南新郑）；到公元前 340 年时，魏国最后也将其国都由安邑（在今山西夏县境内）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虽然，韩、魏、赵三国前后均将其国都迁出了山西高原，但直到它们的最后时刻，在它们各自的国土中仍占有山西高原上的某一部分，如赵占有山西的北部大片领土，魏占有山西的西南与中部部分地区，韩占有山西的东南一隅。正由于此，秦与韩、魏、赵之间的战争就在山西的土地上留下了很多的古代战场遗址与遗迹。其中公元前 260 年秦赵两国之间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市境内）之战后所留下的战场遗迹及其历史影响最为著名。

当时，赵国在长平的守将本为知名度很高的大将廉颇。廉颇认准秦军远道而来必然坚持不久，所以坚筑工事壁垒只守不战，以期秦军耗尽粮草士气后再一举歼之。这也是秦军最害怕和所担心的。于是，秦军就派奸细用重金买通赵国权臣，利用反间计使赵王用只知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了老将廉颇的主将位置。赵括为赵国主将后，果然中了秦将白起的计策。他一反廉颇的作法，刚到长平就主动出击，以至很快就陷入秦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秦军趁此机会又断绝了赵国的援军与粮草通道，使赵军无以为食竟至 46 日，营中甚至出现了杀人为食的残酷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赵军多次拼死突围不成，最后，无能的赵括也在突围中被秦军乱箭射死，秦军获赵军俘虏共 40 余万人。白起惧怕赵军 40 余万降卒再起叛乱，竟在长平当地尽数杀戮或挖坑活埋。史称：“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复，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①这样大规模地阬杀降卒，可能在中外古今的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两千多年来，这一残酷的历史事件使多少后世之人感到悚然震惊或是困惑不解。唐代咸通年间（公元 860—874 年）诗人胡曾路过山西长平，为赵王竟然用赵括这样一个空读兵书而使 40 万人残遭杀戮的历史悲剧写下了如下诗句：

> 长平瓦震武安初，赵卒俄成戏鼎鱼。
> 四十万人俱下世，元戎何用读兵书！[①]

另外一位明嘉靖年间诗人李攀龙（公元 1514—1570 年），身临长平古战场时则写下了更动感情的诗作，用以抒发其胸臆之　中的感慨叹息：

[①] 姚奠中主编：《咏晋诗选》，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68 页。

世间怪事哪有此？四十万人同日死！
白骨高于太行雪，血飞迸作汾流紫。
锐头竖子何足云，汝曹自死平原君。
乌鸦饱宿鬼车哭，至今此地多愁云！
耕农往往夸遗迹，战镞千年土花碧。
即令方朔浇岂散，纵有巫咸招不得。
……[②]

李攀龙400多年前所写的这首诗中有关当地农民常常在耕地中发现当年长平之战的遗物或遗迹之情景，今天看来并非虚构夸大之辞。与李攀龙同时代的一位山西散曲作家叫做常伦的，在其所作的一首题曰《宿长平驿》的诗中，就有“遥闻田父语，犹得旧戈矛”[①]之描写。 1995年4月，现在的高平市永录乡永录村村民李珠海，终于在修田整地时亲眼见到了与400年前李攀龙、常伦诗中所写相同的情形。李珠海不但在田中挖出了2000多年前长平之战中被秦军阬杀的赵军降卒的许多尸骨，而且在尸骨堆中同时发现了属于战国时期赵国的刀币和铜镞。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此年的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山西省的考古工作者对永录村发现的长平之战尸骨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并正式命名其为“长平之战遗址永录1号尸骨坑”。根据这次发掘前10多天的专门考察走访，考古工作者在永录乡附近一带还初步调查发现了近20处同类型尸骨坑。而在此之前，多年来当地乡村居民发现的属于战国时期的兵器与其他有关文物则已有多次。唐代著名诗人李贺写有《长平箭头歌》，明代朱元璋的大臣刘伯温也写有《长平戈头歌》。从某种角度讲，战国时期秦赵长平之战不仅给后世人民遗留下了一些古战场的历史遗存，而且由此也产生积淀了一种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自然反映出的文化现象和文化遗产。如在历史地名方面，当地至今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村庄地名有许多即与长平之战有着直接关系，像“秦赵村”、“哭头村”、“省冤谷”、“米山”、“箭头村”和“赵障村”等均是。此次永录1号 尸骨坑的发掘，再联系到西汉司马迁笔下所记秦昭襄王后来赐剑令白起自裁时白起自己所讲的一段话：“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②]所有这一切，也都足以证明了2000多年前那次秦赵长平之战中有关历史情节的真实性。

据知，山西省高平市政府已经作出决定，将要在永录1号尸骨坑就地建立战国秦赵长平之战博物馆。这应该说是一件对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意义的事情。

[②] 姚奠中主编：《咏晋诗选》，山西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370页。

[①] 姚奠中主编：《咏晋诗选》，山西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372页。

[②] 《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37页。

在明人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当其论述到历代的战争与山西的地理形势时，曾经讲到北魏时期的一段往事。是曰：“ 宇文氏与齐人争于龙门、玉壁之间，材均势敌，卒不能越关河尺寸。 ”这里所讲的“ 玉壁 ”，即西貌大统四年（公元 538 年）修筑的一座城池，位置的在今山西稷山县境内汾河南岸的玉壁渡口附近。据说此城周长达到 4 公里之多，四周面临深谷，形势十分险要。当时的东魏政权和西魏政权虽然均由元姓执政，但其军事权力却都已分由高欢（后来北齐文宣帝高洋之父）和宇文氏家族势力掌握。高欢从公元 542 年就下定决心要从西魏守将王思政的手中夺取玉壁城，以打通直下关中的道路。但是此年他冒着寒冬大雪接连攻城近 10 日，攻城士卒死伤无数也未能攻下该城，于是只得退兵。4 年之后的公元 546 年，高欢几乎倾其国中全部兵力，再次卷土南下攻打玉壁。这时西魏已由宇文氏家族的北周政权替代，守玉壁城的统帅也换成了在当时享有声名的著名将领韦孝宽。双方攻守之战进行得极其惨烈。高欢军先积土成山借高登城，接着在城四周挖掘地道企图潜进城内，后竟用油脂浇在木柱上施以火攻，但都被韦孝宽悉数击退。这次攻打玉壁的战争坚持了两个多月，高欢军死伤多达 7 万余人，仍然不能取胜。到最后，高欢忧忿成疾。玉壁城内的韦孝宽就让城中军民编唱顺口溜辱骂高欢军，称高欢为“ 高欢鼠子 ”，高欢无以为计，最后只得无奈退兵。退兵时为了稳定军心，他忍住病痛强自镇定，甚至在营中表面上作出宴集将士的样子，示意帐下大将斛律金高唱一曲自编的《敕勒歌》，自己随之引吭附和，其情甚为悲壮。歌曰：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一曲《敕勒歌》不但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而且尤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均留下了深远影响。北周时，玉壁古城曾作为勋州州治所在，后移置绛州（今新绛县城）。在原来的玉壁古战场上，至今仍留有“ 高欢城 ”和“ 万人坑 ”等地名传承于当地民间，《敕勒歌》则成为玉壁古战场留下的另外一种特殊的文化遗存和历史见证。

从玉壁古战场遗址沿汾河东去约 50 余公里处，现有一柏壁村，村附近又有古柏壁关和秦玉堡等。这又是一处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享有盛誉的著名古战场。

公元 619 年秋，即唐高祖李渊刚刚在长安建立李唐王朝一年半的时候，刘武周勾结突厥在山西北部发难，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几乎占领了河东的所有战略要地。在这种情况下，李渊计划放弃河东，但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却认为：“ 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

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 3 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1]李世民愿意带领精兵 3 万去收复山西失地，李渊非常高兴，亲自到黄河岸边的长春宫为他送行。当时正是隆冬季节，李世民带领 3 万精兵从龙门踩着坚冰跨越黄河，驻屯于柏壁古堡，与刘武周的部下宋金刚对垒相持。由于立足未稳，李世民初时采取了坚壁不战的策略，一边充足军粮，休兵秣马，时而又带领轻骑偷袭敌人。如偷袭美良川（在今闻喜县境内），夜袭安邑均歼敌数千，取胜后又复归于柏壁。唐武德三年（公元 620 年）四月，秦王李世民出兵至河东仅 4 个多月，宋金刚已军中粮尽，不得不败北而走，李世民率军出柏壁紧追不舍，曾一昼夜行军 100 多公里，并与敌激战多次。等追至雀鼠谷（在今灵石县境内）时，李世民身先士卒，一日与宋金刚 8 次激战，俘虏杀敌共计数万人。史曰：“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止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1]紧接着，李世民率军一鼓作气追至介休，并在此地又收降尉迟敬德。未至五月，刘武周与宋金刚均被突厥所杀，而数月前河东所失之州县又皆回归于唐。由此，今天的新绛柏壁与灵石雀鼠谷，也都成为山西境内著名的古代战场。柏壁附近的秦王堡虽然原建的城垣早已毁圮，但至今仍保存着秦王擂鼓台遗址。当地民间传说，之所以到现在绛州鼓乐还能够享誉于国内外，是由于当年秦王李世民在此屯兵时编创了著名的《秦王破阵乐》的历史缘故。《唐会要》上记载说《秦王破阵乐舞图》是唐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正月七日由唐太宗李世民制订的，但初创则是他作秦王驻屯柏壁的时候，也是有道理的。要不然，为什么以《秦王破阵乐舞图》而命名，而不以其作皇帝后的尊号去命名呢？

也许由于元明时期以来戏曲与小说在民间的广为作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山西古战场里，在一般人心目中最具影响者，恐怕第一就要数北宋时和杨家将有关的边塞沙场。例如位于今内长城外的怀仁县金沙滩，以及朔州市西南狼牙村，就最使后代人们向往。前者金沙滩为杨业驻守代州时常与辽兵激战处；狼牙村则为辽统和四年（公元 986 年）杨业兵败朔州以南时，受箭伤被辽兵所俘处。杨业在此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殉死，其情甚为壮烈。关于此事《宋史》与《辽史》中均有记述。稍有不同的是《宋史》中称为“杨业”，《辽史》中则称其为“杨继业”。另有关杨业被俘绝食而死的地方，据《辽史》讲在朔州以南的狼牙村（今称狼儿村），而《宋史》则说是在陈家谷。今朔州市南与宁武县相邻处有陈家谷，与狼牙村相距不远，大约不到 25 公里的样子，实际是一个地域。从《辽史》记载的细节较《宋史》更为具体的情况看，《辽史》则更为可信。如《辽史》在记载耶律奚低此人一节中，就有“继业败于朔州之南，匿深林中，奚低望袍影而射，继业堕马”[1]的文字。

---

[1]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5868 页。

[1]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5881 页。

[1] 《辽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303 页。

有具体地址、具体人物和具体情节。这可能与辽属此役胜者一方，当时能详细目睹了解战场实情有很大关系。

从秦汉至宋金，历代的都城均在山西以外的一些地区，如长安、洛阳、开封、邯郸等；而处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从来总以南侵为其战争目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所处的地理位置又几乎全部处于山西的正北方，山西遂成为北人南侵及中原御敌的进军必经之地。例如汉与匈奴，西晋与鲜卑，东晋与北魏，北齐与北周，隋唐与突厥，北宋与契丹，及至金元之争，无一不是如此。从某种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战争史，山西高原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历代战争及其战场的云集之地，似乎已成为必然之事实或必然之趋势。

战争与瘟疫和任何一种自然灾害相同，它的降临常常使人类无以防患，躲之不及。当其像飓风一样刮过之后，它的破坏性极强的灾难性后果，往往给发生战争的地方造成一种永久的记忆或留下永远不去的历史标记。我们在山西保存下来的许多地方方志类的古代文献中，就时常能见到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对历史上发生战争的地方或场所，修志之人对这些曾经洒满鲜血的历史遗存地，大多以冷静的笔法将它们冠之以“古迹”之名，记载下来，以警示后人。我们在前面所列举的那些发生在山西的著名战争，不论它们过去了多少年代，却无一不在发生战争的当地留下一些生态标记。这些标记将以历史遗产的形式，长久地保留与传承下去。除了许多历史战争中得以幸存至今天的物质类的遗存之外，还有很多由于某些历史战争而形成的带有极强时代特征的历史地名，都属于这种遗产生态的范围。然而因为时间过去太为久远，以至形成了过于厚重的历史尘封，后人则难免对它们无从认识或了解，这不仅需要我们去着意地给予认真保护，而且还应将它们向今天的人们作必要的介绍，以便发挥其作为遗产生态资源所应该发挥的历史教育作用，甚或是在旅游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四节　万里长城及其关隘

中国古代万里长城的最早出现，根据文献记载和专家们的研究，据说是在公元前 7 世纪左右，相当于我国东周的春秋时期。而春秋时期最早修建长城的则是南方的楚国，这是我国当代古长城研究专家们的看法。古文献上记载，鲁僖公四年（公元前 656 年）时，春秋五霸之一齐桓公派兵攻打楚国，楚成王派一叫屈完的人带兵迎敌。在召陵这个地方，两军对垒，齐桓公问屈完：“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则回答：“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①]这两人的对话若翻译成今天的语言，那就是齐桓公说：像我齐国这样强的兵力，谁能够抵挡呢？我如果用这样强的兵力去攻打你楚国的城池，有什么的城能不被我攻打下来呢？但是楚国屈完这个人偏不怕他。他胸有成竹地回击了齐桓公的恫吓，针锋相对地说：你虽然强大，若以德去服务诸侯小国，谁能够不服你呢？但是你如果强以武力来进犯我们楚国，我们楚国却有方城可以防守，还有汉水阻挡你。你兵力再强大，又有什么用呢？齐桓公听了屈完的话，后来只好退兵。诸如齐桓公代楚这样的事，据知后来在公元前 624 年和公元前 557 年时还发生过两次。其中一次是晋襄公派处父伐楚，另外一次是晋平公派荀偃伐楚，也都因为楚国有“方城”这种特殊的防御设施，都只好草草收兵。对这两次晋国出兵伐楚而后又因“方城”阻御无奈退兵的事情，《左传》一书中也都均有相关记载。

“方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城池？为什么像齐和晋这样的强国在它的面前也无可奈何呢？

我国著名古长城研究专家罗哲文先生认为，当时楚国赖以抵御强敌而又能每每奏效的这种“方城”，即是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长城。他说，无论是齐桓公伐楚，还是后来的两次强晋伐楚。“这些情况不仅说明了楚方城防御其他诸侯领国侵扰上的功能，而且也说明了方城不是一般孤立城市的城垣，而是连绵不断的城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这便是长城的开始”。②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种种迹象看，长城的最初出现于我国古代，其实用功能首先是为了战争中的防御。春秋时楚国长城的出现，主要就是为了防范来自它的北部诸国如晋、齐、秦、鲁、郑的进犯的。　1981 年以后，经过河南、湖北等省区文物考古界和楚文化研究会等多方面的考察与踏勘，已证明楚长城的总长度大约近 500 公里。实际调查的结果与古代文献记载完全相符。

与古楚国长城的始建年代相比，位于山西高原上的古晋长城的出现则要晚出大约 300 年以上。其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春秋时期的晋国其四邻均是一些落后的戎狄部落或弱小诸侯。从军事方面来讲，自西周建国初期直至春秋

[①]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52 页。

时期中叶以后，大约 500 余年间，晋国基本上一直处在一个向外进行军事扩张的状态中。从某种角度讲，还有一个自然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晋国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四周山河阻隔，天然封闭。一些具有能与晋国进行军事抗衡的大国，如齐、楚、秦、宋等距离晋的核心地域又很远，即使意欲犯晋，碍于像太行山和黄河这样的天险屏障，再加上晋国本身已有的军事实力，这就可能成为古代长城在山西高原出现较迟的另一个原委。

较为准确地讲，我国古代长城在山西高原的最早出现，应该是在韩、魏、赵三家于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 376 年）彻底瓜分晋国之后。当时，魏国在山西高原的西南部隔黄河与秦国相对峙，赵国则将其军事扩张的目标基本指向塞北翟、代之地及太行山以东齐、燕的势力范围。韩国在当时的实力大不如魏、赵。在秦、魏、赵的强力夹缝中，它则不得不逐渐地避其身边的强敌，而将有限的军事力量施加于比它更弱的郑、宋一类的小国，渐次向东南方向发展，以至最后将其国都由山西境内迁出，定于太行之外和黄河以南的郑地（今河南新郑）。在韩、魏、赵这三个由晋派生出的新诸侯国的各自发展中，魏惠王十九年（公元前 352 年），因魏国在此之前时曾经一度攻过黄河，占领了河西原来属于秦的一些领地，为了能永久保住这些地方，所以就有了发生于此年的“筑长城，塞固阳”[①]之举。据知这是战国三晋筑长城的最早记载，但其所建地理位置并不在山西界内，而是在今天陕西省洛水东岸一线。真正最早在山西高原范围内建筑长城的，应该是战国三晋中的赵国。史曰：赵肃侯十七年（公元前 333 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②]这里所记载的两件事，实际上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一件是讲赵肃侯十七年这一年赵国攻打魏国叫做黄的地方，没有攻打下来。后面筑长城则是指赵国在另外一个地方筑长城以防另有强国攻赵。根据当时赵所处环境分析，赵所攻打的魏国的黄，当在今山西南部沁河上游一带，而赵当年修筑长城的地方则应该远在今天山西北部忻定盆地的西北方一线。因为赵当时要时时提防秦对其西北代地的突然侵袭。根据有关方面近年来的考察，从今天山西兴县西北部的黄河东岸开始，向东经岢岚、五寨、神池、代县、繁峙诸县，直到山西东界的广灵与灵丘交界一线，沿着管涔山和恒山山脉伸向今河北境内，近 500 公里的距离内均有战国长城遗址与遗迹发现（其中从今阳方口开始向东，其走向基本与明代的内长城有所重叠）。这些战国时代的长城遗迹与遗址，应该而且也只能是三晋之中赵文化和赵历史的孑遗。韩、魏、赵三家分晋之后，特别是战国七雄的鼎立之势基本形成之时，赵国立足晋阳，据有今山西北部大片土地，其向西、北、东三面的军事扩张速度非常迅速。1979 年以后，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国古代长城遗迹调查的结果表明，战国时期赵国长城的分布地域及其建筑总长度在当时各诸侯国中，无疑是居于前列位置

[①]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845 页。

[②]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802 页。

的。除了其初期在今山西境内的修筑，赵的长城绝大多数则分布在今内蒙古阴山以南以及与山西隔河而望的陕北地区，还有恒山东侧的冀西地区。正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一篇有关古长城的调查报告中所讲的那样："当时的赵国也和魏国一样，在今山陕之间的黄河以西拥有大片土地。现在宜川县西北就是赵国的定阳故地（《战国策·齐策》五）。而黄河以东，现在山西离石、柳林诸县附近，也是赵国当日的离石、商（《战国策·西周策》）、皋狼诸地（《战国策·赵策》）。"[①]在司马迁的笔下，同样记载了赵国的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公元前 325—前 299 年在位）在实行了他的著名的胡服骑射制度之后，又在修筑万里长城方面的业绩。史曰："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胡俗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②此处引文中司马迁所说的高阙，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库布齐沙漠西北处的杭棉后旗东北阴山山脉。

从高阙至今天的山西大同市的直线距离足有 500 公里以上，可见当时赵国长城的修筑规模何其宏伟壮阔。至于云中、雁门和代郡的地望，已确知其中有的在今山西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区，有的则完全处于山西省境内。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后，中华民族首次形成大一统局面。这位当时刚 38 岁的千古一帝在诸多国家大事中，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将原来由秦、赵、燕等诸侯国分别修筑的长城联结为一体，以抵御来自于北方戎狄及匈奴部落的侵扰袭击。《史记·蒙恬传》中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后世人们习惯上所说的"万里长城"一词，罗哲文先生认为实际上即始于此。需要指出的是，秦万里长城中虽然有大约近半数的长度是利用了赵长城，但其所在位置却全在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当时山西境内的赵长城则可能均被命令予以拆毁。为什么秦要在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这样一个长达万里的距离中统一修筑长城的同时，又要命令拆毁原来六国诸侯境内各自修筑的长城呢？原因据知是害怕在此之后再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诸侯割据局面。这极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山西境内极不容易发现战国时韩、魏、赵三晋长城遗址遗迹的主要原因。从各个方面看，西汉建立后虽然修筑万里长城的工程曾经呈现了更为庞大的气势，但仍然是在北部边疆秦长城的基础上予以增补加修，仍然是为了防范来自北部草原匈奴的侵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山西省有关部门在晋东北的广灵县曾经发现汉代长城遗迹。这是目前在山西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处汉长城遗址，使人倍觉珍贵。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来，那就是有关此处汉长城的修筑时间问题。在翻阅有关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在清雍正十二年（公元 1734 年）

[①] 《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9 页。括号内引文为史先生原文中所有。

版的《山西通志·古迹卷》广灵县内容里，发现有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 年）在当地直峪山修筑长城的记述。此处记述明确说到该处长城遗迹在清雍正年间还保存着，今人常常对地方志的记述抱一种怀疑态度。鉴于此，我们不得不再去到官修的《汉书》中去取得印证。果然，《汉书》在汉武帝元光五年有关内容中也有相关记载。史曰：是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险阻”。[①]无论从出动上万人的工程规模看，还是由其地理方位分析，人们都无法怀疑地方志中的记载和《汉书》的有关记述，以及当地遗址本身存在这三因素间必然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应该能够足以说明西汉长城确实在此存在的真实性。如果再对西汉初期匈奴与刘汉政权在山西北部地区的军事对峙稍多一些了解的话，那么，对这种历史真实的理解或许就会更为深刻。例如，早在汉元帝后元六年（公元前 158 年）时，由于匈奴数万骑兵从山西北部长驱直入，西汉朝廷就曾“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勾注”。[②]所谓“飞狐”，即飞狐陉或称飞狐口，其位置正在今天山西广灵县的东部；至于“勾注”即勾注山，具体位置也就在今广灵县往西的繁峙与代县一带。应该相信，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的广灵汉长城遗迹，正是当年西汉戍边军屯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

两汉过后，从三国直至隋唐之初，亦即从公元 3 世纪初到公元 7 世纪初，500 年间中华民族又沦入了一个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战火纷飞的动乱时代。由于前后有数十个割据政权分布于大河上下与江淮流域，所以长城在战争中的特殊防御作用又在此时显现了出来。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几个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小朝廷，都曾在山西大地上多次大肆修筑过长城，其中北齐时期在晋西北的管涔山由北向南在关帝山西隅一线修筑的百余公里长城尤为突出。而在南北朝与东晋之前，建都洛阳的西晋司马氏政权为了抵御其西部羌胡民族和北部东西鲜卑人的不时袭扰，也曾有效地利用了秦汉时的长城设施与来自西北的侵略相抗衡。

关于山西境内历代所建长城的总长度，国家有关部门在作过勘察了解后，至目前已调查确认大约 3400 公里以上。南北朝 以前的约为 1000 公里左右，其中绝大部分已很难找到遗迹。现在能够确认其遗址遗迹的古代长城，在山西境内基本上均是隋唐以后的遗存。而保存较为完好的部分，则几乎全是明代新建或重修过的长城。考古界与古建筑学界认为，长城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防御建筑，从东周的春秋时代开始，直至明朝建立，所经多数朝代均有修筑。通过对山西境内古长城的调查了解，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虽然南北朝以前的古长城遗迹目前在山西已很难寻觅，但若征之于历史文献，有许多记载却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如以有关南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在山西境内所修筑长城的记载为例，就极易得到。

[①] 《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64 页。

[②] 《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30 页。

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是北魏时期政治作为仅次于孝文帝拓跋元宏的一位政治家。史载，在其执政的太平真君七年（公元 446 年），他曾“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1]罗哲文先生认为此处的筑畿上塞围，“即是从现在北京居庸关，向南至灵丘，再向西经平型、北楼、雁门、宁武、偏头诸关而达山西河曲县。当时把这道长城称之为畿上塞围，是因为它环绕于首都大同的南面，用它来保卫首都之意”。[2]大同即当时北魏都城平城所在之地，灵丘、平型、北楼、雁门、宁武、偏头诸长城关隘均在今山西境内。可见，这条畿上塞围的大部分遗存地皆应在山西高原，这无疑便于我们今天的考察与寻求。

再如北齐文宣帝高洋，这是一位在他那个时代就被人们比作为夏桀和殷纣的残虐的封建帝王。虽然他在位时间仅仅只有 10 年，然而如若论及他横征暴敛与大兴土木的“业绩”的话，可以说他的所作所为绝不亚于秦始皇时的大修万里长城，以及隋炀帝开辟京杭大运河的残酷程度与巨大规模。根据历史文献中有关记载的显示，他在北齐天保三年（公元 552 年）时，就曾不顾冬天的严寒，亲自君临晋西北的吕梁山上，“次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于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1]这段南北向的长城，大约北部起自今天的岚县一带，南部一直修筑至现在汾阳与离石交界处的薛公岭（亦即历史上的黄栌岭）之处。其历史遗迹至今仍能在一些地方偶然发现。天保六年（公元 555 年），高洋又“诏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天保七年（公元 556 年），又“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六十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天保八年（公元 557 年），又“初于长城内筑重城，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2]以上引文中古地名如恒州、总秦戍和库洛拔等均在今山西大同附近，坞纥戍则在今天平型关遗址的东北处。高洋死后，不到 6 年时间内，北齐连续就换了 4 位皇帝，至天统元年（公元 565 年）北齐后主高纬时，高纬竟又“自库堆戍东距海二千余里间，凡有险要，堑山筑城，断谷起障”。[3]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北齐时除了于塞北修筑长城之外，而且还曾在今山西阳城与河南济源间的太行八陉之一的轵关陉附近也修筑过数百里长城，以防御当时北周宇文氏的北侵。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笔下有关“齐诏司空斛律光督步骑二万，筑勳掌城于轵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1]的记载，即是史证。时当北齐河清二年（公元 563 年）春三月的时候。至

---

[1] 《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01 页。

[2] 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1 页。

[1] 《北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49 页。

[2] 《北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53—254 页。

[3] 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1 页。

[1]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5231 页。

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能见到这些古长城的遗迹。近年在山西阳城至晋城之间山区考察时，有关方面发现的所谓不明时代的长城遗迹，极有可能就是北齐时所筑长城的历史遗存。

北周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继西魏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维持时间很短的短命政权，但在长城修筑历史上仍有自己的建树与记载。如北周静帝宇文阐，虽然他只是一个在位一年多时间的短命皇帝，当突厥寇扰并州时，他也于大象元年（公元 579 年）六月，“发山东诸民修长城”。[②]据知，这次所修长城原计划自雁门关一直修到碣石临海滨的地方，但不久由于隋国公杨坚篡权，北周灭亡，故未及竣工。

范文澜先生曾经说过：“北朝和南朝南北对立。北朝和北境外强国也是南北对立。这些北境外强国都是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发展、以掳掠人口和财物为专业的游牧国家，对北朝的威胁是严重的。北朝对南朝要攻、守、和、战兼施，对北境外强国也要攻、守、和、战兼施，所以北朝的处境比较复杂。”[③]正是由于所处的这种复杂的政治与军事环境，故而北魏、北齐、北周等北朝政权从公元 4 世纪末至公元 6 世纪末这 200 年间，在我国古代长城建筑史上，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从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个建筑高峰期。其特点是建筑地域布局广阔，建筑总长度则仅次于先秦长城和明代长城。另外一个特点，因为北朝各个政权几乎均以山西高原作为他们的主要军事和政治活动地域，所以，这一时期的长城修筑活动，在山西的古代地方史上显得尤其突出。

作为一个封建王朝，隋代虽然在中国古代史上只有 37 年的短暂历史，但在修筑长城方面却有许多文献记载。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一次就征用丁伕多达百万人以上，去修筑陕北榆林至今山西大同西北部之间的长城。隋代修筑长城的地理区域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几乎全部都集中在都城长安以北今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

根据罗哲文先生研究结论，“唐、宋、辽时期，长城的修筑工程几乎处在停息阶段”。[①]金代虽曾有过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举动，但其修筑地域多在今天的黑龙江、辽宁与内蒙古地区。非常有趣的是，在北宋欧阳修和宋祁撰修的《新唐书·地理志》中，当记述到当时的太原郡所辖太谷县有关内容时，书中竟写到在太谷县“东南八十里马岭上有长城，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贞观元年废”。[②]从那以后，后人多以为此段长城为唐长城。如清雍正十二年（公元 1734 年）版《山西通志》即非常明确地写定这段长城“自平城至

[②]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5398 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 2 册，人民出版社 1949 年版，第 621 页。

[①] 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2 页。

[②] 《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003 页。

鲁口，沿山屈曲延三百里。武德二年筑，贞观元年废”。[③]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至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之间仅8年时间。为什么刚刚修筑好的150公里长城不到10年时间又要废弃呢？在非常险峻的山脉间修筑150公里长城，一筑一废，非同小可。为此，笔者曾翻过许多历史文献，修筑此段长城的具体记载难于稽查，怀疑清雍正版《山西通志》中“武德二年筑”的记述恐怕有误。近年有关方面在调查此段长城时仍以唐筑长城对待，笔者则以为其建筑年代很可能属南北朝，或者属战国时代。有关马岭长城的方位记载，《新唐书》中所说的“平城”即今天和顺县西部的仪城村，此村在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至宋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478年间，曾一直作为当时的平城县治之所在。至于“鲁口”这个古地名很可能就在今天祁县城东南约30公里处的峪口（即伏西河西流出山口）附近。峪口西约5公里处现有鲁村，当是一个历史的佐证。从今天的祁县峪口村沿山向东去，经马岭关遗址再一直向东至和顺仪城村，直线距离100多公里。古时的长城是依山势曲折修筑的，所以《新唐书》中所说“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应是符合实际的。据唐代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志》中讲，隋开皇十六年在今仪城村所建的平城县治，实际上就是战国时期赵国赵简子所建的平都古城的遗址所在。那么，“自平城至于鲁口三百里”古长城如果不是唐长城的话，会不会是战国时期的赵长城呢？这又是一个历史文化之谜。总之，今天我们还仍然能够隐约见到的太谷县南的马岭长城遗址，确实应该被认为是山西境内古长城遗产中最有魅力的一个部分。

在中国古代起自春秋而息于清代的2000余年的长城修筑史上，明代200余年的长城修筑成果堪称最为辉煌。罗哲文先生讲：“明朝长城工程之大，自秦皇、汉武之后，没有一个朝代能够与之相比，工程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改进，结构更加坚固，防御的作用也更大了。”[①]明代不仅将全国州县以上的所有城市的城墙完全用砖石予以包砌，而且同时将万里长城的将近2/3的区段也悉数用砖石包砌或用砖石加固。我们现在能够见到的长城实际上就是明长城。一般人都认为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而西至嘉峪关，事实上明代的万里长城还要比这个长度长得多。向东它甚至到了鸭绿江畔，向西则已进入新疆境内。皖南号称为“典核”的著名才子朱升在明太祖朱元璋即将登基但还没有完全征服天下的时候，向朱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后来明代建立后的200余年中，自始至终一直大修州府县城城垣和万里长城，证明“高筑墙”确成为朱明王朝统驭天下的基本国策。

明代山西境内的万里长城区段，在整个明代长城修筑体系中，仍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当然主要是因为山西北部在明之前历代所修的长城，此时无论对已经退回草原大漠中的蒙古贵族的残余军事力量，还是对刚刚建立政

[③] 《山西通志·古迹卷》，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版，第16页。

[①] 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权的朱明王朝来讲，均被作为双方实行军事对峙前线的直接接触地域。特别是在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公元 1403 年）正式在北京建都后，山西北部的长城设施就尤其显露出了特殊的国防作用。《明史》记载，早在明洪武二十八年（公元 1395 年）春天时，朱元璋就曾派他的第 3 个儿子“晋王棡率河南、山西诸卫军出塞，筑城屯田”。[①]这可以被认为是明初在山西北部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启始。明代北京西北部居庸关向西直至山西偏关的所谓内、外长城的修筑，事实上也应该启始于此一时期，而内外长城的最后完成和竣工，则可能一直延至明代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左右。因为在此之前不久，由于蒙古俺答的一再侵扰，嘉靖皇帝曾经不得不把正在家中为父守丧的山西蒲州籍兵部尚书杨博紧急召回，让杨总督宣化、大同及山西全部军务。任上，杨曾“于大同牛心山诸处筑堡九，墩台九十二，接左卫高山站，以达镇城”。[①]这里的大同牛心山即在今右玉县牛心村附近，堡与墩台皆为当时内外长城上的军事设施。这说明山西境内的内、外长城在公元 1561 年之前仍未完备。

明代的外长城东部起自居庸关，经今河北张家口市然后进入山西的天镇、阳高、大同、左云、右玉直到偏关、河曲。其向西的走向进入天镇后，实际上形成了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的自然分界标志。明代的内长城东部同样起始于北京市郊区的居庸关，然后向西经今河北保定地区的易县、涞源、阜平进入山西灵丘，再沿浑源、应县、繁峙、神池境内的山脉直至偏关老营堡，与外长城相连接。外长城的城隘以“堡口”著称，如山西界内的杀虎口、破虎堡、镇川堡等；内长城则以“外三关”和“内三关”最为驰名，其中“外三关”即是指山西界内的雁门关、宁武关和偏头关。

最初，明王朝曾将北方长城划分为九个防守区段，时称“九边”，由于每边均设镇守官员，所以又称“九镇。”到明嘉靖三十年（公元 1552 年）时，在北京附近的昌平和保定又增设两镇，遂又成为“十一镇”。这“十一镇”分别是：辽东镇、蓟镇、昌镇、真保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和甘肃镇。其中太原镇和大同镇在今山西境内。太原镇管辖山西境内的内长城，全长 800 多公里；大同镇则管辖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外长城，全长 335 公里。

明代曾有许多彪炳于史册的著名历史人物或征战或屯戍或巡视于山西辖境的内、外长城之间。例如明初的开国元勋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和后来明英宗时的爱国将领于谦，以及明嘉靖时鼎柱重臣杨博等人均是。尤其于谦，他不但以其一腔爱国热忱和英雄胆略赢得了后世人民的永久爱戴与纪念，而且还在山西高原留下了许多诗词瑰宝。其中《云中即事》和《咏煤炭》两首，一写当时塞外长城边陲于戍边将士的生活情景，一借山西遍地皆是的

[①] 《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52 页

[①] 《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56—57 页。

煤炭抒发其高尚情操。尤如“边垂无事风尘静，坐听笳声送夕阳”和“鼎彝元赖生成力，铁光犹存死后心”这样优美精辟的佳句，至今仍被人们盛传不衰。

人所共知，在普遍意义上来讲，中国古代的长城修筑活动到了明万历（公元 1573—1620 年）以后，就逐渐进入了停息阶段。公元 1644 年清军入关，顺治皇帝登基于北京。从此时起，清廷虽然“对修不修长城曾经进行过长久的争辩。起初有不少大臣提出过修长城的事，清朝统治者也曾加以考虑过”。[①]但是，由于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特别是在整个北部边疆取得了突出的战绩，竟使阿尔泰山以东直至黑龙江流域的大片土地全部纳入了清王朝版图。所以约到康熙四十年（公元 1701 年）以前时，这位曾经 3 次御驾亲征的康熙皇帝，终于在要不要再修长城这个问题上得以大彻大悟。他断然决定用一种更能使蒙、藏、维等民族上层人物接受的政治统治策略，去替代军事冲突和传统的长城防御工程。他不但决定不再修长城，而且还用写诗的方式讥讽中国历史上那些曾经大修长城的历代帝工是“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一方面他在修筑长城这个问题上嘲讽前代帝王，另一方面他还表示了对前代修筑长城而征役的普通平民的由衷同情。如在一次巡视山海关时他还顺便去看了附近的姜女祠。

爱新觉罗·玄烨，这位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第二代皇帝，最终在他第三次御驾亲征凯旋返归北京时，面对着居庸关这座长城上的著名关隘，欣然认识到了“悬崖壁立垣埔固，古峡泉流昼夜间；须识成城惟众志，称雄不独峙群山”[①]这个深刻的政治哲理。

然而，具有极大讽刺意味的是，在康熙皇帝去世不到 70 年的时候，他的不肖子孙们就因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在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的打击下，违背了他不再修筑长城的愿望，先是在清嘉庆二年（公元 1797 年），川、陕、鄂白莲教农民大起义的义军几次进入陕西、逼近黄河并计划渡河北进山西时，山西清军就开始在黄河东岸一侧，从今石楼县义牒镇附近向南直至吉县、乡宁一带沿河修筑长城。后来又由于清咸丰三年（公元 1853 年）太平天国起义后由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北伐军对山西的威胁，特别是清同治六年（公元 1867 年）秋，当时由张宗禹率领的西部捻军意欲由陕西出发经山西驰援山东的东部捻军，这就更促使山西清军倍觉恐慌。在此前后，山西石楼、永和、大宁、吉县、乡宁由北向南沿黄河东岸修筑的大约 150 余公里长城已基本建成，并在沿线长城上设立了辛关、永和关、铁罗关、马斗关、干渡关等诸多关隘，以加强守备。但是，就是在清同治六年的十一月，由张宗禹率领的西部起义捻军，仍然还是从陕西宜川和山西吉县交界的龙王辿强行渡过黄河，攻破了由清军驻守的河清门长城，一举进入山西，并由此直下河

[①] 罗哲文：《长城》，北京旅游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 页。

[①] 卜维义、孙丕任编：《康熙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2 页。

南。当年的河清关长城遗址至今仍然保留在山西吉县壶口瀑布附近的龙王辿山崖间。这段清代长城已与著名的黄河壶口瀑布一起，成为当地颇享盛名的旅游景点。如果说明代以前 2000 多年间历代所修长城，大多是起着一种抵御外来侵略作用的话，那么，山西境内的清代长城则完全可以说是用来对内镇压人民起义的。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山西沿黄河东岸的清代长城遗址，它标志了中国古代长城建筑的真正最后之结束。

中国古代长城历来多凭借自然天险而修筑，故而作为长城重要组成部分的要塞关隘也就几乎都处于山河之要冲位置。由于山西这块大地在中国历代政治军事史上享有独特作用，以及它那特有的以表里山河为特征的特殊地形地貌，所以，名关险隘在山西的分布有史以来又表现得尤其密集。在此，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知名度的三晋著名关隘并指出它们遗址的地理位置。如：

马岭关，太谷县东南 30 公里；
黄泽关，左权县东南 60 公里；
娘子关，平定县东北 40 公里；
平型关，繁峙县东北 60 公里；
黄芦岭关，汾阳市西 30 余公里；
永和关，永扣县西北 30 公里；
铁罗关，永和县西南 30 公里；
东阳关，黎城县东北 13 公里；
老营堡，偏关县东北 75 公里；
杀虎口，右玉县西北 30 公里；
马斗关，大宁县西北 25 公里；
偏头关，偏关县城；
雁门关，代县北 15 公里；
宁武关，宁武县城；
蔚汾关，兴县城东；
乌仁关，吉县西 30 公里；
平渡关，大宁县西南 27 公里；
天井关，晋城市南 23 公里；
长平关，高平县北 20 公里；
直谷关，广灵县南 5 公里；
茹越口，应县南 20 公里；
……

以上所举关隘均在山西境内长城线上，本身就是历代镇守长城将士的戍所，同时兼有军事、行政和来往交通管理多方面功能。这些关隘在外长城一带多以堡、口、卫等命名，因地因时而变异，有的长城区段关隘设置相当密集，如从今宁武向东经代县至繁峙一段内长城上，在北宋时就曾设有 20 余处大小关隘。仅盘道梁至平型关之间，就有水峪、胡峪、马兰、茹越、小石、大石、大安、团城、凌云、葫芦、太和、白草、八岔、小莲、夹柳、燕水、雕窠、元冈等隘口，其中雁门关还未算进去，时称“十八隘”。有的长城关隘虽然地处偏远，但是在历史上曾经十分繁荣昌盛，如偏关县的老营堡。这本是明代内、外长城在山西境内的连接会合之处。1985 年时曾有两位年轻记者到老营堡采访，堡内一位叫陈程的老人竟能极为详尽地讲出这座长城古堡繁盛时的状况。他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准确说出老营堡在历史上最后一次扩建时的情景。那是“万历癸酉年，即 1573 年，将老营堡向东拓城一倍，用千斤石百斤砖修建城墙，城墙周长五里十三步，3 个城门，4 个城楼， 360 个

垛口。城头，上有瞭望台，下有弹药库”。“老营城在极盛时期，城内有 3000 多户人家，全部是砖瓦房；沿街店铺林立，有 43 家字号。每年正月十五、五月端午、六月十八赶庙会，街头人群熙来攘往，热闹非常。南销胡麻油、北运棉布、铁货……城中心建有魁星阁，四面有关帝庙、娘娘庙、城隍庙、文昌庙、马王庙等 13 个戏台”。[①]

在有明一代的长城防御史上，偏关老营堡有着重要的地位。“铜偏关，铁宁武，生铁铸成者营堡。”这两句从明代一直传至今天的民谚， 400 多年来许多学者或百姓都能讲出或者耳闻过。但是能够把老营堡的历史从一位偏僻乡村的老人口中侃侃道出，讲给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两位年轻记者来听，这在今天却是不多见的。两位年轻记者后来在他们的有关著作中，当写到这一节内容时，慨然以《不该遗忘的长城》作为章节标题，堪称具有时代的慧眼。

山西除了有长城的地方分布了很多关隘，同时还有不同于长城关隘这种类型的许多其他古老关隘存在于山西的险山与大川之间。诸如此类，我们也能讲出一些它们的名称和地理位置。

石岭关，阳曲县北 25 公里；
阴地关，灵石县西南 25 公里；
黄榆岭关，和顺县东 35 公里；
石门关，原平市西北 35 公里；
赤塘关，忻州市西南 25 公里；
白壁关，孝义市西 10 公里；
孟门关，柳林县西北孟门镇；
泉子关，中阳县西南 20 公里；
风陵关，芮城县西南风陵渡口；
龙门关，河津市西北禹门渡口；
横岭关，终县南 12.5 公里；
上党关，屯留县西；
隘口村；乌岭关，沁水县西北 15 公里；
五度关，陵川县南 40 公里；
昂车关，武乡县东 4 公里；
……
白马关，盂县东北 35 公里；
天门关，太原市北郊区；
冷泉关，灵石县北 20 公里；
平岭关，广灵县北；
两岭关，静乐县南 30 公里；
合河关，兴县西北 30 公里；
金锁关，汾阳市西北 15 公里；
太平关，襄汾县西北 10 公里；
黑龙关，蒲县东 25 公里；
蒲津关，永济市古蒲州西蒲津渡；
潆关，垣曲县东 35 公里；
铁岭关，侯马市南 6.5 公里
穆陵关，万荣县西南 17.5 公里；
玉峡关，平顺县东南 32.5 公里；
虹梯关，平顺县东 17.5 公里；

与长城沿线的关隘不同，以上所举出的这些古代关隘大多分布于山西腹地各交通要道处，或是自然形成的山脉峡谷断陷位置，又或是著名的河流渡口处。例如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忻口战役的地方，古时就是

[①] 马小林、张敬民：《西口大逃荒》，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8 页。

忻口关之所在。在它的关城西边，西边是金山余脉，东边则是五台山脉的余脉。又如阳曲县北与忻州交界处的石岭关，古时关城两侧，西侧是云中山脉的余脉，东侧又是系舟山的余脉。再如平顺县东的虹梯关和玉峡关，则完全坐落深入在莽莽太行的群山峻岭之中。古人曾为两关分别作铭文并勒石于关上。《虹梯关铭》曰：

石崖攀天，仄蹬千迴。仰干塞明，俯临蔽霾。
铁壁钩连，谽谺中开。观者骇魄，行子心摧。
亘如长虹，横绝天阶，彼昏者氓，肆其喧豗。
爰据培/ ，以抗震雷。卒于大刑，亦孔之哀。
太行之阿，大河之隅。关门弗严，维帝念哉。
北山有石，南山有材。经之营之，突若崔嵬。
待臣作铭，以诏后来。[①]

与《虹梯关铭》相比，《玉峡关铭并序》使人读后，更觉气势非凡。是曰：

玉峡关者，夏子创焉而命之名也，旧日风门口，在隆虑万山之巅，为两河、三晋之界，盖天作之险也。前此弗设守，庸氓往往凭阻以拒命吏，兹大非失理与！迺即是关焉。关成而系之以铭：

太行盘盘，横厉中原。近引河朔，遥缀昆仑。
太原大梁，维国雄藩。壶关林虑，界于花园。
鸟道崎仄，轮摧马烦。怪不离列，熊攀豹蹲。
连崖壁立，屹如墉垣。绝顶中断，是曰风门。
俛临夜壑，仰逼朝暾。一夫挺身，万骑空屯。
设险甚固，王者道存。迺告守吏，爰作键阖。
勒铭岩阿，宠以瑶琨。匪昧在德，用戒嚣昏。[①]

千年的古代关隘虽然许多已经成为破败不堪的遗迹和遗址，然而这些幸存的碑碣刻石以及保留在方志文献中的那些历史文字，都成为我们藉以认识已经失去完整面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弥足珍贵的真实历史依据。这些与长城没有什么关系的古关隘，在一点上则与长城上的关隘存在着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与中国古代许多次战争密切相关。

清代初年曾在山西宁武府任过知府的河北人魏元枢，曾经写过一题为《查勘关隘遍历大关内外纪事二首》的诗歌。诗的上阕前二句为：“长城尽日此经行，谁挽天河洗五兵？”意思是说，我来长城查勘的时候战争早已成

[①] 《山西通志》点校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846 页。

[①] 《山西通志》点校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2846 页。

为往事了，可是想到千百年来曾在此戍守战死的征人，即使倾天河之水，谁又能洗净那战争留下的创伤与回忆啊？诗的下阕首两句则是：“ 驱车千里出重关，高卷双施过市门阛。 ”此处的描写却好像在说，我的查勘的车骑走过去了一道又一道的关隘，然而看到的竟是一派毫无战争气氛的繁荣景象，当年战火中的军旗应该已经是统统收卷起来并束之高阁了吧！

是的，中国古代的长城与关隘作为战争的标志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它们毕竟仍是人们难以忘却的历史。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全世界特有的一种景观生态，早已引起全人类的向往和注意。有人说过，万里长城是美国宇航员登临月亮回观地球时，唯一能够用肉眼观看到的地球人类文化建筑。还有人说过，山西是唯一一块存在着长城和黄河并肩平行的古老大地。把中华文明的两个著名标志联系在一起，黄河是自然遗产她却孕育了伟大久远的中华文化，万里长城虽是文化遗产，但它从诞生的那一时刻起，就紧紧地依附在自然山河之间和草原大漠之上。于是，就又有人说，这是两条巨龙。一条是人类的文化巨龙，一条则是孕育了人类文化的自然巨龙，而它们都属于中华民族，都被全人类视为文明之奇迹。这一切，真是构成了一个多么富有魅力的悠久的话题，这话题在山西最为源远流长。

第五节　历史文化名山

金哀宗亡国的第六年，即公元 1239 年的农历七月，当时在河汾一带颇有声名的才子麻革，接受浑源人刘祁之邀从晋南远上代北，准备攀登游览与北岳恒山紧相毗邻的龙山。未行前，麻革曾想到自己从小生长在河东名山王官峪和五老峰之下，中原一带的名山也游历过许多，荒凉凄凄的塞北会有什么样的名胜之山可游呢？刘祁总不会以夸大之言对我吧。直到几个好友相随登龙山那天的路上，麻革的心中还有些怀疑，原因是自他越过雁门关来到浑源后，所见到的山的颜色都是死灰一般，连山间路旁的草木也缺少青翠诱人的感觉。然而，麻革怎么也不会想到，自登上龙山群峰的那一刻起，他的兴致竟随着山的景色的变换而一步高似一步。一路上诸如大云寺、西岭、文殊岩、北岭、玉泉寺、望景台等，及至攀上龙山绝顶萱草坡时，他完全被征服了。两日游程下来，竟然激动得夜里连觉也睡不着了。于是，这位才子为浑源龙山留下了一篇为后人传颂的《游龙山记》。不到两千字的文章，应该说写得和龙山本身的风景景观一样漂亮而诱人。尤其文末处有一句写得堪称警世之句。是曰：

> 人之情，大抵得于此而遗于彼，用于所见而不用于所未见，此通患也。

凡读至此的人大都有很深刻的感受和随之而来更深刻的思考。不赘述。

山西是一个山的世界。今天的山西省其总面积中山地面积占到了 72%以上，约计 10 余万平方公里。它主要由太行、太岳、中条、吕梁、恒山、五台、芦芽、管涔、云中、系舟、王屋等大山系组成。许多山峰的高度都在 1500—2500 米之间，多属中山类型，均适宜于人类闲暇时攀登游览。五台山的北台叶斗峰，海拔 3058 米，是山西山地中的最高峰，也是华北地区山地的最高峰。山西山地中光 2000 米以上的山峰大约就有 30 多座，其中许多都是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游览观光胜地，例如五台山的五个台顶高峰、关帝山的孝文峰、芦芽山上的太子殿与荷叶坪、管涔山的林溪山、石膏山的牛角鞍、历山的舜玉坪、霍山的中镇峰、太行山的北天池山、恒山的天峰岭等。

在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山中，山西的历史文化名山群落除了海拔普遍偏高这个明显的特征外，还有另外三个特点，即历史悠久、类型结构丰富与数量多。

关于历史悠久——《山海经》无疑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专门记载域内名山的经典文献，而山西今天仍然见诸于现行地图标识的许多名山之名，则早在《山海经》的“山经”之中大批出现。如管涔山、狐岐山、天池山、王屋山、太行山、发鸠山、雁门山、姑射山、霍山、薄山、甘枣山、渠潴山、历山、孟门山等。据我们考察，《山海经》中提到的远古山名里，目前仍在流行使用着的，论省区山西省可能是最多的一个。又如先秦文献《庄子·逍

遥游》不但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的记述，而且明确指出这个藐姑射之山，即在“汾水之阳”。[1]山西省政府数年前已将位于今临汾市汾河西约 16 公里处的藐姑射山公布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在这个风景名胜区中至少仍保存着上百通从唐宋直至明清的古代碑刻。其中一宋碑即记述了北宋徽宗时期政和八年（公元 1118 年）赵佶这位有名的道家皇帝巡游藐姑射山的情景。碑曰：“皇上驾游仙境之山，前至马蹄战，偶见四仙下棋，仙接驾不止。皇上前行，四仙随驾，……神居洞为止。”以上足可佐证山西历史文化名山历史之悠久。关于类型结构——所谓山西历史文化名山的类型结构，主要是指因不同的历史背景或文化因素而促使形成各种风格的名山类型的本身组成形式。山西历史文化名山群落的自身类型结构形式表现得极为丰富多采。概括起来，可以归纳成这样几个大的类型：

（1）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类。如五岳之山中的北岳恒山、五镇之山中的中镇霍山。

（2）佛教文化类。如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王四大道场（亦即四大佛教名山）中的文殊道场所在地五台山，毘卢佛的道场芦芽山、佛教净土宗的祖庭之山交城石壁山等。

（3）道教文化类。如道教十大洞天的第一洞天王屋山（位于今山西阳城县与河南济源交界处）、七十二福地之一的永济五老峰以及方山县境内的北武当山等。

（4）中华民族远古先祖祭祀文化类。如历山舜王坪、稷王山（即周人先祖后稷之山）、闻喜汤王山（即商先祖汤王之山）、晋东南的炎帝山、吉县境内的人祖山（祭祀伏羲与女娲之山）等。

（5）中华民族创世造物文化类。如位于夏县温泉附近的巫咸山传说为商时巫咸造鼓的地方，陵川棋子山（又名谋棋岭）为商时箕子弈棋之地；干定的东、西浮山与长子县的发鸠山的得名则更为久远，前者是传说中女娲补天的地方，后者即精卫填海衔取木石之所在。《山海经·北山经》中有关“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埋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1]的记载，所讲即为发鸠山。

（6）历史人物文化类。此类历史文化名山在山西境内极多见。如介休绵山是晋文公时名臣介子推自焚之山，盂县藏山是为战国时赵国名臣程婴舍亲子以冒险收留隐藏赵氏孤儿之地，永济王官峪是为唐代末期著名诗论家司空图著《诗品》的地方，沁源灵空山则为唐末时先师菩萨（即唐懿宗第 3 个儿子李侃）削发为僧的落身之山，寿阳方山因唐代李通元（本名通玄，因避

---

[1] 《老子·庄子·列子》，岳麓书社 1989 年版，第 3 页。

[1] 袁珂：《山海经校译》，上保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9 页。

唐玄宗之讳而易名）隐居撰著《华严论》而享誉域内，太原西北郊区的崛■山则因为有明末清初的哲人巨子傅山长久结庐居住于此而更为知名，等等。

（7）历史事件文化类。如大同市东北白登山，汉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刘邦引兵追击韩王信，被其勾结匈奴围 7 日于此，之后白登山始有名。陵川县东南有马武寨山、刘秀城山和王莽岭，皆为太行雄峰；山中地名多与东汉初年战争有关，传说当年刘秀取邯郸时王莽曾尾追至此两相对峙。山中景观甚壮伟秀美且古老苍劲，因与河南辉县紧相毗邻，故而成为晋豫交界处之名山。再如灵石韩信岭，自古为晋中名胜。清嘉庆十年（公元 1805 年）时，寿阳人祁韵士有日记《万里行程记》，记其路经韩信岭时情景：“石磴盘空而上数十转，路益陡峻，策马至山巅，红垣缭绕，为汉淮阴侯墓，前有祠宇颇宏整，下马入拜谒，壁间诗甚夥，太抵当道者驻节所题。侯死（指韩信被吕后杀死）长安，不解何以葬此。阅古碑则云吕后既诛信，函首送代（时刘邦正在代地讨匈奴），适高帝还师驻跸此山，遂命瘗之，后人为起家焉。”[①]因为此山与吕后杀韩信的事件有关，且在这里安葬了韩信的头颅，所以韩信岭遂知名。另如水济首阳山之与周武王讨伐商纣，雁门山之与北宋时杨家将抗辽等，均是。

（8）民间一般祀神文化类。如乡宁县云邱山祭祀四海龙王，隰县五鹿山祭祀五鹿大夫，和顺县合山祭祀懿济圣母神，沁源县五花山祭祀狐突之神，屯留县三嵕山祭祀三嵕之神，壶关县凤台山祭祀乐氏二仙，离石市九凤山祭祀白马大仙，洪洞县娄山祭祀娄山之神等。历史上这样的地方文化名山，虽然只属于某一个有限的地域范围，但却常常产生很大的文化影响，显得十分繁盛。像在晋东南祭祀崔府君和乐氏二仙的庙宇，尽管在省内外其他地方很少见或根本未见到过，但它们所产生的文化现象却不容轻视，就像我国东南沿海祭祀妈祖的情况一样。正是由于它们具有着一种非常强烈的特殊性，所以也就赢得了一定的普遍意义。

（9）由于某种奇特自然生态现象而产生的特殊文化类型。在山西文化历史文化名山群落中，属于此种类型的名山数量虽然为数不多，然而其存在本身及其文化影响已经告诉人们，确实不失为一种应该引起特殊注意的历史文化名山类型。例如在原平市有天涯石鼓山，此山地热丰富，每入冬落雪即消，从无雪积，古人甚觉奇异；再加上山巅有一巨石，形肖似鼓，久而久之，乡人以神物对待，遂建石鼓神祠于山上，祭祀石鼓神者日众，山不但以石鼓作名，且声名远播，成为忻定盆地东北山地一大名胜。距离天涯石鼓山东南不远，又有凭牛山与逆草坡。凭牛山上古有池水六畜饮后有病即愈，为此宋真宗因以封此山之神为“通圣郎君”，古时当地四方百姓则称凭牛山山神为“牛羊将军”，岁时祭祀。逆草坡更为怪异，传说此山曾有幼鸟吃掉了自己的母鸟，从此山石之色皆变赤，而且山上所生草类的枝叶全部逆向而生，遂

[①] 李广洁整理：《万里行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 页。文中括号中语为本书作者所加。

得名为逆草坡。再如方山县境内之北武当山，又名真武山，传说真武大帝北游至此，见此山有一蜂，峰上有两块巨石形如龟蛇，道教以龟蛇比喻水火，于是遂有真武行宫建于此山，山渐次有名。1994 年北武当山已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又如浮山县有司空山，早时山中有风洞，山腹空虚，人行山上随即就发出响亮的脚步声，打柴的人曾将衣服投入风穴，不多时即又被穴中之风吹推而出。为此乡人多感到神异，不知什么时候在山上建了司空之庙，所以此山随之以“司空”命名。另如陵川县马武山中素有“棘无倒刺蛙不鸣”奇异现象，千百年来即被当地人传为因当年马武率兵保护刘秀躲避王莽时，山中的草兽也为马武和刘秀帮忙而所形成。诸如此类，像长治西南的天台无影山和潞城县南的无影岗（白天日出日入无论何时均无倒影）、宁武管涔山的万年冰洞（洞中结冰四季不融化）以及陵川板山怪泉酷暑结冰而严冬温热等许多奇特的自然生态现象，在这里均已构成产生特殊文化类型历史名山的主要因素。这可能是人类从远古进化至今的总过程中，从来就有一种原始的图腾意识孑遗在后世人心灵深处的缘故，反映在自然山水和人类的相互关系方面，遂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名山类型形成时的诱导原因。

关于山西历史文化名山数量——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写下《游龙山记》的麻革一样，元好问也是金末元初山西籍的一位名气更大的诗人，写出过“诗人爱山爱彻骨”名句。无独有偶，元好问同样与浑源刘祁交情不薄，刘祁也向元好问夸浑源的龙山。于是，元好问游过龙山后就有《游龙山》诗作问世。诗写得很长很惬意，但还是有难言的遗憾。他无可奈何间写下了这样几句：

一峰忽当眼，仰看看不休。

一峰一峰千百峰，虽欲一一顾揖知无由！

天下名山无数，人生奈何苦短。莫说是像元好问这样一个经历于战乱之世还常好涉足于官场之事的人物无法一一顾及世间名山，即使是像李白那样一位处于开元盛世，写下过“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样类似誓言的诗句且足迹遍及天下的人，不是在后来的旅途中也发出了“边山去无际，流水何时归”这样的由衷感慨吗？感慨还觉不够，甚至生出一丝“含悲想旧国，泣下谁能挥”的悲哀来。据考证，李白在三晋大地上所登游过的历史文化名山，也不过恒山、太行、雁门等几处而已。

我们今天站在 20 世纪最后几年的历史坐标上，若以历史文化遗产的尺度去考察，山西境内目前究竟还有哪些历史文化名山可以交给未来人类作为保护和利用的生态目标呢？

根据近年来有关调查资料表明，包括在国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在省内属地区性的历史文化名山遗产生态单元，目前在山西至少还有 60 余处表现出了它们的可保护价值和可开发利用价值。例如（包括它们的名称及其所在县市）：

北岳恒山，浑源县；　　霍山，洪洞县·霍州市；

五老峰，永济市；
芦芽山，宁武县；
黄围山，陵川县；
龙山，浑源县；
广志山，黎城县；
仙堂山，囊垣县；
云邱山，乡宁县；
析城山，阳城县；
东云山，左权县；
诸隆山，盂县；
北武当山，方山县；
灵空山，沁源县；
紫团山，壶关县；
方山，寿阳县；
珏山，晋城市；
蟒河山，阳城县；
北天池山，左权县；
棋子山，陵川县；
云龙山，和顺县；
龙门山，平顺县；
孝文山，交城等县；
人祖山，吉县；
云濛山，阳城县；
小尖山，阳城县；
五花山，沁源县；
翠屏山，浑源县；
云梦山，交口县；
乔山，曲沃县；
瑶台山，夏县；
十八罗汉山，阳城县；
刘秀城山，陵川县；
禅隐山，榆社县；
绵山，介休市；
冠山，平定县；
藐姑射山，临汾市；
天龙山，太原市；
柏洼山，中阳县；
乌金山，榆次市；
天涯石鼓山，原平市；
雄山，长治县；
汤王山，闻喜县；
五台山，五台县；
石膏山，灵石县；
藏山，盂县；
历山，沁水等县；
九凤山，离石市；
卦山，交城县；
龙山，太原市；
孤峰山，万荣县；
锥子山，平陆县；
太白维山，灵丘县；
雁门山，代县；
姑射青山，汾西县；
稷王山，稷山等县；
悬泉山，垣曲县；
陀罗山，忻州市；
隐堂山，文水县；
老顶山，长治市；
管涔山，宁武县；
太阴山，绛县；
砥柱山，阳城县；
天柱山，静乐县；
龙隐山，孝义市；
……

在全国各省区中，山西省实际上是唯一一家同时拥有中华历史文化名山精粹四大系列项目的省份。即它同时拥有了五岳之一北岳恒山、五镇之一中镇霍山、佛教四大名山（道场）之一文殊道场五台山，以及道教十大洞天之一王屋山。同样作为中华历史文化名山中的珍贵遗产，北岳恒山和文殊道场五台山在国内外均已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五大镇山中的中镇霍山，在现实生活

中却未能享有它应该享受到的盛誉及其应该给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和利用效应。

霍山之得名极早，在《山海经》中它被列在中山经。曰：“又北四十里，曰霍山，其木多楮。有兽焉，其状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养之可以已忧。”[1]霍山又名霍太山。霍山所在的大山脉历史上之所以被呼为“太岳”，本源即在于此南麓今天的古县，古时叫岳阳县的原因，也因为它处的地理位置正好在太岳之阳的缘故。应该说霍太山与中华文明的起源还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尚书·禹贡》中划天下为九州，第一州即为冀州。霍山位处冀州之中。我国先秦史学家刘起釪先生曾认为“冀州为中国之号”[1]，实际上霍太山夏代已为古冀州之镇山。也就是说早在齐鲁大地上出现那座被秦始皇与以后历代皇帝所祭祀的泰山之前，中国已经有过一个更为古老的霍泰山。泰、太古时通用。今天山东泰岳的得名应该是在西周之后。远古之时，古人将祭祀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所谓“祀，国之大事也”。[2]公元 1899 年安阳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以及对其近百年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一项研究成果就是确认了起码在 3500 年前中国已经形成了有规律的祭祀活动，而对山神的祭祀则是当时殷商祭祀活动中最频繁的一种。从各种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看，霍太山应该是殷商时山神祭祀最为集中的一个地方。如《史记》中记载：“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3]这段记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商朝末年时，周武王出兵讨伐商代最后一个帝王纣，并在讨伐中斩杀了恶来此人，恶来的父亲蜚廉正为商纣王守北方之地。等蜚廉返回时，已经无法挽救商纣王的败局，只好在霍太山立坛为商纣祭祀；不想在祭祀时，却在此地得一石棺，石棺上还刻着铭文。铭文中讲，上帝令处父（即蜚廉）不要再参与殷商为乱，特赐给你一副石棺还是归顺周的大统吧。于是后来蜚廉死时，也就葬在了霍太山。事实上，从古以来，自今太谷县东南，经祁县、平遥、介休、灵石直至霍州、洪洞一线东南侧的山脉，均属于古霍太山脉的范畴，亦今太岳山系。 1976—1985 年期间，考古工作者曾在太岳山西麓今灵石县施介村附近山上，两次发现了数座晚商墓葬，并出土了一大批商代青铜器。从器形与纹饰特征看，这些青铜器都属于殷商晚期。更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早在北魏正光三年（公元 522 年）六月时，当时并州静林寺的一位僧人在象谷（今太谷县东）的山坡上采药时，曾经突然从地下挖出一批玉器，其中玉壁五枚、玉圭十枚。古人祭祀山川之神时常有在山前瘗玉的习俗，且多数以玉壁和玉

---

[1] 袁柯：《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11 页。

[1] 《文史》第 25 辑，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 页。

[2]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95 页。

[3] 《史记》，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74 页。

圭深埋。如《山海经》中各山经文末多有祭祀该山时瘞埋“藻圭”或“婴用一璧”的记述。今太谷、祁县还有以“白圭”和“白璧”作为地名的地方，特别是在平遥、介休与霍州靠近太岳山的许多村落，用“璧”命名的尤为多见。因为祭祀霍太山的那个时代距离现在毕竟太遥远了，所以“璧”的本义早已不被后人所知，绝大多数地名中的“璧”字也就被讹改为更易被后人接受的“壁”字。例如木壁、遐壁、张壁、宋壁、高壁、岳壁、赵壁、曹壁等。在霍州靠山一带的村庄，索性就把原来的“璧”字改成了“比”字，显得更为简易方便。如杜比、赵比、石比、韩比、宋比、李比、新比等。

凡此种种，正由于有这样许多远古的文化积累作为铺垫，到了西周之后就正式有了“九镇”之山中的冀州之镇山的记载。所谓九州与各自的镇山其顺序为：

> 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
> 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
> 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
> 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医巫间；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
> 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①]

假如说霍太山在中国远古祭祀文化中的地位于夏商两代时是处于一种“一岳独尊”的状态中的话，那么西周后“九镇”之山的出现，实际上已经表明由于诸侯分封制度的实行，随之而来在山川祭祀文化方面也出现了由一元变多元的事实。唐肃宗在位时（公元 756—761 年）河东才子吕諲曾为霍山之神立传。传曰：

> 霍山神者，苍帝之中子也，生于天灵之纪，著雍赤奋若之岁。封冀，总领海内名山，锡璜寰以象其德。青帝赤帝之子，元司白司之神，咸禀承焉。尧时，洪水为灾，遣黄能入洪波寻禹。故禹承舜命，乘四载，先登太岳霍山祷之。于是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地平天成，万世永赖。妃厥貌姑，辅厥五老，带以黄河，砺以太行、中条、五台，衙官仆从也。当殷之衰，蜚廉助纣为虐，神赐之死，亦给石棺……[②]

吕諲的《霍山神传》从某种角度证实了至少在隋唐之前霍山在古人眼中的历史文化地位。由“九镇”之山改称“五镇”之山，始于隋开皇十四年（公元 594 年），即“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巫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另特别言及“其霍山，零祀日遣使就焉”。

[①] 《周礼·职方氏》，岳麓书社 1989 年版，第 91 页。

[②] 释力空：《霍山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64 页。

“十六年正月，又诏……若修造，并准西镇吴山造神庙。”[③]从隋之后直至明清，“五镇”次序再无变更。

无论是在全国，还是在山西，霍山事实上已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山遗产。 1932 年，蒋阎冯大战刚结束不久，突然有一位曾经在河北灵寿、阳原、行唐与山西定襄等县做过县长，名字叫做任重远的赵城人在太原永祚寺（即今双塔寺）剃发受戒，随后就回到家乡在霍山西南麓兴唐寺（遗址在今洪洞县苑川乡境内），以释力空的法名修撰了一部六卷次的《霍山志》。据释力空这本《霍山志》记载，虽然久经战乱，但直到本世纪 30 年代初时，霍山历史上遗留下的各种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仍有相当规模。人文景观如兴唐寺、中镇庙、“透亮碑”、子孙圣母庙、慈云寺、喝石庵、红崖寺、广胜寺、“兴隆丛林”牌坊、康熙皇帝御书“灵鹫华台”匾额等等；自然景观则有伏虎岩、双门峰、红岩谷、桃花谷、洗心泉、葡萄坪、天马峰、天竺峰、马跑泉、仙人石、欢喜岭、盘龙峰、宝冠峰、笔架峰、摩天峰、万年坪、钟鼓峰、扪天岭、控月峰、灵龟岩、老龙背、凤凰岩、连珠峰和青霞嶂、朝阳洞，万锦坡、玉柱峰等等。到目前为止，霍山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山遗产生态的一部分，它原有的人文景观仅剩广胜寺景区保存基本完好，而其他历史文化造景，特别是始建于隋开皇年间的中镇庙和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兴唐寺等核心景观都在本世纪中叶时破坏殆尽，其中许多珍贵历史文物也多已损毁散佚于民间。令人欣慰的是，在保存完好的广胜寺中，幸存下来的上寺舍利琉璃塔与下寺水神庙中的元代戏曲壁画，以及霍泉上的分水亭等，均已成为国内外研究我国古代琉璃制作史、戏曲发展史和水利史等方面不可多得的精粹历史文物，受到了国家文物部门的重点保护和利用。

像湖南湘西的著名风景名胜区张家界、索溪峪和天子山一样，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分别属于大庸、慈利、桑植三县，但它们事实上均属于历史上早已形成的知名度甚高的武陵源风景区文化地域之内。同样，今天分别属于介休市的绵山、洪洞县的霍山、沁源县的灵空山和灵石县的石膏山，实际上它们都属于历史文化意义和文化地域意义上的太岳山范畴。今后，实施对这些历史文化名山遗产生态的保护和利用，都应该立足于太岳山这个更高一层的文化基础之上，去逐步实现对这些名山遗产的统一规划、统一保护和统一管理利用。

在山西诸多历史文化名山中，无论从其开发历史的悠古，还是景观的壮美以及传统文化积淀的丰厚各个方面去讲，今天位于永济市境内的五老峰，是特别应该给予介绍的一处。五老峰，古称为五老山。因为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正好与西岳华山隔黄河遥相对峙，所以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一带民间人们又称它为东华山。作为道教中的所谓七十二福地之一，五老峰在东汉至两晋时期已颇具名气。晋时有名张僧鉴者曾撰写有《浔阳记》，文中称庐山

[③] 《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40 页。

“五老峰横隐苍空，其形势如河中虞乡县五老山”。[1]古虞乡县治在今水济市虞乡镇。浔阳，即今庐山脚下的九江市。以庐山的五老峰与远在北方山西的五老山相比，可知今永济五老峰之得名应在庐山五老峰之前。至于为什么以“五老”而命名这座山，传说“尧升首山观河渚，有五老人飞为流星上入昂，因号其山为五老山。又五老仙入祠，在虞乡县西一十七里”。[2]首山，即今天的中条山，当然也包括五老山在其内。说当年尧治理黄河之水时登临中条山来到后来称为五老峰的这个位置时，突然遇到五位老人变作流星一直飞上天去进入二十八宿之一的昂宿星座，所以那五位老人升天之山遂以“五老”命名。凡神话，当然都有它们的离奇之处。庐山五老峰没有这样的神话，只以山峰的罗列形象作为根据，或可证明它的得名有来自北方五老山的可能。胡世健、张敦仁编著的《华夏旅游史后》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内容时，曾提出过一个“旅游资源向南开发”[1]的问题，亦即中国古代在这一时期应该有过一个造景文化南移的问题。“五老”山名的南移也当在其中。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许多谜一样的东西，包括在中国古代历来的传统山水文化中，同样是这样。虽然是谜，令人费解，但又常常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美感于其中。如永济五老峰，在它北面的山下平原上，相隔不到 25 公里处，又有一古老的伍姓湖，金元时期诗人元好问的学生王恽以《五老歌》为题写过一首诗歌。诗中有这样的妙句：

晓破五老峰上云，　　晚钓伍姓湖中鱼。
忽逢渔夫三五人，　　问是伍姓谁家子？
自云无姓亦无名，　　接辈相传常钓此。
月落天昏驾小舟，　　从来不见风波起。
得鱼心自安，　　无鱼心亦喜……[2]

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山水文化。“得鱼心自安，无鱼心亦喜。”即使是像元好问那样爱山爱彻骨的人，恐怕也不会向其登临的名山苛求索取任何一种具体有形的东西。人们之所以乐于移情于山水，大多是为了追求来自于自然和自然文化本身所赐予的精神愉悦及人文感受。王恽的《五老歌》表现出的正是这样一种山水文化境界。中古之后，绝对把某座名山作为祭祀的偶像去对待，纯粹将其视为神仙的化身，在中国的世俗社会中不能说没有，但其绝不会是文化主流。像唐玄宗那样敕使自己的妹妹玉真公主把一具金龙模型投入五老峰上的所谓龙井之中，又将龙井敕封为玉真洞，也只能将其视为唐玄宗

---

[1] 《山西通志·山川》，清雍正十二年版，第 19 页。

[2] ［清］王轩等纂修：《山西通志》，中华书局 1990 年点校本，第 2672 页。

[1] 《华夏旅游史话》，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9 页。

[2] 贠创生等编：《河东名胜诗抄》，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24 页。

李隆基本人尊崇道教的一种个人行为，而并非当时的社会时向。说芽了，隋唐之后来自于许多历史文化名山中的传闻典故，大多成了名山造景的文化凭藉，没有这种凭藉，就没有后来遍布神州域内各个名山大川中那浩若繁星的种种名胜。

许多历史资料都表明，永济五者峰与霍山同样作为历史文化名山，它们二者之间在传统文化上的一种根本区别，就在于五老峰上的种种文化名胜大多来自于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以后的各种文化附会，而霍山的文化根基却是深深地扎根在中华民族文明起源时期的原始祭祀文化基础之上的。至清末民初时，河东五老峰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文化名胜群落，已不再单单是中国传统道教系统的一个“福地”形象，佛教、儒教直至泛神的世俗宗教文化，在这座千年以上的历史文化名山上都有一席之地。根据民国 20 年（公元 1931 年）后南同蒲铁路通车不久，由陕西潼关大皇宫道士马葆阳所绘的《新绘山西虞乡县西南五老峰胜景全图》记录，五老峰的人文景观计有五老殿、吕祖行宫、五龙宫、石佛寺、观音行宫、灵官庙、铁楼山庙、棋盘山庙、山神庙、三圣宫等。以绘图人刻印在原图上的话说，是“庵观寺院庙宫大小一共上下六十四处，神像不一样”。而自然景观则有玉柱峰、紫霄峰、祥云峰、笔架峰、芙蓉峰、玉莲峰、文明峰、笔尖峰、羽仙峰、天官峰、新峰、鹤卧峰、聚仙台、八仙洞、北斗坪、甘露泉、雷公洞、紫微峰、莲花台、天乙峰、天竺峰、会仙崖等，还以绘图人刻印在原图上的文字讲，是“大小三十六峰，十二仙洞，九个泉源。”当时每年农历七月初一至七月十五日的丑老峰开山庙会期间，光进山峪口处的茶房就达 40 余家，山脚下有新旧两座戏台为庙会演戏助兴。其繁盛景象于此可见一斑。

我们讲山西境内的历史文化名山，并非仅仅限于一般有人工建筑亦即人们一般所讲有人文景观的名山单元。在山西，有一些完全可以称为历史文化名山的自然山体生态，虽然人工建筑极其少见或近乎绝迹，然而若深入考察，这些名山不但可以称为历史文化名山，而且其中个别尤应将其以历史文化名山的精粹来对待。因为，在中国古代的文化名山理论体系中，实际上将自然景观赋予一定的文化诠释，这已经可以成为一条大家都默契共认的思维规律。

关于这方面，在王屋山系与中条山系相交界处有一座声名渐大的历山，应该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本身的例证。

在山西省沁水、翼城、垣曲和阳城四县的交界地域，座落着一处自然生态与风景景观极为奇特的大山，即历山。这是一块面积广约 300 余平方公里的原始山地，主峰舜王坪海拔达 2358 米，是华北地区南部山地的最高峰。此山森林密布，清泉四季长流；峻峭绮丽的险奇峰峦拱围着主峰舜王坪，尤如众星捧月，数量约 10D 余座；幽深的峡谷纵横交错，其中峡谷最为密集的地方人称七十二混沟，据知至今还无人敢于进出于此。就是这样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尤使我们惊奇的是，此地已知的上百处山水景观，却无不与舜的

传说故事发生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须知，在历山腹心地区约上百平方公里范围内，据知居住的固定居民实际上从明清以来就始终未超过数千人的规模，明清以上当地居民的人口分布可能更为稀少，其中有文字传播能力的人口当然就更少了，而且这里的村庄与村庄之间相距甚远，交通环境又十分恶劣。即以历山沁水县一侧的下川乡（位于历山最核心的部位）为例，全乡面积 40 多平方公里，到 1986 年时，全乡只有 2300 口人，却分住在 30 余个自然村落中，其中半数以上的居民至今买油盐酱醋仍需远行出村，步行来回。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别原始闭塞的地理区域之中，却能祖祖辈辈传承流布着很多有关舜与当地山水之间内容的美丽传说与故事。

历山人说历山最著名的风景景观有百处之多，而与其相关的舜的传说故事也有百种以上。历山人还说，如果把历山所有有关舜的传说组合起来，当可形成一部舜的历史，而且能与我国古代有关文献中对舜的记载相互吻合。笔者曾经抱着一种好奇对这种说法作了一番实地考察，其结果果然使人欣然叹服。

例如在舜王坪西南方向大约 30 余公里处的垣曲县同善镇附近有一个斜井村，村中有一古井人称舜井，即传说中舜的继母推舜落井处，斜井村附近又有诸冯山，传说是大舜的出生地。与诸冯山相距不远又有山称替冢山，传说此山则是舜的瞎眼父亲瞽瞍的坟墓之所在。

又如，历山及其周围一带自古盛产小麻，然而唯独舜王坪东南 20 公里处的东坪山（在今阳城县西南云濛山附近）却自古从不产麻。这是什么缘故呢？据说这和有关民间传说中所讲舜的继母屡次陷害大舜有关。传说中讲，一天舜的继母给舜一袋炒熟的麻籽，让舜到西坪山（在今舜王坪东北沁水县一带）上去种，继而又给舜的弟弟（舜的继母亲生，我国古代许多文献中称其为“象”，但在历山一带的传说中则名曰“仄”）一袋生麻籽，让仄到东坪山上去种，并规定俩人将麻下种后必须要等到麻苗出土开花后才准回家，否则就要赐死，可是，谁知俩人在路上走得饿了，就吃随身带的麻籽，弟弟觉得哥哥的麻籽吃着香，于是就要与舜换。舜此时并不知道继母的恶毒用心，遂与弟弟仄交换了麻籽。结果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历山舜王坪四周的山庄土地都长着麻，而唯独仄所去的东坪山上不产麻。据说，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也曾多次号召乡民在东坪山试种，结果不是产量极低，就是有种无收。其中的原因，当然不会如传说中所讲是因为当初仄在这里种了熟麻籽的缘故。但是，凡是在历山听到过这个故事的人，总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这个自古以来我国很多地方民间都在讲的故事，在历山的舜王坪下听起来绝不像是以文字传来的外来事物，而活脱脱就像是历山当地土生土长的发生在昨天的事情那样新鲜和富有天趣。

诸如此类的舜的传说，在历山的主峰舜王坪一带更为密集，每一个传说故事都各与一处或数处风景景观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再如像舜王坪东北处沁水县下川村西那条四季长流叫做“富裕河”的小河，有关传说中说它是在一

个大旱不雨之年，为了拯救饥饿中的百姓生灵而由舜的妻子娥皇用金簪划出来的。另如在舜王坪北侧的雪红坪下流淌着另外一条清清的林尺河，林尺河畔长着一种罕见的稀有树种叫做林尺木。这种林尺木木质极轻，通常一根成檩材的林尺木重量不过 10 公斤左右，可是若将它放在水里，却会像石头一样沉重得马上坠入水底，而不像其他树木那样投入水中后能长久在水面上漂浮着。林尺木的与众不同，传说同样与舜有所关系。据说一次舜治理历山一带的洪水，当他坐着车辇过河时，车轮却被洪水冲跑了，于是手下的人赶快就去砍林尺木做车辇的轮子，但是砍倒的林尺木又太重，众人怎么也抬不动，舜一着急就脱口喊道：“这木料应该轻一些！”话还没落声，林尺木果然就变轻了。当装上了新用林尺木做的车轮，又要过河时，由于水大而急湍，新做的车轮连同车身总是漂浮在水面上打转转，就是走不过河去。这时舜又急得大喊：“车轮应该沉在河底而过！”还是话音未落，原先漂在水上打转转的车轮就立即沉在河底缓缓向河对岸驰去了。从那时之后，当地民间就一直传说林尺木是舜御封过的神木，于是历山人自古都把林尺木当作驱邪避鬼的吉祥之木，连黑夜出门行路，人们也常常要随身带一根林尺木在手中。

即使是在历山的主峰舜王坪的顶巅之上，同样是凡有风景景观的地方就有舜的传说。海拔 2358 米的舜王坪四周悬崖如削，深若千丈，而峰顶却是一片足有 20 余平方公里的高山草甸，其平缓起伏之状酷似塞外草原。就在这草甸之中，离此地唯一保存的一座古代建筑——舜帝庙不远处，有两股旱不干涸、雨不泛溢的清泉从一眼望不到边的奇花异草中突冒而出。在当地的传说中，这就是在舜的故事中与他的两位妻子（即尧的两位女儿）娥皇与女英有关的妫水和汭水。又有人说，这两股泉水，是娥皇、女英听到舜治湘水而不幸身死南方九嶷山的噩耗后，由两人悲伤的眼泪变成的。从康熙年间的《垣曲县志》中得知，当年这两股泉水旁，曾经建有娥皇与女英之祠。距离泉水不远，在彩毡铺成一般的夏季五彩草坪上，又有两条与耕犁犁过的犁沟一模一样的垅沟，虽然关于它的出现年代之久远谁也讲不清楚，但垅沟内翻起的泥土，却一年四季总是如此清新，永远像耕犁刚刚犁过的一样。更奇异的是，尽管舜王坪上无处不长着花草，但唯独这两条“舜耕犁沟”却永远没有花卉草木长出。著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经由衷地赞誉过：“山西作为中华民族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从尧、舜、禹立国建都，后稷教民稼穑、嫘祖养蚕缫丝起，数千年黄河文化的积淀，使这块土地上形成了异常浓厚、丰富和有着鲜明特色的民俗文化层。”[①]在历山脚下的下川村，本世纪 70 年代曾经发现了著名的距今 24000—16000 年的细石器类型古人类文化遗址。与下川古文化遗址及舜的一系列传说文化交相辉映，历山还有着相当独特的民俗文化。如在舜王坪近围四县的山村中，我们就发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在其他地方难以遇到的事象：每年春耕过后，这些山村的农民们纷纷将自家的

[①] 《山西民俗·序》，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 页。

牛马类大牲畜全部赶上高高的舜王坪草甸上，而牲畜的主人们则在送牲畜上坪的当天即返回山下的村落。从这一天开始直至农历十月初，四五个月当中，无论风雨雷电，舜王坪上成百上千头牲畜就在一种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度过上百个日日夜夜。白天它们安然信步于蓝天白云之下悠然咀嚼，夜晚则与同村的“邻居”们结群而卧。大畜公畜们环卧于外圈以防猛兽侵袭，母畜与幼畜则安卧在圈内恬然而睡。似这种稀有风情究竟起始于什么时代，历山人自己都说不清楚，反正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另外，在历山舜王坪周围的许多山村中，我们还看到至今民间做饭所用铁锅、铜锅或者是砂锅，无论是什么质地，但其锅的外形则与史前人类使用的三足陶釜或陶鼎十分相似。这是否与传说中舜制陶于河滨的故事有着联系呢？我们已不得而知。我们在历山还有另外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今天在山外，时代虽早已跨入工业社会，但在历山深处的下川人家庭中，几乎每个成年的家庭成员仍然保持着一种近于原始的采集野生植物果实的技巧及习俗。 1986 年时，这个包括老弱残幼在内总人口不超过 2300 人的山乡，一年内除了正常的农业耕作，竟能额外地收拾采集回菖蒲 5000 多公斤，木耳 2000 多公斤，鹿茸 5 公斤，橡籽 15 000 公斤，麻皮 10 多万公斤，松籽 20 多万公斤，沙棘……历山人还保持另外一些祖辈相传的文化生活习俗。如在舜王坪西南垣曲县同善镇一带，历山人习惯在院墙上密密麻麻地插种上许多带刺的仙人掌，而在舜玉坪东北沁水县下川村一方，历山人则又习惯于在自家的屋顶上种植一种叫做“无根花”的鲜艳无比又非常神秘奇特的紫色花卉。夏日远来的游人一来到当地，就会在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的映衬之中，惊奇地发现这种“无根花”的紫色诱惑。“无根花”没有根，所以不怕它们的根须穿透屋顶使房子在雨中漏水，但它们既然没有根须又为什么能长得那样茂盛鲜艳呢？下川人的祖先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代里开始了这种在屋顶上种植“无根花”习俗的呢？这真是一个极富文化魅力的历史生态之谜。

历山没有一般历史文化名山所拥有的那些宏伟规模的人文建筑景观，但是历山的每一处山水却遍布了历史文化。这一座目前世人依然罕知的历山，在它的怀抱里不但仍然保存着历史文化的奇迹，而且同样保留了自然生态的奇迹。在其数百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围内，有莽莽无际的原始森林，有特大型的刀削斧劈般的大峡谷，有典型的更新世原上层高山草甸，有古老绮丽且深不可测的一处处“喀斯特”岩溶洞穴，有苍劲雄险的悬崖叠嶂，有数不清的山问泉瀑，还有许多在长江以南几乎失其物种的珍贵植物及动物，例如黑鹳、林麟、猕猴、金钱豹、大鲵（娃姓鱼）与鸳鸯等。1982 年，历山已经成为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二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一。下川古人类文化遗址，则在 1986 年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富有特殊历史背景及民俗氛围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历山的山水风物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美丽而古老的历山，俨然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巨著，现代人类正在揭开它那神秘而苍古的扉页。

历史文化名山与一般文化遗迹相比，虽然我们也将它列入文化遗产生态的范畴之内，但它毕竟与一般文化遗产生态在形式表现方面存在着区别，严格讲，历史文化名山是历史文化遗产生态和自然遗产生态两相结合的一种复合体。在这里，山，实际上起着一种载体的作用；而作为历史文化名山整体内容中主体内容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态部分，只是一种附着物。这种作为附着物的历史文化形态，有时在特殊的时间环境中也可以产生空间上的位移或者生态形式变异现象。

北岳恒山在这里即是个活例。

恒山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①]后来到周代时，恒山又被列入九州中北方并州的镇山。还有传说讲，在尧舜时期恒山已经享有祀典之礼，然而并无确切的经典文献可以确证此事的真正存在。现有文献记载表明，把恒山作为五岳中的北岳予以礼祭，最早应在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汉书·郊祀志》曰：是岁"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者，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②]根据北魏时郦道元所撰《水经注》中有关古 水的流经方位分析，至少是在北魏以前，恒山的祭祀活动，应该大都发生在后来的山西浑源县界内。然而，正如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一样，由于浑源界内的恒山从汉宣帝正式作为五岳给予祭祀的那个时代起，代北之地（即恒山山脉以北）就常被来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军事武力所威胁或是占领控制，所以，受战争的影响，虽然恒山还是恒山，但祭祀恒山的地方却不得不另有选择。这个选择即是后来河北省西北部恒山山脉之阳的曲阳县。于是，实际上五岳从最初确定，恒山的祭祀之地就有了两处，北岳庙实际上也在很长时间中同时存在着两处。那就是一在古恒山的本地山西浑源，一在所谓"权宜"计下的河北曲阳。汉至唐先是匈奴与突厥的经常侵扰，而宋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契丹、辽金及蒙古族的长时间占领。所以，从北宋到元明，中原政权在浑源对北岳恒山的皇室祭祀可以说到了完全停废的境地，然而民间祭祀在浑源仍然一直在坚持着。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以至到了朱明王朝建都北京后，产生了一场北岳恒山祭祀之地的争讼纠纷。不错，《明史》中是有这样一段记述："万历十四年（公元 1586 年），巡抚胡来贡请改把北岳于浑源州。礼臣言：'《大明集礼》载，汉、唐、宋北岳之祭，皆在定州曲阳县，与史俱合，浑源之称北岳，止见州志碑文，经传无可考，仍祀曲阳是。'"先不要说"经传无可考"并非事实，而且明廷执大礼的官员也已承认"州志碑文"均为客观存在，即使以明时一些著名的文史学问大家的著述而言，也与礼官所见大相径庭。例如比万历十四年早出近百年的明成化年间进士且后来又作过南京兵部尚书的晋籍人士乔字，性好诗文，乐于山水，曾写过一篇

[①] 《白话尚书》，岳麓书社 1990 年版，第 43 页。

[②] 《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191 页。

很精彩的《恒山游记》，记曰：“北岳在浑源州之南，纷缀典籍，《书》著其为舜北巡狩之所为恒山，《水经》著其高三千九百丈为玄岳，《福地记》著其周围一百三十里为总玄之天。予家太行白岩之傍，距岳五百余里。心窃慕之，未及登览，怀想者二十余年。”及至他真正实现了夙愿去登浑源北岳时，写得更为生动具体：“其上路益险，登程三里，始至岳庙。颓橙古像，余肃颜再拜。庙之上有飞石窟，两崖壁立，豁然中虚。相传飞于曲阳县，今尚有石突峙，故历代怯升登者，就祠于曲阳，以为亦岳灵所寓也。”读至此，显然与万历时礼臣所言大有出入。乔字不但是成化时的进士，而且又是武宗正德年间的南京兵部尚书，后来到嘉靖皇帝时还作过明吏部尚书，加上成化后的弘治皇帝，乔堪为四朝元老与饱学之士，应该是言之有据的。

我国明代末年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在他所著的《徐霞客游记》中，也忠实地记下了他在浑源北岳恒山的两天经历。时当明崇祯六年（公元 1633 年）农历八月的事情。“初十日……又一里，涧东有门榜三重，高列阜上。其下石级数百层承之，则北岳恒山庙之山门也”。第二天，“十一日，风翳净尽，澄碧如洗。策杖登岳，……三里，有杰坊曰：‘朔方第一山’，内则官廨，厨井俱备。坊右东向，抬级上，崖半为寝宫，北为飞石窟，相传真定府恒山（即河北曲阳恒山）从此飞去。再上，则北岳殿也。上负绝顶，下临官廨；殿下云级插天，虎门上下，穷碑森立……下山五里，由悬空寺危崖出。又十五里，至浑源州西关外。”

以上所引乔字和徐霞客两位明代旅行家的游记片段，在此有两个意义。一则通过浑源恒山说明保存历史文化名山遗产生态在我国古代就有此优秀传统，另外旨在理清有关两处恒山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北岳恒山的皇室祭祀直至清顺治十八年（公元 1661 年）时，才又根据礼臣的建议，由河北曲阳改祀于古北岳之地浑源。不可否认，在河北曲阳，也留下了与北岳恒山本于一体的一大批历史文化遗产。

700 多年前，诗人元好问写过这样几句诗，诗中情感颇与今人心境类同。诗曰：

> 城居日蛙黾，局促复局促。
> 去作山中客，放浪谁检束？[①]

当然，无论古人今人，之所以都喜欢到山野之中去，并不单单为了摆脱一种市井生活对人的约束。认真考察一下，古往今来，有几个人是愿意到凄凉荒野中去寻求乐趣的？人们追求山野的真正内涵实际上或多或少还在于他们都有一种寻觅文化的动机。还是元好问说得好：“山深地古自是有神物。”我认为这种“神物”应该就是历史与文化。如果没有历史与文化在里面，名

[①] 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5 页。

山将何以为名？诗人李白讲“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这里的关键是“五岳”与“名山”的文化界定。假如没有了历史文化内涵在其中，试想一下“五岳”非但不成“五岳”，即使天下其他名山还能剩下几座？固然，当代又有名山如川西北的九寨沟、鄂西北的神农架与湘西的武陵源那样一些以特殊的自然生态形式震动了国内外人士心扉的绝佳风景景观。然而，即使是这样，也不能说它们就是纯自然的了。也就是说，当这些目前在全球已经十分稀有的自然生态景观在开始接待它们最初的一批外来游客时，人们已经开始赋予它们某种文化定义或文化符号。如九寨沟的“宝镜岩”，武陵源的“屈子行吟”、“水绕四门”、“石船出航”和“五女拜师”、“罗汉迎宾”等景点景观的命名，正像黄山“天都峰”、“玉屏楼”最初的命名那样，随着历史的向前推移后来它们必然也就成为历史文化名山中的生态遗产内容。从某种意义看，公元 8 世纪雕凿的乐山大佛无疑属于文化遗产生态；同样，近年来由游客无意间在乐山突然发现的天然形成的凌云山大卧佛，已经被赋予了文化和历史的生态特征。人类把自身发展的历史作为一个大参照系，然后又对自然山川根据其肖形印象、人文环境赋予某种文化符号或定义，这几乎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山景观生态逐渐发生发展的一个定规。在山西，古代人类依据自己对自然山体的肖形印象随之而给其赋予一定文化名称及其传说的例子，可以说是枚不胜举。如在黎城县就有过五仙山、马鞍山、望夫山、石老儿山等，在昔阳县有牛头山、白鹤山、鹤度岭、石马山等，在翼城县有覆釜山、石姑山等。我国当代青年学者喻学才先生在中国传统旅游文化方面的研究颇有成果，曾对古代旅游造景文化的附会现象有过十分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他认为：“我们的祖先，在创造文化之初，就是以‘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自然态度著称的。所谓文化，实在是古人在人和自然之间另外开辟的第二自然。在改造自然和自身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文化。……从微观的方面看，初民们在狩猎、捕鱼、农耕生活中发现许多自然物酷似人形，于是赋予这些石人或其他类似人形的自然物以人的色彩，将多情的人生色彩涂抹在那无情的石人身上，从而创造许多动人的传说。”[①]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山中的一个生态群落，在山西的历史文化名山遗产中，有许多遗产单元即如喻学才先生所言，实际上是一种文化附会现象的产物。

在山西省 10 余万平方公里的山地中，仅从清初地方志中我们就接触到了数千个山地名称。而这有名称的数千座区域小型山体，只不过是整个山西山地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许多人迹罕至甚或从无人类涉足过的山地，以其所在区域而言，从古至今实际上直到今天还没有命名。也就是说，我们在本书中所提及的山西历史文化名山，如果以其数量或面积而言，在整个山西山地中所占的比例就更为微小。所以，与其说山西历史文化名山遗产生态是一

[①] 喻学才：《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2 页。

笔丰厚的经济文化资源，倒不如直接说山西山地本身即是一笔经济与历史文化的珍宝或者更为确切些。因为正是由于有这样丰厚的山地基础，所以才会产生现在我们认识到的山西历史文化名山。

第六节　石窟与石刻造像

我们在这里所要介绍的，包括山西境内的佛教石窟和道教石窟。

石窟，这种通过人工雕凿在整座山体上的很特殊的宗教建筑形式，其最初起源是在公元前一二世纪时的印度。它的起源与公元前 6 世纪佛教在印度诞生后僧侣们的佛教事务活动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公元前 3 世纪后，印度佛教首先传入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到西汉末年时，才逐渐传入我国中原地区。中国有佛寺，乃始于东汉明帝时（公元 58—75 年）的洛阳白马寺。而中国有佛教石窟，则最初始于两晋时期的我国西北今新疆天山南麓地区。此后不久，至南北朝时，佛教石窟又迅速通过河西走廊今甘肃一带逐渐发展到了北魏拓跋氏政权所控制的山西高原之上。在此之前，一般的佛寺建筑则早在东汉时业已发展到了山西境内。如洪洞广胜寺即始建于东汉建和三年（公元 147 年）。到南北朝时，佛寺建筑在山西境内已经十分繁盛。这实际上为佛教石窟在山西落脚奠定了一个非常和谐的氛围与基础。

许多人的调查都表明，我国历史上石窟建筑分布最多的地方是甘肃省，其次即是山西。山西古代的石窟建筑质量和单位规模水平与其他省区相比，也处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之上。

云冈石窟，位于古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附近武周山上，是我国古代三座规模最大且雕凿艺术最为精湛的石窟之一（另外两座即敦煌石窟与洛阳龙门石窟）。主持修凿开建云冈石窟的第一个人是北魂文成帝时高僧昙曜。根据史书记载，昙曜本是古中山（今河北西北部）之地的僧人，接到北魏政权的命令赶赴京城。一日正好文成帝拓跋濬出外，在路上遇到了刚到京城的昙曜，不想文成帝所骑御马突然用嘴衔住了昙曜的衣服。于是朝廷上下皆为惊异，以为马识善人，文成帝遂拜昙曜以师礼。就此，昙曜请示文成帝后即开始在平城西门外的武周山上开凿石窟。《魏书·释老志》中讲昙曜最先“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根据后世的确认，著名的云冈“昙曜五窟”亦即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云冈石窟中的第 16 窟至第 20 窟。这五窟的尊者主佛个个都被雕成高鼻厚唇的模样，既不像佛经中讲的天竺人，也与中原汉人有所距离。人们都认为，云冈石窟中所谓“昙曜五窟”所塑的主尊佛者，其实是模拟了北魏开国时的几位鲜卑族皇帝。从第 16 窟至第 20 窟即分别雕塑了当时还在位的文成帝拓跋濬和在他之前的景穆帝拓跋晃、太武帝拓跋焘、明元帝拓跋嗣、道武帝拓跋珪。

云冈石窟的开凿启始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经献文帝拓跋弘和孝文帝拓跋元宏，至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 494 年）迁都洛阳为止，历经约 30 余年，共建 21 个大窟，小窟无数。根据现代文物工作者的实地测量，整个大同云冈石窟从东到西，沿武周山绵延近 3 公里，最大的佛像高达 17 米，最小的佛像则仅几厘米。整个云冈石窟保留至今的大小石雕佛像总数竟达到 51 000 余尊。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云冈石窟的开凿过程具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

那就是它所有的工程几乎均是在北魏一个朝代中完成的，施工时间基本上集中在公元 5 世纪末叶的 30 余年时间内。而敦煌石窟的开凿过程，则是始于东晋太和元年（公元 366 年），后期一直延续到元代以后，前后长达近 1000 年左右。洛阳龙门石窟的营造启始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历经隋唐时代，也有 400 余年的开凿过程。

佛教石窟在山西，最具魅力的除云冈石窟外，即数太原西南郊天龙山石窟了。由于后者所在的天龙山从古至今即是一座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风景名山，而且它又与太原这座古老都市近在咫尺，所以从某种角度讲，它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常与云冈石窟作等量观。

天龙山石窟的始凿年代约在东魏武定年间（公元 543—550 年），在此之前，天龙山上已建有天龙寺。据史载天龙山一带曾是东魏时高欢、高洋父子的避暑行宫所在地。高欢死后，其子高洋废东魏而另立国号曰“齐”，天龙山下的古晋阳成为北齐政权的别都（都城当时在今河南安阳以北古邺城）。天龙山石窟群的始凿虽然启于高欢、高洋父子，但最后完成则在五代时期。

正像在本世纪前半叶遭受过日本侵略军野蛮掠夺的敦煌石窟藏经洞一样，天龙山石窟是我国众多石窟群中艺术水平被公认为最卓越的石窟之一，也是被日本侵略者破坏得最严重的石窟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经确知的天龙山石窟群中的雕刻艺术品的各种构件，竟有 150 余件被那些披着“文明”外衣的强盗劫掠而去，至今仍然散失陈列在一些欧美国家或日本国的国家博物馆及私人展柜中。天龙山石窟规模虽不大，然而它的文化艺术价值却极高。如对 9 号窟中那尊十一面观音像的评价，我国著名雕塑家傅天仇和钱绍武先生认为这尊“石佛堪称世界之最，也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最精美的典范”。说到石窟本身的规模，“天龙山石窟虽不像云冈石窟雕刻得那样巨大，形式上也缺乏逼人的气势（云冈石窟采取了大面大体的造像手法，这与自然环境有关），但它那纯熟的造型、比例的适当、线条的柔和、雕刻的精细，均不亚于云冈石窟，甚至比云冈石窟还技高一筹，所以天龙山石窟群是中国古代石窟雕塑艺术中一颗灿烂明珠，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①]雄峙于太原市西南山地中的天龙山，以石窟群闻名于天下，又集林、泉、洞、寺与诸多古迹名胜于一体，确实是一处域内不可多得的融文化与自然景观于一山的最佳遗产生态组合单元。几年前，山西省人民政府已经将天龙山公布为省级风景名胜区。

如果说，开凿佛教石窟的活动在北魏以前的中国还是一股涓涓细流的话，那么随着拓跋氏政权在大同大规模建造云冈石窟，中国的石窟造像风气则已完全成为一种社会洪流。于是，“各地方长官模仿着他们的皇帝而支持僧尼开窟造像……一时石窟造像之风遍布于华北各郡城，但规模都不及前者

[①] 郭永安等：《天龙山揽胜》，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2—13 页。

大……这一系列的历史都是在华北地区，因此华北才遗存着很丰富的中世纪石窟寺院遗迹，保存着成千成万的不同时代的精美雕刻、塑像及壁画，以成为历史物质资料……这一部分历史物质资料，大都是国家公布保护和专设有保管的机构”。[①]老一辈中国石窟艺术研究专家荆三林先生所叙述的这种状况，在山西显得尤其突出。关于此事还是让我们再引用荆三林先生自己亲身考察后所作的一番记述吧。

> 1956 年 4 月中旬起，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与山西省文化局合组“文物普查经验工作队”，在山西省南部潞安等县发现石窟、石刻 362 处。石窟、摩崖造像以潞安首阳山石岩脑山千佛沟，高平的羊头山、高庙山、金峰山，晋城的碧落寺、石佛岭等为最重要，都是北魏、隋唐的作品。其规模虽然不大，但如首阳山一处就有七个窟。所刻石佛、菩萨、天王、比丘供养人等像亦多至数千，无疑是一部分重要的艺术遗产。[②]

荆先生的这些亲身考察记述，来自于他们 40 年前的工作结论，其资料的真实性应该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应该指出，显然他所记录的有关地址与数字只不过仅仅来自于晋东南的少数几个县市，即今天的晋城、高平与潞城等地。从地域面积上讲，他们当时考察过的地方，实际上还不及山西全省面积的 5%。也就是说，山西省应该还有将近 95%左右的地方他们未能去给予普查。

石窟艺术的物质依托是山地。山西多山，世人皆知。即使依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全省 110 多个县市中，确实很难讲得出哪一个县市会没有山地。山西自古以来宗教造景习俗源远流长，其中尤以佛教造景为最。笔者曾经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着意于对这一方面的调查，一个是寺院的分布，另一个就是石窟造像的分布。实际上，山西山地中千百年来存在过的佛教造景习俗，几乎使整个山西山地达到一种无山不佛、无山不窟的程度。在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些人们平时并不注意但又确实真实存在有佛教石窟造像的地名来，并列诸于后：

石窟，高平市羊头山清化寺；	石佛殿，长治市石佛山；
石窟，平顺具林虑山金灯寺；	藏经洞，襄恒县仙堂山：
石佛洞，阳高县偏梁寨山；	千佛洞，浑源县孙膑山：
佛窟山，左云县石佛寺山；	石佛洞，榆社县西梓荆山；
石佛崖，吉县宽静河畔；	石造像，乡宁乡南白云洞；
圣佛崖，霍州西南汾河东岸；	千佛洞，隰县北佛陀湾；
高欢洞，左权县东南 20 公里；	石佛洞，左权县西 3.5 公里；

[①] 荆三林：《中国石窟雕刻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 页。

[②] 荆三林：《中国石窟雕到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6 页。

石造像，永和县双山洞；
观音洞，翼城翔皐山菩萨崖；
石佛崖，汾西县北 15 公里；
万佛洞，宁武县宁化古城西：
千佛洞，榆社县西响堂寺；
石造像，昔阳县石马寺；
千佛洞，乡宁县东 7 公里：
石造像，盂县兴道村千佛寺：
石造像，乡宁县西滴水崖；
石造像，大宁县西梵王扫；
石造像，左权县东马岭洞；
千佛崖，太谷县奄谷内；
石造像，太谷县龙门壑；
七佛岩，交城县东北；
石室寺，高平县石室山；
石造像，太原市尤山童子寺；
石窟，浑源县南淘沙村；
石窟，静乐县王端庄；
石窟，静乐县南丰润村；
石造像，保德县花佛村；
石造像：夏县西威神寺；
石窟，芮城县岭底瑞峰寺；
石窟，大同市北小石子村；
石造像，寿阳县羊头崖村；
石窟，清徐县岩香寺；
石窟，阳曲峰东村佛爷沟；
石窟，古交布刘庄观音寺；
石窟，太原晋词悬瓮寺；
石造像，安泽冀氏村石佛寺；
石窟，五台山那罗延窟；
石造像，宁武县坎门口村；
石窟，神地县烈堡村悬空寺；
石佛洞，平定县药岭山；
千佛洞，翼城县千佛崖；
石造像，宁武县翠屏山；
石造像，宁武县禅房山；
万佛洞，五寨县芦芽山；
石窟，平定县乱流村；
石造像，孝义市李家山；
石佛嵎，忻州市浮屠山；
石造像，代县西北白仁岩；
石造像，汾阳市西石室山；
石造像，交口县李家山村；
石造像，寿阳县方山；
石造像，太原市西南蒙山；
石佛崖，祁县子洪镇村外；
石佛洞，高平县龙王山；
石造像，离石市西石佛寺；
石造像，中阳县西石佛寺；
石造像，代县南赵果观；
石造像，定襄县七岩山；
石造像，沁县南涅水；
石造像，灵丘县曲迴寺；
千佛洞，隰县北神峪村；
石造像，灵石县南石佛寺；
石造像，交口县锦泉寺；
石窟，阳曲黄水镇；
石窟，古交市木路塔；
石窟，古交市新岩村；
石造像，怀仁县西南千佛寺；
石窟，五台山金刚窟；
石窟，宁武县石家庄；
石窟，河曲县点峪村；
……

由此可见，自从北魏以来，凭依山地造佛，随之又以佛作为山的名称或地域名称，实际上已经成为千百年来山西历史文化中一种突出的民间习俗及地域特色。

在北魏石窟造佛风气的影响下，石窟造佛不但从此遍布山西高原，而且由此出现了喜造大佛的现象。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不过 23 米之高，天龙山

最大的 9 号窟释迦牟尼坐佛也才 8.8 米。同样是在太原西山，距离天龙山石窟不出 20 公里的范围内，也还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时代的事，在前后不到 5 年多的间隔中，还有两座借山崖人工凿成的巨佛赫然问世。其中一座于北齐天保二年（公元 551 年）后开凿，位于晋阳古城（今太原市西南古城营村）西约 10 公里的蒙山开化寺附近，巨佛高 200 尺（约 63 米）。其高度虽然比四川乐山大佛低约 8 米，但是却比乐山大佛的凿成要早出 162 年（乐山大佛凿于唐开元元年，即公元 713 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第一个巨型石佛。关于蒙山开化寺的这座大佛，《北齐书》中记述说："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①]在 10 公里外晋阳古城中也能看到，可见大佛之高大。

同样距离晋阳古城不远的另外一座大佛，是在北齐天保七年（公元 556 年）后所开凿，根据有关文献记载，位置在晋阳古城西龙山之上的童子寺附近。该巨佛高 170 尺（约 56 米）。在乐山大佛出现之前，此龙山大佛的高度仅次于与它近在咫尺的晋阳蒙山大佛。

从有关历史资料上得知，太原西山这两座依山而凿的巨型石佛，隋初以后在佛身之上均建起了像天龙山 9 号窟那种漫山阁一样的大佛阁。本世纪 80 年代初，太原市王剑霓先生在文物古迹地名普查中，为寻找已经毁圮湮没了数百年的西山大佛曾经做了艰辛的工作。根据他的调查和考证，认为"唐武宗灭佛时，大（佛）阁虽然失修破败，但大佛未损。晚唐乾宁二年（公元 895 年），晋王李克用竭河东之力，'计口随钱，不可胜计'，五年用工 30 万，重修了大佛阁。五代后晋开运二年（公元 945 年），北平王刘知远留守北京（晋阳），又修佛阁，这次重修的庄严阁，高 5 层，每层 13 楹，26 间，共 130 间，将 200 尺高的大佛庇盖于内，可见阁之大。元末（公元 1368 年）寺毁阁倾，大佛头部掉落，残砖破瓦和山间泥石掩覆了佛像下部"。[①]以上所引王剑霓先生的这段话，讲的是蒙山大佛。至于龙山童子寺大佛，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寺观卷》中记载说："金天辅元年（公元 1117 年）毁于兵。明嘉靖初僧道永重建。"明代重建后的龙山童子寺及其大佛究竟是什么样子，后来又怎样毁坏湮没，至今无考， 1980—1983 年，王剑霓先生找到晋阳蒙山大佛时，其遗迹"现场外露胸颈部分，高 17.5 米，宽 25 米，颈部直径宽 5 米……"蒙山大佛所在的开化寺，是北齐文宣帝高洋所赐之名，而在此之前东魏时，该寺已建成，初名大庄严寺，寺分上下，俗称"大庄严石窟二寺"。这就是今天我们还能知道的一些情况。

关于石窟造像一类的事情在山西民间还出现过许多谜一样的奇异事件，与这些奇异事件共生的是很多美丽又怪诞的神话传说故事。如在保德县南 7.5 公里处的杨家湾村附近的一个石窟中，元代至正年间（公元 1341—1368

---

① 《北齐书》，中华书局 1972 年版，第 113 页。

① 《太原文史贤料》，第 19 辑 1993 年版，第 180 页。

年）人们突然发现石窟中隐隐有声音传出。几年后村人又从石窟中发现了腰系锤凿的鲁班爷石像，同时出现在洞中的则是数百尊大小不同的石佛造像，其造型玲珑光洁，比例适当，且一点也看不出有斧凿痕迹。人们甚觉怪异，认为是神佛显灵，于是在当时的保德州南宣化坊建花佛寺，将石窟中佛像悉数列置于寺中，从此这里佛事甚盛。神仙显灵之事当然不会存在，然而那石窟与石佛之事则无疑都是真实的。此事见于明清以后的保德州志及清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寺观卷》中。

如果说方志文献中记载的保德花佛寺发现石佛造像数百尊的事件已经使许多人感到奇异的话，那么从本世纪 50—90 年代发现的沁县南涅水窖藏石刻造像与灵丘县曲遇寺石像家群就更使世人感到万分的吃惊。

沁县南涅水窖藏石刻造像——早在本世纪 40 年代时，沁县南涅水村一带的农民就经常在地下发现有一些零散的石刻造像，当时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 1957 年秋天，由于山西省人民政府文物管理部门的重视及其地方文物工作者的密切配合，终于有了一次大规模调查与发掘清理这一珍贵历史文化遗产的机会。首次发掘清理即得到了 760 余件石刻造像。这批石刻造像所属历史时代的跨度最早的约在北魏水平三年（公元 510 年）前后，最晚的也在北宋天圣九年（公元 1031 年），中间包括了东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石雕作品。由于其“数量大，内容丰富，刻工精湛，时代特色鲜明”，[①]一时间在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引起极大轰动。到 1990 年，山西省考古所与沁县文物部门又一次在南涅水作了勘探发掘，继之又新发现了 100 余件宋代的石刻造像。至此，南涅水已发现的历代石刻造像的总数已经达 900 件左右（包括在此之前的许多次零散发现）。

沁县北依太岳山脉，东靠涅水河。北魏都城由平城（今大同）迁至洛阳，后来的北齐都城虽建在今河南安阳以北的邺城，但陪都仍在晋阳。沁县所处位置正在其来往通衢之上，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兴起的凿窟造佛热浪，不可避免地首先影响到了这块古老的土地。南涅水石刻造像的出土地点即均是在当地古代寺院的遗址之间。

灵丘曲迴寺石像家群——曲迴寺位于灵丘县南约 70 余公里处的三楼乡境内。它与县城之间隔着两座好大的山峰，一座是大白山，一座是对维山。曲迴寺南是独峪河水，一直向西南流入河北省境内。从某种角度看，曲迴寺距离五台山佛教圣地更近些，因为站在曲迴寺看不到灵丘县城，但是可以一眼望到西边 70 余公里外的五台山东台台顶。可能是历史上曲迴寺在晋冀两省交界处名气较大，所以后来当地的人就以寺名作了村名。

在曲迴寺村附近一带，历来就有有关石像冢的传说在民间流传。同时，曲迴寺的有关碑刻对此也有一些记载。碑记中讲，在唐天室十年（公元 751

[①]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3 页。

年）时，奉皇帝诏在此曾建过 306 座（又有 360 座之说）石塔。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对曲迴寺的保护非常重视，曾在 1959 年将其列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真正地弄清楚曲迴寺石像冢群的基本形制，却是在 1982 年。这一年，首先有人在曲迴寺村西部山地的乱石中意外地发现了用银罐装存的古代金饰物。对此，有关部门遂根据其线索作了进一步调查。于是，被千百年历史灰尘尘封着的曲迴寺石像冢群，从此被逐渐揭开了掩盖在它表面的那一层厚厚的神秘的面纱。

所谓唐天宝十年（公元 751 年）在曲迴寺建起的 306 座石培或是 360 座石塔，实际上均为石像家的地表标志物。至今为止，文物部门已在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范围中发现了其中的 45 座。这些石像累之所以被以“冢”相称，主要是因为其地表的主体构筑形式均为坟丘状，每冢封土之上均有石塔。文物工作者发现这些石像冢时，“家为石片盖砌，每家内有石佛像数尊，花岗岩雕造。造像有释迪、观音、文殊、普贤、力士、沙弥等，30 厘米至 100 厘米以上大小不等。造形面相丰满，佛为螺譬，在家内分两列排放，相应而立。从石夹中望去，有的只可见到佛头部，其身全埋于土中。”[①]文物工作者还发现在曲迴寺村西的一座石像唇冢家前沿石壁上有六尊浮雕佛像，像侧镌刻有“天宝十载”的字样。这证明有关碑记中关于唐天宝十年奉诏造塔的记述是与史实相符的。曲迴寺遗址上保存的元代碑记也证实曲迴寺的始建年代应在唐代，当时该寺曾被称作为五台山寺院的下寺。南宋未年的著名僧人刘秉忠曾经在灵丘曲迴寺留居修行，后 被人举荐给当时还未作皇帝的元世祖忽必烈。《元史》载，此人曾向忽必烈建议“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部（即今北京市）。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②]正由于此，元朝建国后，刘秉忠一时被称为国师。应该说，刘秉忠此人对曲迴寺在元代的复兴以及对石像家群的保护，也作出过很大贡献。

据知，在 1982 年之前，曲迴寺石像家中的一些石刻造像已被移出冢穴，现已得到有效保护。曲迴寺石像家群中每冢埋藏佛像数量不等，少者三五尊，多者则达到 30 余尊，据此如按每家平均 15 尊计， 300 余家中共藏石佛总数起码应不少于 4600 尊。像曲迴寺石像家这样一付特殊的宗教建筑式样，这样庞大的数量与规模，可能从佛教诞生自印度以来在世界佛教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有人将山西灵丘曲迴寺石像冢的发现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作等量观。客观说，这种评价并不为过。然而，从各种角度看，灵丘曲迴寺石像冢群在许多方面至今还都是一个巨大的谜。例如有关这个石像冢群的排列形制与格局，为什么要用 306 或 360 这个数目作为家群的总数，这些石刻造像是出自灵丘当地还是从远方运来之物，石像冢群及其曲迴寺的选

[①]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19 页。

[②] 《元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3694 页。

址与坐落在它们北部的对维山或大白山存在不存在一种内在联系，以及它们与五台山的关系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均需要从一个较大的地域环境角度或生态系统角度去给予科学的认识与综合分析，然后方可逐步将其解决。

石窟与石刻造像，原本作为佛教建筑中一种特有的构造形式，当它从东汉末年传入我国时起，即对我国的道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位于甘肃省泾川县境内而建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 510 年）的玉母宫石窟，就是我国古代在佛教石窟建造的影响下产生最早的道教石窟之一。然而若论开凿的规模，与天龙山石窟紧相毗邻的山西太原西山的龙山道教石窟，则是目前我国保存的开凿窟穴最多且规模最为宏阔的道教石窟群落。

太原龙山，位于著名的晋祠悬瓮山西北侧，西南与天龙山石窟相连接，向北则有蒙山大佛和古开化寺的遗址与其相依。北齐文宣帝高洋时所建的童子寺和约 56 米高的巨型石佛是龙山最早的一批宗教建筑。约在唐宋之季，龙山童子寺对面的山峰上齐始出现了属于道教的建筑，名曰“昊天观”。至公元 13 世纪初时，昊天观已成为一片废墟，仅在遗址上留下了一些碑碣和两穴石窟。据《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记述：金元之际道教全真派第三代传人宋德芳“甲午（即元太宗窝阔台汗六年，公元 1234 年）游太原西山，得古臭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家像。壁间有宋仝二字，修茸三年，殿阁睁嵘，金朱丹雘，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①]一片古昊天观的废墟遗址与两穴造像保存完好的道家石窟，披云真人宋德芳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苦苦修茸了 3 年时间，使古昊天观的道家石窟由两穴增加到了 7 穴，同时他还重建了昊天观。从此使龙山昊天观及其道教石窟群成为域内道家的一大名胜，即如前面所引碑铭中所说的“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

披云真人宋德芳，金未道教全真派七真之一丘处机（时称长春真人）的得宠弟子。金宣宗兴定四年（公元 1220 年）曾随丘处机往草原拜见元太祖成吉思汗。3 年后返归中原。丘处机此时己成为成吉思汗的“国师”，宋德芳也被封为教内提点，统领河东、元大都以及终南山各地的道观营建事宜。《玄通弘教披云真人道行之碑》说他一生“建立宫观于燕赵秦晋间，凡四十余区，门下传道者不啻千百数，抑所谓光明气焰，大且弘者此也”。[②]在山西，不唯一处龙山石窟及昊天观，除此之外，芮城永乐宫，太原市内今仍较完好保存的纯阳宫，以及原太原县城东南三贤村的龙泉观和原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一些道观，其重修重建或始建与保护，在元时均曾赖斯人而为之。

龙山昙天观到明代洪武年间（公元 1368—1398 年）和正德元年（公元 1506 年）时，又曾兼并附近的道家北极观及重修，而且还新开凿一小型石窟，即今天被编入的 8 号窟。龙山道教石窟的全部 8 个窟分别称为：虚皇龛、三清龛、卧如龛、三天大法师龛、玄真龛、玉帝龛、七真龛和辨道龛。8 个石

[①] 陈垣编纂：《道家金石厚》，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47 页，引文括号中文字系本书作者所加。

[②] 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累》，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53 页。

窟中现存石刻道教造像共 78 尊，是我国有道教后最大规模的一处道教石窟。1957 年，龙山道教石窟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窟艺术，是山西约 1400 年左右时间中，古代人类遗留给今后人类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中华石窟宝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从历史角度讲，还是从文化艺术角度讲，拟或从石窟本身的规模数量与工艺质量方面讲，山西的石窟文化遗产，均堪称为中华石窟艺术发展史上的佼佼珍品。同样作为景观生态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园林与寺庙等遗产形态的形成过程，都表现为自身与自然的一种组合过程；而唯有石窟和石刻造像这种人类文化的遗产形态，是通过镌入自然肌体本身传承于未来人类社会的。从这一点上讲，石窟具有相对永恒的特征。

第三章　山西文化遗产生态资源（下）

第一节　古代壁画与泥塑砖雕

据悉，至今发现并仍然保存较好的古代壁画在山西的总面积竟多达 23 052 平方米。与国内其他省区相比，这一项文化遗产占有指标，山西应该排在全国各省区的第 1 位。至于同样属于文化遗产内容的彩色泥塑，在山西省内的发现也同样令人惊叹，其数量达到 12　712 尊的规模。有关统计表明，此项文化遗产在全国各省区中也创最高纪录。

23　052 平方米的古代壁画中，在国内外学术界和绘画界引起过极高赞誉和轰动效应的，大约有这样一些地方与内容：

芮城永乐宫道教壁画；　繁峙岩山寺宗教壁画
洪洞广胜寺戏曲壁画；　稷山青龙寺宗教壁画
平陆枣园汉代墓壁画；　新绛稷益庙农事壁画
太原南郊娄睿墓壁画；　河曲岱岳庙民俗壁画
五台佛光寺唐代壁画；　……

壁画，是人类装饰在建筑物四周墙壁或顶壁上的一种绘画的特殊样式。如果要追溯其产生源头的话，可能要与史前人类生活时期的岩画联系起来。岩画在山西，尽管目前还未发现有大面积的遗存，但在吕梁山地中的吉县一带已经有过零星的发现。根据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在山西高原分布的密集程度分析，再加上山西这样一个泛山地地域提供给原始人类的特殊环境条件，估计原始岩画不会太少，只不过当代人类还未接触到它们，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踏勘与考察。说到壁画这一特殊绘画样式在古代人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与其本身所能发挥的功能，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人类本身所处环境的装饰，另一种则是其在人类宗教崇拜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从某种角度看，后一种情况更为主要些。无论是在国内其他省区，还是在山西省，之所以我们至今发现的古代壁画几乎全部都在寺庙或墓葬中，也就是这个原因。

山西的古代壁画遗产，从全国范围看它具备了这样几方面的突出特点。那就是保存的数量居多，历史悠久，技法精湛，环境特色强以及题材丰富多样。保存数量多这已是一个客观存在，不需赘述；像平陆张店乡枣园村距今已 2000 年左右的汉墓壁画以及像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这样的例子，已足以说明壁画文化在这块古老土地上悠久的历史积淀；技法精湛在山西古代壁画中则首推芮城永乐宫中的近千平方米的元代道教壁画，人们盛赞它可与敦煌莫高窟佛教壁画相媲美；至于环境特色强，主要是指山西的古代壁画遗产与其所在地域的历史文化以及自然生态方面的高度融合的特点；而题材丰富这

一点在山西方代壁画中表现得尤其令人瞩目，虽然它们囿于寺庙或墓葬特定的环境局限，然而在摄取内容题材方面，这些古代壁画却几乎无一不是强烈地反映了其创作时代在历史背景或社会背景方面的广泛性。

永乐宫壁画，是中国现存寺庙宫观中神堂壁画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永乐宫中轴建筑线上原来的五座主体建筑（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丘祖殿），除了丘祖殿在本世纪初时已毁坏不存，无法弄清其原本是否也有壁画存在外，在前四座大殿中，直至今天仍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公元 13—14 世纪大约 100 年间完成的许多巨幅壁画。由于这些壁画分别属于四个内容有别的大殿，而且又都是在不同的历史年代由不同的画工逐步完成的，所以表现了不同的内容题材和艺术风格。三清殿是永乐宫中的至上之殿，殿中壁画面积达 403.34 平方米，几乎占去了永乐宫壁画总面积（960 平方米）中的 42%之多。虽然面积大而且分布在殿的东南西北四壁之上，但是由于其主题突出且艺术构思极为严谨，所以读画者一旦置身于殿中就会立即被四壁画面所震慑。此殿画曰“朝元图”，亦即道教教义中所谓三百值日神朝谒元始天尊之图。画中各路神仙庄严与飘逸集于一身。几百尊神像神态各异，没有丝毫重复。每尊神像的平均高度都在 2 米 6 上下，但其衣纹飘带无一不是舒展流畅，充满了仙界神气。无论是构图的宏伟气魄，还是画工的技法，三清殿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它不但是永乐宫壁画中的精品，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壁画中的精品，同样还是古代东方绘画中的精品。更加让人赞叹的是，三清殿的壁画完成于元泰定三年（公元 1326 年），至今虽已 670 余年之久，但画面上的各种色彩却仍然十分清晰鲜艳。这是任何一位到过永乐宫的国内外游客，都感到十分惊异的事情。

永乐宫纯阳殿供奉道教全真派祖师吕洞宾，殿中壁画内容故而均取自有关吕洞宾历史生平的传说故事。该殿壁画 193.16 平方米（占永乐宫壁画总面积的约 20%稍多），壁画以自然山水相隔但又相连，自然组成 52 幅故事连环画，虽都叙述成仙求道之事，但因为其中“绘有亭台楼阁，街市旅店，酒肆茶馆，园林私塾，医馆道观，还有活动在这些地方的贵官、商贾、平民、农夫、乞儿”[①]等，所以极富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这一殿壁画绘成于元惠宗至正十八年（公元 1358 年），应该说它们十分真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元代末年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纯阳殿中一般认为艺术成就最高的一幅绘画是中央神龛背面的《钟离权度吕岩图》，或称为《钟离权吕岩谈道图》。近 16 平方米的画面中虽然仅画了钟离权和当时还未入道的吕洞宾两个人物，然而由于画中人物的情态与动作格外传神，衬景也安排得十分精当适宜，所以不但读画者没有丝毫冷清的感觉，反而因钟离权的目光炯炯和吕洞宾的谦恭之态获得一种慑人心魄的享受。

永乐宫壁画的全部绘成大约已在公元 14 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明朝洪武

[①] 贠创生等编：《河东名胜大观》，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5 页。

年间。将近 200 年以后，一位名叫张佳胤的四川才子到山西蒲州任知州，他是一个酷爱名胜并喜好题咏的人。他当时不但办了重建普救寺莺莺塔那样的好事，而且也常到辖境之内诸古迹名胜处踏勘察访。永乐宫原址所在的古永乐镇即属蒲州辖境，张佳胤不但在永乐宫中住宿过，而且还留下了《宿永乐宫》的诗作，诗中就有盛情记述永乐宫壁画的句子。

斗牛行画壁，枕簟出飞泉。
玉检神霄秘，金官绛节悬。[①]

本书作者 27 年前因为工作之便，也曾有幸在永乐宫的吕公祠中住宿过 40 个日夜，并曾多次至各殿欣赏过这些古代壁画杰作。以为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 1562 年）张佳胤的这四句诗，实际上讲的都是永乐宫壁画中的情景。一、三、四句以斗牛、玉检、绛节描述三清殿壁画中各路星宿之神以及捧检玉女和旌节之下值日尊神的丰采，而第二句分明是在讲纯阳殿壁画中那个非常有名的和吕洞宾有关的黄粱一梦的故事。

永乐官三清殿与纯阳殿又分别留有元泰定二年（公元 1325 年）马君祥与元至正十八年（公元 1358 年）朱好古门人的题记。专家们都认为这是元代民间的一些画工。本世纪 60 年代中央美术学院陆鸿年教授等曾临摹永乐宫中的部分壁画精品并在日本、缅甸等国家及国内一些地区展出，引起了极大反响。

尤其值得在此写上一笔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即开始筹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大坝建成后，由于永乐宫原址濒临黄河滩岸，库区蓄水势必影响到永乐宫的安全保护问题。为此，国家决定将永乐宫另行迁建。于是，宫中各殿中近千平方米古代壁画的揭取与重新复原于新址的问题就成为工程技术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此之前，无论对国内还是对国外，这都是一个全新的技术课题。1957 年国家曾计划邀请国外揭取壁画的专家，但这些专家到永乐宫实地勘察后，不但拿不出一个成熟的实施方案，而且还索取高昂的报酬，至于施工期限更无以保证。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毅然决定，由国家文物局当时的古代建筑整修所（即后来的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所）与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以及永乐宫所在地、县有关部门结合起来自己干。于是，“于 1958 年第四季度开始，实地进行实验，边实验边总结，随即制定设计方案，付诸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研究不断改进提高，使方案更加完善，工艺流程更加符合实际，达到了预期效果。随着永乐宫迁建工程的进展，壁画的揭取、迁运和加固复原，大体上分三个阶段：1959 年 6 月初开始揭取，9 月下旬揭取工作全部完毕，并包装妥善，仅用了 4 个月的时间，开支约 10 万元，较外国专家的计划减少了

[①] 贠创生等编：《河东名胜诗抄》，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35 页。

很多，工期也大大缩短，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外汇开支。到 1960 年 4 月底，壁画全部搬运到新址工地，对治黄工程在时间上给以很大的方便……到 1964 年底，全部加固安装完毕，1965 年美术工作者修补了裂缝和画面，壁画的加固修复工作就此告竣”。到现在，30 余年过去了，永乐宫搬迁后复原在新址上的各殿壁画至今没有发现有任何质量上的问题。正像亲身参加过这次搬迁工作的古建筑专家所说的，“永乐宫的迁移保护，在我国文化艺术史上是无先例可循的，尤其是千余平方米壁画（连同拱眼壁画）的迁移、加固和修复，更是前所未闻……这一实践，揭开了我国壁画保护的序幕”。[①]也可以说，这是我国当代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生态方面一次真正的技术革命。

从公元 12 世纪末直到公元 13 世纪末，正当我国金元之交的时期，虽然战争频仍，但是在北方黄河中游的山西大地，有着深厚基础的传统文化起码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了异常的成就与风采。一个是出现了诸如元好问、段成已、段克己、麻革、陈赓、陈庚、曹之谦等一批号称为“河汾派”的著名诗人和伟大诗作；另一个就是出现了诸如关汉卿、白朴、狄君厚、石君宝、李潜夫、郑光祖、乔吉、李寿卿那样一批声誉显赫的戏剧作家和伟大剧作；还有一个就是出现了诸如马远、马麟、王庭筠、王曼庆、刘尊师、李山、马云卿、张公佐、杜文、溥光、高克恭、李倜和朱好古等一批为世人夸耀的一代画师及著名画作。在山西现存的 20 000 多平方米古代壁画中，属于金元时期的为数不少，且质量很高。如繁峙岩山寺中的金代壁画，洪洞广胜寺中的元代壁画，稷山青龙寺中的元代壁画，永乐宫中的元代壁画，河曲岱岳庙中的金代壁画等，它们均皆出于金元时的河东文化沃土之中。

山西金元时期寺庙壁画中多年来最能引人入胜者，莫过于这些壁画忠实的生活取材，它们真实地在这些壁画中记录下了 600 多年以前当时中国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永乐宫纯阳殿和稷山青龙寺壁画中都生动地描绘了金元时我国乡村间给新生婴儿洗浴的社会习俗，繁峙县岩山寺的壁画则描绘了金代一群儿童聚在一起看皮影戏和人们利用自然水能带动石磨磨面的具体情景，以及喂养奶牛者正在挤奶的生动场面。在晋西北黄河东岸偏僻地区的河曲县，那里的一座属于宋金时期的岱岳庙和一座当时墓葬中的壁画，更使我们今天的人们大开眼界。岱岳庙壁画中详细地描绘了一幅有 12 位妇女参加的厨灶操作流程图。此间有的正在和面起发馒头，有的已经在将做好的馒头摆放于蒸笼之中；有的在灶间烧火添柴，有的还在案几上切剁鱼鸭……墓葬的壁画内容中，同样留下了晋西北有关此类地方民俗的珍贵资料。画此幅墓葬壁画的显然是一位民间画工，技法尽管不太老到，然而所画情景却能够使人一目了然。画中五人，一夫二妇两童子。男者正在用力踩动石杵压砸石臼中的谷物（专家们认为是晋西北土产养麦），一妇人在旁已用荆编的簸箕簸出谷物的壳皮，两童子接着将簸去壳皮的谷物用石磨推磨成面

[①] 《山西文物》（内部刊物），1982 年第 2 期，第 11、18 页

粉，另一年长些的妇人则已在一边案上用擀杖擀着和好的面了。这是一幅多么富有地方风情特色的图画！

中国到目前已确知的各地地方戏曲剧种多达 460 多种（1962 年统计数字），其中仅山西一省就有 50 余种。从清末王国维以来，多少探索中国戏曲史的学者苦于历史实证的难于寻觅和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了历经 600 余年侥幸保存下来的一幅珍藏在洪洞县广胜寺下寺明应王殿的元代戏曲壁画。这幅元代戏曲壁画绘制于元泰定元年（公元 1324 年）。画的上部标明当时作场戏曲班社名称的横幛遮檐上赫然写有“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11 个楷书大字。“此壁画共绘戏剧人物 11 人。其中 1 人在后台左角掀幕外望，其余 10 人皆列台前。他们分前后两排站立。前排 5 人均着戏装，后排 5 人穿元人常服，手执砌未（相当于我们现代所说的道具）和乐器。显然，前 5 人为演员，后 5 人为乐队或执事。”[①]这幅元代戏曲壁画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历史学界（特别是戏曲史界）尤以为甚，甚至超过了在美术界或美术史界的影响。从本世纪 50 年代至今 40 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人士将这幅壁画和几乎同时期在侯马市发现的金墓中的砖雕戏曲舞台模型，一致视为研究中国金元时期戏曲发展形制的两件世之瑰宝。我国已故著名戏曲史学家周贻白先生，甚至对广胜寺明应王殿发现的这幅元代戏曲壁画所展示出的人物与戏剧场面作出了具体的研究与诠释。他认为，壁画中的“‘忠都秀’为主要演员的艺名。当时的女艺人，多以秀字命名，如珠帘秀、天然秀、芙蓉秀、燕山秀等，皆元代有名演员，能演各门脚色及多种声腔的戏……至于壁画所绘人物形象，当为元剧中无名氏《须贾大夫■范叔》一剧第四折，亦即今之京剧或川剧的《赠绨袍》故事……这一幅壁画既然绘在神庙内，当即神庙演剧时景象”。[①]明代人臧晋叔在他那个时代编了《元曲选》，使我们得以见到元代杂剧的百余种文学剧本；今人隋树森又根据他的搜寻编了《元曲选外编》，使我们现代人能见到的元杂剧剧本增加到了 160 余种。如果说这些元杂剧剧本仅只是使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接触到了 600 余年前的中国戏曲的话，那么，洪洞广胜寺明应王殿中的元代戏曲壁画，则是从一个全新的立体的角度使我们对元杂剧的演出场面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根据有关专家的披露，从本世纪“50 年代以来，我国古代壁画墓已发现约百座之多。资料表明我国古代墓葬绘彩色壁画，大约始于东周，西汉晚期有较大发展，东汉晚期墓葬壁画的内容、布局、技艺都已达到成熟的阶段。魏晋十六国时期，这一习俗在中原地区转向衰微。北魏以后墓葬壁画得到了复兴，到唐代前期则达到了光辉的高潮，显示了崭新的面貌。宋辽时期，墓

[①] 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2 页。引文括号中文字为本书作者所加。

[①] 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92 页。

葬壁画题材发生了变化，元朝以后，即已衰落。”[②]近 50 年来，山西境内已发现的古代壁画墓葬约在 20 座以上，是目前国内发现并保留古代墓葬壁画数量最多的一个省区。在山西所发现的这些古代墓葬壁画中，辽金到元时期的为大多数，大约接近 20 座的样子。如黄景略先生所言，在这些辽金到元的墓葬壁画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们在摄取题材方面与唐以前有很大距离。与同一时期山西的寺庙壁画一样，山西辽金到元时期墓葬壁画的题材选取大多直接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影响，这可能与当时的画工多出自于民间有极大的关系。山西至目前发现的汉代墓葬壁画和北齐墓葬壁画以及唐代墓葬壁画，其数量虽然不如辽金到元时期的多，但从其绘制技法和选取题材方面看，却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也正像黄景略先生所讲的那样，山西的汉墓壁画同样证实了此一时期我国墓葬壁画的发展与成熟，北齐墓在太原等地的发现也确实看到了这一时期墓葬壁画的复兴迹象。山西的唐代墓葬壁画目前在山西发现的还为数很少，与现已在陕西、河南等地发现的唐代墓葬壁画相比，则还少典型意义。

山西现存的 12　712 尊彩绘泥塑，分别属于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 8 个历史时代，时间跨度达 1000 余年。无论从拥有数量上讲，还是从其历史悠久和艺术质量上说，无疑在全国各省区中均居于首位。而在山西目前保存的这 12　712 尊彩绘泥塑作品中，其中最享有盛誉的则是如下一些地方和内容：

晋祠圣母殿宋代彩塑；　五台山南禅寺唐代彩塑；
平遥双林寺宋元彩塑；　晋城青莲寺宋代彩塑；
晋城玉皇庙元代彩塑；　大同华严寺辽代彩塑；
隰县小西天明代彩塑；　朔州崇福寺金代彩塑；
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彩塑；　平遥镇国寺五代彩塑；
……

中国彩绘泥塑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它可以直接追溯到公元前三四千年时的新石器时代，因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我国整个黄河流域都遍布着成熟的彩陶工艺。本世纪 70 年代在秦始皇陵发现的秦兵马俑，应该是我国原始彩陶工艺制作发展到 2200 年前时的极品。公元初佛教艺术从印度传入我国，同时由于道教艺术的发展，这些无疑都对我国古代传统的雕塑工艺无论在制作工艺技术上，还是在题材的拓展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彩绘泥塑作为我国传统雕塑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也同样在这种影响中不断地发展成熟起来。

南北朝以前，我国寺庙中的宗教造像多以石刻石雕为主。隋唐以后，随

[②] 黄景略：《中国古代墓葬壁画的缩影》见《文物》，1996 年第 9 期，第 67 页。

着佛教与道教在民间的不断深入，彩绘泥塑以其工艺简易且选用制作材料方便的特点渐渐在民间广为普及。山西则是中国北方古代彩绘泥塑艺术最早普及的地区之一。

佛教从东汉明帝时传入我国后，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大的灭佛毁寺的举动。一次发生在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 446 年），一次则发生在唐代武宗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两次灭佛毁寺的举动均是在封建皇帝的敕令下进行的，所以破坏性极大。北魏太平真君七年由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发动的那次灭佛毁寺，虽然时间延续了 6 年时间（即公元 446—451 年），但由于当时北魏政权实际控制的疆土地域有限，且佛寺建造还处于初起阶段，并不普遍，所以此次灭佛毁寺见诸历史记载的并不怎样特别显著。但是唐武宗会昌五年的那次灭佛毁寺尽管时间不长，前后不到 8 个月的功夫（即公元 845 年 8 月—公元 846 年 3 月），但天下“计毁寺 4600 所，兰若（同为古代寺庙的一种）4 万所，收良田数千万亩，奴婢 15 万人，僧尼还俗 260 500 人，穆护、火祆还俗 2000 余人”。[①]这可能成为我们今天绝难发现唐以前寺院原始建筑物的一个主要原因。一般来讲，建筑物不存在了，建筑物中的泥塑佛像常常也随之毁灭。在这一点上，泥塑佛像就无法与石刻造像相比，即使建筑物毁坏，石雕佛像的寿命也要长久得多。

在本世纪 50 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进行山西省古代建筑的普查时，在佛教圣地五台山寺庙群的边沿地带发现了两座属于唐代佛寺建筑的遗存。一座叫做佛光寺，位于五台县东北 30 公里豆村附近的佛光山，寺内保存了唐大中十一年（公元 857 年）重建的东大殿，殿内幸存着 35 尊唐代彩绘塑像。另一座为南禅寺，位于五台县西南雕王山西麓山脚下的李家庄，寺内保存了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 782 年）重建的北大殿，殿内幸存着 17 尊彩绘泥塑佛像。两座唐代佛寺建筑中均遗存着同一时代的彩绘泥塑佛像，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后者南禅寺中的北大殿及其殿中彩塑，它们不但比佛光寺东大殿及其殿中彩塑要早出 75 年，而且比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 845 年）的灭佛毁寺也要早出 63 年。据知，佛光寺现存东大殿的位置上原本是一座三层七间高约 32 米的弥勒大佛阁，这座大佛阁即湮灭于唐武宗会昌五年的毁寺灭佛举动之中。而寺中现存的东大殿则是在唐武宗灭佛过后 12 年在大佛阁的原址上重建的。那么，比唐武宗灭佛早 63 年建造的南禅寺北大殿为什么没有毁于唐武宗灭佛毁寺的举动，而佛光寺的大佛阁却被毁了呢？有关专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佛光寺早在唐武宗灭佛毁寺前的“隋唐之际，已是五台山名刹，寺名屡见于传记。见于敦煌壁画上的唐中叶绘制的五台山图，佛光寺就居显要地位”。看来因为知名度太高，遂召致了被毁的命运。南禅寺的命运则大不相同，虽然唐武宗灭佛致使中国佛寺大都损毁，“而

[①] 曹琦、彭耀编著：《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7 页。引文括号中文字为本书作者所加。

南禅寺由于规模较小，处地偏僻，且州府县志和佛教经籍上均无记载”，所以能够“幸免于难，留存至今”。[1]1961 年南禅寺与佛光寺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寺中的 52 尊彩绘塑像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到了国家文物部门的重视与保护。严格讲，佛光寺东大殿中的 35 尊彩绘塑像其实并非全属佛教造像。在高大宽阔的大殿佛坛上，除了塑有释迦牟尼、弥勒、阿弥陀佛与观音、普贤以及诸胁侍、供养菩萨和诸天王外，于佛坛两端，竟塑有当时重建该佛寺时的两位真人塑像。一位是塑在佛坛左端的佛门女弟子即建殿施主京都宁公遇，另一位则是塑于佛坛右端的建寺时的住持高僧愿诚的塑像。作为建寺时的真人塑像与诸佛像同塑于一座佛坛之上，而且保存了 1100 余年，这在中国现存彩绘泥塑作品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例子。

太原市西南郊的晋祠古迹名胜群落中以该祠的主建筑圣母殿为最知名，而晋祠圣母殿从很大程度上讲，则是因为殿中宋天圣年间（公元 1023—1031 年）塑的 40 尊侍女像而身价倍增。这些侍女像据知全部出自于北宋民间塑工之手。 40 尊 40 种模样情态，均作宫殿中侍奉主人形式分立于殿中两侧。因她们身材的大小都与真人相仿佛，加上其神色姿态自然如生，游人步入殿中，就常有似走入一群轻语微笑女子群中的感觉。 1958 年春夏之交时，我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来太原演出，趁着演出闲暇时曾到晋祠游览。当他见到圣母殿里的这些侍女群像时，直感到情不自禁与激动万分，大有不忍离去的感觉。这或许与他一生的演艺生涯有着深切联系，他曾在戏曲舞台上塑造过上百个中国古代不同身世的妇女形象，见到晋祠圣母殿中的这些精彩纷呈、栩栩如生的彩塑古代女子们的种种身姿及面容，他自然会产生一种发自肺腑之中的情感与共鸣。据说，那次梅兰芳先生在太原演出的 20 多天时间中，并非一次身临晋祠圣母殿，他可能从这些侍女群像中受到了深刻的艺术启发，找到了表演上的创作灵感。事后，梅兰芳先生曾作过一首名曰《晋祠颂》的长诗，诗中对圣母殿侍女群像就有“宋塑群像，体态轻盈，一颦一笑，似诉生平”的高度评价。梅兰芳先生离开太原的第二年，我国当代的文学巨匠郭沫若先生也来到了晋祠，他同样留下了一首《游晋祠》的七言律诗，诗中对圣母殿中的侍女彩塑群像自然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倾城四十宫娥像，笑语嘤嘤立满堂。”[1]无论是梅兰芳先生的“一颦一笑，似诉生平”，还是郭沫若先生的“笑语嘤嘤立满堂”，总而言之，他们都在看到晋祠圣母殿的宋塑侍女像后产生了一个共同准确的认识，那就是：这些雕塑于 900 多年前的侍女群像真是塑活了！

曾受到世人极高评价的山西古代彩绘泥塑作品，除了晋祠北宋时的圣母

---

[1] 柴泽俊：《佛光寺》、《南禅寺大殿》，《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1993 年版，第 158、383 页。

[1] 贺新辉、宋达思：《现代咏晋诗词选》，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殿侍女像，则还有大同华严寺下寺中的辽代彩塑合掌露齿胁侍菩萨等。大同华严寺下寺中的薄伽教藏殿，建于辽兴宗重熙七年（公元 1038 年），其始建年代比晋祠圣母殿稍迟 10 余年，包括那尊著名的被称为“东方维纳斯”的合掌露齿胁侍菩萨在内的 31 尊辽代彩塑，均置身于该佛殿之中。这 31 尊彩塑所取身姿不论坐立侧正或庄谐雅趣，皆优美生动，自然丰满，其雕塑之法似并不受佛界规限，表现得极为精湛而大胆。其中尤以那尊合掌露齿胁侍菩萨最为生动传神。该“塑像高约 2 米，赤足站立于莲台之上，体态丰盈，上身薄袒，衣饰贴体，肘悬飘带，长发垂肩，面如满月，身微侧，颈稍斜，眼半睁，口小开，双手合什，举至胸前，露齿微笑，婉丽动人”。[①]完全是一个刚入佛门不久且神情中还带有某种满不在乎感觉的清纯少女的逼真形象。华严寺这组辽代彩塑保留下来极为不易。 1977 年 8 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不到一年的时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欣然身临大同寻访佛教圣地云冈石窟与华严古寺。这可能也是他生平第一次来此。他为云冈石窟和华严寺在 10 年浩劫之后居然还能幸免于难而万分感慨，也为这两处古窟寺的雕塑之美所震憾，不禁之中吟出了如下诗句：[②]

昨日游云冈，　　今日访华严。
雕塑之美两奇绝，　　快遇平生所未观。
凿岩造佛高数丈，　　示观手如兜罗绵。
仿佛灵山集海会，
弟子或坐或立或语或默或悲或欣然。
飞天持花周匝围绕迅疾如风旋。
四壁所刻多经变，　　千姿万状尤非凡。
释迦多宝同龛坐，　　维摩文殊对床谈。
时空玄里寓神话，　　魅力更赖形像传。
想见神工与意匠，　　能令顽石不敢顽。
正如泥塑成对照，　　坚者柔之柔者坚。
试观下寺诸塑像，　　线如铁画劲而圆。
静穆兼有飞动意，　　神态妙非言能宣。
……

1982 年 11 月 19 日，由国家邮电部特准发行了全套四枚的大同下华严寺辽代彩塑纪念邮票；而早在 1961 年 3 月 4 日，大同华严寺即以其古建筑及其辽代彩塑的崇高艺术价值被国务院公布为我国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 年之后，即 1964 年夏天时，郭沫若先生来到了华严寺，他在那尊合掌露齿菩萨面前站了很久。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郭沫若先生竟然在第二天又再

---

① 王宝库：《心事浩茫连广宇》，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2 页。

② 贺新辉、宋达恩：《现代咏晋诗词选》，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5 页。

次来到那尊彩塑面前，又站了好几个小时。他在细心地揣测这位刚入佛门不久的天真少女，她为什么要发出那样会心的微笑，而且忘记了“笑不露齿”的规矩。最后，这位极富浪漫情趣的文学老人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原因。他对身边的人说，这位刚入佛门不久的少女，肯定是在听佛讲经时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或是精彩的情节，才笑得忘记了古人之训的。

晋祠圣母殿的侍女群像是属于在古代宫廷形制的规范下作出整体创作立意的，因为该殿中央的主神是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的母亲邑姜；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中围绕中央三世之佛（即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排列的各色佛门弟子、胁侍菩萨以及供养童子等，则是按照佛教的教规礼制作为尺度的。在晋城市境内的府城村玉皇庙中，至今仍保留着 300 余尊完全不同于以上两种形制内容的古代道教彩塑神像，这 300 余尊道教群像的排列组合规制，则属于金元时期北方道教思想的形象体现。与芮城永乐宫元代道教全真派主持绘制的道派壁画相比，它们二者之间虽然在出现时间上相距不远或者说基本属于一个历史时代（晋城玉皇庙中的 300 尊彩塑除了玉帝殿中的 30 余尊是宋代作品以及还有个别部分属明清制作外，其余大部分系元代至元二年到至元三十一年、亦即公元 1265—1294 年间制作），但永乐宫壁画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属于正统殿堂气氛的味道，尤其是三清殿其富丽堂皇与庄严肃穆感极强。晋城玉皇庙的元代彩塑却显然不同，它基本属于一种民间规制。它所塑造的形象与其说是诸神倒不如称其为凡间众人。其中尤以西配殿中元代塑制的二十八宿神像动感特强，极备情趣。有人评价其“二十八尊次第排开，平等并列，神情各异，动态有别，或男或女，或老或少，或文或武，或动或静，或威严，或慈善，或丰腴，或俏丽，或凶猛，或文雅，或肃穆，或活泼，或端庄，或俊秀，奇异迷人，动人心魄”。[①]总之，此组玉皇庙西配殿内的二十八宿彩塑，著论及它们的艺术价值，则完全应该与晋祠的侍女塑或华严寺的胁侍菩萨塑相媲美。中国民间道观中自古以来以十二生肖或二十八宿作为彩塑题材者很多，但目前存世的此类遗产之中，雕塑水平之高、艺术感染力之强者，则莫过于晋城玉皇庙中的这 28 尊。1988 年 1 月 13 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山西省有 12 处古建筑被列在内，晋城玉皇庙及其古代彩塑作品即为其中之一。

悬塑，又称为壁塑，此为中国古代彩绘泥塑中一种特殊样式。据说启始于唐代雕塑家吴人杨惠之。时有“道子画，惠子塑，夺得僧繇神笔路”的民谚传世。是说大画家僧繇培养了吴道子和杨惠之两个有名的学生，结果吴道子以其绘画，杨惠之以其彩塑在当时一时压过了僧繇的名气。传说唐代中原出于杨惠之手下的壁塑尤多，且多在各地寺院中。他不但功于实践，而且还有理论著述，如《塑诀》即是。唐宋以后各地彩塑受杨惠之的影响很大，悬塑于壁也很快普及。

[①] 王宝库：《心事浩茫连广宇》，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42 页。

山西从金元以后在寺院道观壁上作悬塑已经蔚然成风。虽然保存至今的古代寺观不及千分之一二，但遗留有悬塑作品的寺院仍然比比皆是，如太谷阳邑的净信寺，隰县的千佛庵（俗谓“小西天”），五台山的殊像寺、金阁寺，平遥的双林寺，长子县崇庆寺，新绛县福照寺，等等。其中特别以平遥双林寺和隰县“小西天”的悬塑水平为最高。

双林寺位于平遥县城西南 7 公里桥头村，全寺 10 所殿堂中聚集了 2000 余尊从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彩塑作品，其中约半数是悬塑，多集中于千佛殿与菩萨殿中，其雕塑人物数目之多和人物情态变幻之丰富，在国内实为罕见。坐落在中轴线上的释迦殿内，其中央扇面墙后有一组名曰“观音渡海”的悬塑，与河北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中央坛墙背后的观音倒坐须弥山足以媲美，同被称为华北明代悬塑中的艺术精品。两处悬塑观音的区别在于，正定隆兴寺的倒坐观音处于静态环境之中，显得更为庄严一些；而平遥双林寺的渡海观音则处于动态画面之间，自然、安祥与飘逸构成了又一种艺术特色。

隰县“小西天”悬塑分布在这座本名“千佛庵”寺院的上院大雄宝殿之中，雕塑内容主要为一般的佛教故事和释迦牟尼的本生传说。悬塑人物精巧玲珑、异彩纷呈，加上殿内的各种飞天、神鸟、孔雀和仙鹤等祥瑞悬塑点缀其间，更显得金碧辉煌，颇有一派天堂景象。与双林寺悬塑相比，隰县“小西天”的悬塑显得程式化了些，在人物刻划上显然缺少了一些现实主义的个性特色，但仍然掩盖不住其雕塑技艺上的艺术成就。

悬塑艺术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古代寺观彩塑在空间拓展上的一次小小的技术革命。而这种技术革命则使得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在唐宋之后逐渐更臻成熟或者说更奢糜起来。一方面它使那些陈旧的宗教内容得以采取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它则在中国古代美术史上增添了一个新的章节。山西境内目前保存的彩塑及悬塑文化遗产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历史衔接上具有连续性特征，在艺术质量上也颇有代表性。许多人将平遥双林寺和晋城玉皇庙称作中国古代彩塑艺术的宝库，事实上，整个山西又何会不是一座雕塑艺术的宝浑呢？

山西还是一座砖雕艺术宝库。

砖雕在中国古代的出现，晚于石雕与木雕。这主要是因为它首先涉及到人类用砖的历史。砖用于中国建筑，首先是作为一般的建筑构件和建筑材料，然后才是特殊的建筑构件与工艺材料。自然石与自然木可以直接拿来作为工艺雕刻材料，但是砖不是自然物，砖是经过选土、成泥、定型、烧制后，才能作为砖雕材料或特殊建筑构件的。中国古代砖雕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汉代或者更早。那时不但已有汉画像石，同时也有了汉画像砖。汉画像砖石，一般都用于墓葬。佛教传入中国后，砖塔随之逐渐在各地普遍出现。为了塔身各部位的装饰美化或者宗教内容上的要求，砖雕遂在建塔的过程中也大量出现。到唐宋时，中国民间建筑用砖开始普及，砖雕在民用建筑中也相应开始推广。明清以后，中国建筑用砖达到了高潮，砖雕艺术同时也达到了炉火纯

青的阶段。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且利用历史较早，这为烧制琉璃与砖瓦建筑用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山西事实上是建筑用砖普及最早的一·个地区，也是历史上砖雕工艺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从山西现已发现的砖雕历史文化遗产看，金元与明清时期的砖雕工艺作品最为丰富，目前在山西发现的金元时期砖雕几乎全部来自于墓葬之中，明清时期的砖雕则基本表现在村镇民居上。

从 1959 年在侯马市发现金大安二年（公元 1210 年）董明与董玘坚兄弟两座砖雕仿木结构墓葬起，到现在 30 余年时间中，在山西发现的同类型结构的金元墓葬已有数百座。虽然同为砖雕仿木结构墓葬，但是由于地区不同，互相之间又各有特点。关于这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作出了如下总结：有关砖雕“金墓的仿木构情况，雁北地区与晋东南地区都比较简单，晋中地区墓室结构比较复杂，但晋南地区的金墓与之比较则更胜一筹。特别是稷山金墓有的作重檐迴廊，围以勾栏，其高大宏伟，无与可比。侯马金墓结构精巧，装修细致，磨砖对缝，手法严谨，独具风采。对于墓的装饰手法，雁北与晋中地区多为砖雕彩绘。晋东南地区以壁画为主，砖雕为辅；晋南地区与其相反，壁画彩绘极少见，而以细腻的素砖雕刻为其特点”。[①]在墓室砖雕装饰内容方面，虽然全省各地区在表现墓主生前家居生活这一点上大多统一，但晋南地区（特别是新绛、稷山、襄汾、侯马一带）却更以金元时期的杂剧表演、民间乐舞等作为其特殊的装饰内容和雕刻题材。如稷山马村金墓群共发现墓葬 14 座，在已发掘并对游人开放的 9 座中就都有乐舞戏剧砖雕内容。当然，其中最负盛名者还是 1959 年在侯马发现的那座金代董明墓中的杂剧戏台砖雕模型以及正在作表演状的 5 尊砖雕戏俑。关于这 5 尊砖雕戏俑，曾在戏曲史学界引起过极为热烈的探索与讨论。著名戏曲史学家周贻白先生生前即认为：“侯马董氏墓中这座舞台上的五个砖俑，实为金院本（金元时期行院演剧时所用剧本）中五个脚色……这五个脚色，从右至左顺序排名，应为‘副净色’、‘引戏色’（即装旦）、‘末泥色’（即正末）、‘捷讥色’（即副末）、‘装孤’。这一发现，在中国戏剧史的发展过程中，不但使我们能够联系实物，解答了以前未能明确的某些问题。同时，也使旧有的一些文字记载，更具体地获得了印证。”[①]与洪洞广胜寺明应王殿中的元代戏曲壁画一样，晋南地区侯马、新绛、稷山等地金墓中的金代戏曲砖雕均已成为今人研究我国古代戏曲发展或砖雕发展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明清时期山西砖雕艺术的成就，基本表现在今天还能见到的一些明清时期的村镇民居建筑群落之中。而这些明清民居遗存在晋中和晋南的部分县市显得更为突出。如目前已广为人知的晋中祁县乔家大院、榆次常家大院、太

[①] 《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4 页。

[①] 《周贻白戏剧论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87 页。

谷曹家大院、灵石静升镇的王家大院、祁县县城的渠家大院、沁水西文幸柳氏民居、襄汾丁村丁氏民居，等等。明清以后砖雕艺术在山西中南部民居建筑中的广泛使用，与“明代开国以后，砖和石灰的生产量很快地增长”[②]有着直接的关系。与传统的木雕与石雕工艺相比，砖雕比木雕所用材料在价格上要便宜许多，而且更不宜损坏，便于保存更长久的时间；与石雕相比，砖雕则可塑性更强，并由于材料本身重量上的区别，它可以随意使用到建筑物的高部位置，如檐下及门庭楣额之上等。另外，砖雕仿木结构方式在金元时期墓室结构中的长期使用，应该也为明初以后民居建筑使用砖雕奠定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和文化准备。古代的民居建筑由于受环境影响，其长久保存比一般的寺院建筑更为不易。所以，我们目前在山西民居中能够见到的明代砖雕作品已非常稀少。据了解，从保存规模上看，沁水县土沃乡的西文幸村柳氏民居应该是最大最集中的一处。这处柳氏民居，全部由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 1546 年）举人柳遇春修建。柳遇春曾任山东宁海知州与陕西同州知州。他当时建起的柳氏民居据知共 13 处院宅及 1 座柳氏祠堂。现仅存 4 座院宅与祠堂。砖雕随时随处见于柳氏民居各处院落，尤以其中一院落大门处的明万历年间吏部尚书王国光（山西阳城县人）的书法砖雕最有气势。除沁水西文幸村保留有明嘉靖年间民居砖雕外，我省其他几处有名的明代民居砖雕是襄汾丁村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3 年）以后的民居砖雕，太谷县南洸曹家大院的明代民居砖雕和灵石县静升镇的王家大院明代民居砖雕等。

山西的古代砖雕艺术还多见于全省各地宋金以来的数百处寺院建筑中，其中以历代的砖塔或明以后所建的无量殿一类的纯砖结构建筑物最为显著。仅以无量殿一项而言，目前山西境内就有五台山显通寺无量殿，宁武县万佛寺无量殿，太原永祚寺无量殿，永济万固寺无量殿，清徐香岩寺无量殿等得以幸存。就艺术价值而言，古建筑界的专家们认为，“五台山显通寺无量殿规模最大，宽 7 间，高两层，歇山式屋顶，下层当中 3 间为迭涩砖雕藻井，上层枕头券（纵向通拱券）通达尽间，外檐上下两层砖雕斗拱规整精细，门楣华罩雕刻得华丽细腻，在全国已知之无量殿中，除南京灵谷寺外，五台山是较为宏伟的遗物。时代虽晚，但建筑技巧和雕刻艺术都是应予重视的。”①

山西古代砖雕艺术的出现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经济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作为山西古代文化遗产资源中的一个特殊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存在又直接受着经济生态和自然生态的种种影响。所以，研究山西的文化遗产生态，就应该将其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②] 《建筑史论文集》第 1 辑，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0 页。

第二节　名人故里以及祠墓

把在历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历代名人的故里（包括故居）及祠墓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然后给予特别的保留与保护，以供给后来的人们瞻仰纪念或者凭吊，这在目前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业已成为受法律保护的社会时尚和文化传统。

在将近 3000 年时间的有确切文字可考证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涌现的各种类型的历史名人成千上万。其中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画家等等。

由于历史久远和生态变迁，三晋大地上历代名人的故里故居及其祠墓大多已经不能见其确址原貌，保留下来的则不足其百分之一二。

唐叔虞，本周武王姬发的幼子，西周初年被其兄周成王姬诵封于山西南部古唐（今翼城、曲沃、绛县一带）之地。叔虞之后，他的儿子燮父因当地有晋水而改唐为晋。所以唐叔虞堪称为三晋历史上的始祖第一人。据此，唐叔虞的故里亦即封唐之地均应在今天的古汾浍交流处翼城、曲沃一带，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该地区发现的数座西周晋侯墓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这一史实。

太原晋祠亦即唐叔虞之祠，可以说这是山西大地上至今保留最为古老的古代祠宇。北魏时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即记载说：“昔智伯遏晋水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羁遊宦子，莫不寻梁契集，用相娱慰，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①]从这段记述中，我们不但可以确切地了解到至少是在公元 500 年以前时（郦道元公元 527 年被肖宝夤杀害，《水经注》注文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年代是北魏延昌四年，亦即公元 515 年。陈桥驿先生认为此时《水经注》全书尚未脱稿）唐叔虞祠已经存在，而且还对起码是 1500 年前的晋祠周围的环境生态也有了一个具体翔实的认识。关于太原晋祠的始建年代，尽管今天我们已无法准确考证，但我们根据一些悠久的历史信息与生态信息推测，坐落在古晋阳城侧悬瓮山下的唐叔虞祠极有可能在公元前 4 世纪末战国初已有雏型。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周代各诸侯国均将祭祀之事视为国之根本，即所谓《左传》中所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事情即莫过于宗庙祭祀与出兵打仗了。早在韩、魏、赵三家分晋以前，赵简子（即赵鞅）就已经开始经营于晋阳之地。《左传》中记载，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 497 年）“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②]赵简子为什么往晋阳奔逃？因为此时晋阳早已是他的根据地了。晋静公二年（公元前 376

[①] 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8 页。

[②]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385 页。

年），韩、魏、赵三家彻底将晋国瓜分之后，此时晋阳事实上已成为赵国的都城。所以，我们以为太原晋祠中的唐叔虞祠应该是在战国初期时就有了的，它应该是赵国举行宗庙祭祀的地方。而此时赵国的宗庙祭祀无疑仍应将唐叔虞作为其开国始祖给予礼祭，因为无论韩、魏、赵三家中的任何一家，实际上在瓜分晋国后，都还把自己作为唐叔虞所开创的唐晋的正统继承者而自我标榜着。“‘祠’，古音同‘食’（饲），义同飨。宗庙四时祭的春祭叫‘祠’；战国时引申为祈祷得福后报神祭叫‘祠’；至秦汉时又引申为泛指祭祀。”[①]无疑，晋祠（亦即古唐叔虞祠）之在太原，最初的诞生即应在这样久远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中。

我们推测太原晋祠始建于战国初期赵国的宗庙祭祀活动的另外一个根据，则来自于对晋祠中古代植物生态遗存的综合观察。正像 1400 多年前郦道无当时就对晋祠山水树木所描写的那样，“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树木繁盛，以致于人行祠中常常很难见到阳光。现在我们以今天晋祠中仍能见到的古树之生态去对照郦道元当时的记述，确实仍感到他的形容并不为过。清末举人刘大鹏，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 1902 年）45 岁时隐居故里（晋祠以北里许赤桥村）开始编撰《晋祠志》，约 4 年后书成。全书共 42 卷，其中即有两卷（第 26 卷与第 27 卷）专门记述晋祠植物。仅树木一项就有松、柏、桧、枞、杨、柳、榆、槐、桑、梓，椿、桂、柽、樗、柘、桐、桃、李、银杏等多达 30 余种，花草 20 余种。尤对历代种植古树木如松、柏记述甚细，“晋祠古柏颇多，高可十仞，大可十围，有周柏，有汉柏，有隋柏，有唐柏，有宋、金、元、明柏，或数千年，或千年，或数百年，阅寒历暑，久而不改柯叶……”其中周柏共有两株。一株叫双柏，原在朝阳洞石阶下左侧，清道光初年（公元 1821 年）被人砍伐；另一株名为齐年柏，植于圣母殿前“鱼沼飞梁”十字桥北侧，躯干向南半卧枕于另一古柏之上，虬劲奇绝，仅其胸径即达 1.91 米。明末思想家傅山先生曾书“晋源之柏第一章”7 个大字于其傍。傅山先生的儿子傅眉则有专门描写晋祠周柏的《古柏歌》传世。诗的启首 4 句即为：“晋祠众木临水多，青杨白柳交枝柯，不能老大作妩媚，此两柏树可奈何？”[①]很生动形象地写出了这两株周柏在晋祠群木中的特殊地位。近年山西省林业厅原厅长刘清泉先生，在多年专业研究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的古稀珍贵树木研究专著《山西古稀树木》。书中专门介绍了晋祠周柏与其他古代树木。这些千年古树应该能从自然生态遗产的特殊角度，去为晋祠的古老历史作出某些客观的说明或旁证吧。作为国内最古老的祠宇遗存，经过了 2000 余年的经营变化，到今天晋祠已成为一座集儒、释、道于一体的大型古典园林。它以其拥有古之“三绝”（周柏、唐太宗李世民亲写御碑和圣

[①]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纵论》，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3 页。

[①] 刘大鹏著，慕湘、吕文增点校：《晋祠志》，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母殿宋代彩塑）而闻名域内。 1961 年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近年来国家又投入巨资对北宋建成的圣母殿给予落架大修，使得这座古老祠宇又焕发出了新的青春气息。

如果说唐叔虞祠是以其古老悠久而渐成典型的话，那么，作为历史名人，三国时的蜀将关羽则是实实在在是以其妇孺皆知的知名度使古今之人对其故里、陵墓和祠宇产生敬慕之情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个人的知名度是其他任何历史名人都无法比拟的。一位是山东曲阜的孔子，另外一位就是山西解州的关公。关羽败走麦城被东吴杀害后，其身首异处。身躯埋葬于湖北当阳县城西北，而头颅则埋葬于河南洛阳市南，所以关羽的陵墓就有两处。湖北当阳那处被称作关陵，河南洛阳的则被叫做关林。位于今运城市常平村的附近有关羽祖茔，然而关羽的陵墓最终未能建在家乡。天下庙宇以关庙最为兴盛，数量也最多。古代中国乡村常常可以不建文庙（文庙一般建于县治以上的城市之中），但是不能没有武庙。武庙即关帝之庙，专供乡人祭祀关羽。明清以前关庙仅见于中国国内。从 18 世纪末叶开始，随着海外华人的增多，在东南亚各国甚至欧美及日本的华人社区都出现了祭祀关羽的庙宇。如在今天的马来西亚，竟然会有 6000 多座关庙出现。在我国的宝岛台湾，大大小小祭祀关羽的庙宇据说达到 3 万座以上。

始建于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的山西解州关帝庙，是国内外最大规模的关庙，也是距离关羽故里最近的一座关庙。但是此庙却不是关羽的家祠，它是历代皇帝对关羽进行国祭的地方。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时，敕封关羽为“ 协天护国忠义大帝 ”，故明清以后的解州关帝庙其形制已完全类于帝王宫阙。真正的关羽家祠至今保留在关羽故里运城市常平村内。祠中除主祭关羽以外，还配祀关羽的始祖、曾祖、祖父与父亲之神像。这在域内外关庙中属仅见一例，表现了真正家祠与一般关庙的区别。常平关羽家祠中有一八角七层砖塔，世代传为关羽父母之墓。据说当年关羽在家乡杀死恶霸吕熊之后远逃他乡，但年迈的父母却无法逃走，只得投井自尽。后人在井口之上起砖塔一座，以为陵墓。关羽死后，关氏后裔又于关羽父母陵墓所在处建关羽家祠。关羽家祠始建年代不详，但民间传说当在解州关庙之先。解州关帝庙建于隋开皇九年（公元 589 年），距离关羽被害的时间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计 370 年。解州关帝庙已于 1988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 1990 年开始，关公故里在关羽的诞辰纪念日（东汉延熹三年亦即公元 160 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连续举办数届金秋大祭暨传统庙会活动，在海内外引起相当大的文化共鸣。闻喜县东北 25 公里处有一个百余户的小村落名曰裴柏村。村子坐西朝东，背后与南北两测近十座山峦成半圆形排列将村庄拱围起来，煞有气概。村子虽小，然而气魄颇大。中国有句古语叫做“ 天下无二裴 ”，意思是说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碰到的人是姓裴的，那他肯定都来自于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河东闻喜县的裴柏村。关于裴氏姓氏的起源，金大定十一年（公元 1171 年）编写的《裴氏

世谱》原序中认为，闻喜裴氏“出自有熊氏，乃柏翳之后，与秦同祖，佐舜又赐姓嬴，佐殷伐桀，佐周伐纣，累世有功。秦封　城，至陵，更邑从衣，因以为姓。始祖遵，始自云中，徒居安邑。曾孙晔，迁闻喜，东五十里裴柏而家焉”。[1]这段800多年前写出的文字，有的内容显然来自于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中。意思是说，闻喜裴氏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至远古时的有熊氏，它与秦之嬴姓同祖，都出自伯翳之后，曾扶佐商的始祖共同讨伐夏桀，也曾扶佐周人讨伐商纣，历史上功绩累累。到秦代的时候先封至　城那个地方，而到了一世祖裴陵时，才将“　”字下面那个“邑”更改为“衣”，真正的裴姓从此时方才诞生。而直到十二世祖裴遵时，裴氏才从云中之地迁徙到了安邑；又到十五世祖裴晔时，此时已是西汉，裴氏方定居于闻喜之地，这就是后来的裴柏村。叫裴柏，是因为此地柏林茂盛的缘故。到两晋时期时，裴氏人丁繁衍已经遍布域内。当时仍旧家居河东（泛指今晋南一带）者称为中眷裴，而居于燕地者则称为东眷裴，居于长安以西直至西凉地区者又称为西眷裴。从两汉以下，直到隋唐，千年以内真是裴氏的黄金时代。有人曾经根据历史文献的确切记载，又参考了《裴氏世谱》，统计出在宋之前，裴氏历代担任过宰相的多达 59 人之多；在五代以前，担任过历代尚书之职的则多达54人；而在宋以前，还有42人担任过历代朝廷的各部侍郎；还有在唐代之前，担任过历代大将军职务的裴氏人物也多达 58 人。裴氏一族在唐代官场尤为显赫。顾炎武晚年在曲沃隐居时，曾就近造访裴柏村，瞻仰裴氏宗祠，后来留下了一篇《裴柏村记》的短文，文中论及人才与国家民族兴亡之间的关系时，一方面赞叹裴氏的人才济济，另一方面则为裴氏对唐王朝的卓越贡献和重要作用，由衷地发出了“观裴氏之与唐存亡，亦略可见矣”[1]的慨叹。

纵览 2000 余年中的裴氏家族，其享有赫赫盛名的历史名人可以说比比皆是。他们遍见于中国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也遍见于封建社会的各种领域。在这些风云人物中，曾经出现过像裴秀（公元 224—271 年）那样被称作东方托勒玫[2]或中国古代地图学之父的地图学家。他第一次写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图学理论专著《禹贡地域图》，而且在此书中首次提出了所谓“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分别叙述和阐明了地图绘制时的比例尺、方位和距离等一些基本原则。一直到明代时，这些原则仍被当时的地图学界所广泛遵循。裴秀的一些观点，甚至直接影响到了现代地图制作理论的诞生与成熟。

生活在东晋末年至南北朝时期的裴松之（公元 371—451 年）、裴骃父

---

[1] 贠创生、周庆义、王午申点校：《裴氏世谱》，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 页。

[1] 贠创生、周庆义、王午申点校：《裴氏世谱》卷十，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16 页。

[2] 占希腊的地理学家和地图学家，著作有《地理学指南》。其生活的时代约在公元 90—168 年之间。

子，是闻喜裴氏家族历史上的又一骄傲。父子三人前者以为《三国志》作注65卷而名扬于世，后者则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写下130卷《集解》而彪柄史册。事实上，裴松之、裴骃父子的名字，已经与司马迁的《史记》、陈寿的《三国志》这样珍贵的中国古代经典历史文献一样成为不朽。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百花园里，其形式与体裁多种多样。“传奇”即为其中之一种，后世人以其泛指唐宋文人用文言体所写的短篇小说。然而，许多人都不知道，“传奇”最初也是闻喜裴氏家族中一位名叫裴骃的所首创的。裴骃，约生活在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的唐代末年。他的小说集《传奇》共3卷，然而身后皆散佚。现代学者郑振铎先生曾经依据北宋小说总集《太平广记》，辑得了裴骃《传奇》一书中的24篇作品。著名者如《聂隐娘》、《裴航》、《昆仑奴》、《韦自东》、《封涉》等，元明以后多将其故事改编为戏曲。总之，把裴骃称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传奇小说的主要开拓者当不为过。

古代的闻喜裴氏家族中，也出过十分著名的法学家，这就是曾致仕于南梁、北周与隋三个朝代的裴政。裴政15岁时即跻身于仕林，做过法曹参军；北周时又任刑部下大夫之职。《隋书》中记载，裴政判案常常是“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囚徒犯极刑者，乃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刑决，皆曰：‘裴大夫致我于死，死无所恨’”。正因为裴政有这样好的执法之名，到隋开皇年间时，隋文帝就仰赖他和苏威等人修定律典。为此，裴政博采魏、晋、齐、梁等南北朝时各家刑典，取其可用则废其种种酷虐刑种。虽然“同撰著者十有余人”，但凡遇到疑滞不通，不能最后决议时，就“皆取决于政”。[①]就是在裴政的实际主持下，中国古代著名的法典《开皇律》终于诞生了。这部法典废除了前世的枭首、圜刑与鞭刑，而更定刑名为死、流、徒、杖、笞等5种。中国古代所谓的“十恶大罪”之概念也即始自这部《开皇律》。《开皇律》从本质上讲它无疑仍是一部镇压人民和维护封建皇权的法典，但它在中国 2000 年的封建法律制度发展史中，却有着它应该拥有的历史地位。

旧时的裴柏村曾有裴氏祖祠，祭祀裴氏列祖；又有裴晋公祠，则专门祭祠中唐名相裴度。裴度（公元765—839年），其政治生涯共经历了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和唐文宗6个唐朝皇帝。在唐代的大政治家中，裴度的名字则完全可以与他之前被誉为“再造唐室”的郭子仪或唐初的魏征等人相并列。裴度一生的最大功绩是竭尽毕生精力去一次又一次地削平藩镇割据势力以维持唐政权的大一统局面。唐宪宗时淮西吴元济藩镇割据日甚一日，甚至事情发展到了暗杀朝廷大臣于京城官邸的恶劣程度。就在这种情况下，裴度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秋请往淮西亲自督战，并下定了淮西一日不平就一日不返京城的决心，史称其亲往延英殿向唐宪宗表示：

[①] 《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549页。

“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1]此年 10 月淮西藩镇元凶吴元济果然被破就擒。裴度平定淮西后凯旋而归，即被封为上柱国并晋国公。裴柏村裴晋公祠中现存有一通高 2． 54 米、宽 0． 92 米的裴度平淮西石碑，碑文由唐代文学家韩愈撰写，加上清代咸丰年间山西大书法家祁隽藻的精绝书法，世称该碑为史、文、书“三绝”之碑。现裴晋公祠已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芮城永乐宫的主轴线建筑群以西，有一座“吕公祠”。游永乐宫的人们常常与这座面积不大、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擦肩而过，却不予重视。其实，正是由于先有了“吕公祠”，全真教永乐宫才得以兴建于后来。永乐宫和吕公祠原建均在今芮城县城西南约 25 公里黄河北岸的古永乐镇，而永乐镇西的招贤里竹水墟，据说就是道教‘八仙’故事中吕洞宾（本名吕岩，洞宾为其入道后之道号）的故里。

关于吕洞宾，过去曾经有许多人认为他只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神仙而已，历史上并非真有斯人。然而，根据近年来发现的一些文献以及考古成果和研究结论来看，历史上应该是真有吕洞宾其人的。当代著名宗教史家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即认为：吕洞宾的确切主卒年代虽然“无考，但据可靠史料，他们（包括钟离权，‘八仙’中的另外一位神仙）活动于唐末至北宋初，在五代末已颇有名”。[2]《全唐诗》中就收有吕洞宾的诗词共 5 卷 121 首。其中第一首即他初遇钟离权后的言志之作，题曰《呈钟离云房》：

> 生在儒家遇太平，悬缨重滞布衣轻。
> 谁能世上争名利，臣事玉皇归上清。

这首七绝所透露出的诗的作者的身世，与历来见于各种文献中吕洞宾的生平及出身是基本相符的。传统的说法认为吕洞宾的出生时间为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 798 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其家庭约在唐初高宗朝即已定居河东永乐一带。吕洞宾的祖辈从唐代最兴盛的时期开始，几乎每代均担任过朝廷官职。但是到吕洞宾时，尽管他曾经十分醉心于功名科举，然而当他最终拿到一个进士的头衔时，已经是 37 岁的年龄。此时的李唐朝廷严重衰败，吕洞宾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弃官入道的，也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遇到了钟离权，而且写下了那首题曰《呈钟离云房》的七言绝句。吕洞宾入道后大约不到百年时间，亦即五代与北宋相交之际，其名声就已远播，成为当时天下人中神仙。根据永乐宫历代碑记所述，吕洞宾的祠堂肇始于唐末，宋金代有所修。金末元初，道教北方全真派兴，更将吕洞宾奉为全真始祖，加之民间道教“八仙”的传说日益普及，吕洞宾的名字在国中堪称家喻户晓。到蒙古

---

[1] 《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211 页。

[2]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90 页。引文括号内文字为本书作者所加。

太宗四年（公元 1232 年），全真派传世弟子潘德冲奉旨将昌洞宾祠观扩建为道宫，称曰“大纯阳万寿宫”，主祀纯阳真人吕洞宾，是为道教全真派第一祖庭。

与吕洞宾的超然脱世截然相反，在山西的历史名人中，以杨业和杨延昭（民间传为杨六郎）为代表的北宋杨家将，则是以其一腔热血和满门忠烈谱写出了一曲宏壮无比的爱国主义史诗。杨业，五代后汉时本随其做麟州（今陕西神木北）刺史的父亲家居麟州。后汉乾祐三年（公元 951 年），郭威袭破开封以后，后周取代后汉。此时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刘崇在其控制下的太原建立北汉政权，杨业的父亲杨弘信将杨业送到太原做了刘崇的义子，改名为刘继业。后周显德七年（公元 960 年），赵匡胤攻破开封建立宋朝，当时太原仍在北汉的控制之下。从宋太祖乾德初年（公元 963 年）至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979 年）太原城陷为止，十几年时间中赵宋多次派兵强攻北汉，杨业一直竭尽全力死守太原。故元代人撰写的《宋史》称杨业为太原人。

北汉亡后，杨业归顺宋朝。《宋史》中称，宋太宗赵灵“以业者于边事，复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让他去镇守代州雁门一带边关，以防契丹人袭侵。杨业不辱使命，连战连捷，“自是契丹望见业施旗，即引去”。[①]杨业归宋后的第八年，即雍熙三年（公元 986 年）时，辽军大军压境，宋太宗命令潘美、杨业所部宋军掩护代北四州边民内迁，监军王侁与潘美贻误战机，陷杨业所部于辽军重兵埋伏之中。最后杨业身负重伤在拼杀中被辽兵所擒，绝食三日后而死。这场残酷的战斗中与杨业同时战死的还有他 7 个儿子中的一个杨延玉，战场地址在今朔州市与宁武县相连接的地方，杨业受伤被俘处则在今宁武县北部的陈家谷口。

杨业遇难后，他的其余 6 个儿子延昭、延浦、延训、延环、延贵和延彬继续为宋廷镇守边关。特别是杨延昭，《宋史》记其“智勇善战，所得奉赐皆犒军，未尝问家事。出入骑从如小校，号令严明，与士卒同甘苦，遇敌必身先，行阵克捷，推功于下，故人乐为用。在边防廿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①]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 1014 年），延昭卒，终年 57 岁。延昭的儿子杨文广继承父业，继续为宋廷戍边效力。杨业祖孙数代人驰骋疆场，热血洒遍长城内外。从宋太祖至宋英宗，百余年间，杨家将身经百战，功勋赫赫，朝野感泣。尤其在晋、冀两省长城一线，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地名以杨六郎之名命名，如“六郎塞”、“六郎城”等。后来，在元代至元十六年（公元 1279 年）时，杨业的第十四世孙杨山与杨友在今代县鹿蹄涧建杨忠武祠。时杨山与杨友分别以坚代（指坚州与代州，今山西繁峙与代县）永定军节度同知和坚代永定军节度使的职务仍然镇守在内长城边关一线。这可能是从北宋初时就永久定居在今代县一带的杨业的一部分后裔。杨友与杨

[①]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9303 页。

[①]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9308 页。

山兄弟二人的墓葬即在距鹿蹄涧村数公里的繁峙县雁头村（古时曾称晏头村），而有关鹿蹄涧的来历，清雍正十年（公元 1732 年）刊刻的《重修祠堂碑记》则描述了一个动人的传说。记曰：当时杨友和杨山镇守坚、代二州时，“政优而猎，逐一鹿不见，留蹄石上，遂聚族于坚西代东之间，因名其庄为鹿蹄涧”。这块碑记仍存于鹿蹄涧杨家祠堂中，鹿蹄石也存于祠堂后院正中。碑记中明确记载着鹿蹄涧村是杨业的后裔们聚族于此以后才形成的一个杨性居民点。与代县鹿蹄涧相呼应，其周围有关杨家将的传说及遗址甚多。如怀仁县的金沙滩古战场，代县枣林镇的杨七郎墓，峨口东南的木阁村（传说中穆桂英的娘家住地），五台山台怀镇北杨五郎落发为僧的太平兴国寺和五郎阅兵台，以及始建于宋代原本是杨家家庙而后来改建的龙泉寺（寺附近东北坡上今仍有人们称为“令公塔”的杨业墓塔，传说杨业蒙难于陈家谷后，杨五郎后来寻回父骨遂葬于此，并建祠祭祀）等等。杨家将在历史上所留下来的这许多遗址及其历史文物，业已成为晋东北地区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

本世纪 50 年代末以前，山西境内的古墓葬大多保存完好，特别是其中许多历史名人的墓葬尤其如此。在这些历史名人的祠墓处见到的大都是松柏葱郁，碑石林立。而在 50 年代末之后，除了在此之前已经引起国家文物部门高度重视的一些名人祠墓，或者是祠墓所在地居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较为强烈者外，大多被毁坏。陵墓封土被平，松柏虽有数百年或千年之久也遭砍伐，更多的是那些极有文献价值的古代碑碣，竟被统统砸碎，或被作为烧制石灰的材料，或被粉碎做石子供修公路之用。而越是在这样一种情态之下，对于那些幸存于今日的部分历史名人祠墓，也就越是感到其无比珍贵而应倍加珍惜。除了以上我们所举的那些事例外，目前山西境内仍然较完整保存并有一定典型色彩的历史名人祠墓，则还可选择性地举出如下一部分来。

猗顿墓——位于今临猗县（该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临晋县和猗氏县合并而成）涑水南岸牛杜镇王寮村，有较大规模陵园，陵园四周又有砌筑围墙。陵园始建年代不详，但墓尚占，墓前存“猗顿墓”古碑一通，又有历代重修陵园碑记与猗顿德行碑，现存陵园建筑为清咸丰年间（公元 1851—1861 年）重修之物。猗顿，本为战国时期鲁国贫士，因向陶朱公范蠡请教致富方法，遂来到古晋之地经营畜牧，最后在涑水河畔定居，成为天下巨富。西汉置县时县以“猗氏”命名，即因猗顿居地之故。传猗顿身后留有三子，分别叫做王寮、王景、王鉴。现临猗县有王寮、王景、王鉴三自然村，即当年猗顿三子及其后代所居村落。

晋文公墓——即重耳墓。位于今绛县卫庄乡下村西岭。重耳，晋献公诡诸第 2 个儿子。献公错杀太子申生激起晋国内乱后，重耳流亡国外 19 年，后复返晋国成为晋国国君，继齐桓公之后称霸，先制秦而后伐齐败楚，成为春秋五霸中最有声名者。晋文公在位 9 年，鲁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 628 年）夏四月卒，葬子绛山东麓，墓因地形而起，高 30 余米，状若山丘。据民间

传说，陵丘所有封土皆运自曲沃城北太子滩。墓后有祠，墓周松柏成林，皆毁于抗日战争中日军之手。本世纪 50 年代初，晋文公陵园重新绿化，现已槐荫葱郁，秀蔚不减当年。有明刻“晋文公墓”石碑存于墓前。该墓在 1962 年时，已被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好问墓——位于忻州市南 5 公里处韩岩村。元好问，金元之际著名诗人。蒙古蒙歌汗七年（公元 1257 年）九月诗人卒于河北获鹿旅途之中，遂归葬于故里祖宗先茔。现存元墓为清乾隆六十年（公元 1795 年）重修。陵园为山屏水环，有村舍毗邻。红墙四围中，高堂错落，碑蝎井然。高达丈余的诗人墓冢之上生古榆一株，虬劲盘曲，参天而立。冢前墓碑由诗人当年亲传弟子魏初、姜彧所立。元好问陵园中又有著名的“野史亭”，亭最初传由诗人亲自设计构筑，然已毁于沧桑，今亭是乾隆年间重修元墓时所新构。诗人之墓又称“五花坟”。自诗人辞世后， 700 余年来，至此瞻仰吊唁者络绎不绝，今已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司马光祠墓——位于夏县城西 12.5 公里处鸣条岗上，与魏禹王城毗邻。司马光，我国北宋时杰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其史著《资治通鉴》在我国的历史经典文献中如一座丰碑，占有重要地位。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 1086 年）九月，司马光卒于都城汴京。史曰：“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①]不久，即归葬故里祖茔。司马光祖茔及祠宇总面积约 3 万余平方米。大小共 13 处墓冢，分别 葬司马光父子及其曾祖、祖父、父亲、叔父等。陵园内余庆寺及司马家族祠始建于北宋治平二年（公元 1065 年）。司马光辞世后，后改家族祠为司马温公祠，并于清乾隆年间将祠迁至余庆寺与墓冢之间。

司马光祠墓陵园中最享名声者为“杏花碑”。碑额由宋哲宗元祐三年（公元 1088 年）御题，碑文则由苏东坡奉旨撰文并书写。此碑作为御题神道碑，原竖立于司马光墓前，宋哲宗绍圣年间（公元 1094—1098 年），该碑被司马光的政敌章京、蔡卞等派人推倒断为数截。遂掘地深埋。金皇统八年（公元 1148 年），当时的夏县县令王廷直命将此碑挖出复原再立，并从民间找回原碑碑文拓片，重新摹刻。这时从倒碑时算起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埋碑的地方竟长起了一株茁壮茂盛的杏树，故再立的新碑就有了“杏花碑”这个名字。 1988 年 1 月 13 日由国务院公布，司马光祠墓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郭林宗故里及其墓葬——郭泰，号曰“有道”，字林宗。我国东汉末年著名思想家。其故里位于今介休市郭家村。传说北关华严寺即其故宅遗址。林宗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公元 127 年），家世贫贱，父亲早逝。母亲曾想让他到县衙中混点差事，林宗却回答：大丈夫怎么能满足于做那样的平庸

[①]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0769 页。

差使呢？后求学于河南成皋屈伯彦门下，三年结业即博通《三坟》、《五典》，[1]并知音律善谈论。林宗初游京都洛阳即结交当时名重一时的名士李膺，被李推崇备至，誉为天下楷模。于是林宗声名轰动一时。《后汉书》，说他离开洛阳，“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2]可见其影响之大。林宗归乡后虽对当时朝政有明确见解，但他视仕途利禄如浮云，朝廷屡次召举均谢绝不就，一心聚徒讲学，得弟子数千人。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林宗卒于乡里，时年 41 岁，士人学子为其送葬者多达上千人。东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为他撰写墓碑，认为自己生平为他人撰写碑铭很多，但常有敷衍虚饰之辞，唯对林宗之碑可称文符其实，感到毫不愧色。林宗之墓现在介休市东门外，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杨深秀墓——位于闻喜县仪张村南，距大运（大同至运城）公路约百米。杨深秀，清道光二十九年（公元 1849 年）生于闻喜县仪张村，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21 岁时中举赴京任职，在北京晋籍士子中颇见声名。光绪八年（公元 1882 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奏请朝廷批准设立山西通志局，遂受聘返省任通志分纂。 10 年后（光绪十八年，即公元 1892 年）《山西通志》全稿完成，深秀负责编成其中《星度谱》两卷与《古迹考》八卷，尤见学问功力。这期间，深秀兼在太原崇德书院和令德堂讲学。光绪十五年（公元 1889 年）得中进士，遂补为刑部郎中，继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他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绪皇帝上《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奏疏，这也是他加入清末维新变法改革运动之前，最初阐明自己政治主见的公开举动。光绪二十四年（公元 1898 年），杨深秀终于成为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最坚强的中坚力量，及至农历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及其党羽发动政变，大肆逮捕镇压变法志士的前一天，他仍然痴心不改并继续上疏，期望改革获得成功。而政变当日京城上下已经是一片腥风血雨，康有为、梁启超等均已避入日本驻华公使馆并随之乘海轮远走日本，此时“举朝惴慄，深秀独不避艰危，”且公开诘问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被废黜的原因，以激烈的言辞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当有人告诉他逮捕他的人马上就到门上时，他不但无任何畏惧，反而安坐于室继续与友人谈笑，并从容向其子杨韨田晓以大义，叮嘱后事。深秀入狱后，面对顽固派的凶恶气焰仍旧坚贞不屈，于四五日内连续留题诗词 10 余首，抒发其维新图强的爱国壮志。此年八月十三日杨深秀与其他 5 位变法志士同时被害于北京菜市口，因斯年干支纪年为戊戌，故被国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深秀被害后旋即草草葬于北京。直到 12 年后的清宣统二年（公元 1910 年），朝廷方下诏“诏先朝党事被祸诸臣听归葬”，[1]其遗体始归原籍。灵柩被运回张仪村故里后，又在该村关庙内搁置达 16 年之久，直到民国 15 年

---

[1] 传说中我国上古时代最古老的书籍。

[2] 《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225 页。

[1]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118 页。

（公元 1926 年）才被安葬。其陵园面积约亩许，四周原筑土墙，墓椁用砖砌筑，以青石装顶。近年国家文物部门对原墓封土重新修整，并镌刻墓碑立于墓前。因墓地与公路近在咫尺，来往行人于此瞻仰吊唁者日众。深秀一生博通经史，尤爱书法绘画与诗词，均有传世之作。戊戌变法的幸存者梁启超先生曾称誉杨深秀为“山西儒宗”，并在其《戊戌政变记》中赞扬深秀在变法维新活动中“上书言定国是，废科举，译日本书，派亲王游历外国，遗留学生留学日本等事，所条陈新政最多”。近一个多世纪的山西近现代著名人物中，杨深秀堪称为最有爱国气节与最应该永久纪念的仁人志士之一。

在山西历代历史名人中，还有一些也都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他们的故居、祠宇和陵墓。例如被称为明初硬骨头清官和程朱理学河东学派代表人物的薛瑄的祠堂与墓葬（包括其祖茔），清末为治理黄河中下游水患而立下丰功伟绩的著名水利工程专家栗毓美的墓葬及其附属石刻文物，绛县与襄汾县一带的晋大公墓群（包括晋献公诡诸墓、晋襄公墓、晋灵公墓等），闻喜裴氏家族中裴行俭墓、裴光庭墓及其附属石刻文物，祁县修善村保存的东汉末年以铲除董卓而闻名于世的王允之墓，榆社县赵王村附近的石勒墓，灵丘县城西约 1 公里处的赵武灵王墓，河津市唐代名将薛仁贵故里修仁村中传说当年薛仁贵与其妻柳氏住过的寒窑，和永济市唐末著名诗歌理论家司空图墓葬，等等。特别是像在闻喜县的埠底村和仪张村，竟能分别保留了南宋名相赵鼎和清末维新志士杨深秀的部分故居，显得至为珍贵。

在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故里所属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议。例如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究竟是河北祁州伍仁村人还是山西解州人的问题（生于元仁宗延祐元年即公元 1314 年的元代人朱右在其所撰的《元史补遗》中肯定关汉卿为山西解州人）；西汉被称为太史公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究竟是陕西韩城人还是山西河津人（两地仅一河之隔）的问题；元末写过《三国演义》的著名小说作家罗贯中，究竟是山西太原人还是山东东平人（明初《录鬼簿续编》一书明确记载罗贯中为太原人，其作者与罗贯中曾是忘年之交）的问题等等，目前仍是有待破解的历史文化之谜。

历史上常常有将著名人物的籍贯给予穿凿附会、强拉硬扯的事情出现，尤其在一些地方方志中更属屡见不鲜。然而，却也不能简单看待这一问题。如唐代的柳宗元和白居易，他们俩人的行迹与故居一在广西柳州，另一在河南洛阳，可以说已是妇孺尽知与极易考察发现的事实，但是偏偏在他们的祖籍之地山西省内，却难于寻觅有他们行迹遗存的地方来。同样，也有一些历史名人虽然其祖籍故里属于其他省区，而在山西境内却保留着他们的墓葬、故居或行迹标志物。对此，也不能更不应该采取断然否决的简单方法。如西汉开国名将周勃，他的祖居之地应该在今天的江苏沛县一带，但他后来却被封为绛侯，在今天山西曲沃县城东北约 12.5 公里处的周庄，即有周勃之墓，据说周庄的命名也因此而来。又如唐德宗时期被封为北平王和担任过晋绛慈隰（相当于今山西临汾、吕梁、运城三地区部分地县）节度使的名将马燧，

他的家乡在今河南郊县，但是他的一生中有大约一半以上的时间在山西，唐贞元十二年（公元 796 年）病卒后不但被葬于山西猗氏（今临猗县城）城北，而且又被谥“庄武王”并建了诺大规模的大唐庄武王庙，或称北平王祠。北宋时司马光有《过北平王祠》诗。曰：“唐相灵祠古到今，庭前槐柏绿成荫。昔时图像谁通妙？难状筹谋为国心。”据知在河南郏县马燧故里也有马燧墓，但却是衣冠冢。再如清光绪年间曾任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并因反对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而被革职的阎敬铭，这位名重一时的清末名士本是陕西朝邑县人，但他被革职后却定居山西虞乡附近的王官峪口，并与其子在此建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王官别墅”。该别墅建筑精巧，布局考究，至今仍基本保存着始建时的原来形式。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时，路经此地曾在王官别墅中居住过。当时阎敬铭已经去世 8 年，慈禧太后为他的后人们特意题写了“岁岁平安”的匾额。所有这些虽非三晋名人，但在山西确有行迹，而且征之有据。然而，确实还有许多显然在山西这块古老土地上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但至今一直不能使人昭然的名人行址或墓葬，构成了山西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如周以前酿酒家杜康本河南汝阳人，东汉造纸家蔡伦本湖南耒阳人，东周神医扁鹊本河北任丘人，但在今天山西省境内的运城市老杜村则发现了杜康墓和杜康故里碑（清咸丰八年即公元 1858 年刊立），在同一市的王范村附近发现了蔡伦墓，在永济市清华镇村外发现了扁鹊墓。甚至在杜康墓地和扁鹊墓地都分别发现了经有关专家鉴定有汉雕风格的一尊石虎及一对石羊。扁鹊墓前现存的墓碑为北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 1107 年）三月刊立，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几处扁鹊墓地中年代最古的一处。《史记》一书中曾记述：“当晋昭公时，诸大夫强而公族弱，赵简子为大夫，专国事。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于是召扁鹊。扁鹊入视病……七日而寤。”又，“其后扁鹊过虢。虢太子死，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太子起坐。但服汤二旬而复故。故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①]从这些记载看，扁鹊到过山西南部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特别是扁鹊入虢事，似更可说明问题。春秋时曾有著名的“唇亡齿寒”的历史典故，讲的即是晋献公向虞国借路去打虢国的事情。虞国与虢国在地理上唇齿相依，今天永济市的清华镇正当虞国地域，虢国则在东南不远今平陆县界。虞、虢两个小国后来均被晋献公所灭。关于扁鹊之死，《史记》中讲那是入秦后的事情。扁鹊到了秦国，秦国当时的太医令李醯自知医术不如扁鹊高明，于是就暗暗派人把扁鹊刺死于秦国。扁鹊死后，据说各诸侯国均很震惊，特别是三晋大地更甚。当时扁鹊老家的人找到了扁鹊尸体的躯干，所以河北任丘有扁鹊墓；而古虞地的人们则在秦国找到了扁鹊的头颅，故而今山西永济也有了扁鹊墓。永济市清华镇扁鹊墓旁又有扁鹊祠。祠甚古，始建年代不详，仅存明清两代重修碑刻。

[①]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786—2792 页。

蔡伦，东汉明帝永平末年（公元 75 年）时即已在宫廷中，历经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 5 朝。蔡伦发明纸当在汉和帝时期（公元 89～105 年），时称“蔡侯纸”。《后汉书》称汉安帝继位后因宋贵人事贬蔡伦，蔡伦不堪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国除”。[①]也就是说，蔡伦是从容自杀而死的。湖南省耒阳县蔡伦故里有蔡伦墓，但属衣冠冢，且规模很小。与湖南蔡墓相比，运城市王范村的蔡伦墓规模显然宏伟得多。墓的封土高 3 米，长 16 米，宽 11 米。现王范村口有一高达 7 米的碑楼，碑上刻有“汉龙亭侯造纸蔡伦墓”9 字；在通往墓地的路上有一条大沟，沟内又有一碑，上刻“蔡伦沟”3 字；至墓地，墓前还有一座碑楼，高 2.4 米，碑上刻着“汉尚方令蔡侯讳伦字敬仲墓”12 个大字。这些碑刻属清嘉庆元年（公元 1796 年）重修蔡墓时所刻。从湖南耒阳蔡墓属衣冠冢一事分析，许多史学界的人士认为应对运城蔡墓给予重视，它有可能是蔡伦自杀后真的葬身之处。蔡墓为什么会到当时的河东郡安邑县（王范村旧属安邑）？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蔡伦最初本为宦官，受到净身阉割之辱，后来又从龙亭侯突贬至廷尉，正像《后汉书》中所讲的“伦耻受辱”那样，他自杀时可能已有耻于归葬故里的意思（正像历来力主司马迁为今山西河津人一样，认为司马迁的墓葬之所以留在黄河以西的陕西韩城，也是同样原因）。另一个原因即蔡伦自杀后，既然受到了“国除”的严厉处分，则其安葬极有可能为民间或生前友好就近所为。当时的东汉都城洛阳离河东郡安邑之地近在一河之隔，仅 150 公里左右；然而，湖南耒阳距离洛阳就要远出数千里之外，即使有归葬之心恐也无此能力。

人类从蛮荒蒙昧阶段走入文明社会，标志着人类自身已经成为世间一切生态活动中的主体。人们一方面改造着自然界，另外一方面也在自然界中改造着自己。这种改造与被改造的物质遗存，便成为地球上的文化遗产。人类竭尽力量保存下来自己种族中那些杰出人物的故里（包括故居）和祠宇陵墓，或者类似的纪念物体，以使其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进而用以启示后来的人类，这恐怕就是名人故里与名人祠宇陵墓作为文化遗产的意义之所在。

山西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自古素称人杰地灵。上自“三皇五帝”下至维新共和，历代名人何止万千？以杰出历史人物的地域分布纵览华夏大地，山西则无愧为亘古以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极为显赫而且重要的文化区域。

[①] 《后汉书》，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514 页。

第三节　寺院·道观·庙宇

寺院、道观与中国传统祭祀庙宇（此处专指有皇家宫廷祭祀等级的大庙），事实上已经成为目前山西保留的文化遗产生态景观的主要构成部分。所以，近 20 年来到山西旅游的许多游客就有“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印象。尽管这种印象并没有真正完整地反映山西旅游的实际状况，但它却无意中反证了另外一种事实，那就是到山西的任何一个地区去旅游都会看到寺庙道观类的景观。国内外很多人将山西誉为“古建筑博物馆”或“地上博物馆”，也都同样道破了这样一种客观现实。我们在这里说的寺院、道观和庙宇从具体内容上讲，实际上它们分别属于佛教、道教和中国传统儒教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宗教建筑形式。其中佛寺目前在山西的遗存数量尤为众多，我们在此可轻而易举地列出山西现存的 100 座较知名的佛教寺院及其始建年代，还有它们所属的县市位置来。例如：

广胜寺，东汉，洪洞县；　　双塔寺，明代，太原市；
玄中寺，北魏，交城县；　　显通寺，东汉，五台山；
双林寺，北魏，平遥县；　　天宁寺，唐代，交城县；
南禅寺，唐代，五台县；　　岩山寺，金代，繁峙县；
回銮寺，隋唐，介休市；　　碧山寺，北魏，五台山；
金阁寺，唐代，五台山；　　觉山寺，北魏，灵丘县；
大云院，五代，平顺县；　　安国寺，唐代，离石市；
开化寺，五代，高平市；　　华严寺，辽代，大同市；
普救寺，北齐，永济市；　　悬空寺，北魏，浑源县；
崇善寺，唐代，太原市；　　善化寺，唐代，大同市；
崇福寺，唐代，朔州市；　　佛光寺，北魏，五台县；
镇国寺，五代，平遥县；　　小西天，明代，隰县；
观海寺，北魏，五台山；　　南山寺，元代，五台山；
青龙寺，唐代，稷山县；　　金灯寺，北周，平顺县；
青莲寺，北齐，晋城市；　　法兴寺，唐代，长子县；
原起寺，北宋，潞城县；　　净土寺，金代，应县；
慈云寺，唐代，天镇县；　　塔院寺，东汉，五台山；
游仙寺，北宋，高平市；　　洪福寺，北宋，定襄县；
罗睺寺，唐代，五台山；　　正觉寺，唐代，长治县；
宝梵寺，北宋，清徐县；　　定林寺，北宋，高平市；
海潮庵，明代，河曲县；　　资寿寺，唐代，灵石县；
龙泉寺，北宋，五台山；　　龙兴寺，唐代，新绛县；
万佛寺，明代，宁武县；　　永福寺，隋代，交城县；
净信寺，明代，太谷县；　　抱腹寺，北魏，介休市；

禅山寺，唐代，榆社县；　　大佛寺，北齐，太原市；
圣寿寺，北齐，太原市；　　佛宫寺，辽代，应县；
仙堂寺，东晋，襄垣县；　　圣寿寺，唐代，沁源县；
资圣寺，北宋，高平市；　　安禅寺，宋代，太谷县；
无边寺，西晋，太谷县；　　广济寺，元代，五台县；
光化寺，唐代，太谷县；　　龙门寺，北齐，平顺县；
崇安寺，隋代，陵川县；　　惠济寺，唐代，原平市；
金洞寺，北宋，忻州市；　　白胎寺，唐代，新绛县；
万固寺，北魏，永济市；　　香严寺，唐代，柳林县；
公主寺，北魏，繁峙县；　　三圣寺，唐代，繁峙县；
尊胜寺，唐代，五台县；　　卧佛寺，唐代，绛县；
楼烦寺，东晋，原平市；　　岱岳寺，金代，河曲县；
白云寺，明代，平遥县；　　石马寺，北魏，昔阳县；
福祥寺，五代，榆社县；　　太山寺，唐代，太原市；
云林寺，明代，阳高县；　　林泉寺，北宋，原平市；
海会寺，唐代，阳城县；　　崇寿寺，北魏，晋城市；
崇明寺，北宋，高平市；　　吉祥寺，唐代，陵川县；
圣天寿，晋代，沁水县；　　普净寺，元代，襄汾县；
永安寺，金代，浑源县；　　香岩寺，金代，清徐县；
宝宁寺，明代，右玉县；　　菩萨顶，北魏，五台山；
慈相寺，北朱，平遥县；　　法云寺，唐代，长治县；
千佛寺，唐代，古交市；　　铁佛寺，唐代，临汾市；
奉圣寺，唐代，太原市；　　多福寺，唐代，太原市；
观音堂，辽代，大同市；　　天台寺，北魏，代县；
珠像寺，唐代，五台山；　　观音堂，明代，长治市；
龙泉寺，唐代，长治县；　　白云寺，明代，太原市。

这 100 座基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古代佛寺中，目前有 16 座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 67 座属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全国各省市和自治区中，山西省是保存古代佛寺建筑原景遗产最多最集中、质量品位也最高的一个省区。何以山西能够出现这样丰厚的古代佛寺遗产呢？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一个原因，即山西古代建筑佛寺的历史较早，而且持续时间长，在数量上形成了一个较高的基数；其次一个原因，山西山地面积广阔，特别是历史上的山西山地森林植被好，河流泉瀑丰裕且气温凉爽宜人，为佛界僧人选定寺址先天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气氛与环境（这一点对道家似乎更为重要），也同样为其香火延续奠定了优良生态基础；第三个原因，山西因为有广袤的山地与森林，故采取建筑木料与石料相对便利，这也就是为什么山西古代寺院的 95%以上都有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重

修或重建历史的原因，因为有重修重建，古代佛寺也才有可能大量地遗存至今天。中国自古有一句名言，即“天下名山僧占多”。统览山西的佛寺建造历史，在北宋及五代以前，有相当多数量的寺院都选择在林水皆佳而且距离居民集中区较远的山地环境之中。到金元时期以后，许多市镇与人口稠密的大村庄中寺院迅速增多，到清代中叶时，有些上千人的村庄中，甚至有数座佛寺同时出现且香火都很兴旺的情况。五台山无疑是山西境内建造佛寺最早的地方之一，而且也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最早出现佛寺且佛寺最为集中的地方之一。如建在五台山中心位置台怀镇内的大显通寺。“古名大孚灵鹫寺。汉明帝时摩腾、法兰[①]西来，见此山，乃文殊住处，奏帝建寺，以山形若天竺之灵鹫，即以为名，加以‘大孚’二字。后魏孝文帝重葺，复置院十二，以拥护之……”这段记述见于光绪版的《山西通志》古迹卷，同类记述也见于古《清凉志》。从这些记载中可以了解到五台山佛寺的始建年代当与中国佛教史上最早兴建的第一座佛寺河南洛阳白马寺（公元 68 年建）属于同一个时间坐标。另外，从此我们还得以发现，最迟当在北魏孝文帝时（公元 471—499 年），五台山就已经形成了寺院群落。除了五台山的大显通寺之外，我们目前已知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 58—75 年）的寺院，在山西境内起码还有襄汾县北柴村凉马寺，长治县西原村延福寺，大同市北寺，榆社县大同寺等四座。这些寺院可以称作山西省最早出现的寺院，也完全可以称作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批佛教寺院。在山西省境内，历史上最早在一小小的地理范围内出现佛寺群落的可能并不是五台山，而是山西中南部的霍山南麓地区，亦即今天洪洞县的广胜寺一带。在这里，至少是在东汉桓帝刘志登基后的头三年（东汉建和年间，即公元 147—149 年），就出现了普济寺、广胜寺、慈云寺等佛寺。山西省始建于东汉时期的佛寺，目前已知的还有榆次源涡村永寿寺、介休铁瓦寺、垣曲兴国寺和河津畅村的大觉寺，太原市西缉虎营普光寺和王郭村明秀寺等，但除了像五台山显通寺、洪洞广胜寺这样一些经过历代重修较为完整保留下来的少数早期名刹之外，多数早已湮没无迹或仅知遗址而已。

关于五台山的文化积淀与生态形势，从汉魏以至明清，讲得最简练而又精彩纷呈的莫过于清代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一段文字。是曰：

> 朕惟清凉山，古称文殊大士演教之区也。兹山耸峙于雁门云中之表，接恒岳而俯滹沱，横临朔塞，藩屏京畿。其地风劲而高寒，层冰结于阴岩，积雪留于炎夏，故名清凉。然地虽寒，而嘉木芳草，蒙茸山谷，称灵异焉。五峰竦立，上矗霄汉，日月之所回环，烟霞之所亏蔽，苍然深秀，其为神皋奥区，盖自昔而已然矣。是以自汉迄今，历代皆有崇建，古刹精蓝，遍满岩岫。宇内称灵山佛土，最著者有三：峨眉、普陀，而五台为尤盛焉。[①]

[①] 皆公元 1 世纪时的印度高僧。

[①] 《清凉山新志·序》，清康熙四十年（公元 1701 年）版。

五台山从北魏开始形成大的佛寺群落，虽然 1500 余年来它一直都堪称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享盛誉而且规模最大的佛教圣地和佛教文化中心之一，但是其间也确实出现过几次时间尽管短暂然而影响却很巨大的毁灭性破坏。有资料表明，到北齐高洋时代（公元 550—560 年）时，五台山的佛寺总数已经达到 200 座左右，甚至到了“割八州租税以充香火之需”[①]的程度。而仅仅一年未满到北周武帝宇文邕时代（公元 561—578 年）后，在其毁寺灭佛的严厉敕令下，五台山的佛寺几乎悉数被毁，而且强行让僧众全部还俗。北周静帝大定元年（公元 581 年）隋国公杨坚取北周而代之，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这个隋文帝不但出生在冯翊郡一座叫做般若寺的佛寺内，而且从小即由来自河东郡（今山西运城地区）的一位尼姑抚养长大。所以，他一拥有了天下，即下诏书在五台山的“五顶各置寺一所，设文殊像，各度僧三人，令事焚修”。这是五台山佛寺建造史上首开在五个台顶上建构佛寺的空前之举。不仅如此，到隋开皇十三年（公元 593 年）冬天时，隋文帝又遣亲使到五台山设斋礼佛，而且亲草疏书口诛笔伐北周武帝宇文邕。疏曰：“大隋皇帝佛弟子坚，敬白文殊大士。周武乱常，侮灭圣迹，致愚者无以开迷，智者无以入圣。朕往植善因，寄兹昌祚，起废兴残……”[②]从此可知，在隋文帝时五台山一定有过大规模建造佛寺的活动。唐代初期至中唐安史之乱发生之前，五台山的佛寺建造活动曾达到过鼎盛阶段。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五台山者，文殊闕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③]到武则天时，它不但敕命重建五台山清凉寺，而且敕封该寺的住持和尚感法师为掌管大唐佛事活动的最高长官。五台山寺僧的地位在当时国内佛教界达到了至高无比的境地，台内的佛寺数量竟多达 360 余座，是五台山佛寺建造史上数量最多的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以一座名山计算佛寺最集中数量最高的地方与时代。与此同时，五台山的固定居住僧人这一时期也达到了万人以上。甘肃敦煌莫高窟第 61 窟中至今完好保存着一幅唐末刻造的石刻《五台山图》，它真实地记录了唐代五台山佛寺发展到鼎盛阶段时的壮丽情景。唐武宗李炎会昌年间（公元 841—846 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又一次大规模的毁寺灭佛事件，前后时间尽管只不过 5 年多的时间，但影响甚大，五台山在此次大劫难中佛寺被毁者十之七八。此后，从唐末五代直至宋初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到宋、元、明、清几代虽时有复兴之举，但五台山寺院的规模与数量却终未再能恢复到唐时情形。在此，有一点是需要特别给予记叙的，那就是五台山佛寺群落在清代初年时，尤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复兴与建设尤为显著。清初诸帝对五台山的重视从某种角度去看，有时并不亚于当时对承德避

---

① ［明］《清凉志·帝王崇建》。

② 《清凉山志·帝王崇建卷》，五台山显通寺 1985 年再版。

③ 《山西通志·寺观卷》，清雍正版。

暑山庄的重视程度。据清廷大档记载，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曾 5 次巡礼于五台山，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则 6 次驻跸清凉圣境。康、雍、乾三位清帝巡游五台山后所留下的诗作共多达百余首，这是其他几处佛教名山所不能比及的。

清初诸帝为什么对五台山这样钟情？过去许多民间传闻认为这和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出家到五台山当和尚有关，而其实并非如此。一些历史学家近年来经过多方面考证与研究，认为清初诸帝的看重于五台山，当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附近耗费巨资建造“外八庙”（皆佛教寺院）一样，其目的是为了利用宗教与蒙、藏地区的政教首领建立联系，以巩固清朝政府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与统一。又如康熙皇帝 5 次到五台山，其身边就都带着蒙古诸王，其真正用意就在于倚借五台山的佛教积淀以柔服或融合蒙、藏地区当时的上层统治者。五台山虽然在元代或再早一些时候就已有了藏传佛教的先声，然而，在五台山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真正大规模融合共处并形成相当声势，则是在有清以后的 200 年时间中。关于清初诸帝看重五台山的第二个原因，当是“曼殊”与“满州”辞音相谐所形成的一种巧合。乾隆五十一年（公元 1786 年）三月上旬，乾隆皇帝以 75 岁的高龄第五次君临五台山，曾写过一首题曰《至灵鹫峰文殊寺即事成句》的七言律诗（此诗用汉、满、蒙、藏 4 种文字镌刻于汉白玉质地的四方碑石上，该碑现存于五台山菩萨顶大文殊院东院）。诗中末两句为：“曼殊师利寿无量，宝号贞符我国家。”诗后，乾隆皇帝加了自注。注释说：“曼殊对音即满州。今卫藏呈进丹书均称曼殊师利大皇帝。竺兰宝号与我朝国号相符，用征亿万年无量福祚也。”原来，“文殊”又称“曼殊”，发音与清王朝入关前的起兵发祥之地“满州”二字几近相同。清帝将这种纯属巧合的事情看作天降祥瑞于大清，而这种祥瑞可能预兆着大清江山会像文殊菩萨的无量功德一样，标志着满清将有亿万年的福祉而可延续不尽。显然，清廷在这里已经把文殊菩萨认作为大清的祖宗化身，公开把文殊和皇帝拉扯重叠在一起。民间传说五台山佛寺在清以后重修重建的过程中之所以用材与形制常常采用宫殿样式，不避忌讳，大量使用红墙黄瓦或龙凤图案，均与顺治这位入关后的开国皇帝出家有关。看来，事实并不限于此，而是更有深刻内容在内。到清末时，五台山作为国内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唯一融合共处的佛教名山，青庙与黄庙的总数已经达到了百余座的规模，黄庙（即藏传佛教的喇嘛庙）占到了其中的 1/4 左右。满、蒙、藏地区僧侣，每年不远数千里徒步跋涉到五台山朝山进香者四季不绝，接踵而至。甚至有内外蒙古王公，“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诚贡献”[①]于五台诸寺。有的蒙、藏民族的佛教徒朝山时，当距离五台山中心台怀镇尚有 100 公里左右时，他们就一步一叩首地跪拜前行，一直坚持到所去五台山中心区域的塔院寺，然后首先朝拜塔院寺“五圣迹”

[①] 袁希涛：《游五台山记》，《东方杂志》第 17 卷，第 23 页。

（即佛舍利大白塔、刻有释迦牟尼佛足迹的佛足碑、文殊菩萨发塔、般若泉、杂花园遗址）。而在此之前，东亚、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印度尼西亚、日本、尼泊尔等）的僧侣朝奉五台山的历史，则可以一直追溯到历史上的唐宋时期。

作为我国古代近 2000 年时间积累遗留下来的最大的佛教文化遗产宝库，五台山不但在国内外至今仍享有盛誉，而且到目前为止还完好保留了一大批佛寺及其佛事文物。其中以古建筑、历代彩塑佛像、古壁画和古代名人题咏墨迹最享盛名。我国现存的四座唐代建筑物中，有两座即为五台山的佛寺建筑（佛光寺东大殿和南禅寺大殿），这也是我国现存距今时代最早的两座古建筑物实例。 1982 年 11 月 8 日，五台山被国务院公布为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佛寺及其附属文物则被分别公布为国家和省两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佛教自从 2000 多年前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后，随着佛寺建构的逐渐扩展和教徒的迅速增多，由魏晋以后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很多佛教派别。例如三论宗、华严宗、密宗、禅宗、净土宗、天台宗、曹洞宗和律宗、云门宗等。其中尤以供奉阿弥陀佛并主张持念佛号即可托生于西方净土的净土宗，在隋唐以后最具影响。到北宋以后，凡中国的其他佛教宗派，甚至到了几乎无不兼习净土教义的状态。由于其礼佛形式平易近人，所以又在中国甚至海外如日本等国的平民中得到广泛普及，成为后来中国拥有教徒最众的佛教宗派。

山西省交城县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 472 年）的玄中寺，作为佛教净土宗的创宗祖庭，是千百年来驰名于华夏大地甚或于东瀛之国的又一著名佛寺。玄中寺因建于交城县境内的石壁山，所以历史上又称其作“石壁玄中寺”。石壁山丛林浓郁，四季流泉，环境十分幽静可人，极符合佛禅教义中的“净土”之意境。玄中寺的知名由北魏高僧雁门（今山西代县）人昙鸾起。昙鸾少年入居五台山访佛听经，不久又剃度为僧。大约在其壮年后遂寻游南梁，曾见梁武帝，又访陶弘景，得陶所赠经书 10 卷。南梁大同二年（公元 536 年），昙鸾北归，途中在洛阳遇到当时的名僧菩提流支。菩提流支对他说仙经中没有不死之法，虽可长生，但生死轮回则是无法避免的。这对昙鸾专心致志于弘扬净土起了决定性作用。昙鸾北归后先住并州大寺（今晋祠东 1 公里），随后又移住于交城石壁山玄中寺。十数年间，昙鸾在北方获得极大声誉，时称“神鸾”。昙鸾在玄中寺中注释撰写了《净土论》（后改名为《往生论》）、《净土十二偈》、《调气论》、《略论安乐净土义》等佛学净土宗的理论著作。由此玄中寺远近闻名。昙鸾于东魏兴和四年（公元 542 年）圆寂，安葬于距离石壁山不远的文峪河入汾河口附近。昙鸾圆寂后 20 年，即北齐河清元年（公元 562 年），另一位在净土宗教派史上卓有成就的大师道绰诞生于玄中寺西南 10 数公里处的并州文水县。道绰年轻时初师并州高僧慧赞，后改信净土遂移居玄中寺。由于他 30 年如一日布

化净土教义专心不二，在北方赢得广大信徒。当时一些仰慕道绰的僧侣曾留下许多记述，说向往道绰的僧俗之众常常满山遍野地来到玄中寺所在的石壁山谷，其口念佛号的“阿弥陀佛”之声震彻林谷山壑，往往撼动人心。道绰圆寂于唐贞观十九年（公元 645 年），在玄中寺的扩建与净土宗教义在民间的普及方面，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德。道绰生前留有系统阐述净土教义教理的重要教典《安乐集》2 卷，对后来净土宗的发展产生过重大作用。道绰大师圆寂前 5 年的时候，玄中寺内又来了一位 29 岁的年轻僧侣善导，他是敬仰 道绰专程米拜谒投靠净土教派的。善导在玄中寺师从道绰 5 年，虽然时间不长，但深得净土真谛。道绰圆寂后善导即往京城长安诸寺布教说法，不久即引起轰动。善导在弘扬净土教义方面所做的事情，均都是净土宗形成初期并走向成熟阶段时空前绝后之举。例如他到长安后主持缮写《弥陀经》经卷 10 万卷，绘制了 300 壁之多的净土变相彩绘壁画。而最为后世称道并为妇孺皆知者，就是他还主持了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工程并随后建造了著名的净土佛寺奉先寺。作为净土宗的一代宗师，善导在佛学著述方面更是颇具成就，他一生留下的有关著作达到了 5 部 9 卷之多。唐高宗永隆二年（公元 681 年）善导圆寂，时人称誉他为“弥陀化身”和“肉身菩萨”。佛教界将交城石壁玄中寺作为净土宗的开宗祖庭，而实际从宋代以来，玄中寺则把昙鸾、道绰和善导尊为玄中佛门的三大祖师。在玄中寺建成后的 1500 余年时间中，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位皇帝亲至于此，一位是唐太宗李世民，另一位是金章宗完颜璟。唐太宗来玄中寺是唐贞观九年（公元 635 年），他是因为给他的母亲文德皇后祈福去病才到玄中寺的。事后，玄中寺即成为皇家“宫寺”，这一阶段，寺内曾有过大规模的扩建工程。到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 793 年）时，玄中寺耗资巨大建立佛门戒坛。唐元和八年（公元 813 年）时，曾做皇太子侍读的李逢吉为玄中寺撰《唐石壁寺甘露义坛碑记》。时玄中寺戒坛已成为中唐以来全国三大戒坛之一。其他两坛为上都长安青龙寺灵盛坛和东都洛阳登封会善寺会善坛，玄中寺的甘露义坛是为唐北都并州之坛。此时的玄中寺已至鼎盛之极的时候。金章宗完颜璟来玄中寺的时间是金泰和七年（公元 1207 年）九月金秋时节，他的诗作中曾把玄中寺比喻为“金色界中兜率宫，碧莲花里梵王宫”，这使得当时住持玄中寺的高僧万松行秀万分荣幸，当时也写了《迎驾》诗一首以为奉承之作。

早在唐宋之际时，中国净土宗诸大师如昙鸾、善导撰著的许多教典就已通过当时日本的遣唐僧介绍到了日本。公元 12 世纪时日本净土宗先驱法然就曾据善导大师的《观无量寿经疏》等著作的教义，开始了日本净土教派最初的活动。法然弘扬净土十分虔诚至信。一次，他在梦中梦见中国唐朝时的善导大师造访于他。梦醒后，他立即请画师将梦中的情景绘制成图像，这就是经过 800 余年后被日本数千万净土宗信徒视若“国宝”的那幅所谓“二祖对面”的祖师圣像。有资料表明，目前在日本的净土宗信徒虽然其内部派系多达 20 余个，但无论哪一个派系都将中国的玄中寺尊奉为他们的祖庭，且

均把昙鸾、道绰和善导奉为祖师。到本世纪 80 年代中期时，仅“日本净土宗，净土真宗两大净土教派的寺院多达万余处，两大净土教派的信徒占到日本人口的 40%以上，有 4000 多万”。[①]1920 年 12 月时，日本近代净土宗高僧常盘大定首次寻访玄中寺后，激动万分之余，吟出了这样发自肺腑的诗句：

石壁山深一径通，幽溪穷处是玄中；
鸥啼月蚀空广夜，赞仰鸾绰二祖凤。

到 1942 年时，正值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侵略的非常形势，常盘大定高僧与另外一位日本净土大师营原惠庆又率领着一个日本佛教徒团体，再一次来玄中寺，与中国的佛教徒共同为昙鸾大师圆寂 1400 周年举行了纪念法会暨玄中寺奉赞大法会。法会之后，营原惠庆长老回日本时将玄中寺刚成熟的红枣种子带到日本静冈县，等种子发芽出土后他又把幼苗移栽于东京他所住持的净土宗佛寺运行寺中，遂又郑重将运行寺改名为“枣寺”。他又请日本著名画家横山大观为枣树作画，并请常盘大定高僧为枣画题偈，画跋由他自己写定。跋称“虽是小树，象征日中佛教之友好关系。它年枝叶繁茂时，日中佛教徒之传统友谊，必当增深累厚，愿刮目以待之。”1955 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率团访问日本东京枣寺，以“玄中一脉”四字为该寺题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营原惠庆长老曾 3 次拜谒于净土宗祖庭玄中寺。更为感人的是， 1982 年 2 月 20 日他圆寂之前，他一再地叮嘱他的子女，希望能在他圆寂之后将他的部分灵骨送归玄中祖庭。这一遗愿在第二年即得以实现，赵朴初会长亲自陪同菅原惠庆的儿子菅原钧，将其灵骨于 1983 年 3 月 31 日隆重安放于玄中寺的往生堂里，并同时于此举办了庄严法会活动。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 1900 余年的历史过程中，山西这块土地上曾经涌现过一大批杰出的佛事活动家甚至是在世界佛教史上也享有盛誉的著名高僧或佛学家。除了以上提到的昙鸾和道绰（善导虽师承玄中祖庭，但其祖籍在山东淄博）两位大师外，最著名的还有同为雁门（今代县）人的东晋佛教领袖慧远（公元 334—416 年），曾经用 15 年时间远行 30 余国的东晋著名高僧和翻译家法显（公元 334—420 年，今山西襄垣县人），唐时师从长安大慈恩寺玄奘法师并被当时人誉为“百本论师”（因其佛学论著多达百部，故称）的朔州高僧窥基，中唐在寿阳方山隐居写出《华严论》的枣柏大师（即李通玄），明万历时主持建造了太原双塔寺和宁武万佛洞等佛寺与石窟的高僧妙峰，等等。这其中又以东晋时的法显与慧远最为著名。法显首开中国僧人远游西域、南亚和美洲的纪录，并写下了亲身经历的《佛国记》，比后来

[①] 宋沙荫、简声援：《净土古刹玄中寺》，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s 年版，第 50 页。

唐初玄奘的西域之行还要早出 300 年左右。法显在西域影响巨大，直到今天在斯里兰卡还保存着他当年住过的寺院遗址，当地人至今仍把来访的中国人呼作“法显”。据知，今天的山西襄垣县即为法显的家乡，襄垣县仙堂山中的仙堂寺则为法显初为僧侣时的佛寺。雁门人慧远出家后居住庐山东林寺，翻译佛经达数十年，而且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著述，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宗派酝酿期最知名的高僧之一，也是净土宗理论的先导与教义奠基者。宋以后佛学界将他尊为净土宗的远祖，名望儿与法显等高僧相等观。山西从两晋至隋唐三四百年间佛教几度出现高潮，佛寺建造极为兴盛，不能不说这与山西拥有许多声名赫赫的高僧大师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世纪 80 年代中期经过重建后的永济普救寺，是山西众多著名佛寺中最具有文化传奇特色的一座。因为一部元稹的《会真记》传奇小说和依此改编的金元戏曲《西厢记》，不仅使它在华夏古国中妇孺皆知，家喻户晓，而且其声名也远播于异国他乡。有关普救寺的始建年代及其寺名最初形成的原委，在历代文人笔下或民间口碑之中曾有过形形色色的说法。如清乾隆十九年（公元 1754 年）版《蒲州府志》就记述说，普救寺在唐代时还叫西永清院，只是到五代时后汉小朝廷派郭威讨伐蒲州城中的李守贞，攻打了一年时间城也未破，郭威问城外西永清院中的和尚为什么一年都攻不破此城，和尚回答说将军你要发善心，城就会破，郭威立即折箭为誓，果然第二天城就破了，郭威依誓言不杀城中一人，唐时的西永清院于是即改名为“普救寺”。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让任何人听了都会很受感动的故事。之所以千百年来它感动了无数人，而且使很多人都相信了这可能就是真实的历史事实，那是因为，这故事讲出了住在这个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军事要镇地方的人民害怕战争祈求和平的心声和理想，人们编出这个充满了美好愿望的故事，其根本目的可能旨在感动后来的攻城人。然而，这却无意之中将普救寺的得名推迟了起码 400 年的时间。殊不知早在唐代初期一位叫做道宣的僧人所编著的《续高僧传》中，对普救寺就已经有了明白无误的记载。他说：“沙门宝澄，隋初于普救寺创营大像百丈。”可见在隋初时普救寺即已存在，且名称已为“普救寺”无疑。至于隋唐时普救寺的规模形势，又说：“其寺蒲坂之阳，高爽华博，东临州里，南望河山，像设三层，岩廊四合，上坊下院，赫奕相临，园硊田蔬，周环俯就……”[①]足可见普救寺在隋唐时已有相当规模。 1985 年秋至 1986 年夏，山西省古建筑研究所在重建普救寺时，为了寻求到复建的依据，遂对历史上遗存下来的普救寺遗址进行了全面的实地发掘。发掘中发现了三尊 2.5 米以上的完整石雕佛像和一躯高 0.7 米，宽 0.55 米的残存石佛头部部分（以此比例推算，此尊石佛的全高应在 5 米左右）等。发掘者认为：“各像体形健美，眉目端庄，螺髻、高鼻粱，两肩显平，腹部隆起，宽衣博带，手印古雅，衣纹挺拔劲健，刀工豪放有力，造型风格为北齐至隋

---

① 《大正藏经》第 57 册，藏经书院版，第 395 页。

初。”[1]以此推测，普救寺的始建应该是在南北朝时期，至少应在北齐或北周之间。更有人认为，从寺中舍利塔建在大佛殿前部的建筑形制看，该寺又有始建于东晋时期的可能。这样看，历来认为普救寺始建于唐代的记述都是靠不住的，而认为普救寺的得名是因为五代后汉时郭威攻城的故事而来，则更属于一种小说家言。

古时在蒲州一带佛寺甚多，如白石寺（即后来的万固寺），栖岩寺、大兴国寺、讚叹寺、竹溪寺、云盖寺、净土寺、延祚寺、广化寺、开元寺、华严寺、护国寺、仁寿寺、蒲津寺、崇福寺、救生寺、鹿苑寺等。其中像栖严寺、大兴国寺和白石寺，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名声和影响方面看，曾经都比普救寺要大一些。像大兴国寺，在北周时原名般若寺。《隋书》中所讲隋文帝杨坚出生的地方般若寺即此。所谓“有尼来自河东”，这个河东神尼据说叫做刘智山。她对隋文帝杨坚的母亲讲，说这个孩子生来即有灵异，不应该让他处在凡人俗世之间。所以隋文帝从生下起就由神尼刘智山领养于佛寺之中，这个佛寺亦即般若寺。后来的大兴国寺则是杨坚建立隋朝后由般若寺改成的。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隋文帝杨坚执政后对河东（即今山西运城地区一带）地方的佛寺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照与重视。他不但数次巡幸河东佛寺，将外国进贡的玛瑙盏布施于蒲州城外中条山上的栖岩寺，而且由此对河东一带的百姓民俗怀有极大的兴趣。他曾经感叹：“此间人物衣服鲜丽，容止娴雅，良由仁宦之乡，陶染成俗也。”[1]被称为“大历十才子”的中唐著名诗人卢纶，家乡故居本就在栖岩寺附近，他写栖岩寺的诗很多，其中就有一首叫做《栖岩寺隋文帝玛瑙盏歌》。诗曰：

天宫宝器隋朝物，锁在金函比金骨。
开函捧之光乃发，阿修罗王掌中月。
五云如拳轻复浓，昔曾噀酒今藏龙。
规形环影相透彻，乱雪繁花千万重。
可怜贞质无今古，可叹隋陵一抔土。
宫中艳女满宫春，得亲此宝能几人？
一留寒殿殿将坏，唯有幽光通隙尘。
山中老僧眉似雪，忍死相传保扃鐍。[2]

卢纶本人是见过这件玛瑙盏的。他见到此物时距离隋文帝将它布施给栖岩寺已经过去了 200 年左右。卢纶感叹玛瑙盏的精美质地和永恒。也感慨人生苦短和沧桑瞬变，更有感于人去物留与人不如物的生态变化规律的无情。从卢

---

[1] 柴泽俊：《普救寺原状考》，（文物季刊）1989 年第 1 期，第 44 页。

[1] 《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25 页。

[2] 《全唐诗》，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3150 页。

纶的时代到现在，时间又已向前推移了 1200 余年。 1200 余年后，不要说那件稀世之宝玛瑙盏已不知去向，原来偌大规模分为上中下三院的栖岩古刹竟也毁圮殆尽，所余仅剩隋仁寿二年（公元 602 年）敕立的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隋文帝玺诰将佛骨舍利分布于国内 80 州，此年十月十五日同时造塔），以及唐与五代以后的历代禅师塔等共 26 座，是为目前山西省内保存下来的古代佛寺塔林中规模较大的一处。

普救寺的知名于天下，当在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公元 779—831 年）《会真记》传奇小说问世以后。这篇传奇小说向人们描写介绍了一个张生寓居普救寺与崔莺莺邂逅相爱的美丽故事，故事从头至尾其情节均围绕普救寺这个特殊环境集中展开。根据历史遗址发掘后复建的普救寺大佛殿侧有一西轩，此即传说中张生所居处；大佛殿东侧隔墙又有小院落，人称梨花院，院中有正房与东、西厢房，西厢房即崔莺莺居处。元稹写的《会真记》中曾说“崔之东墙有杏花一株，攀援可逾；既望之夕，张因梯其树而逾焉，达于西厢”，即此。崔莺莺差使红娘送《明月三五夜》诗给张生，约其夜半相会。诗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①]莺莺小姐诗中所说“西厢”亦即此。唐宋以后，金代董解元和元代王实甫又据元稹《会真记》传奇小说写出了形式风格各异的戏曲作品，均以《西厢记》命题。1986 年重建普救寺前的考古发掘证明，“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和元王实甫《西厢记》中的普救寺建筑，与遗址遗物吻合，盖为实况记述，并非虚构”。[②]不仅这些戏曲作品和原著《会真记》中描述的普救寺是真实的，而且根据许多中国古典文学史专家的研究，认为张生与莺莺小姐的爱情故事也并非全属虚构，他们都是有生活原型的。甚至如鲁迅先生都认为，《会真记》的故事实属“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③]正由于这一切，普救寺遂与张生及莺莺的动人故事一起，成为千百年来世人传说不乏且心向往之的一大文化名胜之地。本世纪 80 年代后期重建后的普救寺，荟萃了历代积累起来的许多遗产精华，在一座历史废墟上又重构了这一文化遗产园地中的奇葩异景。整个佛寺中，现有大钟楼、舍利塔（即莺莺塔）及塔廊、大佛殿、西厢院、藏经阁、十王堂、罗汉堂、菩萨洞、天王殿、正法堂、枯木堂等一大批结构精美的建筑。这可能是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 1555 年）大地震破坏后 450 多年来，普救寺最为辉煌的一次真正文化意义上的复兴与重建。

山西从东汉至明清的 180 余年历史进程中，一直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时期宗教设施（特别是佛教机构）最为密集庞杂的地区之一，而晋中盆地和上党盆地的四周沿山地带则又是山西境内佛寺聚集最繁盛之处。例如紧靠太岳山地的太谷县，据不完全统计仅始建于金代 100 年间的佛寺即有资福寺、常

[①] 《西厢记小说》，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附录第 2 页。

[②] 柴泽悛：《普救寺原状考》，《文物季刊》1989 年第 1 期，第 47 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 9 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

乐寺、万寿寺、大时寺、永安寺、法宁寺、大智寺、万安寺、清凉寺、法二寺、妙香寺、寿安寺、安定寺、普向寺、净圆寺、永庆寺、安净寺、贞寿寺、观音寺、崇胜寺、慈济寺、梵天寺、保胜寺、定明寺、永宁寺、宣梵寺等近30座左右。如果从西晋武帝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算起直至元惠宗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为止，[①]这1000多年间见于地方文献记载的寺院在太谷县境内的总数则大约在60座左右。金元之季，是太谷民间确知建寺最多的时代。现知太谷县境中的所有佛寺中，有80%左右即始建于金元两个历史时期。究其原因，这可能与这一时代北方少数民族入侵，战争频仍而形成的广大平民社会求神佛而避乱世的心理有很大关系。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的道教全真派即形成于此种历史背景之中。

山西历史上最大的自然生态特色是无县不山，表现在宗教文化的分布方面，则是无山不寺。以今天的晋中地区备县市为例，我们不妨列举出它们各自在古代历史上的一处山地，而且附上该山地中的一处佛寺或佛窟来。如：

榆次市，中林山·和合寺；　寿阳县，方　山·昭化院；
昔阳县，长寿山·兴善寺；　和顺县，云龙山·龙附寺；
左权县，瓮洪山·资圣寺；　榆社县，紫荆山·响堂石窟；
太谷县，凤凰山·三佛阁；　祁　县，下帻山·幽仙寺；
平遥县，超　山·百福寺；　介休市，绵　山·云峰寺；
灵石县，石膏山·保安寺。

正如晋中诸县市一样，在雁北、晋西南、晋东南、晋东等县市的山地中，同样是凡山皆有佛寺，许多山间佛寺虽不及五台山的规模宏大，但往往也是栉比鳞次，十分辉煌壮观。如在晋中盆地西南沿山地中的孝义市境内，古有龙山，又名龙隐山。山中自古就有象王峰、莲花峰、云盖峰和金沙河、半月池等自然名胜景观，又有华严寺古刹。清代雍正年间在当地做县令的方志祺曾撰有《龙山志·序》，称龙隐山华严寺“殿阁之崇壮，廊宇之深迴，为汾郡诸兰冠”。而在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时，华严寺的僧人德楷，一次即在山中扩建寺院上百间，成为当时汾州府（府治在今汾阳市，下辖汾阳、平遥、介休、孝义、临县、石楼、宁乡、永宁诸州县）地面上最为知名的佛寺群落。在今天太原市西山，从汾河出山口的上兰村向南直至天龙山一带，近50公里的范围内佛寺分布更为密集，历代所建的寺院累计在50座上下。在山西的山地佛寺中，有许多建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山之上。此种高山佛寺群落在山西除五台山五个台顶的佛寺外，还有宁武的芦芽山、清真山和灵石的石膏山等均有佛寺建筑。其中尤以芦芽山顶峰被称为毗卢佛道场

[①] 据知西晋是太谷县最早出现佛寺的年代，此年始建无边寺；元至正年间以后，明清两季太谷县未再记载有佛寺创建。

的太子殿建得奇险叫绝。这些高山佛寺，在中国可能是除了西藏、青海等少数二三个省区外，建得最为高远的寺院。而在国内的汉传佛教寺院中，山西的高山佛寺所建海拔之高远，则可能堪称全国之最。这无疑形成了山西佛寺景观最为显著的一个生态特色与环境特色。

与佛寺相比，山西的道教宫观无论在建筑规模或建筑数量上都表现得较为逊色，尽管在金元之季道教全真派曾经在山西出现过一个令人瞩目的高潮时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山西著名的古代道观其数量已经有限，而我们今天可以亲眼见到的较为完整的山西道观就更为有限。在此，我们无妨也举出一些山西省现存比较完整的知名道观的名目及其所在县市位置来。例如：

永乐宫，元代，芮城县；　　玉皇观，宋代，长治县；
纯阳宫，明代，太原市；　　太符观，金代，汾阳市；
堆云洞，元代，夏县；　　九龙庙，金元，河津市；
凤山道院，宋代，离石市；　　洞阳观，唐代，离石市；
清虚观，唐代，平遥县；　　玉皇庙，宋代，晋城市；
龙泉观，金代，中阳县：　　老君洞，唐代，浮山县；
清梦观，金代，高平市；　　清微观，元代，浮山县；
龙祥观，金代，平顺县；　　真武祠，元代，汾西县；
碧霞圣母宫，明代，洪洞县；　东岳庙，金代，石楼县；
东岳庙，金代，蒲县；　　仙翁庙，元代。高平市；
万寿宫，元代，高平市；　　会仙府，不祥，浑源县；
九天宫，不详，浑源县；　　真泽宫，唐代，陵川县；
黄围宫院，不详，陵川县。

清末光绪版的《山西通志》有关卷次中记载的历代所建道观的总数约 350 座以上。也就是说，山西古代道观的数量大约只等于山西古代佛寺数量的 1/20 稍多一些，而今天还能见到的山西古代道观建筑遗存，则只是原来数量的 7%左右。

山西古代道观出现的最早时代大约也在东汉中期。现在确知山西最早的两座道观一是紫微观，另一是披云观，就都始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公元 147—149 年）的原赵城县伏牛里（今洪洞县明姜镇西伏牛堡）一带。我们知道，“道教的正式形成在东汉顺帝以后，是当时社会上黄老之学及神仙方术、鬼神迷信盛行的自然结果。东汉道教组织最初兴起于民间，主要有东方的太平道和西南方五斗米道两大教团”。[①]显然，山西最早的两座道观的始建年代距离东汉顺帝末年（亦即汉安三年，公元 144 年）也就三四年之隔；也就是说，山西古代道观最初出现的时候，正值中国道教组织刚刚兴起的时代。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室：《道教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

这也足以证实，山西其实也是我国古代道观出现最早的省区之一。然而山西的道观虽然出现很早，但是直至中唐以前，其发展规模和速度与同时期佛寺建筑相比，则实在有些黯然失色。我们翻阅了许多地方文献，除发现东汉建和年间最早的两座道观外，到东晋永和三年（公元 347 年）时，在距这两座道观不到 10 公里的原赵城县杨堡里（今杨堡）又建过一座栖云观。而从此以后，历经北朝各代直至隋末，大约 270 余年的时间里，我们竟再没有发现有建造道家宫观的记载。唐宋两朝，帝王中多有崇尚道教者，像唐高祖李渊、唐玄宗李隆基、宋真宗赵恒、宋徽宗赵佶等均是。据说唐武德三年（公元 620 年）李世民在山西霍山一带讨伐刘武周部将宋金刚时，有一当地人叫吉善行的，说他在浮山县的羊角山遇到一位骑白马的老人，自称是老子李耳，而且预言李唐朝廷可以享国千年。唐高祖李渊听到这件事后，不但立即敕命在浮山县的羊角山建老子庙予以祭祀，甚至下旨将浮山县改名为神山县。及至后来，由此唐朝李姓皇帝从李渊开始，竟公开宣称自己为老子李耳的后代。唐武德八年（公元 625 年），李渊更下诏钦定三教在当时的次序，使天下崇教者从此有了尊卑与等级，即道教为国之首教，儒教次之，佛教则还排在儒教之后。山西是李渊父子起兵发迹夺天下的根基之地，在这种形势下，道教宫观在河东大地上一时蜂拥而起。唐玄宗之前，仅中镇霍山南麓一带，有规模的知名道观就建起了 10 座上下。唐武德二年（公元 619 年）在浮山羊角山建起的老子庙先是改名为庆唐观，唐玄宗命高力士亲自监修，大兴土木予以扩建，不仅御题观额，而且将他之前唐代几位皇帝的御容造像列供；到了北宋天圣五年（公元 1027 年）时，浮山县羊角山上的庆唐观仅观内的行廊就达到了 300 余楹，此时宋仁宗又下诏把天庆观改名为天圣宫，成为唐宋数百年间山西最有声名和势力的道家宫观。赵宋皇帝在此仍然继承李唐王朝的道统，继续确认李耳即李姓皇帝祖宗和老子即是太上老君的成说。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 1014 年），宋真宗就曾御赐老子徽号，特尊其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而早在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 666 年）时，李唐朝廷实际上早已在羊角山加封太上老君（亦即老子李耳）为“太上玄元皇帝”。道教在唐玄宗执政的开元、天宝年间（公元 713—756 年），曾经达到了东汉建道以来最为鼎盛的局面。还在玄宗未登基做皇帝前，他曾经做过潞州（今山西长治）别驾。做皇帝后，开元十一年（公元 723 年）他曾又到潞州巡幸，并在此特别大赦囚徒，免除税赋，甚至将他做潞州别驾时的旧府第改称为飞龙宫。上有所好，下有所效。也许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在唐玄宗时晋东南的潞州和泽州（今晋城市）一带迅即建起了一批道教宫观。其中如长治县桑梓和西火两镇的洞云宫、玉虚观、长子县的自鹤观，高平的瑞云观等即均建于开元、天宝之世。北宋末年的宋徽宗赵佶，在嗜好老庄、崇尚道教这一方面与唐玄宗李隆基极为相似。北宋的另一位皇帝宋真宗赵恒本已嗜道有名，徽宗赵佶比他则更甚一筹。我们现在知道有这位北宋皇帝御制碑记的宋建道观，在山西就有岢岚的神霄玉清万寿宫、平定的神霄万寿宫等。至于宋

徽宗曾经亲临过的神仙道观，在山西则有今临汾城西的道教圣地藐姑射山。直到今天，该山仍保留着一块宋人刊立的记载宋政和八年（公元 1118 年）徽宗游幸此山情状的碑蝎。唐至宋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阶段。这一方面表现在道家教义理论的日益成熟，另外一方面即是道教在一般平民阶层中的影响与作用力更趋深入。著名的道教“八仙”（即张果老、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李铁拐，钟离权、吕洞宾和曹国舅）神仙传奇体制，虽然迟至元代才最后形成确定的格式，但这些传奇中的神仙形像其实有大部分都取自于中唐以后的真实历史人物，也就是说“八仙”原本大部分都是有生活原型的。根据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们的深入考证，“八仙”中起码有两人的生平身世及其活动的主要区域与山西这块土地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一位是倒骑毛驴的张果老，另一位是身背宝剑、形似游侠的吕洞宾。吕洞宾其人，本书前面有关内容中已有简单介绍。至于张果老，新旧两《唐书》中均有传记文字。传曰：“张果者，不知何许人也，则天时，隐于中条山，往来汾、晋间，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自云年数百岁矣。尝著《阴符经玄解》，尽其玄理。”[①]有时间，有地点，甚至还有道经著述，可见是真有其人。武则天闻其名，欲召其入宫，但是张果装死不赴。但后来又有人传说他由中条山北上到北岳恒山去了。唐玄宗即位后，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 年）恒州刺史韦济表奏朝廷报告张果行踪；唐玄宗即命通事舍人裴晤到恒州迎接，张果又装死，裴晤不敢强逼，只好派快马又给朝廷报告；唐玄宗求道心切，无奈又派中书舍人徐峤带着盖有皇帝玉玺的御书再次亲往邀请。这一次张果遂随徐峤来到东都洛阳，又坐着像今天我们见到的滑杆一类的肩舆被接入皇宫，住在集贤院里。唐玄宗亲向张果求教，称张果为奇士，后来竟然计划把自己的妹妹玉真公主下嫁张果。但张果坚辞不就，而且一再恳请要回恒山去，唐玄宗只好应允。先是擢封张果为银青光禄大夫，赐号通玄先生，接着又在恒山为张果建栖霞观，赐送锦帛 300 匹，并派两名侍从专门服侍张果。所有这些往从细节，均见于新旧《唐书》之中，可见张果之事绝非空穴来风。山西境内的北岳恒山与中条山脉的五老峰，作为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化名山在古代时都曾有过相当规模的道观建筑。由是恒山曾被列入道教三十六小洞天序列，称第五小洞天或通玄洞天。山中有通玄谷、果老岭、九天宫、纯阳宫、会仙府、玄武井、紫霞洞等很多与道教有密切关系的名胜景观。而中条山脉的五老峰，则被列入道教七十二福地序列，称第六十二福地。山中有太乙峰、果老洞、真人洞，青城洞、玉真洞等道教名胜景观。

北宋亡于金，江淮以北从此长期处于南下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中。尤其是金元交替时期，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道教产生了种种变异。变异中则涌现了一大批新的道教教派，如太一教、大道教和全真教等。全真教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影响力最为广泛，这种影响发展到山西地区，就形成了山西历史

[①] 《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5106 页。

上道观建筑的第三个高峰期。前两个高峰期一次在唐代初中期，一次则在北宋中期。陈垣先生讲到全真教当时在中国北方的影响时，曾认为若言“人对全真之好恶，人民信服全真之事，随处可见。即其推行之远，传布之速，已足惊人，其第一流勿论已，其第二流以下，亦恒有弟子千人，庵观百所”[①]。这里的“第一流”和“第二流”是指全真教的第一代人物和第二代以下的教徒们。山西后来建于元代的一大批著名道观如芮城永乐宫、太原纯阳宫、龙山昊天观等，事实上全都是全真教派的第二代人物主持策划之所为。陈垣先生讲的全真教第一流亦即第一代人物，应该是指全真教的创始人王重阳和他最著名的七位弟子（号称全真七子），即丹阳子马钰，长真子谭处端、长生子刘处玄、长春子丘处机，玉阳子王处一、广宁子郝大通，以及清静散人孙不二；而陈垣先生讲的全真教的第二流亦即第二代人物，则无疑就是“全真七子”以后的教徒弟子如披云子宋德芳以及潘德冲这些生活在金末元初以后的全真道人们了。道教全真派到元代以后又有了更细的流派，如丘处机的龙门派。山西境内元代创建的道教宫观就基本上是由龙门派的全真教弟子们主持建造的。全真教有三大祖庭，即建在吕洞宾家乡山西芮城的永乐宫、陕西终南山下王重阳家乡的重阳宫和元建国后丘处机的受封藏蜕之地北京白云观。三大祖庭中永乐宫的规制最为宏伟，建构技术也最为精制，被列在三大祖庭之首，亦即全真教的第一祖庭。永乐宫中轴线上其主要宫殿的排列顺序已经表现了其中的尊卑次序。道教徒常讲“老子一气化三清”，故“三清”为道教之本，所以永乐宫中的三清殿（又称无极之殿）即排在最前一位：吕洞宾被全真派尊为北五祖之一，所以纯阳殿（吕洞宾道号为纯阳真人）就紧接无极之殿排在第二殿的位置上；王重阳是全真派的创始人，故又排于第三殿位；在第三殿重阳殿之后，就是王重阳的弟子亦即全真教龙门派的创始人丘处机的丘祖殿。可惜的是，丘祖殿早在本世纪初即毁于一场大火之中了。现仅存殿基。主持营建永乐宫的全真教龙门派道人潘德冲，字仲和，山东人，道号微妙真人。此人将他平生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永乐宫的建造之上，死后仍然葬于永乐宫中。水乐宫从原址迁建新址时，潘德冲之墓得以发掘，其石棺上的戏曲线刻图十分珍贵精美，成为永乐宫目前保存的重要遗存文物之一。

道教作为中国本土自生的宗教体系，到金元以后其祀神范围日益广阔，其布道范围也愈加平民化，这种特征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从公元 13 世纪后半叶表现得更为突出。许多原本并不属于传统道教系统的神异或地方性神异都先后挤进了道家庙堂，有的甚至打起正统道家的招牌雄踞一方，竟使真武玉皇和太极老庄那样一些道家本尊反而显得黯淡起来。如在晋东南一带，仅清雍正版《山西通志》祠庙卷中记载的潞安、泽州、辽州两府一州地面上的有规模的三嵕庙、崔府君庙和二仙庙等，就多达 30 座左右，这当然还不包括

[①]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6 页。

一些同类小庙。所谓“三嵕神”据知即远古射日之后羿，传说羿射九日之地即在今屯留县三嵕山上；而崔府君庙，则是祭祀唐初贞观七年（公元 633 年）时长子县令崔元靖之神灵的，当地唐宋之后即有“天降神明君，赐我仁慈父”这样歌颂崔元靖的民谣代代相传。至于二仙庙中的“二仙”，则完全供奉的是两位民间女子。二女本生于唐乾宁前（公元 894 年以前）屯留县李村一乐姓人家中，后随父母迁徙至壶关县紫团山中的益阳里村。乐氏姊妹生来贤慧，自幼孝敬父母。一天两姊妹因上山采灵芝遇大风被吹落山崖，乡人皆悼念之。北宋政和元年（公元 1111 年），宋徽宗敕封乐氏二女为“真泽二真人”。紫团山先起庙宇百余间，之后各代二仙庙遂遍及晋东南 10 余县之中。在这里，无论是后羿或崔元靖，还是乐氏姊妹，在后来人眼中，他们实际上均已成为神仙中成员，皆入道观供奉之。

在山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经存在过一批与佛寺道观迥然不同，更与一般民间小庙大相径庭的皇家祭祀场所而堪称为“御庙”者。这些御庙的存在，各自又展示了在整个中国古代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中封建帝王们的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场面。目前我国仍能确知存在过的皇家御庙，在山西大概计有 10 多个，它们的庙宇名称、地点和祭祀神主分别如下：

后土祠·社神·万荣县；
舜庙·虞舜·永济市；
池神庙·盐神·运城市；
汤庙·商汤·万荣县；
北岳庙·恒山神·浑源县；
河渎神祠·黄河神·永济市；
尧庙·唐尧·临汾市；
禹庙·夏禹·夏县；
西海神祠·西海神·永济市；
中镇庙·霍山神·洪洞县；
关帝庙·关羽·运城市；
……

这里举出的 11 座皇家祭祀庙宇中，除北岳庙位于雁北地区外，其余均坐落在山西西南部。晋西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皇家远郊祭祀地最为密集和集中的地域之一。

后土神，亦即古之社神。依现代人之理解，就是大地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曰：“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①]从此可知，中国古代祭祀后土，之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夏商时代。但是，先秦以上帝王诸侯祭后土的地址几乎无法具体稽考，唯西汉时所祭后土之地则很清楚，那就是位于今天山西省万荣县境内的汾阴后土祠，这也是今天我们知道的中国古代最早的后土祭祀地。在古代帝王的眼中，祭后土仅次于祭天，所谓皇天后土均皆至尊至贵之神。汉武帝刘彻写过一首很有气魄的《秋风辞》，就是他在元鼎四

[①] 《左传》，岳麓书社 1988 年版，第 360 页。

年（公元前 113 年）第一次东幸汾阴祭后土时的作品。辞曰：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擢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2 000 多年前的山西黄河与汾河的交汇之处，当时河水之大还能漂浮运行高大的皇家楼船，船至汾阴时已是此年十一月初，在刚刚新建的后土祠内祭祀礼毕，站在高高隆起的汾脽之上面对自然与人生的浩茫，这位极有作为的帝王竟然能够发出这样一番深邃而有哲理的感慨，于前后之世则均不多见。在此三年前的五月，有人在此汾脽地面掘得一尊宝鼎，满朝文武甚至举国上下皆曰祥瑞。为此，就将 ” 元狩 ” 年号改元叫做 “ 元鼎 ” ，并随之敕令在此起建后土祠，以作郊祀之礼。从元鼎四年开始，汉武帝刘彻共到河东汾阴亲祭后土共 5 次，其中元封四年那一次最为隆重。事后特别颁布诏书，称：“ 朕躬祭后土地祇，见光集于灵坛，一夜三烛。幸中都宫，殿上见光。其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以下，赐三县及杨氏皆无出今年租赋。 ”[①]因流年顺畅，以为是后土之神庇佑，所以不但赦免当地苑囚杀身之罪，而且还免去了当年三县民户和天下杨氏的租赋。类似的事情此后又有数次。中国封建时代汾阴后土祠的祭祀活动以汉代最为频繁，计有汉武帝、宣帝、元帝、成帝、光武帝等共 5 帝 13 次。从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及至唐初，近 700 年间则再无帝王问津汾阴后土之神。

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有时不仅仅只是相似而已，有些简直就是重复。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 116 年）在汾阴发现了古鼎，《汉书 · 武帝纪》记载 “ 得鼎汾水上 ” ，于是有在此始建后土祠事。又有谁能预料得到，整整 839 年后，即唐玄宗开元十一个（公元 723 年）时，玄宗刚刚接受了兵部尚书张说的建议，决定重开汾阴后土之祭，有司官就有奏表送了上来。奏称，在修祠掘地时，又得古铜鼎二。“ 大者容四升，小者容一升，皆青色。获古砖十，长九寸 ，有篆书 ‘ 千秋万岁 ’ 字。又于古坛侧旧祠堂内得石人，如从官像。 ” 于是，唐玄宗大喜，遂 “ 诏以鼎供庙，移像就祠中配焉 ” 。[②]经过了 839 年的历史尘封，到了中唐开元盛世重新在西汉汾阴后土祠的遗址上修建新祠时，不但又得到了两尊古鼎，而且还有石造神像意外出土。这简直是一个疑云重重的历史文化之谜！人们不禁要问，中唐出土的这两尊古鼎究竟是西汉祭祀后土时新铸造之物？还是像西汉元鼎元年发现的古鼎一样属

[①] 《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95 页。

[②] 《蒲州府志 · 事记》清乾隆十九年（公元 1754 年）版。

于更古的周或周以前的祀神重器？如果是商周时的远古遗存，它们如何会埋藏在汾阴脽上？由此，我们不禁又自然联想到同样位于汾阴脽上的另外一处古帝王陵庙——殷汤陵庙。

汾阴汤陵汤庙原在古荣河县（今万荣县）百祥村西黄河东岸，南距汾阴后土祠约 20 公里。《隋书》记载，隋开国之始，亦即开皇初年（公元 581 年），诏颁使祀先代王公诸庙，除尧、舜、禹、周文、周武两王外，即还有祀“殷汤于汾阴，伊尹配”[①]。据知，这是中国古代历代帝王中在河东汾阴祭祀殷汤的首次见于文献。但是，又据《圣贤城冢记》讲，汾阴汤陵早在北魏天赐年间（公元 404—409 年），因黄河崩岸倾圮于河水之中，而且特别记明当时河东汾阴有叫张恩的一个人，曾将原陵中随葬所用明器收敛起来郑重祭投于河。如果此记属实，这又说明，汾阴殷汤陵庙的民间祭祀早在魏晋之时可能已有规模。虽然从古至今有关殷商开国之主汤的陵墓究竟在哪里一直存在着争议，然而隋代帝王亲颁于汾阴脽上祭祀商汤却是一个无法更改的历史事实。唐代时，皇家祭汤由汾阴易地于今天河南偃师，之后五代至元 460 余年间，唯五代政权更替频繁，领土时有变异，所以祭祀制度几不成立，所征文献或残缺混乱，或断然失记。而北宋与金元，则显然记之甚确，如《宋史·祀》中有“遣祀河中府境内伏羲、神农、帝舜、成汤、周文武、汉文帝、周公庙及于脽下”[①]；《金史·礼》中也有“于仲春之月祭伏羲……陶唐于平阳府，虞舜、夏禹、成汤于河中府”[②]；《元史·祭祀》更明确记着：“至元十二年（公元 1275 年）二月，立伏羲、女娲、舜、汤等庙于河中……”[③]汾阴地面唐以后数代皆属河中府辖，金元两代虽属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而且维持年代都比较短暂，但从祭祀先代诸王这一点上看，它们都能着意地继承前代的有关礼制以及文化传统。在殷汤陵庙的祭祀地选择上，即可见其曾经作过许多周密的稽考。公元 14 世纪后半叶明朝初立，洪武四年（公元 1371 年），朝廷礼部议定在全国各地共祭祀先代帝王 35 人，其中“在山西省一：荣河祀商汤”。[④]具体方法是每年春、秋两次由皇帝遣使到各地分别致祭，并特别命有司官经心修葺各陵庙，平时设守陵户两人，新镌陵前碑刻，确定祭期与所用牺牲供奉数目，又决定每 3 年要由朝廷专出祝文、香帛和太常寺的御用乐舞前往各陵庙，由有司主持致祭。明代京城由南京迁徙北京后，祭祀事常有懈怠。故有明正德元年（公元 1506 年）朝廷专管祭祀礼乐事宜的太常寺少卿乔宇疏议之事。乔宇是山西乐平（今昔阳县）人，在他的任期内，他曾为山西境内的北岳庙与中镇庙的皇家祭祀活动专疏奏请。这次他又向明

[①] 《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36 页。

[①]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2536 页。

[②] 《金史》，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818 页。

[③] 《元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903 页。

[④] 《明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292 页。

武宗奏请扩建汾阴汤庙之事，汾阴汤庙遂又扩得地面三四亩之多，又新置殿堂 3 间和两侧庑廊多楹，使汾阴汤庙又有了一定声势。明末清初，考据之风日盛，曾经有人认为汾阴汤陵汤庙有可能张冠李戴，此汤陵应该是《史记》中记载秦宁公三年（公元前 713 年）秦军所伐汤杜亳王的陵墓。还有人以为殷汤的子孙有封国也称作汤，汾阴汤陵有可能即是汤的子孙的陵墓也未可知。这真可谓又是一桩历史文化疑案。事实上，不管是汾阴后土祠的始建，还是所谓殷汤陵庙的缘起，实际均由偶尔发现的古鼎和古墓葬的遗存事实引起。历史上若是没有汾阴古鼎和古墓葬的存在与发现，至少历代皇家祭祀活动中有一部分内容就会是另外一种写法。不但汾阴汤陵汤庙在过去的千百年中引起过种种学术争辩，而且就是唐玄宗时在汾阴后土祠旧址上发现的那两尊古鼎的时代所属，也都在历代文人中激起过不大不小的文化争鸣波澜。北宋著名诗人苏轼就写过一篇短小精悍的散文，题曰《汉鼎铭》。文中即有“汾阴之鼎，汉鼎也，非周鼎”[①]之语，而且特别说明他写这篇《汉鼎铭》的目的，就是要留给后世之人，大有警世之意，因为他不相信会在汾阴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出现周鼎。他认为周九鼎在周将亡时一定也“玉碎”了，而绝不会传至唐时。看来，这确实是一桩由遗产生态引出的 2000 年的文化之谜。当然，苏东坡所在的时代距离我们已经过去了近千年的时间，他当年所讲的汾阴之鼎属汉鼎而非周鼎的说法显然不确，这可能与他未能亲到过汾阴有很大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考古工作者通过科学发掘，相继在汾阴脽上（亦即汾阴后土祠和殷汤陵庙附近）发现了属于东周时期的汾阴古城遗址，还有一批东周早期的古墓葬。墓葬中的青铜器最为丰富，其中仅在一座墓中就出土了近 30 件之多，内中即有青铜盖鼎 7 件。这或许可为汉武帝与唐玄宗时期在此发现古鼎的事情聊作历史佐证或称为历史注脚吧。如果说西汉开创了在河东汾阴由皇家祭祀后土之神先河的话，那么这种祭祀的鼎盛时期则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而到宋真宗时其豪华与排场就已经到了一种十分奢靡的状态。事实上，在唐宋两代，汾阴后土之祀最鼎盛时其铺排张扬之势已经与泰山封禅的仪式相类似。或者说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东岳泰山封禅典祀。本书前面曾提到过的唐开元十二年（公元 724 年）在蒲州黄河上所建的蒲津铁牛连舰浮桥，从某种角度讲事实上就是唐玄宗为了以后到河东汾阴祭祀后土而修的御用专桥。对当时事，侍奉过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和唐玄宗五朝帝王并享有“文章宿老”声誉的大诗人李峤，在“安史之乱”发生时曾写过一篇题曰《汾阴行》的长诗。诗中极备后土祠在中唐时的兴衰情景，读来使人无不慨叹。诗曰：

君不见昔日西京全盛时，汾阴后土亲祭祀。
斋宫宿寝设储供，撞钟鸣鼓树羽旂。

[①] 《蒲州府志·艺文》清乾隆十九年（公元 1754 年）版。

汉家五叶才且雄，宾延万灵朝九戎。
柏梁赋诗高宴罢，诏书法家幸河东。
河东太守亲扫除，奉迎至尊导銮舆。
五营夹道列容卫，三河纵观空里闾。
四旌驻跸降灵场，焚香奠醑邀百祥。
金鼎发色正焜煌，是祗炜烨摅景光。
埋玉陈牲礼神毕，举麾上马乘舆出。
彼汾之曲嘉可游，木兰为楫桂为舟。
櫂歌微吟綵鹚浮，箫鼓哀鸣白云秋。
欢娱宴洽赐群后，家家复除户牛酒。
声明动天乐无有，千秋万岁南山寿。
自从天才向秦关，玉辇金车不复还。
珠簾羽扇长寂寞，鼎湖龙髯安可攀。
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
豪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
路逢故老长叹息，世事回环不可测。
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
不见祗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①]

据知唐天宝十五载初夏当潼关失守，安禄山叛军将要打到上京长安而唐玄宗准备逃往四川的前夕，他登上宫中的花萼楼强颜欢笑让宫女献歌舞于楼前，而宫女们唱的就是这首《汾阴行》。唐玄宗听到诗尾“山川满目泪沾衣”一句时已经不能自持，向身边的侍者问是谁写的这首诗歌，回答说是赵国公李峤之作。玄宗凄然涕下，当下站起身来慨叹地说：“李峤真才子也！”未等此曲终了，他已悲伤而去。唐玄宗在位的 43 个年头，他本人亲自到汾阴后土祠去祭祀一共是两次。第一次为开元十一年（公元 723 年），第二次为开元二十年（公元 732 年）。第一次时秦晋间的蒲津浮桥还是用竹索连舰的旧桥。玄宗兴致极高，曾写有《晓渡蒲津》五言诗。当时随从仪仗颇为壮观，跟随玄宗的张说、苏颋、徐安贞、宋璟、张九龄等诸大臣，也多有诗作奉和玄宗圣制，唐以后，到宋真宗时，皇家祭祀汾阴后土祠遂成为西汉以来的第三个高潮期。先是景德四年（公元 1007 年）朝廷遣工部尚书用大祠礼至汾阴后土祠致祭，到大中祥符四年（公元 1011 年）时，春节刚过，宋真宗即率群臣与皇家仪仗，浩浩荡荡经河中府城（即今永济市蒲州古城）抵达汾阴。我国南北朝以前出现的著名历史地理著作《三辅黄图》中，曾记载说，早在汉武帝祭祀汾阴后土祠时就在此建有万岁宫，至唐玄宗时，又在此新建奉祗

[①] 《全唐诗》，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689 页。

宫。据《宋史·本纪》记载，宋真宗这次祭祀汾阴后土祠，即驻跸于唐奉祗宫旧址，“辛酉，祀后土地祇。是夜，月重轮，还奉祗宫，紫气四塞，幸开元寺，作大宁宫”。大宁宫是此年宋真宗至汾阴后土祠前始建之新宫，据知宫中有穆清殿，又有可登高远眺之延庆亭。宋真宗亲祀后土礼毕后，就在汾阴大宁宫御“赐天下酺三日，大宴群臣于穆清殿，赐父老酒食衣币，作《汾阴配飨铭》、《河渎四海赞》”[①]等。后来，宋真宗御制的《汾阴配飨铭》碑和唐玄宗祭后土御制的《后土神祠碑铭》，成为汾阴后土祠中的传世之宝，并建碑亭专供于祠内前部中轴线之两侧。从明万历年间（公元 1573—1620 年）开始，黄河东岸汾阴脽上一带河岸崩塌日甚一日，后土祠受到严重威胁，不得不两次向东迁建。进入清代以后，迁建后的后土祠又数度被淹，康熙二年（公元 1663 年）只好将祠址再次东迁。一直到清同治六年（公元 1867 年），距上一次迁址时间又过去了 200 多年，黄河水竟又全部淹没了汾阴后土祠。水退之后，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无奈又第四次将后土祠再向东北方向高崖迁移，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包括山门、成品字布局的三座戏台、正殿、献殿和东西配殿、秋风楼等在内的清后土祠的最后遗存部分。值得庆幸的是，虽然唐玄宗的御碑以及一大批珍贵的古代碑刻文物大都沉沦于黄河波涛之中，但宋真宗的那通《汾阴配飨铭》御碑却仍完好幸存至今。1965 年 5 月 24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将位于今万荣县境内的汾阴后土祠公布为全省的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又有 30 余年。一部汾阴后土祠的兴衰沉浮史，可以说即是一部典型的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生态的变迁史。而这里的文化遗产生态之变迁，则是直接受到像黄河侵蚀这样的生态灾害的严重影响的。

像汾阴后土祠与殷汤陵庙一样，在晋西南地区还有三处中国古代的皇家祭祀之地至少也受到过古老黄河的多次重复性侵蚀，并最终毁没于黄河的泥沙淤积之中。这三处古代中国的皇家祭祀之地即是位于古蒲州城近郊的舜庙、河渎神祠与西海神祠。而有关这三座皇家祭祀建筑的始建年代和初有御祭的时间，一些经典文献或地方文献中也都多有记述。

舜庙——虽早在公元 3 世纪中时时即有像皇甫谧那样博学的学者说过蒲坂乃虞舜设都之地，但确知南北朝以前蒲坂已有舜庙却是在郦道元的名著《水经注》之中。他不但肯定地写到“今城中有舜庙”，而且还明白无误地讲到“郡南有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有舜井。妫、汭二水出焉。南曰妫水，北曰汭水，西经历山下，上有舜庙。”[①]可知舜庙在蒲州古城已有很久历史。这里所谓城中舜庙，本在城内之东南隅，至金哀宗正大八年（公元 1231 年）十二月，元兵攻城甚急，守城金兵主将草火讹可因兵力不足，

[①]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47—148 页。

[①]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9 页。蒲州在南北朝时曾为河东郡治，故称“郡南”。

所以将城之东半截去，只守西半城，故元代以后，原城中舜庙即到了城外东关。最先将蒲州舜庙作为皇家祭祀地的应该是隋文帝杨坚，其时间与祭祀汾阴汤庙同时，都在隋初。当时朝廷颁令：“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东，咎繇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殷汤于汾阴，伊尹配；文王、武王于沣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汉高帝于长陵，肖何配。”[①]这样系统地自尧舜禹以至商周前汉的历代先帝王祭祀，在隋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一排列有致的圣贤系统中，却有一多半均在今山西西南部举行皇家祭祀，就更是没有过的。此处所指的祭帝舜于河东，无疑即是蒲州舜庙。因为蒲州从汉以后，曾是古河东郡郡治所在，所以如此指称。从另一方面说，这当然更符合于悠久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和禹都安邑的世俗文化传承习惯。

河渎神祠——历史学家们认为，我国古代的山川之神崇拜及其祭祀秩序应该是在夏商时已有规模。自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在河南北部安阳殷墟发现甲骨卜辞以来，许多专家发现“殷人祭祀最多，祭礼最重的是‘河’神，有关卜辞不下 500 条之多。‘河’即黄河神”。[②]到西周时，除已有“五岳”和“九镇”之祭外，同时也有了祭祀我国四条主要河流（即黄河、长江、淮河、济水）的“四渎”之祭。因为黄河自古以来即是“四渎”之中为害最重的河流，所以，历代的河渎之祭就更为突出。而早在西汉时，像祭祀后土一样，帝王们的河渎之祭，也已有了专门地方。如《汉书》中记载，在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 61 年）三月时，即已有诏书明令祭“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余皆一祷而三祠云”。[③]对黄河之神的祭祀一年之内竟有 5 次之多，是四渎中最隆重的，可与泰山封禅相匹配。而此时河渎之祭的地方在临晋（即陕西省古朝邑县一带，在黄河西岸，东岸即蒲州古城。明清两季朝邑县城因黄河崩岸，大部沉沦于河水之中）。河西的古临晋河渎之祭从汉代开始，至唐初时改祠于同州（即今陕西省大荔），到唐开元十五年（公元 727 年）又再次改祠于河东岸的蒲州城郊。开元改祠后，据知最初的蒲州河渎祠庙是在唐肃宗时由郭子仪监修的。从此以后直至明清，历代皇家或帝王亲祭或遣使代祭，河渎神祠的庙址就再未迁徙改变。

西海神祠——在我国古代的祀神系列中，所谓“四海神”的出现尤晚，而且所谓“四海”更无确指。隋初文帝颁布祭祀诸神的方位地址时，也仅只见有祭祀“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①]的文献记述，而并无西海或北海之说。及至唐初之时，才始见四海并提，且具体确定其祭祀地址为东海于莱州，南海于广州，西海共河神于同州，北海共济神于河南。

---

① 《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第 136 页。

② 詹鄞鑫：《神灵与祭祀》，1992 年版，第 67 页。

③ 《汉书》，中华书局 1962 年版，弟 1249 页。

① 《隋书》，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40 页。

[②]唐开元时，西海神祠与河渎神祠一起从河西同州迁至河东蒲州，所以宋真宗亲祭汾阴后土祠后，有所谓“还至河中，亲谒奠河渎庙及西海望祭坛”[③]的文献记载。也就是说，西海神祠与河渎神祠从唐初始，即像是一对亲兄弟一样，先是在黄河西岸，后来又同迁徙至黄河东岸，共同经历过 1200 余年的沧桑变迁，一直至清末同时被黄河的泥沙彻底掩埋掉它们的遗址为止。

如果说古蒲州的舜庙最后衰亡还多少有些社会原因或人为原因的话，那么，河渎神祠与西海神祠的最后湮灭，则完全应该归咎于自然生态变迁的无情侵害。但这三座中国古代皇家亲祭祠庙的最终毁灭，在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它们的崩溃消亡几乎是与中国封建帝制的寿终正寝同步而至的。尤其是千年之前其始建这些河海神祠的初衷本来基于消除河海水患的目的，然而最终这些供奉至尊至圣河海神位的神圣庙堂倒反被河患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由千年沧桑最后实现了的巨大的历史性讽刺。

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去审度，诸如古蒲州河渎神祠与西海神祠这样一些已被黄河泥沙淤没了近一个世纪的古代皇家祭祠遗址，又正像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印度科纳拉克太阳神庙或希腊阿波罗神庙一样，虽然现在它们均已沦为废墟或是仅剩下部分残损的遗址与遗迹，但它们又毕竟可以代表已经远去的那个时代的艺术以及建筑文化方面的辉煌成就，可以作为逝去的某一历史时期古代文明的标志物让我们给予珍视与保存。我们在此讲的蒲州河渎神祠与西海神祠，在 1200 年间虽然曾经重修重建过许多次，但其中唯有明隆庆六年至万历二年（公元 1572—1574 年）那次重修后的庙宇规模最大，而且记载最为详细。这就是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兼大学士的蒲州籍名人张四维所撰写《重修海神河渎庙记》中记述的：

> 二庙并峙，左河右海。广轮崇庳，无尺寸异。其为正殿各七楹。殿后为寝殿，各五楹。殿东西为风、雨、雷、电祠，凡四座。楹杀寝殿之二。其仪门楹数准寝殿焉。堦墀内为井各二，具复以亭。碑亭视井亭之数，建仪门外。其外门则以大坊表之，内环以连廊，以楹计凡二百八十有六。外缭以砖墉，以丈计凡三百二十有二。以及宰牲有亭，斋宿有所，而制度大备矣。广庑翼翼，棼橑高举，邃深轩辖，金碧辉煌。信足以永奠明神，系一方之瞻。[①]

这两座总面积分别的达到 6 万平方米以上的中国古代皇家祭祀庙宇，我们今天的人是无法见到它们的原貌了。即使是它们的遗迹，至今仍被埋在数米深的黄河泥沙中。1986 年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在原庙遗址，发现并发掘出了一通清康熙玄烨题写的御碑。该碑身高 4.43 米，宽 1 米，厚 0.29 米，上刻“砥

[②] 《新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80 页。

[③] 《宋史》，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2486 页。蒲州古为河中府治，又西海并不在所祭之处，故称“望祭”。

[①] 《蒲州府志·艺文》，清乾隆十九年（公元 1754 年）版。

柱河津”四个楷书大字。从碑上四字看，发掘此碑的地方应为河渎神祠。清康熙四十二年（公元 1703 年），已经年满 50 岁的康熙皇帝曾两次离京外巡。一次是二月南巡江浙一带，再一次则是十月西巡到西安阅兵。西巡途中的康熙帝曾在蒲州驻跸，并亲至河海神祠为两庙分别题赐了“砥柱河津”和“源远流长”两榜御书。事后两庙守臣即将康熙御书分别勒石成碑，且加了额座又建碑亭，然后分树于河海两祠之中。1986 年发现“砥柱河津”碑时，碑已在数米深的泥沙下。当时仅发掘出土了该碑碑身，碑座与整座河渎庙的遗存基础，甚至包括西海神祠的庙基和另外一通“源远流长”碑石，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意外的话，估计均应完好地保存在黄河泥沙的游积保护层内。

在漫长的封建君权统治的中国古代社会中，许多专制独裁的帝王都曾成功地利用过宗教的力量，以强化巩固他们的王权基础。处于重重压迫下的人民一方面默默接受着宗教和神权的奴役，另一方面也曾虔诚地信仰和拜倒于宗教的诱人光环与祭坛之下。历史上的宗教确曾过分强大，它们拥有过令人难于具体估计的广阔空间和环境。千百年中，宗教已经无法与文化断然分开，各种宗教建筑物成为普天之下人文景观生态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共有 15.6 万平方公里的山西，截至到公元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时的总人口是近 1010 万人，[①]然而在此之前历代在这块土地上建造过的各种宗教建筑（包括佛教寺院、道教宫观、儒家祠庙与诸类民间祀神庙宇）总数，却至少不下于 2 万余处座。许多调查资料都表明，山西这块土地确实是中国古代拥有最长宗教传播历史以及最多数量宗教建筑的省区之一。而也正是由于拥有了这样悠久丰厚的宗教历史土壤和基础，也才得以形成今日山西的种种珍贵宗教文化与宗教建筑景观遗产。截至目前，山西已公布的国家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事实上其中有约半数以上均曾经是历史上的宗教活动场所，而且有少数现在还是重要的宗教活动地。早在 1983 年时，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曾在全国确定了一批属于汉族地区的佛教国家级重点寺观，山西太原的崇善寺、大同的华严寺、交城玄中寺和五台山的显通寺、碧山寺等 14 座寺庙被列于其内。总而言之，山西约 2000 年历史上遗存下来的众多宗教文化景观和建筑景观，今天业已成为山西历史文化遗产生态资源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人们通过它们不但可以了解历史上的山西宗教与中国宗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通过它们去深刻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及山西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历史上的寺院、道观、庙宇，甚至包括陵墓建筑在内，历来均十分重视其自然环境的选择。尽量地寻找一块山水皆宜，林木葱郁的风水宝地，不但是人们生活住址选择所遵循的原则，而且也成为宗教建筑与陵墓选址所极力追求的标准。即使是在远离山川的地方，人们也仍然要力求通过人工造景的方式，去竭力使这些寺庙道观和陵墓建筑处于一种园林化的自然生态氛

[①] 张正明、赵云旗编：《山西历代人口统计》，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围内。这样悠久的传统文化观念从公元前 10 世纪时的许多遗存形态中就已得见端倪，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老子》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充满自然生态之美的悠久传统文化意识，可以说遍见于数千年来的所有中华建筑形式之中，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各种宗教建筑在内。目前仍然完好保存的许多寺庙道观和名人陵墓，之所以能在现代旅游中被中外游客视为风景名胜，一方面固然有历史文化的因素在其中，但是其中能与文化因素自然天成于一体的环境景观因素，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的山西不但多山，而且多林多水，这无疑为历史上的各种宗教派系提供了一个良好而又广阔的栖居自然环境，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山西至今仍然能够保留如此众多寺庙道观群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节　古代园林与珍稀古建筑遗存

讲山西现存的古代园林遗迹与珍稀古建筑遗存，可能不会像谈著名的苏州园林或明清时期的北京皇家园林那样有一个完整周密的理论系统，或是有个前后连贯、传承有序的历史发展系统。这主要是因为，今天我们有幸还能见到的山西古代园林遗迹和珍稀古建筑遗存，它们都具备了一种特征，这就是它们数量太少称得上是国内绝无仅有的稀世孤品。

绛守居园池——这是一座原始地貌与始建时期造园面积基本完整保存至今的隋代初期的园林遗址。该园池的确切始建年代是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 年），距今已有 1400 年的历史。绛守居园池在历史上有根高的知名度，像王勃、岑参、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范仲淹等唐宋文学大家，均曾慕名寻访于该园，而且都留有诗文作品以为纪念并长久传世。绛守居园池的稀奇珍贵之处在于，它是中国现存唯一一处最为古老的隋代园林实物遗存。1960 年，国家文物局原局长王冶秋先生曾专程赴此考察，事后又为《人民日报》撰写专文《拨开涩雾看园池》，热情介绍这处稀有文物遗迹，并高度评价它对研究我国隋唐园林艺术的重要价值。

恒山悬空寺—这座举世无二的高空崖作式特大型木结构建筑，创建时间约在北魏孝文帝至北魏宣武帝时期（约公元 471—515 年），素来被世人称为北岳第一景。明崇祯六年（公元 1633 年）夏，　47 岁的旅行家徐霞客经五台山来到恒山，在其衣历八月十日的旅行日记中曾写到“西崖之半，层楼高悬，曲榭斜倚，望之如蜃吐重台者，悬空寺也。五台北壑，亦有悬空寺，拟此未能具体。仰之神飞，鼓勇独登。入则楼阁高下，槛路屈曲，崖既矗削，为天下巨观，而寺之点缀，兼能尽胜，依岩结构，而不为岩石累者仅此。”[①]古时我国名山中悬空崖壁木构建筑曾经不少，其中山西境内尤众，如徐霞客在日记中提到的五台山悬空寺（今已无存）、宁武管涔山悬空寺、大同焦山悬空寺、和顺县寺庄头村太行山悬空寺等均是。但无论从悬空高度、寺体规模、架构技巧、寺址环境选择和知名度哪一方面看，其他的悬空寺都无法与恒山悬空寺相比。恒山悬空寺建筑物所依附的恒山翠屏峰峭壁“为古老的寒武奥陶系石灰岩，距今约有 5 亿年。由于构造运动强烈，大面积基岩裸露，其势陡峭险峻”，[①]且壁间多有天然形成的崖壑石隙与风蚀水蚀窟穴，这给建寺的古代工匠们创造了一个利用天成山势进行工艺创造的很好条件。虽然整个寺体从南到北长约 30 余米，而且悬空高度多在 1520 米以上，但给人们的感觉却是惊险之处而又不失宏伟庄重。

恒山悬空寺的悬空附崖建筑面积尽管极为有限，但其整体容量却特别丰富多采，计有雷音殿、三官殿、三佛殿、太乙殿、纯阳宫、观音殿、释迦殿、

[①] 蒲仁、新辉：《咏晋散文游记选》，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5 页。

[①] 曹安吉、赵达：《雁北古建筑》，东方出版社 1942 年版，第 126 页。

伽蓝殿、三教殿、钟鼓楼、地藏殿等 40 余处，铜铸、泥塑、木刻、石雕的各种神佛之像 80 余尊。除各种殿堂楼阁以外，还有院落栈道等其他形式的建筑内容。须知这偌大的一座梵宫禅院若论其悬空重量，又何止于千吨计？但它都能或巧借数十根碗口粗的斜插飞梁，或是暗托崖间凹凸岩石，竟贴立此壁达 1500 年左右。这 1500 年间，为此人间奇迹慨叹歌颂者真可谓大有人在。其中最著名者当为唐代诗人李白，他曾在云游代北时为恒山悬空寺写下“壮观”二字，后悬空寺则为“壮观碑”创立太白祠。近 20 年来，恒山悬空寺随着国际旅游业的逐步兴盛，其声名已经远达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国政府于 1982 年将其列入了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中。

南禅寺大佛殿—1981 年，时值“文化大革命”10 年浩劫结束后的第 5 个年头，鉴于我国文物界当时所面临的繁重的古建筑保护任务，特别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木结构建筑的许多保护技术亟待普及，国家文物局委托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举办了一期有 16 个省市参加的古建知识培训班。也就在这次培训班上，主持此次培训工作的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柴泽俊先生，在其主讲的内容中公布了这样一系列数字：

> 到目前为止，山西已发现宋代以前的（13 世纪以前）木结构的古代建筑 106 座，其中唐代的 4 座（即五台南禅寺大殿、佛光寺东大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平顺天台庵正殿），五代的 3 座（即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大云院正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宋辽金时期的 99 座，占全国现存同时期木结构建筑的 70%以上。这些建筑的分布之广，数量之多，以晋东南为最（70 多座）；规模之宏伟，以大同和雁北地区为冠（大同华严寺大雄宝殿和应县木塔，是国内辽金建筑中最大的佛寺殿宇和木构佛塔）；时代最早者，以五台南禅寺为先例（唐建中三年建，即公元 782 年，距今已 1200 年）……[①]

也就是从这次培训班柴泽俊先生作过此次讲座后开始，以上我们所引用的柴先生的这段话，特别是其中的几个权威性数字，随即就成为许多山西人讲话写文章必引之内容。晋人藉此以自豪，而晋地以外的人则感到惊异与新鲜。五台山南禅寺，由此也一举名声非凡。因为若以保存时间计，它确实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现存古建筑此项遗产“金字塔”的“塔刹”。更因为有了它的存在，我们今天的人才有幸得以目睹到 1200 多年前中唐寺院建筑的实物。对从事宗教史、建筑史和生态史等专业研究工作者来说，它的存在其意义则更大。他们可以通过南禅寺大佛殿这栋在当时来讲极为普通的佛寺建筑实体（曾经主持南禅寺大修工作的柴泽俊先生说过，南禅寺由于当时地处偏僻，规模小且声誉小，所以后来的州府县志上均无记载），去探索唐代的佛教传播、建筑技术发展或者是华北山地的气候与生态环境的种种变迁。正是由于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五台山南禅寺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了我国政府公布的第

[①] 柴泽俊：《山西古建筑概述》，《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

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中。

九龙壁——龙壁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并不少见，然而以九龙饰壁则有严格的限制。这是因为它象征着封建帝王的至尊至贵地位，所以依照封建礼制的规定，九龙壁常常在有皇帝固定起居的地方出现。例如现在仍完好保存在北京故宫皇极门外的九龙壁，和原为明清两代皇家园林的北海公园天王殿西的另一座九龙壁等。为什么“九龙”能和皇帝拉扯到一起来，这可能和《易经》中的乾卦有些关系。《易·乾》曰：“九五，飞龙在天。”隋唐时的经学家孔颖达解释这句话说：“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飞龙在天……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而早在孔颖达之先，九和五这两个数字很久以来就有了祥瑞的含义，如东汉时的经学家郑玄就认为“王有五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就是说当皇帝的当然是五行皆通或无所不能行的至圣。所以从孔颖达之后，皇帝就又有了一个被称作“九五之尊”的名义。九龙壁最终的形成，可能就是这样逐步地由历代经学家们穿凿附会出来的。

奇怪的是山西大同也有一座九龙壁。这座九龙壁原来是朱元璋的第 13 个儿子朱桂到大同做代王时在自己的府门前做的影壁。明代以前是否已经有了九龙壁这种建筑形式，或者明朝时在其他什么地方还有没有出现过同样的九龙壁，这些我们今天都已无法知道。因为目前全国仅存的三座九龙壁，处于北京的两座均是清代建筑，只有大同这座九龙壁是明代的建筑实物遗存。与北京的两座清代九龙壁相比，大同明代王府的九龙壁不但建筑年代早出了 200 余年（大同九龙壁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即公元 1391 年；北京北海公园九龙壁建于清乾隆十一年，即公元 1746 年；北京故宫九龙壁建于清乾隆三十六年，即公元 1771 年），而且体积规模也大出很多（大同九龙壁长 45.5 米，高 8 米，厚 2.02 米；北京北海公园九龙壁长 25.52 米，高 6.9 米，厚 1.42 米；北京故宫九龙壁长 29，4 米，高 3.5 米，厚约 1 米）。三座九龙壁的相同之处是它们的正面壁体均为七彩琉璃的质地，只不过由于壁面的大小有异，所以各自烧制的琉璃数量也就不同（大同九龙壁用 426 块，北京北海公园九龙壁用 424 块，北京故宫九龙壁仅用 270 块）。除此之外，三座九龙壁的壁顶与壁基座建筑样式也基本一样，即均为庑殿顶和须弥座。凡见到过全部三座九龙壁的人们，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直觉的心理感受，那就是在整体环境衬托方面，大同明初代王府的九龙壁显然比清代北京皇家宫苑中的两座九龙壁更费了一番匠心。大同九龙壁前多了一个与壁体长高基本相等面积的倒映龙池，而北京的两座九龙壁都没有。在建筑格调上，这显然又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九龙遇水，想得更深一些，立意之深远，确是棋高人一筹。而所有这些，毫无疑义地也就形成了大同九龙壁独有的特色。

《明史》上讲，明太祖朱元璋共有 26 个儿子，除太子朱标和第 26 子朱楠早死，第 4 子朱棣后来做了皇帝（即明成祖）外，剩下的 23 个儿子均被封了藩王，其中封在山西的有第 3 子太原晋王朱棡、第 13 子大同代王朱桂和第 20 子潞州（今长治）沈简王朱模。在朱元璋诸子中，代王失桂的脾气

最为骄横暴躁，而且对封地百姓横征暴敛，所以向朝廷告他状的人尤多，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在位期间（公元 1399—1402 年），代王朱桂曾被削掉王爵，废为庶人。明成祖朱棣继位后，朱桂的代王爵位又被恢复。代王朱桂与明成祖朱棣关系亲近，因为朱棣的皇后是明初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的长女，而代王朱桂的王妃则是皇后的亲妹妹。《明史》上说徐达的这个小女儿性情与代王一样骄妒。俩口子在大同搞得乌烟瘴气，告御状的人一直不断，明成祖将他们的罪状一共列出 32 条之多，几次三番召他入朝，但代王充耳不闻，拒不回京。一个是皇帝的亲弟弟，另一个是皇后的亲妹妹，明成祖几次警告都不奏效，最后碍于各种关系，还是没有给代王朱桂治罪。这些是否即是大同代王府九龙壁的建造背景呢？明成祖给代王朱桂敕列的 32 条罪状有没有关于建九龙壁之类的内容呢？如果说这在明代时均不算什么异常，那么到清代时，乾隆皇帝又怎么能够允许在其京城之外保留这样一处比他建的两处九龙壁还大得多的九龙巨壁呢？看来，这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之谜。

应县大木塔——辽道宗清宁二年，此时正是中原地区北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 1056 年），在辽西京道应州（今山西应县）建起了一座高 67.31 米，底层直径 30.27 米的全木结构大木塔。塔为当地佛宫寺的一部分，第一层中即是一尊高约 10 米的释迦牟尼坐像，所以被称为释迦塔。这座造型奇特的木塔使多少后来人惊叹不已，然而翻遍了多少典籍或地方文献，此塔的起建背景仍然是无可稽查考证。不管怎样说，后人不会相信一个远离京都（辽的上京在今内蒙古东部巴林左旗，中京在今内蒙古东南宁城老哈河西，南京在今北京市，西京在今山西大同），毗邻前线（应州城西南不足 50 公里即内长城与雁门关）的偏远州县会突然建筑这样大规模的一座佛塔。此塔建成 350 年后，即明永乐四年（公元 1406 年），明成祖朱棣北巡至此，惊叹之余为木塔留下了“峻极神功”的 4 字御笔；明正德三年（公元 1508 年），明武宗朱厚照登此木塔时则又亲题了“天下奇观”4 字大书。后来这两位明代皇帝的题字都制成了巨幅匾额，分别悬挂在了塔的三四两层的南向迴廊间。清代乾隆年间，有一位乘独轮车游遍了五岳，被学者毕沅称作“海岳散人”的湖北才子张开东，他见多了名山大川，竟未曾料到在这塞北之地能出现像应州大木塔这样壮美的宏观巨制，于是禁不住就吟出了一首奔放异常的《应州木塔歌》。歌曰：

君不见应州木塔高佛宫，
下视利舍四万八千皆儿童。
五十六丈摩苍穹，
朱槛八面开玲珑。
突若黄河砥柱嵯峨峰，
又若沧海尾闾气溟濛。
不知见自何年始，

但见石幢注辽清宁中。
元顺之朝地大震，
塔旁屋瓦同飞蓬。
唯有此塔屹然不动如山岳，
宁非神鳌蟠踞嶷屃负其雄？
我来振衣登绝顶，
两腋飒飒扬天风。
南望雁门北恒代，
河流一线西复东。
呼仙子，招云鸿，
我欲乘之八极凌虚空！[①]

可以看出，诗人是在一种极为激动兴奋的状态下写出此诗的。因为能这样用情放歌吟出如此流云涌浪般诗句者，非亲登木塔绝顶而不可得。尽管他遣辞用句已经十分夸张，但绝不失自然真实之情趣。尤为珍贵的是，诗人在诗中恰到好处地夹进了一段真实的，曾发生在元顺帝至元三年（公元 1337 年）八月大地震的描写。关于这次大地震，《元史》中记之甚确：“壬午，京师大地震，太庙梁柱裂，各室墙壁皆坏，压损仪物，文宗神主及御床尽碎；西湖寺神御殿壁仆，压损祭器。自是累震，至丁亥方止，所损人民甚众。”[②]从“壬午”至“丁亥”，这次大地震一共持续了 6 天。震中虽然看样子不在山西应州一带，但对当地一般民居建筑破坏较大。令人惊异的是，大木塔丝毫未受到影响，仍旧巍然耸立着。近千年来的大地震当然并不止元顺帝时期的这一次，这座高耸入云的大木塔却一直安然无恙。包括像 1976 年唐山那样的大地震，它也依然安全度过了。 1926 年军阀混战期间，曾经有数十发炮弹直接打到本塔之上，除了留下许多坑坑凹凹的弹痕之外，竟也无伤大雅。

应县木塔是以它独有的木结构建筑技巧与塔体高耸伟岸的艺术形象，以及悠久的遗产保护历史等多项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文化科技指标，而被载入当代人类文明史册的。我们无法估计它近千年前初落成时是否拥有今日如此殊荣，但是即使是在历史的脚步就要跨入新的 21 世纪时，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它都仍然是最好的和举世无双的。 1961 年 3 月 4 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制度刚刚诞生时，应县大木塔即被列入共和国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4 年文物部门又在应县木塔内的佛像整修过程中，突然发现了一批辽代经卷。这些珍贵的经卷有早至辽统和八年（公元 990 年）的雕版木刻本，也有建塔前后的手抄经卷，其中有的卷体长达 30 余米。

[①] 姚奠中主编：《咏晋诗选》，山西教育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17 页。

[②] 《元史》，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841 页。

这次罕见的发现又一次轰动了国内外文化历史界人士，使许多人对应县大木塔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和了解。

晋祠“鱼沼飞梁”——如果说悬瓮山为晋祠之魄的话，那么难老泉即是晋祠之灵。《山海经》的北山经中有“北五十里，曰悬瓮之山，其山多玉，其下多铜，其兽……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汾水。”[1]这是中国古典文献中对晋祠难老泉水最早的一则记述。晋祠园林从始建至今，历代造景者对如何利用晋水去构思最佳景致，均费过一番苦心思，而其中最成功者则莫过于圣母殿前的那架称作“鱼沼飞梁”的十字型石桥。古建专家们经过认真考察，认为现代人见到的“鱼沼飞梁”应是圣母殿的同时代建筑物，都是北宋天圣年间（公元 1023—1032 年）所建。但郦道元写的《水经注》中讲到过晋祠“水侧有凉亭，结飞梁于水上”[2]的话，又可见晋祠早在北魏时即有水上“飞梁”。是否也是十字形状，今人已无法知道。关于对“鱼沼飞梁”的解释，“鱼沼”当然就是养有鱼类的水池，这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也曾提到，即认为在北魏以前当时的人已把晋祠之水“蓄以为沼”；而“飞梁”，近年主持了晋祠圣母殿 900 余年来第一次落架大修的柴泽俊先生说：“晋祠鱼沼飞梁是建在方形池之上的一个十字形板桥，东西平坦，南北下斜如翼，犹如飞鸟展翅，故名飞梁。”[1]曾经系统深入地研究过北宋官修建筑专书《营造法式》的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经对晋祠作过专程考察。对完好保留在晋祠园林中的宋建“鱼沼飞梁”实物，他曾深感震惊，认为这种样式的古桥虽然过去在一些古代绘画作品中偶然见到过，然而作为今人还能接触到的历史实物，确实是一个仅存的孤例。在梁思成先生参与领导和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中，后来也专对晋祠圣母殿前的“鱼沼飞梁”作了有关介绍。 1961 年国家将晋祠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圣母殿及其殿中彩塑，以及“鱼沼飞梁”等北宋文物遗存，事实上已成为晋祠全部文化遗产中的最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而这一部分稀世珍品，也是多少年来凡来晋祠游览的中外游客心目中最受青睐的一个部分。

山西的古代园林与珍稀古建筑遗存绝不仅限于以上所列举的这一些，诸如万荣县东岳庙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 1617 年）所建的飞云楼，虽然建筑年代并不算悠久，但由于中国古代历史中许多卓有声名的名楼名阁的原物都已损毁湮没（像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鹳鹊楼、浔阳楼等），现在所见到的则多属当代所新建，加上飞云楼本身在整体造型、营造技巧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所以就显得弥足珍贵。再如洪洞广胜寺中的飞虹塔，则无疑在中国古代大型琉璃建筑物中业已成为同类型遗产中的孤例精品。又如五台山龙泉寺山门前的石雕牌坊，其造型之别致与雕造工艺之精湛，均是当前在国内

---

[1] 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第 80 页。

[2]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8 页。

[1] 柴泽俊：《山西古建筑概述》，《中国古建筑学术讲座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2 页。

很难找到匹配之物的稀罕品类。据知这座高大精美的汉白玉仿占牌楼，是在耗费了整整 10 年时间和 5 万大洋的情况下，于民国 26 年（公元 1937 年）3 月 15 日才最后完工的。而这一天距离日军在北京发动罪恶的芦沟桥事变，也只差 3 个月时间了。如从某种角度看龙泉寺的这座汉白玉石雕牌坊，它不是恰巧标志了一个和平时代的终止与另外一个战争时代的开始吗？山西现存的珍稀古建筑物精品事实上并不仅仅见于一般的大型宗教类环境中，在民间建筑遗存里，则同样保留了不少珍稀品类。例如目前仍然基本完好地保存在翼城县武池村乔泽庙中的古戏台，即是我们已知在全国现存的 6 座元代戏台实物中规模形制最大的一座，距今已有 600 余年的时间。另如高平市孝义里村建于清代道光年间的祁■家族墓地中的四座石雕碑亭，从其建筑样式的设计角度或雕造工艺水平衡量，不但在目前我国民间同类型建筑中已是仅存之物，而且即使退回到其始建年代，也属当时民间建筑中的上乘之作。

山西古代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珍奇建筑物荟萃且经久不衰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当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名山大川遍及域内，有一个极佳的造景环境；第二，林木山石举目皆是，有一个良好的建筑材料供给条件；第三，传统建筑技术积累雄厚。早在春秋晋平公时期（公元前 557—前 532 年），晋国就曾倾其国力，在古浍河之畔花费 6 年多时间建造过规模宏大的虒祁宫；几乎与此同时，又在其国都东北沁水上游一带修建了连绵数里而且愈加豪华奢侈的铜鞮宫；之后汉魏南北朝直至隋唐五代，各朝在山西境内修建宫阙之事层出不穷，其中北魏在大同，北齐在晋阳，隋炀帝在宁武天池的大兴土木之举更是尽人皆知。所以，又有一个悠久的工匠技能传承不缀的绵长历史。第四，制砖与烧造琉璃等特殊工艺在山西历史上出现较早，成为促进山西古代珍奇特殊古建筑物出现的另外一个有利条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五代至宋以后战争频仍，特别是金元之际的战争，致使山西境内许多珍稀建筑物迅速大批湮没毁坏，其中如举世闻名的建于北周时期（公元 557—581 年）的蒲州鹳鹊楼、隋代时建于宁武天池南侧的避暑行宫汾阳宫、隋代时的太原蒙山大佛之大佛阁、唐代建于蒲州北城上的逍遥楼等。

从文化遗产生态角度观察，山西历史上的许多珍奇建筑物由于其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影响作用，遂成为各种传统艺术样式的集中表现对象和历史文化的载体。在这方面，声誉显赫 1000 多年的鹳鹊楼最为典型，仅直接描述它的历代著名诗人的诗歌就几达百首以上。其中唐代诗人王之涣《登鹳鹊楼》中“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名句，则成为诗人身后 1000 多年来激励人生，体现中华民族博大胸襟和英雄人格力量的警世之作。即使金元战争之后楼已毁坏，但继续前往寻访遗迹遗址者仍然大有人在。元代诗人王恽至元九年秋天，即有《祭鹳鹊楼记》传于后世。文中充满了无奈和荣幸交杂在一起的情思：“其岁冬十日戊寅，奉堂移偕来伻，按事此州，遂获登故基。徒倚盘桓，情逸云上。于是俯洪河，面太华，揖首阳，虽杰观委地，昔人已非，而河山之伟，风烟之胜，不殊于

往古矣。”[①]同篇文章中这位豫北平原上长大的诗人还说，他是在“儿时得闻此州楼观雄天下，而鹳鹊尤为之甲”。可见历史上的蒲州楼观并非少数三二处，能够称得上“雄天下”者，其形制规模也一定非常特别。现在我们仅从唐代诗人的笔下，已经可以得悉仅蒲州州城一地在中唐时名楼即有三座，那就是鹳鹊楼、逍遥楼与白楼。唐玄宗李隆基与其大臣苏颋有登逍遥楼唱和诗，卢纶、耿　等诗人则有奉和朝廷重臣游蒲州白楼诗传世。鹳鹊楼与著名的蒲律浮桥毁于金元之际战火，而逍遥楼和白楼则是在五代兵革中就已经化为灰烬的。因为这两座名楼从唐诗中看它们都建在城垣之上，所以一有攻城事即绝不易保存下来，而唐末五代时蒲州城的各方攻夺又何止于以数十次计。后人有人推测白楼与鹳鹊楼实为一楼，这不可能。因为诗人耿　同时有以《奉和李观察河中白楼》、《鹳鹊楼》分别为题的两首诗出现，假如两楼本为一楼，就不会如此分别命题，况诗人前面一首白楼诗的启首句即是“城上高楼飞鸟齐”。鹳鹊楼是建在城外西南方向黄河滩涂上的，又怎么可能被称作“城上高楼”呢？甚至还有人怀疑逍遥楼也就是鹳鹊楼，或认为逍遥楼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这又纯系后人的无端想像。殊不知蒲州的逍遥楼毁于五代后，当时即有人将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为此楼书写的“逍遥楼”楼额从原址拓摹了下来。不久就在广西桂林的东城之上重建了一座同名逍遥楼，并依蒲州逍遥楼颜真卿楼额摹片另刻一碑立在桂林逍遥楼上。北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 1102 年），当时广西的经略安抚使程节将桂林逍遥楼改名为“湘南楼”，有人便写了一篇《湘南楼记》刻在桂林逍遥楼重刻碑的碑阴处。值得万分庆幸的是，桂林的这块重刻逍遥楼碑至今仍完好保存在桂林山水之间，并有新建逍遥亭。这块几乎是蒲州逍遥楼毁圮同时重刻的桂林逍遥楼碑，不但展示了桂林逍遥楼的启建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保留下了原建于祖国北方蒲州古城逍遥楼的唯一一件今人仍可见得到的重要史迹证据。根据新旧两《唐书》记载，颜真卿曾于唐肃宗乾元元年至二年（公元 758—759 年）之间做过短暂时间的蒲州刺史。但从现存于桂林的逍遥楼重刻碑原有题款纪年看，“逍遥楼”三个颜体大楷左侧，是“大历五年正月一日颜真卿书”12 个颜楷小字，公元纪年序列当是 770 年，即颜真卿作蒲州刺史整 10 年之后。时年颜真卿已是年满 60 花甲之人。如果判断无误，此时的颜真卿应是在长安做京官，并已晋封为鲁郡公。从某种角度看，颜真卿的逍遥楼重刻碑虽然现在属于广西桂林的文物遗产，但以研究山西古代历史上的文化名胜而言，则具有更重要一层的意义在里边。

大书法家颜真卿的题书匾额未能保住一代名楼而不被毁，但是和韩愈齐名而且相从友善的另外一位唐代文坛的名人樊宗师，却由于写了一篇几乎举国皆知的怪文《绛守居园池记》，竟使得绛州城内的一代名园由隋唐而完整保留至今。这座绛守居园池的得名与它所居位置以及始建园池主人的身份，

[①] 《蒲州府志·艺文》，清乾隆十九年（公元 1754 年）版。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园池原址在未建池前本属当时绛州州署的后院。隋开皇十六年（公元 596 年），当地的内军将军兼临汾县令梁轨，为了解决城周农田的灌溉事宜，遂将城北数十公里之外的鼓堆泉开渠导引南来。随着又将渠中余水分流引进州署后院蓄作池沼，并建泗涟亭于池中，池畔多植竹木花卉，很快即成郡中一景。这亦即园池初建启始。整整 227 年之后，到了唐穆宗长庆三年（公元 823 年），这时的绛守居园池已成一座名园，园中的著名景致有虎豹门、子午梁、新亭、望月亭、洄涟亭、苍塘、鳌■原、白滨、香亭、风堤、柏亭等 10 余处。园中除养植各种花卉树木如槐、柏、梨、桃、李与蔷薇、藤萝、兰花、蕙草等之外，还有水禽如鹭与鹇等。此年五月十七日，正在此地作绛州刺史的河中怪才樊宗师即在治所一气写出了那篇共 777 个字的怪文《绛守居园池记》。樊的文章在当时素以艰涩难读而闻名，时有“奇学韩愈，涩学樊宗师”的舆论流行于唐元和（公元 806 年）以后，并颇有影响。而樊宗师的这篇《绛守居园池记》一经问世，便使世人难于句读。更令人慨叹的是，此文面世不到一年，作者本人即在绛州任上逝世。他的好友韩愈亲至其家为他写了墓志铭。几个月后，即唐长庆四年（公元 824 年）十二月，韩愈也相继去世。这就是说，包括作者樊宗师本人在内，这个世界上能读通读懂《绛守居园池记》的两个人都不在了，他们未来得及将此文的句读奥秘向世人昭明就相继撒手而去，这应该说是一件匡世奇事。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了一场延续了 1100 余年之久的断句破译《绛守居园池记》的文字疑案。截止目前，虽然历代名家注释也时有所出，但彼此都大相径庭，终久未有真正结果。这或许就是那座建于隋初的著名园林遗址得以完整保存的主要原因吧。为此，我们不妨将樊宗师 777 字的《绛守居园池记》抄录于此，以供有志者得以欣赏或有所发现与探索。文曰：

《绛守居园池记》

樊宗师撰

绛即东雍为守理所禀参实沈分气蓄两河润有陶唐冀遗风余思晋韩魏之相■剖世说总□[1]其土田士人令　无硗杂扰宜得地形胜泻水施法岂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兴废人因得附为奢俭将为守悦致平理■益侈心耗物害时■自将失敦穷华终披夷不可知陴缅孤颠跼倔玄武踞守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大池泓横硤旁潭中癸次木腔瀑三丈余涎玉沫珠子午梁贯亭曰洄涟虹蜕雄雌穹鞠觑蜃碍佷岛坻淹淹委委莎靡缦萝蔷翠蔓红刺相拂缀南连轩井阵中踴曰香承守寝睟思西南有门曰虎豹左画虎搏立万力千气底发彘匿地努肩脑口牙怏抗雹火雷风黑山震将合右胡人鬅黄　累珠丹碧锦襖身刀囊　挝縚白豹玄斑饫距掌胛意相得东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屃护■郁荫后颐渠决决缘池西直南折庑赴可宴可衙又东骞渠曰

[1] 原碑此处漫毁，缺一字。

望月又东骞穷角池研云曰柏有柏苍官青士拥列与槐朋友■阴洽色北俯渠憧憧耒刮级迴西巽■间黄原玦天汾水钩带白言谒行旦艮间远■青縈近楼台井闾点画察可四时合奇士观云风霜露雨雪所为发生收敛赋歌诗正东曰苍塘蹲濒西漭望瑶翻碧潋光文切镂梨壑挠挠收穷正北曰风堤乘携左右北迴股努墆捩蹴墉衔渠歆池南楯楹景怪烛蛟龙钩牵宝黾灵庁文文章章阴欲垫■湮溃霭褧桃李兰蕙神君仙人衣裳雅冶可会脱赤热西北曰鳌■原开咱储虚明茫茫嵬眼澒耳可大客旅钟鼓乐提鹇挈鹭倡池豪渠憎乖怜围正西曰白滨荟深梨素女雪舞百佾水翠披■■千幅迎西引东土长崖挟横■日卯酉樵途坞径幽委虫鸟声无人风日灯火之昼夜漏刻诡诡绚化大小亭馆池渠间走池堤上亭后前陴乘墉如连山群峰拥地高下如原隰堤溪壑水引古自源卅里凿高槽绝窦墉为池沟沼渠瀑漻潺终出汨汨街巷畦町阡陌间入汾巨树木资土悍水沮宗旅盛茂旁荫远映锦绣交果技香畹丽绝他郡考其台亭沼池之增盖豪王才侯袭以奇意相胜至今过客尚往往有指可创起处余退常吁后其能无果有不补建者池由于炀反者雅文安发土筑台为拒诛几附于汙宫水本于正平轨病井卤生物瘠引古沃浣人便几附于河渠呜呼为附于河渠则可为附于汙宫其可书以荐后君子

长庆三年五月十七日[①]

樊宗师逝世后，身后曾留下了大量著作。其中被称作《樊子》者 30 卷，《春秋集传》15 卷，各种序、记、策、论等杂著 291 篇，铭文 220 件、诗赋 729 篇。这样浩繁的著述，连韩愈也不得不感到惊叹，他认为樊宗师能有如此成就，真是“古未尝有也”。不但多，而且“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②]然而奇怪的是，除了这篇《绛守居园池记》和另外一首题为《蜀绵州越王楼》的五言诗作，樊宗师的其他所有著作竟然都未能传至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使无数后人觉得难堪不解与遗憾。一座著名的中国古代园林的遗址完整地保存了整整 1400 年之久，一篇与此园密切相关的文章也世代相传了 1100 多年——人们的目的可能想通过这篇文章最终搞清这座园林？抑或是想从这座园林的遗址上读懂这篇藏有奥秘的文章？这真是一件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生态史上的奇怪之事！而山西的许多珍贵建筑和古代园林，正是在这种充满奇人奇事和奇异现象的文化沃土上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稀世之品。

[①] 本书《绛守居园池记》原文据永康胡宗楙校锓本

[②] 童第德选注：《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0 页。

第五节　历史纪念地和传说中的先民造物原地

人类历史不管走出了多么遥远的历程，任何国家民族都会眷恋其迈过的每一脚步，其中尤其对曾经发生过重大历史事件或先民有过创造性发明的原地遗址，人们则更会以一种刻骨铭心的行为方式去一次又一次地追寻它、认定它，甚至一年一度或数年一度地纪念它，并向下一代传承这种顽强的纪念形式，使其后代永久继续下去，牢记不忘。这就形成了人类文化遗产生态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类型。近 20 年来，在全世界炎黄子孙中兴起了一种“寻根”热，而且由此将中华民族寻找重要历史纪念地和先民造物原地并以此增强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的活动，欣然推进到了一个空前的热潮中。

洪洞古大槐树处，作为 600 余年前明代初期的移民集散地，由于它在海内外享有的极高知名度，所以堪称为当今山西最著名的历史纪念地之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以及“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等等古代民谚，已成为千百万人中不需作任何解释就能划齐认同的普通知识。但同时这些民谚在更多的人群中所激起的，却还有一种更为深刻和充满理性的文化求索意向。

明初洪武年间（公元 1368—1398 年）到永乐年间（公元 1403—1424 年），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有关这方面的史实不但散见于各地地方文献和当时的私人笔记、碑刻资料，而且更见于官修史书。发生此种大规模移民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当时中原各省许多地方长时间以来，已“多是无人之地”，由于战乱，致使“积骸成丘，居民鲜少”，以致于大量耕地因“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更严重的则是“累年租税不入”，[①]直接影响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政权的财政收入和统治权力的巩固。与中原各省当时的情况不同，此时的山西各地（尤其是晋南一带）相对来讲人口则较为稠密。根据《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的记载，至洪武十四年（公元 1381 年）时，原来经济发达、人口繁盛的河北与河南两地，其人口数量已分别减少到了 189.3 万人和 189.1 万人的极低数字，而此时的山西人口却仍有 403 万人，比河北、河南两地当时人口的总和还要多出 20 余万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廷遂决定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各地，其中也包括京畿地域在内，均属移民迁徙的目的地范围。在山西来讲，虽然移民来源于全省各地，但绝大多数来自晋南和晋东南两个地域，即当时的辽州（今左权）、沁州、泽州、潞安府、平阳府等。而以平阳府为最多，这个府下辖 28 个县，几乎包括了今天临汾与运城两个地区的所有辖区地域，是元末明初时全国经济相对富足，人口也较为集中密集的国中安定丰裕的大府之一。洪洞大槐树所在的洪洞县，即属于平阳府辖下的人口大县。由于该县地处适中，交通便利，无论是东面的沁州、辽州，还是南边的泽州、蒲州、绛州，到这里的道路交通均较方便，且洪洞

[①] 《明太祖实录》卷 148、卷 176、卷 61 等。

又地居太原与平阳两大城市之中，作为山西大规模移民的集散中心，看来当时是非它而莫属了。

作为明初大移民的纪念地，而且有所谓“古大槐树处”称谓以及碑刻与专门建筑，并有正式纪念活动，最早应是在清末宣统年间（公元 1909—1911 年）到民国 3 年（公元 1913 年）。这四五年之间，时有洪洞籍人士景大启、刘子林和贺柏寿等在山东、河南等地做地方官，常常遇到当年移民者的后裔，或以谱牒向他们展示，或述说他们的思乡寻根之情。于是促使景大启、刘子林等人有了筹建洪洞古大槐树处移民纪念地的最初想法，随之即筹募款项，准备建筑事宜。而在此之前，由于汾河向东侵蚀，原来在明初作为移民集散之地的广济寺和寺旁的第一代古槐，则已经沉沦于汾水洪流之中了。从地方文献中可知，广济寺是一座始建于唐贞观二年（公元 628 年）的宏大佛夺，寺侧唐宋以来即有驿站，与佛寺、驿站相邻的是那株名闻遐迩的汉代古槐。据知古槐身粗数围，树冠荫盖数亩，是当地最惹人瞩目的环境标识之物。广济寺与古槐原西邻汾河，汾河在明代水量之大还能行船，河畔水鸟云集，老鹳尤多，许多即筑巢栖息于古槐之上。秋去冬来，槐叶落尽之后，一巢接一巢硕大的老鹳窝鳞次栉比，十分醒目而且壮观。当时由各地集中起来的移民，就是在广济寺造册登记并分别编队，然后发给每人凭照和川资，由朝廷官员率领遣送全国各地。千千万万的山西移民在离开故土之前，其心目中留下刻骨印象的最后一种形象之物，一是那棵汉代古槐，另一个即是最能激起他们凑凉的离乡背井之情的古槐老鹳之窝。

自从清末民初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在原广济寺附近建起名为“古大槐树处”碑亭之后，近百年来过往瞻仰凭吊之人题咏甚多。摩章抚篇，其中不乏撼人心魄与摧人泪下之作。且不说文人笔墨，有一位民国初年曾经担任过陆军第五军六师三旅六团团长、名叫李武扬的赳赳武夫，竟也在此留下了一首题曰《洪崖驻防游古大槐树处怀古》的七言律诗：

阋墙相斗幸方休，一本同根动我愁。
南下雄师曾罗拜，北上壮士亦低头。
碑旁矗立乡关认，经塔高悬过客游。
迁民当日留余荫，嘉树延誉五百秋。

惯于刀枪相见且六亲不认的军阀行伍中人，面对 500 年前移民旧地的一棵老槐，能够触景生情写出如此富有民族情感的诗句，这或许正从另外一种角度证明了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类型——即著名历史纪念地所给予国人的正面教育力量。

多少年未，经有关专家考证研究，仅确切见于史籍的山西明初（洪武至永乐年间）移民，至少有 18 次之多。至于这些移民当时的地理分布，则遍及后来的河北、山东、河南、天津、北京、安徽、江苏、湖北、陕西、甘肃、

宁夏等省、市、自治区。1982 年时，山西省洪洞县县志办公室曾向全国各地公开征集有关明初洪洞大槐树处移民历史资料，得到了来自全国 21 个省、市、自治区共 400 余县的响应。在短短 4 年多的时间里，这些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及当年洪洞移民的后裔，向山西省洪洞县县志办公室提供了包括方志文献、宗族谱牒、笔记碑刻和地名传说等各个方面的资料达数百种之多。如河南民国年间的版本《孟县志·大事记》中即记述，在明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时，“迁山西民于河北，而迁至孟州者十九，皆山西洪洞籍”又河南省民权县地名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调查中发现，民权县全县竟有 60%以上居民户为明初山西移民。而同属河南省的新安县中，普查时竟有 76%的人声称其祖籍在山西洪洞，另外有 23%以上的人则讲他们的祖籍虽然不是来自洪洞，但却同样是明初山西其他州县的移民后裔。在北京郊区大兴、顺义等县，有所谓 58 营或 72 营，多属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之后由山西移民建起的村落。许多村庄至今仍然保留着最初的名称，如长子营、稷山营、屯留营、蒲州营、河津营、夏县营、忻州营、霍州营、大同营和洪洞营等。这些村庄名称均是当年山西移民迁至京郊后，按照原来家乡所在州县的地名沿作新用，作为永久纪念的。桑梓故土观念应该是人类固有的一种天性，然而对中华民族来讲则更为凝重。在中国，历来的故乡情思就与根深蒂固的祖宗崇拜观念紧紧地缠绕萦系于一体。《诗经·小雅·小弁》中已有“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的形象描写，此即大约 3000 年前西周初期时古人对祖宗故土留恋之情的一种纯真流露。东汉发明过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张衡，有《南部赋》传世。其中也有“永世克孝，怀桑梓焉；真人南巡，睹旧里焉”的名句，同样抒发思乡之情。故土难离，业已为我中华民族情感文明中最富有特色的传统标志部分。1991 年 4 月 1 日，山西省洪洞县在明初大移民的纪念地古大槐树处举办首届寻根祭祖节活动，海内外许多当年的移民后裔们都回到了此地。而就在头一天傍晚的时候，奇异的情景出现了。多少年来在当地早已濒于绝迹的老鹳群，此时却迎着绚丽无比的落日任意飞翔，以成千上万只动人心魄的气势，突然又一次降落云集在了已经是第三代的古槐之上，及其他整个披上了节日盛装的古槐公园中的所有树木间。只见“它们时起时落，飞来荡去，交颈偎依，仿佛经年不见的老朋友在倾诉昔日的离别意，畅谈今在它处的思乡情”。[①]一时间明代初年移民故地又鸟声鼎沸，人如潮涌，整个洪洞县内的居民几乎倾城出动，去观看这种数十年不遇的壮观场面。老鹳群 4 月 1 日前夕飞临古槐公园，次日凌晨日出时又结队向东北方向飞去。如此数日，每天如此，直至清明节之后，这多少带有一些传奇色彩的老鹳群方全部离去。当时来自海内外参加此次寻根祭祖活动的许多来客，面对这一奇观无不感到激动与惊叹。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则在此前后用不同形式介绍了当时这种人类文化与自然现象奇妙巧合的特殊景

[①] 黄有泉、高胜恩、楚刃：《洪洞大槐树移民》，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92 页。

观。

“生态经济”这一概念，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对自身与自然资源及其整个人类生存环境之间关系有了高度理性认识时的必然产物。“生态经济”产生的全部意义应该在于这样三个方面：一是人类对自身智能的开发、积累及其保护传承；二是人类对生存环境包括对一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第三则是将人类自身发展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开发利用活动高度协调统一在一个理想水平，最终求得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永恒。无疑，人类因对生存环境或生活环境的选择而形成的迁徙行为，已当然属于生态经济活动中的必然内容之一。人类在一定地域内的环境选择及其迁徙，历史上发生过，未来同样还会发生。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迁徙相比，未来的人类迁徙行为，其区别将在于它会更加趋于自觉、理性和科学。而在中国历史上，与公元 4 世纪初两晋之际及公元 12 世纪初两宋之间因战争造成的人口大迁徒相比，公元 14 世纪末朱明王朝以有组织的行政手段促成的这次大移民，显然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今人给予总结并汲取。单从环境与生态角度去审视，与其将此次大移民单独看作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的政治行为，倒不如将它作为一次历史上成功进行过的巨大生态工程给予重新认识。有许多资料表明，明初的那次大移民不但促使金元之世（约公元 12 世纪初至 14 世纪后半叶）200 余年时间中由于天灾人祸造成的全国生态失衡状态很快得以扭转。单就对山西的生态影响而言，其潜在的积极意义即使在今天来看，也仍然是不可简单估量的。可以这样认为，也许正是由于有了明初那次从山西移民于其他省区的事件发生，遂使明清以后山西省的总人口基数得到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控制，而最终也使得近 6 个世纪以后的现代山西免遭更大的来自于人口方面的压力。

人类虽然也属于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类却把那些没有人类居住或人迹罕至的自然生境称作蛮荒之地。在迄今为止的地球人心目中，只有那些已有人类开发行为所到的自然生境，世人才会真正把其与文化或者是文明这样的概念相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迁徙所至，亦是人类的开发活动之启始。迁徙，当然应该是人类文明传播过程中必然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创物，则是人类文明最初的火炬闪光。

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和重要的文明发祥地，山西高原不但流传着无数美丽的创世神话，同样在此还分布有很多传说为远古时期的先民造物原地。如在山西稷山县的稷王山麓一带，有后稷教民稼穑之地；几乎是在同一地方又有伯益造井的佳话，故当地村庄多将后稷与伯益一庙祭祀，称作“稷益庙”；又如在永济市古蒲州城北有舜帝村和南北陶城村，为传说中所谓“舜陶于河”（指大舜曾在此河滨制作陶器）的地方；在夏县西阴村古有“先蚕娘娘庙”，传为黄帝之妻嫘祖发明养蚕缫丝之处；距离西阴村不远的夏县瑶池温泉旁有巫威山，则传为远古巫咸造鼓之地；再如在平陆县圣人涧附近，传说此地即是商代武丁时期的名相傅说发明民间版筑之术的原地；其他还有仓颉

造字于平阳、师旷辨“三乐”（清商、清徵、清角）于洪洞师村……其中尤以后稷、伯益与傅说的创物之事在历史上最富有人民性，也最具影响。

稷王山，海拔 1279 米。山四周闻喜、夏县、运城、万荣、稷山、新绛诸县从古至今皆为我国传统农业最为发达的地方。山上古有后稷塔与姜嫄塔。传说帝嚳妻有邰氏之女姜嫄履巨人之迹遂生后稷于唐地，今翼城县有村庄名曰“弃里”，即姜嫄生后稷的地方（后稷又名弃）。后稷出生后，帝嚳与姜嫄曾几次抛弃他，其中一次扔在冰池内，有大鸟用羽翼保护他而不死。稷王山东麓闻喜县的冰池村据说就是当时冰池所在之地。后稷自幼即喜做采集野草种子下种的游戏，久而久之，他驯育出了一些最初的谷物种子，尧就让他专管农事。这据说就是我国种植五谷的起始，稷王山一带即五谷的创物原地。有趣的是，稷王山姜嫄塔下散布着许多形状、大小、颜色均与五谷酷似的小石子，古人从很久以前就称其为“五谷石”。人们每年到山上祭祀后稷及其母亲姜嫄时，就都要捡一些“五谷石”回去作为纪念或将其与土地之神供奉在一起。至于伯益，他与大禹一样，都同样生活在五帝时代后期帝舜到夏启的时候。《孟子》、《汉书》与《后汉书》等我国古代经典文献中都秉承了《尚书》的说法，认为伯益知鸟语，善训鸟兽，但《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则又认为伯益不但会占卜之术，而且更会作井。如《吕氏春秋·勿躬》就说：“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稷王山位于晋西南峨眉塬东北侧，当地古井常常掘至百余丈深，饮食用水如粮食一样宝贵。故在数千年的历史上，稷王山一带的人民，祖祖辈辈视伯益和后稷为同样的创物先祖。明清以前，此地的许多村庄中，都将伯益和后稷同庙祭祀，且香火不辍。本世纪 70 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距稷王山不远的夏县东下冯夏末至商初古文化遗址中，曾经发现了多眼距今约 4000 年左右的水井遗存，而这些水井所出现的时间，也应该正是伯益以后不久的那个时代。

关于傅说，史传初为商代第 22 代帝王武丁时候的一位奴隶，距今 3500 年左右。在司马迁的笔下，曾记载了有关他的这样一段故事：“帝武丁继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迺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①]通俗一点去讲这段史事，那就是说商王小乙死后，他的儿子武丁继承了帝位，于是想把当时已很衰败的国政再振兴起来。但苦于没有一个得力的大臣扶佐他。就因这件事他郁郁寡欢，竟然 3 年常常沉默不语，把国中事务交给身边大臣去处理，他则静静地去留心观察。一天晚上他突然梦见得到一位叫做“说”的贤圣之人。第二天他在朝中群臣中遍寻梦中之人，但没有一个是

[①]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102 页。

“说”。武丁下决心派人四处去国中寻访，最后在一个叫傅险的地方找到了那位叫“说”的人，却原来是一个专做版筑夯土之役的奴隶。当“说”被带到宫中后，武丁说没问题，我梦见的就是此人。武丁是礼贤下士的中兴之王，与这位“说”亲近深谈之后，认为“说”果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于是马上举封“说”为冢宰国中大事的首相之臣，衰败的殷商迅即又振兴起来。因为“说”是从傅险那个地方找到的，所以就称他为“傅说”。

傅险这个地方历史上又称傅岩、圣人涧、隐贤社等，位于三门峡市北，黄河北岸，今山西省平陆县城东北城郊。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水经注》中早有记载：“水北出虞山，东南经傅岩，历傅说隐室前，俗名之为圣人窟。”郦道元在此还引用西汉初年汉武帝时经学家孔安国《尚书孔氏传》中有关记述说：“傅说隐于虞、虢之间。即此处也。”[①]可见早在2100多年前，平陆傅岩处已被确认为傅说之故里，并可能已有纪念性的建筑如祭祀这位圣人的傅说祠等，也未可知。历代古人在傅岩的诗词题咏甚多。如唐代湖南籍诗人胡曾即有《傅岩》七绝一首传世。诗曰：

岩前版筑不求伸，
方寸那希据要津。
自是武丁安寝夜，
一霄宫里梦贤人。[②]

随着近几十年夏商周三代考古工作在全国范围的深入展开，商代用夯土版筑技术建成的古城遗址在中原地区，甚或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屡有发现。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尸乡沟遗址、郑州商城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山西东下冯商城遗址、垣曲古城东关商城遗址、河北■城台西遗址等均是。而这些商代版筑夯土遗址恰恰证明了傅说版筑的真实性。历史上古人选择了傅说作为中国版筑刨物之祖，这极有可能正是因为他本出于奴隶平民的特殊身份，而倒不在于他是否真是版筑夯土技术的发明人。在这一点上，人民与历史选择了傅说，因为他偏偏具有某种代表性和典型性。事实上，现在看中国历史上的版筑夯土技术可能早在武丁与傅说之前就已经诞生于世了。在历史上，傅说还常常被傅姓之人奉为傅姓始祖。明末清初山西阳曲籍的哲人傅山先生即曾以自己为傅说之后裔而为荣。太原城内当时就有傅家巷，为傅氏家族故居所在。傅家巷曾有很气魄的牌坊，坊上题额写的即是“版筑故居”。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证，证明傅山家族即以傅说后裔自居，也证明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已承认傅说是中国古代版筑夯土技术的莫基创物之祖。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自古以来即对本民族的创世

[①] 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1990年版，第80页。

[②] 《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432页。

创物的渊源多有追溯与探讨，有关此类的考证求索同样代有涌现。在这一方面，大至氏族起源，细至诸事物类，即常常引起人们寻觅其根本的兴趣。1989年以来，本书作者曾在山西省的东南隅发现，中国围棋起源竟和太行山水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围棋，虽然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成为风行于世界各国的国际流行棋类，甚至早在公元7世纪左右时就由中国流传到了东亚各国如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但讲到它的初始起源却至今仍然令人无从了解，感觉是一片空白。在我国古代一些历史文献中对此事也时有提及，如公元3世纪时曾经受到当时被称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颇多赏识的河北人张华，他在其名著《博物志》中就写到过“尧造围棋而丹朱善围棋”。[①]类于这样的简单记述在其他一些史籍中也有，虽偶有不同，如把尧记作舜等等，但终未给后人提供任何有关围棋起源的技术细节，加之尧舜与丹朱终究皆传说人物，所以还是不得要领。但出于先秦时期的典籍《左传》中有“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举棋不定，不胜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①]这样的话，《论语》中也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②]之语，《孟子》中则直接记载了一位善于弈棋者的名字：“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③]这里引用的三则记述虽然仍未使我们得知围棋的最初起源时间，但它却确切地告知后人，即中国的围棋至少应该在孔孟生活的那个时代之前，即距今2500多年前的公元前6世纪时不但已经存在，而且已经普及于世了。

中国叫“棋子山”的地名很多，但是山西省陵川县有一座棋子山却很特别。此山位于号称“华北之脊”的太行山南部最高峰处，海拔在1700米左右。山上到处散布着一种圆润光洁、黑白分明而且形状酷似围棋棋子的天然石子。从一个山洞中我们偶然发现了一块古人祈雨遗留在这里的清康熙年间的碑刻，碑文中又称此山为“谋棋岭”。由此我们得以知道山上的天然棋石确实在历史上曾被古人作弈棋之用。陵川棋子山在很古的时候又被称作“箕子山”。《山西通志·山川》一节中明确记载着：“箕子山，在县东二十里，递高五里，西南山麓石上存巨人足迹。相传箕子避地憩山中，及武王访以治道，于此纳履焉。”[④]箕子，是商朝末年著名的贵族人物，商纣王帝辛的叔父，与当时的微子、比干齐名，史称为“殷末三贤”。微子的封地据说在今山西省潞城县的微子镇一带，距河南安阳的殷墟很近。而箕子的封地据说称“■方。”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讲过：“从文献看，山西，至少是东南部，本来是商朝王畿的一部分。文献记载，商朝在这里有几个封国，最主要

[①] 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4页。

[①] 《左传》，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233页。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页。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2页。

[④] 《山西通志》山川卷，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版。

的是箕子的箕。微子的微还有争论，箕没人说是在山西以外……”[1]从这一点看，陵川棋子山则极有可能就是商末箕子的封国范围。陵川古箕子山曾是三条古老河流的发源地，一条西流入丹水（此丹水因尧子丹朱而命名），一条南流称平田水，第三条东流者即是古淇水的南源，源头即在今天棋子山中。商纣王帝辛最后自焚之地朝歌城就在淇水下游，因有淇水从城北流过，遂后来此城就成为淇县县治所在。这真是一个令人十分惊异的谜一般的巧合：

先是棋子山的“棋”，
接着是箕子的“箕”，
再就是■方的“■”，
最后则是淇水的“淇”。

四个带“其”字的汉字曾引起本书作者无穷的深思与兴趣。而事实上，若果穷本溯源，不仅是棋、箕、■、淇这四个字，甚至包括期、基两字在内，它们实际上均来自于汉字初创（亦即甲骨文时期）时的“其”这一个字。历史上的古文字学家曾经认为，“其”这个字的本来之义是指簸箕这种东西。而现在看来，这种解释确实太有些肤浅。“其”字的本义在其创始之初，其本有的文化内涵应该丰富得多。如果说，田地的“田”字在甲骨文时期甚或在其作为远古刻划符号时的本义决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耕地”的话，那么，“其”字在殷商以前的本义所指，也自然决非是指什么“簸箕”之类而言。我总以为，“田”字在先民造字之初时，它应该是古人对大地空间认识并初有理解后的原始抽象概括，其基本字形中业已包涵了“东南西北”的“四方”指认意识在其中。而至于“其”（甲骨文中它写作“■”）字，它在先民造字之初，则应该是古人对天体时间认识并初有理解后的原始抽象概括，其基本字形中则业已包涵了“二分二至”（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四时”指认意识在其中了。换一种话说，“田”与“■”作为原始刻划符号，应该在甲骨文字诞生前的夏商之际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就已经诞生。字中“＋”与“×”两种图案事实上在此分别代表了大地的四方位置所指和天体运行的四时位置所指。后世直至近现代的地图经纬分野图示以及时钟环周刻度图示，实际上它们均发端萌生于“＋”与“×”这两种远古先民发明创造的象征大地空间与天体时间的最基本的原始图符框架。约到了商末周初以后，中国出现了一种专门用于对天地万物作占卜预测的卜筮器具。司马迁的《史记》中称它为“旋式正某”，实际上就是我国后来沿用了几千年的罗盘，或者又称占盘。这种叫做“旋式正某”的卜筮器具目前还可见到的最早的实物，是考古工作者在西汉古墓中发掘出土的 2000 多年前的制品。某盘分上

[1]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57 页。

下两层，上为圆形天盘，下为方形地盘，即所谓“天圆地方”，无疑就是“田”与“■”两个甲骨文字字义的物化。从此也可以更进一步地看出，“其”这个汉字初创时的本义应该就是专指时间，即天体运行的。至今发现的汉代“旋式正某”的天盘中心常常绘有“北斗七星”图案，已形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史记·日者列传》曰：“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正某，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而关于“旋式正某”的形状及其操作方法，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引》曾有过如下简明解释：“式即栻也。旋，转也。棊之形上圆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则转天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状。正棊，盖谓卜以作卦也。”[①]中国古代的围棋，在书写时曾经长期写作“围棊”或“围碁”。把围基本写作“围棋”当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显然，围棊之“棊”正是来自于“旋式正棊”之“棊”。在这里，当然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借用一个字的表象。正因为围棋原本脱胎于“旋式正棊”，所以虽然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围棋的技术原理中至今竟仍然孑遗了“旋式正棊”中的很多信息和特征。当代《围棋辞典》和围棋棋枰上仍能找到“太极”、“四时”、“五行”、“八卦”、“九星”等辞目或方位，即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旋式正棊”在商周之际形成初始时，其主要功用曾经是用以纪时或制定历法。所以，我国天文纪时和历法术语中有“小劫”、“大劫”、“万劫”、“亿劫”、“劫初”等专门概念，而在今天仍然使用的围棋术语中，也就有诸如“开劫”、“粘劫”、“补劫”、“应劫”等等。我国天文纪时历法术语中有许多与“投、断、飞、提”有关的辞例，如“投暮”、“断梅”、“脩飞”、“回提”等，无独有偶的是，在围棋用语中则也有像“分投”、“断点”、“小飞”、“提空”那样的内容。从古至今，在人类的心目中，所谓“天象”，事实上总与“气象”无法分开。所以《浑天仪·注》曰：“天地各乘气而立。”《穹天论》也认为，天地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气充其中故也”。我国古时很早就把一年中的 24 个节令称作为“二十四节气”，人类实际上早已认识到“气”乃大自然中的万物之本源。“旋式正棊”之上无疑其中心操作机理即是天地之气的运数，所谓“气数”。毋庸置疑，围棋从它脱胎于“旋式正棊”的初始起，其起源与形成事实上依据讲求的也同样是一个“气”字。围棋对弈中与“气”字相关的术语是那样的多，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例如“收气”、“紧气”、“长气”、“延气”、“杀气”、“撞气”、“内气”、“外气”、“气眼”和“气数”等等。千百年来中国历代方士手中的罗盘之上，不但有“二十八宿”、“八卦”、“九宫”、“十天干”、“十二地支”等内容，而且天地万物几乎无所不包。所谓“包罗万象”一词，事实上就是专指这种罗盘，也就是占盘或“旋式正棊”而言的。但我以为“旋式正棊”初始之时，其最基本的内容却应该是一年的周期标志，亦即天干地支和“二十四节气”。

[①] 《史记》，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3218 页。

围棋棋枰从其最初的“九宫”定式发展到最终汉以后的“十九路”定式，无疑其哲学依据是和秦汉以前的“旋式正棊”是出自一统且一脉相承的。1993年初，本书作者最初发表了题为《论陵川棋子山与围棋起源》[①]的研究论文后，曾很快引起了海内外棋界许多人士的关注。家居山西太原的江氏围棋世家中的江盛久女士，特意将她保存的日籍华裔棋圣吴清源先生的回忆录《以文会友》赠我拜读。当我读完此书后，我惊喜地发现，吴清源先生对中国围棋的起源问题原来早已有过与我相类似的认识。他在书中说：“所谓国手，在中国相当围棋名人之地位。在古代，‘国手’原是指占卜阴阳、观测天文、谙知历法、指导农业生产等活动中担当‘领导国家之手’重任的人。据说，围棋原是作为占卜天文、阴阳的工具而发祥，所以‘国手’即操纵围棋的人。嗣后，围棋逐渐演变为一种赌斗胜负的竞技，但‘国手’这一称号却依然保存下来了。”[②]在此书的另外一个章节中，吴先生将围棋起源的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说：“众所周知，围棋的发祥地是中国。据说围棋最早出现于太古时代，尧帝受仙人赐教之后，又将围棋传给了太子丹朱。然而，围棋发祥之初，并不是为争夺胜负，而是为了观测天文。在尚无文字的时代，棋盘与棋石是观测天体运行、占卜阴阳的工具。围棋到底何时成为胜负之争的竞技工具呢？至今仍无定论。但可以确定，围棋成为竞技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①]

吴清源先生书中对中国古代围棋“国手”的解释自然使我们立即想到了商末曾经隐居在陵川箕子山的箕子。箕子显然正是夏商周三代国中专事占卜阴阳，观测天文天象，而且谙熟历法，并以此指导国中农事渔牧甚或出征活动的重要人物。先秦典籍《韩非子》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说在商末时，当时的商纣王帝辛已是穷奢极欲，经常在朝歌宫中与宫女们不分白天黑夜地寻欢作乐，竟然弄得连节令时间都搞不清楚了。他问身边的人，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回答上来。于是就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则直言对来人说，作为一国之主已经昏庸到了弄不清天之时日，而且朝中之人均皆如此，看来殷商的天下快要完了。整个国家都陷入如此一种不知天时的状况而只有我一人独知，看来我也危险了。于是，箕子由此也佯装醉痴而辞职远走。周武王率师灭商后，曾遍访箕子王国中，想请箕子为周主持天道卜筮大事。箕子对周武王的请教曾作过一番认真的回答。他不但详细地讲了许多阴阳四时和五行星象一类天道理论，而且还郑重向周武王建议，说你如果要解决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就必须要选择善于卜筮之人，命令他们去进行各种天象卜筮活动。著名的古籍经典《尚书·洪范》，据知即是周武王和箕子这次谈话的历史记录。南朝宋人范晔作《后汉书》，其中将阴阳卜筮称为“箕子之术”，

[①] 《新华文摘》，1993年第12期。

[②] 《以文会友》，《围棋春秋》杂志特辑，第165页。

[①] 《以文会友》，《围棋春秋》杂志特辑，第198页。

说明箕子在殷商宫廷中应该是专门从事观测天象和阴阳卜筮并负责制定历法的贵族人物。这自然也符合我国古代几千年中封建统治者严禁民间私自从事天文制历活动的传统规制。正是从箕子在殷商时所承担的职责分析，陵川箕子山应该即是殷末箕子观测天文气象并从事制历活动的地方。而许多人都曾注意到，除了山西省陵川县有一个箕子山外，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几个省区在历史上同样分别存在过好几处“箕山”或者“箕子山。”例如仅山西省内就还有太谷、榆社、左权（古辽县）、平陆、吉县等县境内发现有箕山或箕子山；在山西省以外，则有山东聊城、鄄城和河北行唐、河南登封等地也有箕山或箕子山。这一情况说明，所谓“箕子”这一名称在殷商时可能并非专指某一人，它极有可能是殷商从汤立国时起，或者更早在先商契封于商地时就已经存在了的贵族世袭职称，就像明清时的“晋王”或“恭亲王”那样存在着子孙世袭一样。殷商从契封商开始到商汤灭夏立国而直至殷纣亡国，其间大约经历了 800 余年或近千年的时间，仅汤以后就曾有过 30 代商王。按古文献上记述的习惯说法，殷商的都城迁徙从契经汤到盘庚就也有过 13 次之多。所谓“前八后五”，即商汤以前迁都 8 次，商汤以后至盘庚迁都 5 次，这可能还未算纣王灭国时的商的陪都朝歌城在内。也就是说，随着一代又一代商王的更替，专门从事国中卜筮制历的箕子也就有可能出现过许多次的世袭更替；而多达 13 次的都城迁徙，则当然也会使观察天文气象和星象活动以便授时制历的箕山或箕子山同样出现同步的迁徒。这极可能就是在晋、冀、豫、鲁各省出现多处箕山或箕子山的主要原因。

重要的是，以上的探索与分析并非是凭空臆想。就在这些已发现的箕山或箕子山附近，我们现在都几乎很容易地发现了有关殷商在那里建都的传说，或是在其附近已有被现代考古发掘证明了的重要殷商城址或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存。晋、冀、豫、鲁箕山或箕子山的分布区域竟与历史记载及民间传说中殷商都城频繁迁徙的基本地域完全吻合，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感到十分惊讶之事。例如山西左权箕山就与传说中的商都“邢”（今河北邢台）邻近，山西吉县箕山与传说中的商都“耿”（今山西河津）邻近，山西平陆的箕山则与今垣曲县已被考古发掘证明的重要商城遗址或传说中的商都“亳”邻近，山东聊城与鄄城的箕山则邻近传说中的商都“奄”（今山东曲阜）或是河南商丘，河南登封箕山距离已确认的告成商代古城遗址更是十分接近，山西太谷箕山毗邻的“白燕遗址”，则是被李学勤先生称为是“从龙山到商代各阶段都有”的重要文化遗址。至于山西陵川箕子山，它与河南安阳殷墟以及古朝歌（今河南淇县）的距离更是非常接近，两地到陵川箕子山皆 70 公里左右。从时间发展顺序上说，陵川箕子山应该就是商第 19 代王盘庚自“奄”迁殷（今河南安阳）之后直至殷纣亡国这 270 余年间，末代箕子进行观象授时的地方。

吴清源先生认为远在尚无文字的时代，棋盘与棋石只是观测天体运行、占卜阴阳的工具。看来，无论是作为占卜工具还是围棋棋具，最初的围棋棋

石在其质地特征方面有两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一个是它肯定是石质的，这从古代围棋的棋字曾经写作“碁”就可作为证明。另外一点那就是最初的围棋棋石绝对不会是人工制品，它应该也只能是一种天然之物。陵川棋子山上到处分布的那种圆润光洁、黑白分明、形状酷似人工制作棋石的天然石子，难道不就是吴清源先生所讲的那种先作远古占卜工具而后又成为围棋棋具的物体吗？人们都认为陵川棋子山上的天然棋石是那样的“酷似围棋”，现在看这样的说法并不妥当。恰当的说法则应该是，陵川棋子山上的天然棋石，本来就是商末箕子用以观测天体运行和占卜阴阳气象的卜筮工具，当然也就是围棋在中国出现后最早的原始棋石。我国古代时人工制作围棋棋石的历史，少说已经有 2000 余年，而最初在其制作工艺的规范方面，例如后来人工棋石的取形标准与取色标准的选择等，其原始的参照实物，无疑即是陵川棋子山上的这类天然棋石。古人将陵川棋子山又叫“谋棋岭”，已经从另外一种历史与人文传承的角度，为我们的这一结论作了一个很雄辩而又实实在在的旁证。

那么，“围棋”原本作为一种观测天体运行和占卜阴阳的工具，它究竟是在何时演变成为一种属于胜负之事的竞技工具的呢？吴清源先生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高的悟性，尽管他不能断然作出确切结论，但是他又毕竟果断地道出了他对此一问题的认识。他道出了“可以确定，围棋成为竞技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语。我们已经知道，远古之时先民之所以要注重观测天象与气象，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这种观测掌握各种天体，如日、月、星、云等的运行规律和周期，然后藉以授时制历，即编定历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种不同历法，如所谓“夏历”、“殷历”、“颛顼历”、“太初历”等。据说，仅在周代以前我国先民就曾使用过 6 种历法，即千百年来传说的“古六历”。事实上，历朝历代都有修订历法的人事不时出现，例如直到元代时，就还曾有过像郭守敬等人编制的“授时历”出现。但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的张培育先生认为，“从出土文物中就可知道，至迟在殷商时期我国已有一定水平的历法。”[①] 这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上就可以看出当时人已能熟练使用干支纪年。

殷商后期历法的趋于成熟定型，无疑标志着在此之前那种使用诸如棋盘棋石等原始方式观测天象和占卜阴阳活动濒于结束。显然，也只有这种时候，原来的观测占卜工具，也才有可能逐渐变异为像吴清源先生所讲的那种进行“胜负之争的竞技”活动的器物。这当然就是围棋产生的时代背景。吴清源先生断言围棋成为竞技活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商朝的灭亡至今起码已有 3000 年以上的时间。显而易见，这又是一次多少带些传奇色彩的文化传统认识上的自然巧合。而看来属于“自然巧合”的事情还不止于以上讲的

[①] 《中国古代天文文物》，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9 页。

这些。当本书作者在对中国围棋起源的地域及时代背景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曾注意到在我国北方地区，其中特别是在黄河中下游各省区的民间，至今仍然保留流传着一种原始棋类，其棋枰图案呈“■”形状或者是“■”形状。这不能不使我们把它和商代甲骨文的“■”字字形联想于一起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试想，这难道也仅仅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令人惊异的是，对于这种原始棋类，在其他许多省区民间其称谓已经褪化变异得有些粗俗不堪。如有的地方叫它“裤裆棋”，有的地方则干脆称它为”掉茅坑”。然而，在与陵川棋子山毗邻的晋东南和豫北一带，人们却仍对它保留着一种十分儒雅古朴的名称——“占方”。这自然又使我们想到了殷商时的箕子和箕子的阴阳占卜之术，甚而还联想到了殷商时对诸多方国的习惯称谓。例如“上方”、“鬼方”、“虎方”或“■方”、“■方”等。

也正是在作过了这许多调查与思索探求的基础上，本书作者在 1993 年初提出了陵川棋子山以及淇水的上游地区一带，应该是中国围棋的起源地。换言之，如果说中国围棋有一个原始的造物原地的话，这就是山西省的陵川棋子山及其古老的淇水源头地区。

对 19 世纪美国杰出的社会科学家摩尔根的名著《古代社会》，恩格斯曾经认为它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完全可以与达尔文的学说相提并论。当我们现在探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原始造物活动时，摩尔根的一些话确实可以给予我们很多有意义的启示。比如他说：“近代文明吸收了古代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使之面貌一新；近代文明对人类全部知识的贡献很大，它光辉灿烂，一日千里，但是，其伟大的程度却远远不能使古代文明暗淡无光，并使它沦于不甚重要的地位。”[①]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甚至还引用了摩尔根的这样一句很生动深刻的话，他说：“自从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却往往出现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②]的情况。即使在今天，难道不是经常还可碰到这样一些情况吗？有关对中国围棋起源的探索是这样，有关对鼓在中华文明史中的起源的研究同样也是如此。有的古文献中讲鼓的最早发明人是商代的巫咸，但是现代的考古工作者，却在比巫咸早出许多个世纪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遗址墓葬中发现了用鳄鱼皮蒙制的原始木鼓。这正像摩尔根所讲的，面对着人类先祖留给我们的一座座文明遗产的宝库，现代人却常常丢失了其门锁的钥匙。这真是一种令人们感到迷惘而且不知所措甚或是尴尬难堪的事情。然而，如果当人们一旦破译了那些历史奥秘的密码，得以重识并洞悉那一个个文明遗产之谜时，除了惊喜与欢欣外，还要珍惜与百倍地爱护并承担起使它们能够永久地传承于后世人类——此时的人们却又常常忽视与忘记了这更为重要的一点。这才是值得我们给予特别深思的一个永

[①]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第 29 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26 页。

恒的历史性的主题。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中华民族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与研究业已形成了一波新的高潮。在这一方面，山西高原无愧于是一块蕴藏了极丰厚遗产资源与宝藏的沃土。

第四章　山西自然遗产生态资源

人说“天下黄河富一套”。所谓“一套”指宁夏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的河套地区。黄河从河套地区东流近 500 公里遇到了著名的阴山山脉，于是折而向南直泻约 1000 公里，直到碰撞到秦岭山脉时又猛然向东奔腾而去，一路上留下了壶口瀑布、龙门激浪和三门砥柱诸多天险奇观。虽然千百年来曾有过许多的饱学之士对这一段黄河留下过多少吟咏和赞美，然而，历史上的任何伟人却都未能预料得到，黄河的这一程自然流泻竟为 2000 余年来山西高原的行政沿革，断然划定了一条固定的西南部边界标线。雄壮苍劲的太行山脉，世人习惯于以“脊梁”或“屏障”去形容于它。它横亘于华北平原的西部，从北向南绵延数千里。据说其伟硕无比的体魄隆起形成在 1 亿多年前的燕山造山运动之中。宇宙间若果有什么造物主的话，恐怕它更无法估计得出，太行山脉会成为后来山西一省的东南标界。更使今人感觉到无穷奥妙的是，2000 多年时间中在阴山南麓修起的万里长城，竟然能够自然而然地作了山西省今天的北部界标。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除了台湾省和海南省的地理界线充满自然特征外，山西省的行政边界可能是唯一一个充满了自然造化特征的地理单元。天造地设，贵在自然。像山西界标这般神奇，你在中国大陆是断不会找出第二个来的。

在遗产生态资源方面，山西高原上遍布着无数的历史文化之谜，同样也存在着数不清的自然生态奇迹。

如果用时间去衡量，充其量人类的原始先祖森林古猿的生活时代距今也就是 2400 万年至 600 万年，但是，地球的存在却已经有 48 亿年的历史了。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说过：“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经过了几十万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人的生命中的一秒钟。但是，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①]稍后，在谈到人作为高级动物和其他低级动物的区别时，恩格斯又说：“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②]

不言而喻，劳动无疑促使了人类本身的迅通进化，但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劳动更急骤地改变着曾自然地度过了几十亿年的原始自然环境。须知，19 世纪当时只有 16 亿人口的地球和如今已有 60 亿人口的地球，在对自然界所施加的影响方面毕竟已有天壤之别，600 万年以前只会从野生丛林中靠采摘野果充饥的人类远祖，当然和 600 万年以后已能使用电能机械搬山填海或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1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17 页。

矿冶炼的他们的后代相比更是不能同日而语。在此，如果我们变换一种角度再去审视千百万年以来人类的行为——当然也有劳动在内，而正是这些包括了劳动在内的行为，在使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方面发生着令人忧虑的变化。所以，恩格斯在这里紧接着就向人类发出这样的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①]当我们虔诚认真地引用并深深思考过以上恩格斯这位伟大哲人的那些关于人、人的劳动及其与自然的关系的论述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去居高眺望一下曾被多少古人称之为“表里山河”的苍茫的山西大地，我们的心灵深处不由不引起某种强烈的震颤。这不仅仅是因为自然界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早已开始报复我们，而更主要的则是因为我们之中竟然还有许多人并未清醒地知道，我们其实正在不知不觉之中一天天地失去自然，失去原本浩瀚无际且种群无数的自然资源中的种种珍贵而且活生生的生境。

本书仅在此择其要向读者介绍山西高原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而且目前还有相当规模遗存的几种正在被人们日益关切的自然遗产生态资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12 页。

第一节　高山草甸与森林

在现代人的眼中，山西高原是一块到处布满了山川峡谷和沟壑丘陵的土地。除了置身于省境中几个盆地（如晋中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上党盆地等）中时还可以感觉到某种视野上的辽阔印象外，面对整个山西全境 75%以上那种高低迥异、起伏不平的景象，许多地理学家或地质学家就常常以“支离破碎”来形容这块古老土地的整体地貌。然而，地质史上的悠久记载却告诉我们，原来山西这块大地在渐新世中期（约 5000 万年以前）时，也曾有过一个地形十分广阔平缓的准平原化时代。地质史上称它为“北台期”，而地质学家们则常常把经历了后来地壳剧烈隆起或断陷后侥幸遗存保留下来的“北台期”平原残块，又称为古老的第三纪“夷平面”。而这种“夷平面”，也正是此处要讲的所谓山西省的稀有自然遗产生态景观——高山草甸。

本书前面章节中讲到山西省的历史文化名山时，曾经介绍过位于沁水、垣曲、翼城等县交界处的历山主峰舜王坪。舜王坪即是山西省高山草甸自然景观中最典型的一处。目前山西省自然孑遗的为数不多的几处高山草甸，多分布在海拔 2300 米以上的高山主峰地区。诸如五台山的五个台顶（即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绣峰、北台叶斗峰和中台翠岩峰）、芦芽山的荷叶坪与黄草梁、关帝山的跑马滩和析域山的圣王坪、石膏山东麓沁源一侧的花坡等均是。山西省境内这几处高山草甸因所处地区纬度和海拔高度的不同，所以各自呈现出的景观特色也稍有差别。其中尤以荷叶坪与舜王坪最为著名，其风景景观也优于其他几处。荷叶坪海拔 2738 米，地处北纬 38°44′，面积约近 50 平方公里。舜王坪海拔 2358 米，地处北纬 35°23′，面积约 20 余平方公里。许多第一次登上历山舜王坪或芦芽山荷叶坪的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奇异感觉。那就是他们突然都产生了同样的地理错觉和环境幻觉。认为他们所置身的地方不像是在山西——一个常常被世人称作为黄土高原的省区，而倒像是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或者是在大西北的天山脚下一样。因为当他们刚刚踏进坪甸的边沿地带时，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显然就是那种只有在天山脚下能够见到的，由杉树群落与草原牧坡毗邻共同组成的特有风光景色；而当他们进入坪甸中心腹地时，杉树群落看不到了，能看到的尽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风景。应该说，人们的感觉并没有错。只不过这里确实不是天山脚下或内蒙古草原。关于这一点，生物学界的专家们在谈到像历山舜王坪和芦芽山荷叶坪这些山西高山草甸上的植物种系时，确实也明确地讲到过，事实上山西高山草甸的植物种系不但与内蒙古草原的植物种系关系较为密切，而且与青藏高原亚区的植物种系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有种”[①]类型。也就是说，在几千万年以前，当山西高原的原始地貌还没有出现由于地壳隆

---

① 《山西植物志》第 1 卷，中国科技出版社 1922 版，第 11 页。

起或断陷而形成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支离破碎”的状态时，那个距离我们已经十分遥远的准平原化的山西高原，事实上原本应该是和西南的青藏高原以及北部的蒙古高原连接在一体的，而且彼此之间曾经属于一个十分相似或者完全相同的生态地域类型。山西今天仍然遗留保存下来的这几处为数极少的高山草甸，无疑就是那个曾经存在过的神秘的地质时代的原始证据。联合国教科丈组织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确定“自然遗产”的保护范围时，曾特别强调那些“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和“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应该属于受到保护的自然遗产范畴之内。现在看，山西省这些幸存下来的十分珍贵稀有的高山草甸景观，显然即是《公约》中指认的那种具有科学和保护价值，而且保存了突出的自然美特色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类天然名胜。人们可以通过对山西现存高山草甸的观察和了解，藉以想像那数千万年以前属于显生宙时期的东亚古大陆的原始自然形态。

现代地理学家们根据山西地貌的海拔等高区别，依次从低往高将其划分为盆地平原、黄土台地、丘陵、低山、低中山、中山与高中山等 7 种地貌形态类型。山西的高山草甸即都处于大约 2300 米以上的高中山之上，属于山西海拔最高的自然遗产生态风景景观。而与高山草甸紧相毗邻的，则就是海拔高度仅次于它的由云杉、华北落叶松、油松、白桦树、辽东栋、侧柏、山杨树、五角枫等树种主要组成的山西高原上的森林群落带系。无论从水系分布、地表土壤分析或者是地下煤层蓄藏面积的地质特征任何一个方面去看，历史上的山西高原无疑是一个森林遍布的世界。正像我们已经知道的，森林古猿曾是现代人类的原始先祖。也就是说，人类是从森林中走出来的。仅从已发现确认的中国旧石器时代古人类文化遗址中有 60%以上就都分布在山西高原这一事实来分析，也可证明千万年以前这一古老大地上森林茂密的程度。

但是，人们又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严酷现实，那就是，我们人类距离森林确实是越来越遥远了。这一点在山西高原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随着人口日益增长而由此带来的耕地面积的扩大，甚至还有现代都市生活对处于交通闭塞和文化科技落后地区人群产生的越来越明显的吸引因素，一方面是森林生境的濒于萎缩，另一方面则是许多山区人口向平原城镇的人为集中。有基于经过一定调查与研究后的统计数字表明，目前山西总人口的 65%左右都已集中在了只占山西土地总面积 30%左右的盆地平原地区，或者是邻近平原的丘陵缓坡地区；而在占有山西全省土地总面积 70%左右的准山地地区内，仍然生活在那里的人口数字却仅占山西总人口的 35%左右。总之，像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一样，在山西这块古老土地上似乎人类越来越对“森林”这一本属于自然生态方面的概念生疏而且久违了。许多久居工业大都市的人们现在已经开始渴望能够在周末举家置身于真正富有原始自然气息的森林生境之中，但同时，却又有另外许多本来久居在深山老林之间

的人们，却因为神往于山林外的那个布满霓虹灯和立交桥的五彩世界，而不断地离开大山与森林。这是一种日益显著起来的充满了时代特征的新的“围城”现象。除了这些，还有一点可能也仍然未能引起过社会学家们的注意，那就是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相当久远的时期，在人类对自然森林的维护和保持方面，本来属于一种出于自然本能的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自觉行为，但是，我们现在往往看到的对森林自然遗产的保护却在日益走向职业化。换言之，这也就是说，对森林自然遗产的保护在目前许多人的心目中，已经错误地被认作为只是有关森林专业机构或少数职业管理人员的责任，而竟可以与全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关。如何真正使大多数人们在该问题上警觉起来，显然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有资料表明：山西境内原有大面积的原始自然森林真正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极有可能仅是明中叶以后近 500 年来发生的事情。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恐怕首先是由于人口急骤增长而引起的毁林拓荒；明以后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取材是第二个主要原因，因为历史上山西四邻周边省区大面积自然森林极少，华北乃至黄河中下游平原各省建筑工程所用木材来源曾主要依靠山西；第三个原因则是由于现代战争的破坏，其中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的破坏与掠夺；如果说还有第四个原因的话，本书作者以为那就是近百年以来工矿业所带来的间接恶果。关于这最后一个对山西境内自然森林造成破坏的原因，似乎更应引起当代人的深刻思考。近现代工矿业常常大规模地直接就近采伐用木（例如煤矿矿井所用坑木），这当然已是尽人旨知的事情。然而还有一个更为潜在隐蔽的间接破坏因素，却常常不能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那就是近现代工矿业无节制地对地下水的开采或是破坏给山西境内中山、低中山甚至是低山地区残存森林遗产造成的危害与威胁。一次次被狂采滥伐过的原始林地因为地下涵水层与地表腐殖层的逐步损坏，所以历史上原始自然森林自身具有的那种自然恢复能力和正常的自生周期也最终被破坏。这种悲剧性的后果在山西的低山地区已经成为历史事实，而在许多富煤多矿的中山和低中山地区，目前则仍在继续变为事实。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7 年的时间中，由于政府一直重视一年一度的植树造林活动及其林业科学的实践与探索，山西省境中已经有一些中山和低中山地恢复了大片的次生林带，但真正富有原始风光的自然森林遗产，实际上只能在距离现代都市很远的少数高中山腹地才能见到了。这些年来，中央与省两级人民政府在山西省公布和设立的一大批自然保护区及森林公园，几乎全部都位于这些高中山腹地中的原始自然森林群落之中。森林公园的设置在山西省发展得尤为迅速，至目前仅国家级森林公园在本省境内就已有 18 处，它们所处地域从南在北分别为：

五老峰国家森林公园；　　中条山国家森林公园；

太行峡谷国家森林公园；　　老顶山国家森林公园；

黄崖洞国家森林公园；　　太岳山国家森林公园；
龙泉国家森林公园；　　交城山国家森林公园；
乌金山国家森林公园；　　关帝山国家森林公园；
天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方山国家森林公园；
禹王洞国家森林公园；　　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
赵杲观国家森林公园；　　五台山国家森林公园；
恒山国家森林公园；　　云冈国家森林公园；

其中在地域区划确定上，中条山、关帝山和管涔山三个国家森林公园分别与历云（历山、云梦山）、庞泉沟、芦芽山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所重叠。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在山西省目前共有四处，除已提到的三处外，还有省境东南部阳城县的蟒河自然保护区。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了保护褐马鸡、太行猕猴、大鲵（娃娃鱼）、青羊、虎、狍、梅花鹿、鹰、丹顶鹤、水獭、金钱豹、苍鹭、黑鹳、鸢、红隼、金雕、朱鹮、鸳鸯、麂等国家稀有动物外，另外一个重要保护范围即是这些珍禽异兽所赖以栖息生存的自然森林生境。

在山西省内，几乎是南北垂直状分布在东经 111°25′至东经 112°10′之间的关帝山国家森林公园、管涔山国家森林公园、太岳山国家森林公园和中条山国家森林公园，是目前山西高原上最重要也最具有原始生态气息的四处大型森林自然遗产资源聚落区域。它们各自所拥有的森林面积，都分别达到了 500 平方公里以上的规模水平。若从所拥有的生物物种科目及单位数量、区划面积规模、地形地貌的丰富多采以及森林林相之壮丽等多角度相比观察，显然其中的中条山国家森林公园则表现得最为奇特。该处国家森林公园北、东、南分别毗邻翼城、沁水和垣曲三个盆地。国家森林公园核心部位的历山舜王坪海拔 2358 米，不但是山西高原南部地区的最高峰，也是整个华北地区南半部的最高峰。真正的自然奇迹在于，山西省境中的地势最低点毫清河谷地（海拔 180 米）也处于历山舜王坪南部不到 50 公里的垣曲盆地之内。这就是说，在一个不足 50 公里的距离中，竟然出现了一个大到 2100 余米的自然落差。遇到天气晴好时，站在舜王坪顶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 50 公里以外毫清河入汇黄河处的一线闪亮的波光反射。这可能是一处在中国北方大地上绝无仅有的自然奇观。许多绮丽壮美的自然风景景观，诸如峡谷断崖、峭峰绝壁、激流飞瀑、岩溶洞穴等就都发生在这种很短距离与极大落差的疾变地貌之中。更由于中条山国家森林公园所处地域东南直接面对着辽阔的黄淮大平原，不但有着良好的日照，而且长年得以承受来自东南部海洋性湿润气流的滋补，故而这里就又大量汇聚分布了极多科目的植物与动物种类，其中仅种子类植物就多达上千种左右。此外还有许多蕨类、菌类、藻类、苔藓、地衣类植物出现。根据生物学界专家在当地的多年实地采集考察，从该区域多菊科、豆科、蔷薇科、紫草科、禾本科、木樨科、百合科、藜科和

兰科等数十种种子类植物的特征看，中条山国家森林公园基本属于暖温带植物区系。然而，生物学家和林学家们在此处还发现了诸如红豆杉科、连香树科、野茉莉科等类属于亚热带科的植物，所以他们又断言“中条山植物区系中有喜暖植物的祖先”。[①]也曾有专家认为，一些目前在长江流域已经稀见的植物科目竟然还可以在黄河以北的历云自然保护区大量见到，这不能不说它又是一个自然界的奥秘。中条山国家森林公园中的大量植物不但具有风景观赏价值，而且更具经济利用价值。从目前已确知的情况看，其中几项主要可供利用的经济植物的种类数字分别达到了：

药用植物：约 200 种
纤维植物：近 20 种
鞣料植物：约 50 种
油脂植物：70 余种
芳香类植物：40 余种
淀粉及糖类植物：约 60 种

以上所引用的这些统计数字，仅限于本世纪 80 年代初之前初步采集考察后的结果，而真正的实际情况则极可能要比这些统计数字丰富多采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安全保护措施的不足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以致使有些过去从来无人涉足的危险地带仍然未能进入。

而正由于有如此良好理想的自然生存环境，所以使得中条山国家森林公园及其核心历山自然保护区范围中的陆栖脊椎动物的已知科目总数，分别达到了 25 个目、66 科、 222 种属。据知，亚洲 2000 米以上的高山山峰总数有 219 座。以海拔位次排列，历山舜王坪处于第 190 位；但若以有利于各生物物种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宜与优劣度而说，以历山舜王坪为核心的中条山国家森林公园则无疑应该排列于前 50 位之中。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亚洲的所有 219 座海拔 2000 米以上高山山峰中，起码有半数以上是不适宜于一般生物物种生命存活所需条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 20 年以来，国家对自然森林生态资源的管理与保护，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备有效的工作体制。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是这个工作体制中最主要的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容区别。一般来讲，“自然保护区就是国家把森林、草原、水域、湿地、荒漠等各种生态系统类型及自然历史遗迹划出一定的面积，设置机构管理建设起来，作为保护自然资源，特别是野生动物资源，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基地。它是一种新型的具有多功能的管理自然的基本单

[①] 《山西省自然保护区资料汇编》（内部资料），第 65 页。

位”。[1]国家自然保护区及其区内各自然物种，均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侵害和毁坏自然保护区及其区内自然物种的行为，都应该被追究其刑事责任与受到相应处罚。总而言之，作为一种自然遗产生态的法定管理形式，自然保护区中的一切原始自然物种形态，都应该而且必须得到一个完整的持续存在发展的自然环境的条件体系。

严格地讲，国家森林公园也应该属于自然保护区诸多类型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它的特殊在于，它“具有特殊的科学、教育和户外娱乐的作用”，它应该“在人工的管理和控制下保持其自然和半自然状态。参观者应有特定的宣传、教育、文化和户外娱乐的目的才允许进入公园”。[2]

正像中条山国家森林公园及其历云国家自然保护区一样，包括山西省境内所有（含国家与省两级）27 处森林公园及其 5 处自然保护区在内的山西高原上的自然森林遗产生态系统，它们不但是我国北方地区原始自然生物物种种子最后最重要的珍藏宝地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人类藉以改造优化自身生存环境的重要自然参照实物系统之一，甚或更可以把它们的得以侥幸遗存看作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生态复苏过程中的重要起跑线或出发地之一。人们从此可以认识到保护森林就是保护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就是保护人类自身。

---

[1] 宋朝枢等：《自然保护区工作手册》，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 页。

[2] 宋朝枢等：《自然保护区工作手册》，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0 页。

第二节　河流·湖泊·瀑布

不知道是哪一位名人曾经作过这样一个比喻，他说如果可以把高山比作父亲又再把森林比作母亲的话，那么，大地之间的河流、湖泊、清泉和瀑布当然就是高山与森林的一样可爱的儿女。山西亘古多山，而且在千万年前曾经有过一个原始森林遍布山野的美好时期，所以早在人类诞生的前后，山西高原也早已成为河流、湖泊、泉水、瀑布发育十分繁盛的一块古老大地。直至今日，不管这些河流、湖泊、泉水与瀑布是如何的衰老和孱弱，然而它们毕竟仍给我们留下了一系列亲切熟悉的名字。其中仅我们已知流程曾经在 65 公里以上的发源于山西群山中的河流，即可以举出如下许多（包括它们源头山地的名称）：

汾　河，管涔山；　　桑干河，管涔山；
滹沱河，恒山·五台山；　　沁　河，太岳山；
浊漳河，太岳山·太行山；　　清漳河，太行山；
涑水河，中条山；　　听水河，吕梁山；
文峪河，关帝山；　　三川河，吕梁山；
屈产河，吕梁山；　　沇西河，历　山；
亳清河，中条山；　　丹　河，太行山；
壶流河，恒山；　　唐　河，恒　山；
清水河，五台山；　　湫水河，紫金山·芦芽山；
淇　水，太行山；　　沧头河，管涔山；
桃　河，系舟山；　　潇　河，系舟山·太岳山；
县川河，管涔山；　　岚漪河，芦芽山；
偏关河，管涔山；　　蔚汾河，芦芽山；
松溪河，太行山；　　昌源河，太岳山；
横水河，太行山；　　浍　河，中条山；
鄂　河，吕梁山；　　泗交河，中条山；
坂涧河，中条山；　　南洋河，大青山；
朱家川河，管涔山；　　御　河，管涔山·大青山。

这里仅是对山西境内发源流程在 65 公里以上河流的一个不完全举例，至于流程在 65 公里以下的河流则更是不胜枚举。除了无数河流之外，即使是在 300 多年前明清之交的时候，山西高原境内同样还保留着相当一批水面宽阔、风景秀丽的自然湖泊生态遗产。它们大多分布在省境内的平原或山间盆地中。例如：

伍姓湖，永济市；　　晋阳湖，太原市；

濩　泽，阳城县；	董泽陂，闻喜县；
镇子海，怀仁县；	作疃池，广灵县；
集兴疃池，广灵县；	金龙池，朔州市；
鸭子池，永济市；	神　池，神池县；
偃豬泽，临猗县；	长乐滩，运城市；
洗马滩，运城市；	东膏腴滩，运城市；
苦池滩，运城市；	黑龙潭，运城市；
东郭滩，运城市；	文　湖，汾阳市；
邬城泊，介休市；	白牛泓，介休市；
台骀泽，太原市；	昭余池，祁　县；
东　湖，清徐县；	月波湖，交城县；
郗家泊，平定县；	金龙池，屯留县。

此处所录湖泊均为明末清初时仍有相当规模者。从当时的地方志记述中我们了解到其中有一部分的水面面积曾经都保持在十几平方公里或数十平方公里以上的规模水平上。而这一部分较大面积的湖泊又几乎都集中在晋中和运城两个大型平原盆地之中，这应该与湖泊本身所处地形位置以及和给水山地之间的距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再将历史向回倒退到北魏郦道元写《水经注》的那个时代，那么山西从南到北的七大盆地（运城盆地、晋城盆地、临汾盆地、上党盆地、晋中盆地、忻定盆地和大同盆地）中的湖泊数量及其单位面积就显然更为众多宏壮。湖泊干涸了，但陆盆未移；河水断流了，然而河道仍在。抚今追昔，不能不使今人禁不住地扼腕叹息，浮想联翩。《大同县志》上曾记载直至清代时该县境内还有一处平常被人们称作“小东海”或“文莺湖”的水域。志称该湖“波澄一镜，滨簇万家；采凉诸峰，嶙峋环列；竞秀争奇，如睹十洲三岛，古刹横云，林端隐见；海旁蜃气楼台，仿佛似之。扁舟航处，文浪鳞鳞，鸥波上下”。当时一位叫黄文主的文人即以《文莺湖》为题，吟写了一首七律，开首即曰：

谁言西北少平湖？	偏有文莺入画图。
十里风光开胜境，	一泓烟景是名区。
鸥波绿浸沽鱼箸，	柳岸青遮卖酒垆。
何日浮家兼泛宅，	扁舟明月好踟蹰。

县志上未注明写诗人生平籍贯，读来不像是家在湖畔之人所作，因为诗的情思立意充满了一种异地游子才有的新鲜感。总之，写诗人看来预先并未想到在这塞外荒漠之地能有这般秀丽的湖泊美景。所以破题即见真情。还是在清代，一位叫乔光烈的上海人乾隆年间从宝鸡知县任上调来山西到蒲州接任河东兵备道。这位祖籍江南水乡的官宦士子当然对湖泊一类并不生疏，然而他

还是对山西南部的伍姓湖发生了兴趣。这里有他的《伍姓湖》七律为证：

湖光千顷渺烟渡，图画相看竟如何？
远岸堤长春树暗，晴天沙暖浴凫多。
诗情处处临风好，渔笛声声向晚过。
一曲沧浪清兴足，不知谁和扣舷歌！

和前一首写大同文莺湖的诗人一样，这位写蒲州伍姓湖的诗人同样在诗的启首用反问的口气明白表露了他斯时斯地的激动心境。前一个面对大同文莺湖禁不住自问：谁说大同这地方没有湖泊美景呢？后一个写蒲州伍姓湖者更是情切率直，一语破的：这样迷人的烟波湖光，拿它与图画相比有何不可？两处山西的湖泊，两个来自外地的诗人，两首同样题材的七律，笔下所描写的湖泊不但都美，而且都大。所以一个用“十里风光”赞美，另一个则用“湖光千顷”称颂。 200 多年前山西的湖泊景观究竟如何，于此可见一斑。

从生态角度讲，同样作为高山与森林抚育的“子女”，瀑布与河流、湖泊有着很明显的性格区别。它们不像河流那样刚毅执着，一往无前，也不像湖泊那样恬静温柔。瀑布不但常常习惯于厮守在其“父母”）——高山与森林的怀抱之中，而且苛求于嬉戏的地形与环境，多少带点任性和骄纵。瀑布不能如河流与湖泊那样为人类带来舟楫和灌溉之利，但它喜欢作危险并可以展示自己漂亮身姿的游戏，只要能博得人类的喝彩，哪怕摔得面目全非。在人类眼中，瀑布是一些很帅气的跳崖表演者。山西高原的群山，由于曾经经历过相当强烈的地壳沉降断陷作用，水流侵蚀切割更是十分普遍，断壁悬崖随处可见，所以曾经遍布过数不清的各种形态的瀑布景观。目前知道的山西古代知名瀑布大约有如下一些：

娘子关瀑布，平定县；　　王官峪瀑布，永济市；
龙堂瀑布，盂县；　　百谷泉瀑布，长治县；
悬水崖瀑布，黎城县；　　落水涧瀑布，黎城县；
赤壁瀑布，平顺县；　　千亩泉瀑布，左权县；
黄榆岭瀑布，左权县；　　悬泉瀑布，　平定县；
榆关瀑布，平定县；　　龙潭峡瀑布，晋城市：
水帘洞瀑布，晋城市；　　琵琶泓瀑布，晋城市；
铁盆嶂瀑布，阳城县；　　可乐山瀑布，阳城县；
石门瀑布，阳城县；　　栖龙潭瀑布，阳城县；
鲤池瀑布，陵川县；　　甘河瀑布，　陵川县：
枚迴岭瀑布，灵丘县；　　滴水崖瀑布，广灵县；
圣泉瀑布，广灵县；　　白羊山瀑布，广灵县；
丰泉瀑布，汾阳市；　　牛泓岩瀑布，介休市；

响水泉瀑布，中阳县；　　西山飞瀑，　太原市；
石门瀑布，文水县；　　卧龙冈瀑布，兴县；
天坛山瀑布，洪洞县；　　景明瀑布，　曲沃县；
叠水崖瀑布，闻喜县；　　筛儿崖瀑布，河津县；
滴水崖瀑布，乡宁县；　　龙子湫瀑布，隰县；
滴水崖瀑布，代县；　　滴水崖瀑布，原平市。

山西山地中瀑布生态由于分布地域有所区别，所以在发生形成上也就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特征。那就是在省境东南太行山地区，瀑布形态常常表现为地表径流瀑布，亦即河道瀑布：而在省境腹地的陆盆边沿山地中，瀑布的出现，则多因为地层的断陷而直接表现为由地下水形成的泉水出露形态。例如我们以上列举的几处同样都称作“滴水崖”的瀑布，就都属于后一种类型。

千年一瞬，沧桑巨变，竟使得古今生态判然迥异。作为华北地区亘古以来河流水系源头的主体性摇篮，山西高原曾经是黄河中游河段的主要水源补给地，它怀抱中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就诞生在山西山地的吕梁山脉和管涔山脉。但是时至今日，由于水荒，山西却不得不从黄河中提引黄河的上游之水去反哺汾河。历史上，据知海河水系中有 70%以上水源是通过桑干、滹沱、浊清两漳等河流来自于山西高原的。然而，同样由于缺水，作为海河入海口的天津市，却不得不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导引冀北的滦河之水以解燃眉之急。

作为地球水系生态中的种种不同自然表现形式，河流、湖泊、泉水和瀑布等无疑均都给人类带来过这样或那样的福祉。即使是对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而言，他们也都已经懂得背山面水向阳而居，认识到了利用水和使用水对他们生活生存的重要性。大自然界中，各种自然生态或生物物种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地充满了奥秘。相互间的排斥与矛盾特征固然存在，然而彼此容纳或依赖，谁又能否定得了这同样是在万物间普遍可以得见的客观事实呢？即如大山与森林孕育了河流、湖泊、流泉瀑布一样，反之河流、湖泊与流泉瀑布等诸种水系生态不也同样通过对大地的滋润和涵养而荫庇着大山、强盛了森林吗？

由于森林的萎缩而使无数条历史上曾经是四季奔涌的河流不是变作季节河就是彻底干涸。同样因为无节制无计划地地下采掘而使山地森林赖以滋养的地下水或是陷于紊乱或者水位极度下降，于是残存的森林又继续萎缩。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像恩格斯所讲的那种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应该说已经是无处不见了。本书作者曾经在太行山的山林中亲眼目睹过成群的村民随处刨挖铁矿矿石，而致使一片片青松的根须任其裸露而干涩断裂的残状。本书作者还曾经在管涔山的汾河源头地区见到过一处处乡镇煤矿的矿井，其选址竟然距离汾源涌泉之地还不到二三公里之遥。人类在此时此地的麻木与轻率怎么会到了如此的地步。

河流、湖泊、流泉、瀑布，这些无疑都属于自然的水系生态资源范畴。

而现在的问题是，随着一处处河水的断流和湖泊、瀑布及至泉水的干涸，那么，它们的遗迹——亦即河道、陆盆、挂瀑之崖以及泉浚等等，应该不应该算作是一种必然的自然生态遗产呢？看来，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慎重对待或是必须给予探讨的重大课题。

对于山西而言，因为毕竟它属于一块孕育了千百条河流的众河之源的高原台地，所以，若与许多河流的中下游平原地区相比，发生水患的机会及水患的规模，就均要少得多或小得多。本书在此之前列举出的山西的河流、湖泊和瀑布，其中许多早已丧失了原始面貌或是彻底失其踪迹。湖泊陆盆上早变为膏腴阡陌之田，尽管偶尔遇到一些洪水之灾，人们也难以会想到这里曾是千百年前的湖泊之所在。在那些历史上曾经是帆桅穿梭过的河流上，现在一旦失去了昔日的丰采与清流，人们不但毫无顾忌地在其干裂的河床上倾泄带有各种有害物质的工业废水，而且还堆弃垃圾、甚至敢于在河床中建起一片片焦炉与工棚。由于距离自然越来越遥远，人们忘记的已经不仅仅只是某种潜在的危险，而是忘记了包括着人类自身在内的一个整体的自然——这就是当我们走进工业社会之门时，我们人类中许多人的自然观。截至眼前，可以说除了在一些河流的近林源头地区还保留了部分属于原始状态的水系自然形态外，而在山西海拔 800—1000 米以下地区，且不要说去寻找大禹治水那个时代的水系生态已成神话中事，只恐怕就是想按照 1500 年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的有关记载去证实他笔下的论述也早已成为难事。 1988 年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在他的题为《<水经注>记载的三晋河流》一文中曾说：“在全部《水经注》中记载河湖水系及流域情况最详细的地区，按照现在的区域名称来说，是河南与山西两省。”就在此后不久，山西省的中年地理学学者谢鸿喜先生，在他多年实地踏勘考察和对原著精深研究的基础上，又完成了《<水经注>山西资料辑释》一书。为此，陈桥驿先生作序充分肯定了谢著的成就。应该说，在对山西河湖水系自然生态遗产的诠释介绍方面，乃至今后对该项自然生态遗产的保护利用方面，谢鸿喜先生是作出了令人瞩目贡献的一人。

总而言之，山西河湖水系自然生态遗产资源应该得到保护和利用，也必须给予保护和利用。而这种保护与利用工作，对未来山西的经济社会整体发展及其生态环境的优化，其深远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一种功德之举。

第三节　名泉与洞穴

从发生学角度去看自然界的泉水和洞穴，特别是石灰岩地层中的岩溶泉和岩溶洞穴，它们之间就像是一对“连体婴儿”一样，在地质学家的眼中，事实上常见的岩溶泉只不过是还充满着流水的洞穴，而岩溶洞穴则仅是岩溶泉枯竭后的一种自然孑遗形态而已。在自然界中，由于裂隙或其他自然力作用而形成的洞穴当然存在，但其构成形态远不及岩溶洞穴那样典型或普遍，也不像岩溶洞穴在人类中获得了那样显赫昭著的名声。本书在此叙述介绍的就大多属于岩溶泉与岩溶洞穴，也就是国际地质学界称作为“喀斯特”地貌的那种自然遗存形态。

目前，洞穴研究在国际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1993 年 8 月 2 日—8 月 8 日，由国际洞穴学联合会举办的第 11 届国际洞穴学大会，就是在我国首都北京的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的。这也是国际洞穴组织首次在亚洲举办的国际洞穴学术会议。此次会议曾就洞穴资源与生态环境、洞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在会议期间对北京附近地区的岩溶洞穴组织了考察。

据知在本世纪 50 年代后期时，由国际洞穴专家纪录在案的世界范围内的知名洞穴的数字仅不过 500 余个，然而到 80 年代初期时，同类洞穴的数字竟然增加到了约 5000 余处。其中仅长度超过 100 公里以上的洞穴就有 5 处。美国肯塔基州一处名叫弗林特·猛犸的洞穴，其总长度甚至超过了 500 公里。由英国和马来西亚洞穴专家在沙捞越发现的一处地下洞穴中的天然大厅，其面积居然接近 28 万平方米左右。[①]

从 80 年代初以来，随着旅游业在我国的蓬勃兴起，对岩溶洞穴自然景观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各省区也迅速蔓延开来。其中在广西、湖南、贵州、浙江、云南、江西、福建等石灰岩分布比较广泛的江南诸省区尤为突出。已发现或开发利用的岩溶洞穴至 90 年代中期时，在全国至少已接近 500 余处。

历史上山西从来就是一个多泉的地方，卓有声誉的名泉在国内，特别是在北方诸省中更是声名遐迩。例如太原晋祠难老泉、临汾河西龙子祠泉、介休东山洪山源泉、洪洞广胜寺霍泉、新绛吕梁山南麓的古堆泉、朔州马邑的神头泉、广灵壶流河畔的水神堂泉与莎泉，以及黎城源庄谷地中的太行山源泉等，它们不但千百年来早已被当地人民用于农事灌溉，而且在其源头地区借泉开辟园林名胜景观也都无不堪称悠久。世世代代，乡民惠其利，名人颂其胜。许多山西名泉的声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应该能和号称泉城极胜的济南趵突泉或“天堂”杭城的虎跑之泉相媲美。

李白游览过晋祠之泉，由于此次旅游给他留下了极深极佳的印象，所以以至于多年之后当写《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一诗时，仍对晋泉念念不忘：

[①] 陈伟：《穴居文化》，文汇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4 页。

……

行来北凉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

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

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

浮舟弄水萧鼓鸣，微波龙麟莎草绿。

……

与李白描写晋祠泉水的诗句相比，北宋著名诗文大家范仲淹的一首《题晋祠》，对晋祠之泉则写得更为深刻而感人：

神哉叔虞庙，地胜出佳泉。

一泽甚澄沏，数步忽潺湲。

此意谁可穷，观者增恭虔。

锦鳞无敢钓，长生如水仙。

千家溉禾稻，满目江乡田。

我来动所思，致主愧前贤。

大道果能行，时雨宜不愆。

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旱年。

显然，在范仲淹的笔下，晋祠泉畔已经成为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面对泉中群鱼，他竟虔恭到了一种连垂钓的念头都不敢有的神圣境地。

悬瓮山下晋祠之泉给了宋人范仲淹一种神圣纯清之美，同样在太岳山雨麓，霍泉也给过一位被称为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唐代诗人李端以步入仙境的感觉。李端本赵州（今河北赵县）人，他可能是在前往长安途中路居霍泉时写下了《霍泉》一诗的。诗曰：

碧水映丹霞，溅溅度浅沙。

暗通山下草，流出洞中花。

春色和云落，喧声绕石斜。

明朝更寻去，应到阮郎家。

诗尾所谓“阮郎”，系指东晋时人阮肇。据说阮肇入天台之山，迷路不能出山，忽遇仙女相留，于是从此留居山中如神仙中人。李端在此以阮郎比喻，显然，他是明明白白将霍泉胜境当作仙界了。

被称作尧都平阳的临汾古城西南又有龙子祠泉，至今水源尚存。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 1707 年）秋天，当时以著作《桃花扇》一剧而知名于世的孔子 64 代孙山东曲阜人孔尚任，欣然接受平阳知府刘棨的邀请，来到山西

帮助纂修《平阳府志》。孔氏在平阳留居一年多时间，其间出游诗咏甚多，其中就有《二月朔同人游龙子祠》七律一首，启首四句即曰：

远隔红尘水树幽，宜人景物失乡愁。
含烟店柳从容发，破冻山泉放肆流。

所谓“二月朔”，即指农历的二月初一。这时羁居平阳数月之久的孔尚任看样子早已是乡愁重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般而言，带有思乡愁情之人，即使面对着的是万般景致，恐怕也是难于豪言壮语的。此情此景，孔尚任显然就是处于如此愁绪之中的那种人物。他的四句龙子祠咏物之诗显然看来还是未脱浓浓乡愁，然而使我们感到真正宝贵的一点却是，此诗不但使我们了解到 290 年前早春二月时处于北国大地的龙子祠一带的真实生态状况，而且更使我们能够据此诗句去客观地衡量龙子祠泉在 290 年间所发生的种种生态变化。

毋庸讳言，在山西历史名泉中，晋祠难老泉和临汾龙子祠泉近 20 余年来所发生的水量生态急骤萎缩，可能是最使当代世人感到震惊和普遍关注的事情之一。然而，事情还并不仅仅如此。根据清雍正版《山西通志》山川卷的记载，当时山西百余个县域中，可以被称为一方名胜的具备名称之泉，其总数粗约算来起码应该在 350 处左右。而事实上今天仍能保持源头之水的此类名泉，可能早已不足十之一二的数目了。也就是说，一些颇有名气的山西名泉的退化与萎缩，实际是在一个带有普遍生态特征的背景中逐渐演变和发生的。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种演变和发生，但是绝大多数人却感到茫然而不知何以对策。

如果说世人大多对名泉的生态变化还能保持某种警觉和关注，是因为人类和水之间有一种永久的密切关系的话，那么，显然自然岩溶洞穴在和现代人的关系方面就要相形见绌得多。正由于这一原因，所以当旅游业在 80 年代初刚刚敲开山西高原的门扉时，除了少数对山西地质状况有所了解的专门地质学界的人士外，而几乎所有其他对山西旅游资源构成形态给予关心的人们，当时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

山西究竟有没有岩溶洞穴？

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本书作者针对这一具体问题曾经作了一些专门的调查研究。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确知在公元 18 世纪初以前，山西境内有明确命名的岩溶洞穴，其数目起码已在 110 处以上。诸如：

翠微洞，壶关县；　　白云洞，沁水县·历山；
溪　洞，偏关县；　　神居洞，临汾市；
万花洞，盂县；　　白牛洞，交城县；
白马仙洞，离石市；　　昭泽龙洞，黎城县；

南阳仙洞，沁水县；
隐堂洞，文水县；
■峪洞，黎城县；
龙兴洞，蒲县；
珍珠洞，浮山县；
孤仙楼洞，平顺县；
碧峰洞，平鲁县；
黄围洞，陵川县；
修真洞，阳城县·临涧村；
青龙洞，交城县·榆群村；
仙明洞，中阳县；
风　洞，高平市·米山；
龙　洞，祁县·鹿台山；
黑龙洞，高平市·郎公山；
龙眠洞，大宁县；
清凉洞，襄汾县；
五龙洞，寿阳县·双凤山；
蜚鱼洞，朔州市；
黑石崖栈洞，保德县；
青龙洞，芮城县·历山；
青子洞，平顺县；
马岭洞，和顺县；
攀龙岭古洞，武乡县；
妖狐洞，寿阳县；
六师障洞，盂县；
莲花洞，晋城市；
伏仙洞，盂县；
龙　洞，阳城县·龙崖；
黄士洞，沁水县；
金仙洞，山阴县；
玉龙侗，怀仁县；
龙潭洞，运城市；
石钟洞，芮城县；
七龙洞，左权县；
郝壁洞，榆社县；
白龙石洞，武乡县；
阳摩洞，寿阳县；
龙　洞，阳城县·析城山；
石绿洞，忻州市；
西谷洞，太原市；
苍龙洞，平顺县；
龙囤洞，武乡县；
灵岩仙洞，古县；
乌龙洞，平鲁县；
朝阳洞，偏关县；
仙　洞，兴县·桃花山；
白云洞，黎城县·白玉崖；
青龙洞，平顺县·林虑山；
麻衣洞，襄垣县；
石乳洞，兴县·大寨山；
玉华洞，武乡县·南交村；
驼　洞，偏关县；
金仙洞，应县；
黑龙洞，阳高县·古城乡；
黄龙洞，平顺县·黄崖沟：
辘轳洞，神池县；
桃花河，运城市；
锣鼓洞，平陆县；
仙人洞，和顺县；
中方洞，黎城县；
尤舟洞，武乡县；
仙人洞，盂县·仙人村；
黑虎洞，晋城市；
白石先生洞，晋城市；
蒸饼洞，阳城县；
六泉洞，陵川县；
张万户洞，怀仁县；
三阳洞，浑源县；
鹤鸣洞，汾阳市；
风　洞，夏县·柏塔山；
赤崖流泉洞，壶关县；
龙　洞，左权县·千亩原；
双泉洞，武乡县；
张果老洞，平定县；
白龙洞，盂县·高岭山；
白龙洞，晋城市·松林山；

黄龙洞，晋城市·紫金山；　　五音洞，高平市；
风　洞，阳城县·灵通山；　　黑龙洞，阳城县·桑林乡；
白龙神洞，阳城县·崦山；　　元天洞，沁水县；
黑龙洞，天镇县·青云山；　　黄龙洞，怀仁县·玉龙山；
吕仙洞，天镇具·神头山；　　钟乳穴，灵丘县·太白山；
麻衣仙姑洞，汾阳市；　　三泉洞，汾阳市；
桦林洞，兴县；　　狐　洞，个休市·狐歧山；
石夫子洞，祁县；　　黄龙洞，文水县·石峡山；
风　洞，古县·凤凰山；　　白云洞，曲沃县·白水村；
九仙洞，汾西县；　　龙　洞，灵石县·石膏山；
姑射洞，稷山县；　　风　洞，灵石县·鲁班缠；
金牛洞，垣曲县；　　仙人洞，垣曲县·王茅乡；
卧云洞，大宁县；　　升仙洞，隰县；
冰玉洞，大宁县；　　仙人洞，忻州市·系舟山；
屠岸贾洞，忻州市；　　龙母洞，定襄县；
阳光洞，静乐县；　　春景洞，天镇县；
牡丹洞，交口县。

事实证明，岩溶洞穴在山西的分布已经几乎遍及 90%以上的县、市。实际上山西业已成为我国黄淮以北地区岩溶洞穴最为密集的省区之一。这里列出的 117 处溶洞，仅仅局限于约 300 年前已有确切命名或某种民间活动（如祈雨祭祀和农历二月初二结社游洞等）洞穴的范围，而许多当时显然已被人们发现但由于没有公认的名称或相关活动的洞穴，我们还没有将它们纳入现在的考察范围。近 10 余年来，我们曾多次在报端见到所谓在某处发现了某洞的种种消息报道。我们不能不认为这确实属于一种历史造成的误会。事实上那些所谓刚被发现的溶洞中的绝大多数，早在数百年前或是数千年前已被我们的祖先所认识和洞察。也就是说，真正发现这些自然岩溶洞穴的第一代人应该是我们先民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而的确不是我们。整整 10 年前的 1986 年秋天时，本书作者与分别来自北京和南京的两位青年学者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寻找到了位于阳城县西部临涧村附近的“修真洞”。这是一处深约 1 公里的小型溶洞，洞内的钟乳与石笋类景观发育状况较为典型，各种石灰岩水溶结晶物的自然造型也比较丰富。然而让我们感到有些吃惊的并不是它们，我们的所有同行者都被布满洞壁的千百首古人题咏深深地感染和吸引了。就着微弱的手电光照和火把的照明，我们着意地考察了一下这些古人题咏的时代（所有题咏 90%左右均为毛笔墨书，题咏之后几乎无不留有作者姓名与题写时间）。初步查找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了洞内最早的一首题咏古诗的书写时间是在距离我们 866 年前的北宋宣和二年（公元 1120 年）。与其他题咏所不同的是，作者未用墨书，而是用了鲜亮的红色矿物质颜料。在修

真洞洞口处，我们还见到了明朝万历时曾做过太子太傅吏部尚书的当地人王国光当时留下的洞居诗文碑。诗为七言体，共三阕 24 句。诗前有序，序中王国光在 400 余年前就写到该洞“中有题咏，皆前代笔迹”。距离修真洞不远处还有沁水县界内的南阳仙洞、历山白云洞和黄土洞（当地人又称为黄道士洞）等。其中白云洞中也有古人题咏，而且每年农历二月初二时还有游洞古习相沿至今。这些都说明，在我们现代人利用溶洞洞穴作为旅游景观之前很久的时候，我们的古代先民不但早已发现了相当多的自然洞穴生态，而且他们与这些洞穴之间还维持了相当长久的密切关系。

还不仅如此。在山西这许多古老的自然岩溶洞穴中，经过考古工作者们的调查与发掘，证明有些早在数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即已有古人类在此栖居生活过。例如垣曲县南海峪溶洞、和顺县当城溶洞、黎城南委泉白云洞等。其中和顺县当城溶洞中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化石两块，石制工具竟多达 3000 余件。而垣曲南海峪溶洞中发现的各种石器则表明，数十万年前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已经能够根据石英、角页岩、燧石和蛋白石等不同质量或岩性的石料，去制作出多种不同用途的石器。岩溶洞穴是人类从森林古猿的阶段进入直立人和智人阶段后选择的主要栖居地。这种栖居地不同于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任何一种住宅形式或栖居方式，这主要是因为岩溶洞穴纯属自然形态，它们首先属于自然遗产生态范畴，而同时兼有珍贵的原始文化特征。近 200 年以来，许多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就是借助于对这些居住过原始人类的自然岩溶洞穴的调查与研究，而逐步掌握了数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前人类处于原始自然穴居状态下的某些生存奥秘和生活规律。在我们接触到以上所列举出的近 120 处分布在山西各地的自然岩溶洞穴古代记述资料的初期，我们就发现在古人的眼中，这些洞穴的 80%左右均属于“极深邃”或“深不可测”一类，而且其中绝大多数在数百年前仍然属于多水之洞。例如陵川县黄围山上的黄围洞，据说其深邃竟可与约 50 公里外的壶关县紫团山翠微洞相连。当地县志与清代《山西通志》均记述该洞“洞内有山有谷，有风门，有云门，有神井，有石鸽双飞，有石乳塔。昔人秉炬深入四五里，遇黄河一朽木，不敢越而返洞口。”还讲到该洞中“有灵湫，殊清冽，旱祷辄雨”。和黄围洞一样，山西古代有许多带水的洞穴都同时是当地民间求神祈雨之地。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古代岩溶侗穴的命名几乎都是和“龙”或“仙”分不开的。关于壶关县紫团山上的翠微洞，清代雍正十二年版《山西通志》山川卷描述得更为生动：“洞口劣容一人，伛偻入转身而下，侧足而行，高低宽隘倏变，山水与人间无异。水源如缕如线，如盏如碗。石髓上腾为钟乳，如槟榔葡萄，穗垂地如巨柱，巨至合抱。坐如瞿昙，立如阿修罗。虎豹游龙，闪烁变幻。旁穴歧径，旋转即迷。深　或烛不能燃，莫穷其际。相传直透太行外数百里……”仅仅从这些古代记述中我们即可看出，真正发现和了解山西岩溶洞穴的应是古代的山西人民，而不是我们。在这一方面，无疑今人已不如古人。

在山西洞穴中，也可见到一些区别于岩溶洞穴的因裂隙作用而形成的洞穴形态。例如位于离石市上王营庄乡境内的“白马仙洞”，即是一处由裂隙与岩溶双重作用后形成的自然洞穴。该洞的被发现，起码应该是在公元 6 世纪以前的隋代。因为至今在该洞洞口的古代庙宇废墟及遗址中，我们仍然可以在一些古代碑碣上看到有关唐初尉迟敬德将军在此督修庙字的记载。另外，在五代后晋时期，石敬塘曾于天福元年（公元 936 年）亲率群臣至此祈雨，并诏封此洞为“渊济仙洞”，敕命当时的枢密使桑维翰将 4 字书写制匾作为洞额。与我们见到过的一般岩溶洞穴不同的是，白马仙洞已经探明的 200 余米长的洞体，实际上又是条平均宽不过 3 米而深却达到 150 米的地下峡谷。根据古代方志记载，洞的底部被人们习惯称作为“四十亩放马滩”。近期在开发过程中经过实地测量，这个“四十亩放马滩”事实上是一处长约 80 余米，宽约 40 余米，平均高约 20 米，而面积达到 3200 平方米，空间达到 64 000 立方米以上的地下厅堂。千余年前，五代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祈雨处即设在这个地下厅堂的后部位置。在距洞口约 250 米处，又有岔洞，其深则杳不可测，至今未予探明。正在开发中的白马仙洞其中许多景观与景点，仍然沿用了古代流传下来的名称，如青龙头、飞燕石、卧仙坡、布袋岭、棋盘山、堵心石、翻身涧、白龙池、黑龙池以及九凤山等均是。洞外隋唐以来遗存的古庙宇遗址主要为道家建筑，有洞阳观、天王庙、五岳庙、三清阁和圣母殿等，目前也在做着一些保护基础上的清理整修工作。白马仙洞所在地青松蔽日，清泉潺潺。周围近百平方公里之内大小数十座山峰皆为森林密布区，自然遗产生态与文化遗产生态资源都较为丰富。不久之后，此地有望成为当地一处新的旅游观光区域。

国际地学界专家中，曾经有人作过统计，认为地球上所有洞穴的总面积大约为地球陆地总面积的 1/4，但是现在已被人类发现和利用起来的洞穴却只是地球天然洞穴中的极少一部分。地球自然洞穴中不但蕴藏着极其丰富的各种矿物资源、古人类文化遗存资源和观赏景观资源等等，而且地球自然洞穴很可能以其特有的带有各种自然矿物质的洞内气流和温湿度，而会给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或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带来福音。事实上，在欧洲一些国家已经有人利用天然洞穴开设了“洞穴医院”，还有一些科学家则在天然洞穴中设置了地下实验室或地震观测站等等。[①]

山西山地作为我国北方地区自然洞穴（特别是岩溶侗穴）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拥有着十分丰富多采的洞穴自然遗产生态资源。无疑，在山西大地上存在着一个利用天然洞穴为现代人类造福的广阔前景和充满希望的明天。

[①] 陈伟《穴居文化》，文汇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83 页。

第四节　珍稀自然生态遗存

像在历史文化遗产生态中保留了许多珍稀古建筑群落或个体一样，在山西富有的自然遗产生态资源中，同样也保存下来了一大批非常珍稀罕见的自然生态遗存群落或是个体。例如大同火山群落、运城盐湖、宁武天池、管涔山地下煤层自燃景观、壶口瀑布、长子县和乡宁县的古树化石群落，以及榆社县的古脊推动物化石群落等。

大同火山群落——这是一组个体单位多达 30 余座的火山群落，分布在山西高原北部大同盆地东翼和桑干河中游地段大约 900 平方公里的地域范围内，属于我国第四纪火山运动的典型遗存。大同火山群落中其火山锥景观最为密集和最为宏伟壮丽者是西区部分（地质与地理工作者将大同火山群落按所在方位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区）。而西区火山中最为著名者则有金山、黑山、狼窝山、昊天山、阁老山、马蹄山、双山、老虎山等。从空中看大同西区火山，其中火山口直径最大者是狼窝山，达 500 米左右，几乎呈正圆形状，山口深度则平均达到 30—50 米，也是大同火山群中火山口最深的一座。昊天山，即昊天寺火山，是大同西区火山中锥体最为完整的一座，在空中鸟瞰甚至发现不到数十万年间水蚀作用在山的锥体上所留下的一点痕迹，火山口的边沿也保存得格外完整和规整。它坐落在大同县城的东北近郊，已经成为这个小县城的自然标志物。如果说在空中看黑山的火山锥体就像是一只正在蠕蠕爬行的“大海蜇”的话，那么在它西边大约两公里的金山火山锥就更像是一颗夏夜夜空中正在灼灼燃烧的明亮的“彗星”，其“彗尾”不但硕长（约 300 米），而且洁白闪光。再从空中遥看阁老山火山口平面形状，它尤像一枚金色的“桃心”，由于其四周布满了呈放射状的水蚀沟纹理，所以“桃心”发出的“金光”就显得更为迷人。东坪山火山锥远离大同西区火山的密集地带，坐落在以上所讲的几座火山东南约两公里处，因为火山喷发时熔岩流朝着东南方向喷流，故而该火山锥体东南部留下了一个很明显的缺口，整个锥冠就像是一只惟妙惟肖的“马蹄子”。久而久之，东坪山就又被人们呼作为“马蹄山”。

根据地学家们的结论，一般呈中心式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锥，依其组成物质的差异和外观形态的不同，可以分作为盾形、穹窿状、岩渣和层状等四种类型。可以说，大同火山群落的所有 30 余座火山锥中已经包括了全部四种类型的火山锥形态。例如大同东区火山中的大辛庄火山即属于盾形火山锥，大同北区火山中的孤山火山则属于穹窿状类型，而大同南区火山中的大峪口火山又属熔岩渣屑堆砌形成的火山锥体，大同西区火山中的老虎山火山则无疑属于堆迭层状形态的火山锥。

总之，无论是从群落的整体规模和拥有个体数量的角度讲，还是从构成形态的多样性或景观保留的原始状况看，大同火山群落不但在我国，而且即使是在东亚大陆地区也当堪称为自然遗产生态中极为罕见的稀有景观类

型。

运城盐湖——在我国辽阔版图的西北部，西至新疆、甘肃、青海，东到宁夏、陕西、内蒙古和山西，曾经存在过一个天然盐湖分布十分密集的地带。我国从古至今已经确知的盐湖几乎无一不在这个曾经孕育了古老的仰韶文化的神秘地域之内。运城盐湖，就位于这个神秘地域的最东南边沿地区。而从我国古代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看，运城盐湖无疑又是华夏民族初始时期即藉以从中采集食盐的卓有声名的天然盐湖中最主要的一个。

运城盐湖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地学界认为：运城“盐池位于燕山褶皱的向斜部位，第三纪时填充了红色沉积物，喜马拉雅运动时，中条山和峨眉台地继承老构造运动又复上升，从而奠定了以盐池为中心的向心缓斜沉积环境，即盐池的原始雏型。第四纪初期，中条山地区受新构造运动影响，北麓断裂下沉，形成狭长的陷落地带，并接受了富含钾盐、镁盐、钠盐以及碳酸盐、硫酸盐类等沉积物。这些盐类在潴积的水中溶解，又经强烈蒸发，盐分聚集，形成今日的盐池。”[①]柴继光等先生则认为，除了必要的地质条件外，来自盐池周边的水源补给和区域性的气候环境，也应该是运城盐湖得以形成并一直遗存至今的重要因素。例如，经过当代科学勘察，证明“每年地表延流和洪水流入盐池的水量所带入的盐分为 1.6 万吨。盐池四周的潜水位亦高于盐他水面，并且均自四周向盐池中心汇集，四周潜水补给量约 34 158 立方米/昼夜，每年带入盐分 8.8 万吨。此外，承压水在运城盆地下部共有 9 个含水层，仅以第一承压水为例，流入盐池中的水量为 1146 立方米/昼夜，带入盐每年约 1.4 万吨。加上自流井补给，每年共带入盐池盐分 11. 87 万吨”。[②]从种种迹象观察，我国西北地区这个多天然盐湖地带在亿万年前应该存在过一个类似于里海和咸海那样的内陆咸水海。运城盐湖虽然地处山西省境内，但它的地形地貌事实上属于西部渭河谷地单元，直接和我国西北地区那个多天然盐湖地带相联结着。换言之，也即是说运城盐湖极有可能就是亿万年前那个内陆威海的直接子遗物或称为自然遗存。

现存的运城盐湖东西长约近 30 公里，南北宽约 3—5 公里，全湖面积在 130 平方公里左右，湖水最深处约 5 米。和许多盐种一样，运城盐湖中生成的“解盐”也是经过太阳光的照晒之后才形成的。然而又和其他晒盐不同，“解盐”（因为地近解州，故有此称）的最后形成，除了太阳光照以外，则还必须要有自然淡水的搭配和夏秋南风的吹拂。非如此而不能成盐，这又是一个自然之谜。写过《梦溪笔谈》的宋人沈括和明代写过《天工开物》的宋应星等古代学者，都曾对“解盐”的结晶形成必须有日光、淡水和南风三者齐备而感到好奇并有过实地考察与探索。如《梦溪笔谈》中就有这般叙述：

[①] 山西省地图集编委会：《山西省自然地图集》（内部资料）文字说明部分第 60 页，1984 年。

[②] 柴继光等：《晋盐文化述要》，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 页。

“解州盐泽之南，秋夏间多大风，渭之盐南风，其势发屋拔木，几欲动地，然东与南皆不过中条，西不过席张铺，北不过鸣条，纵广止数十里之间。解盐不得此风不冰，盖大卤之气相感，莫知其然也。”

千百年来，每当到了夏秋“解盐”结晶季节，运城盐湖百里之内一片银白，其恢宏气势真是蔚为壮观。故运城盐湖又有“银湖”之美称。这对于中原大地绝大多数没有见到过天然盐湖的人们来说，确实是一处就近一睹为快的自然奇观。而一旦有了亲见如此奇观的机会，许多人就都留下了他们惊异赞美的心声。如明代人朱知鳌有《盐池》七律，其中就有“条岳翠屏拔地起，鹾池琼液接天流”和“此境已超尘世外，不须截海觅嬴州”之句。明代正德年间曾经出任河东巡盐御史并又亲创过河东书院的河南安阳籍人张士隆也有《盐池》诗，其中又有“何年幻出水晶宫，百里盈盈入望中；雪涌池头重缀白，日烘波面浅浮红”的精彩描写。其他还有“云飞翠岭千秋雪，风送瑶池一夜花”，“银山雪浪五月间，卷出层水六十里；六十里中水接天，波光直与条山连”，或是“尺地寸土皆珠玉，千畦万井凝雪霜；灿如琼华铺满界，皎如月宫游天阊”，以及“盐泽开皇古，曾传渤海名”等。这些古人的诗句，不但忠实地记载了历史上运城盐湖壮丽的自然景观，而且尤其珍贵者是它们还无意中向人揭示了该盐湖古时生态环境系统本来面貌。

宁武天他——宁武天池是一组散布在宁武县境管涔山脉上的高山湖泊群落，所处海拔高度均在 1700 米以上。其群落中主要包括了马营海、公海、琵琶海、鸭子海、老师傅海、双海、干海和小海子等大小近 10 处高山湖泊水面在内。其中马营海水面最大，约 0.8 平方公里；公海湖水最深，深至 11 米左右；海拔最高的是位于海子背一侧的干海子，海拔高度达到了 1894 米。宁武天池西侧有所谓分水岭，岭之南是黄河第二大支流汾河发源地，岭之北则为恢河（此河在大同盆地一段称桑干河，进入华北平原后叫永定河）的源头区。地学界认为，宁武天池群落所在位置在大约百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时期本属古恢河河道。约在晚更新世早期时，由于受新构造运动影响，古恢河河道下游部分地区隆起，而上游河谷则相对降低。于是，遂产生地形倒置，致使古恢河上游河道中“一些深潭形成闭塞洼地，并积水成湖”。[①]显然，宁武天池属于古河耳子遗。

宋元以来这数百年间，山西高原上的宁武天池日益不被世人所知，虽然早在公元 6 世纪时它已被当时的隋代帝王辟为皇家避暑行宫所在地。但知名度反不如明清以后才渐露声名的长白山天池和天山天池，宁武天他群落中各海有各自名称，大约都是唐代在此设立了“牧监”以后的事情，而在唐以前，则统称曰“天池”或“祁连池”。

管涔山地下煤层自燃景观——关于地下煤层自燃景观，在山西当以河曲县境内的“火山”为最早见于古代文献记载。这里所谓“火山”者，实际即

[①] 山西省地图集编委会：《山西省自然地图集》（肉部资料）文字说明部分第 60 页，1984 年。

是地下煤层自燃所形成的景观形态。河曲“火山”根据当地方志记载，显然清初时仍然存在，其位置在河曲古县城以西 3.5 公里处黄河东岸的邻河山崖上。方志记述说火山有孔，人们以草投其中马上会烟焰上发，其火势可以熟食。“火山”四周草木不生，黄河水流经“火山”断崖处，腾发而起的水雾就像是将开水锅打翻了一样。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 979 年）在此建火山军，治平四年（公元 1067 年）又在这里设置火山县，其得名皆因由于此种稀见自然景象。

河曲“火山”地下煤层自燃景观早在清末时已不复存在，但在宁武县境管涔山东麓邻近天池处，则仍可见到同类型的景观。管涔山的地下煤层自燃规模从目前看，很可能要比河曲的古代“火山”要大许多，燃点出露有两三处。在当地居民中了解，其自燃时间起码应在三四百年以上了。人们进入宁武县界，常常可以在数十华里之外清晰地看到管涔山因地下煤层自燃而升腾起的上百米高的烟柱。山西自古多煤，但人们以往较常见到的煤炭自燃现象，则多见于矿区已经采掘出的人工煤炭码堆，而且多在炎暑酷夏日照极强烈时。像管涔山这样规模的且已经自燃至三四百年的地下煤层自燃景观，即使是在山西这样一个号称为煤炭之乡的省区，恐怕也是极为稀有的。作为自然生态遗存中一种特殊类型，地下煤层自燃显然属于非正常形态。但它可能成为有关科学研究的关注对象，为有关科研项目提供有益的参照系和参考系。

古树化石群落——在距今已经十分遥远的地质时代，山西高原曾经是一个原始森林非常茂密的地区，这已经为许多古生物学家和林学界人士所确认。近些年来，有关方面在山西的太岳山区和吕梁山区又数次发现大规模出露的古树木化石群落，这无疑更为古生物学家和林学家们的结论提供了实物物证。

山西目前发现的古树化石群落以长子县南陈乡和乡宁县潭坪乡两处最为典型，规模也非常可观。如位于黄河东岸吕梁山脉南端的乡宁县潭坪乡南岭村古树化石群落，即分布在一条叫做萝卜沟的谷底两侧，面积约有 30 万平方米。根据此地裸露出的古树化石表面纹理观察，多为松柏硅化石。其中最大的一棵树径为 84 厘米。树干断面十分坚硬，许多木化石表面附着一层 1—2 厘米厚的黑色炭化物，有些表面则可见到黄白色的树脂晶状物质。长子县南陈乡的古树化石群落，则位于太岳山东南的支脉区。在团城，苏村、壑只等村庄范围内共发现 7 处共 30 余株，特点是树体一般都较为粗长庞大。其中最粗的一株树径为 1.24 米，树身最长的一株则为 14 米。地学界专家认为长子县南陈乡的古树化石群落属新生代第三纪古树硅化遗存物，距今已有数千万年的历史。

古树化石，又称硅化木。至今国内外发现的硅化木群落多在一些含硅物质较多的沉积岩地层中，或是火山灰堆积层中以及多温泉地带的沉积岩地层中。长子县与乡宁县发现的古树化石群落在国内外都非常罕见。这些珍贵的

发现无疑对探索山西山地的地质和古生物变迁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榆社古脊推动物化石群落——榆社县位于太行山西麓浊漳河上游源头地区，地貌呈盆地状，地学界习惯称其为“榆社盆地”。早在本世纪 30 年代初时，榆社盆地就引起了国内外古生物学界和地质学界的重视与关注，像杨钟健、德日进这样一些著名的中外学者都曾先后到榆社作实地调查和勘测。近 70 年来，榆社全县所有 14 个乡镇中均发现蕴藏有丰富的古生物化石，其中动物化石中古脊椎动物类更为突出。“榆社群”古生物化石已成为中外古生物学界和地质学界注目的热点。1959 年 9 月，国务院正式将榆社县全境确定为全国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重点保护区。 1980 年 7 月，又成立了榆社古脊椎动物化石陈列馆。

脊椎动物是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类群，生物学家们将其分为 6 个纲目。即圆口纲、鱼纲、两栖纲、爬行纲、鸟纲和哺乳纲，而这 6 个亚纲在榆社境内几乎均有发现，而且物种与数量极多。如各种原始鱼类、陆龟、三趾马、剑齿虎、猎豹，鬣狗、貉、鼢鼠、巨付驼、弓颌猪、原河猪、大唇犀、剑齿象、乳齿象、原始牛、大羚羊、熊、猞俐、长颈鹿、巨蛇等等。其中奇蹄类的三趾马最多，其牙齿化石几乎遍及全县。

“榆社群”古脊椎类动物化石对揭示探索东亚古大陆新生代气候、地质与生态变迁，甚至是人类起源都极富意义。贾兰坡先生就认为，在榆社发现古人类化石是很有希望的。

壶口瀑布——在亚洲地区，目前已确知落差高度在 20 米以上的大瀑布共有 27 处。黄河壶口瀑布即排在第 27 位。排在第一位的是我国台湾省嘉义梅山的蛟龙大瀑布，它的高度约有 1000 米左右。台湾蛟龙大瀑布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大瀑布中，论高度它也是排在第一位的。但是，黄河壶口瀑布虽然落差高度只有 20 米，但以它那壮丽澎湃的非凡气势而论，那却是极其具有个性与特色的，哪怕是在全球所有已知落差高度在 20 米以上的 190 处大瀑布中，它都明显具备着任何其他大瀑布所没有的两种自然特征和文化气质。这即是，一，它的源源不断的水源来自约 4000 公里以外的世界第一高原青藏高原，它以它辉煌的黄颜色的瀑色区别于全世界的所有其他大瀑布。二，壶口瀑布以其雄狮般的咆哮怒吼的神姿，将其瀑位深深扎根站定在全球第 6 大河流的河道之上。这在全世界所有 16 条长度在 4000 公里以上的超长河流中，除了位于非洲乌干达境内尼罗河上的木尔齐索纳大瀑布和墨奇森大瀑布（高度分别为 42 米与 40 米）之外，壶口瀑布则是第 3 个发生在世界超长河流主河道上的同类型奇特自然生态景观。举世皆知，中华民族多少世代以来，已经将壶口瀑布及其身居其中流程长度达 5461 公里的黄河比喻作全民族的母亲河，而且将它们作为整个民族的自然象征物。

1988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将黄河壶口瀑布列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序列。而到 1994 年初时，具有强烈自然遗产特征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在山西省已经共有五处之多（其他四处为五台山、恒山、北武当山和五老

峰），吉县壶口瀑布为其中之一。

当人类还没有发展到智人阶段以前，地球上的植物和动物无疑都是原始野生的；而有了智人以后的世界，从此也就有了被人驯化的植物和动物。当代美国学者埃里奇·伊萨克曾经写过一部叫做《驯化地理学》的专门著作。他认为“驯化对人类社会有极大的重要性”，“驯化的发明使得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从而使得人口众多的、复杂的人类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因此，事实表明它是人类对其环境所曾经作出的最重要的一项干预”。[①]

山西大地上保存着极其丰富的人类先祖对原始动植物给予驯化的重要遗产生态资源。1989 年 5 月，原山西省林业厅厅长刘清泉先生出版了他耗费了很大精力的研究成果——《山西古稀树木》，书中翔实记录了山西高原上现存的 109 种共 980 例古稀珍贵树木遗存形态，其中 90%以上应该属于人类驯化植物的范畴。这部著作的可贵之处并不仅仅在于它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学科，更具意义的则是，它不但向当代人类展示了山西自然生态历史的一个侧面，而且还向当代人类无意间介绍了古人驯化自然界原始树木过程中的诸多生动实证。正如刘清泉先生说的那样：“古老树木是大自然的忠实档案。古往今来气候的变化，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环境污染程度，都可从树木的年轮和生长情况中找到科学依据。我们的祖先在营林、抚育、保护等方面的许多符合科学原理的管理，由此亦可见一斑。”[①]

刘清泉先生所记录的这类古稀珍贵树木，无疑应该作为山西珍稀自然生态遗存资源中极为宝贵的一种类型。刘清泉先生的《山西古稀树木》一书，给所有有志于研究、考察、观赏山西此类自然生态遗存的人们，事实上提供了一部图文并茂的导游指示图册。

到目前为止，人类对自然遗产生态景观资源的认识（其中尤其是对稀有自然遗产生态的认识），由于受人类生活生产基本区域的限制，如欲同人类对自身创造的各种文化遗产生态景观资源认识的广度或深度相比，则在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与国内其他省区地域相比，山西高原因为受新生代以来地壳新构造运动的剧烈影响，还有受到来自西北大陆性气候和东南海洋性气候两种大气气流的周期性侵蚀夹击，以及更受到数百万年以来山西山地本身植被、水文、生物活动产生能量的种种促动，所以，无疑在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上还有许许多多自然遗产生态形式而未被今天的人类所认识和了解。本书作者相信，随着人们科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探索开发技术手段的继续加强，人们一定会在山西高原这块古老神秘、瑰丽奇特的大地上发现认识到更多的自然遗产生态现象。而随着认识了解水平与幅度的逐步提高加强，保护利用这些令人耳目常新的自然遗产生态资源，从而丰富当代

[①] 〔美〕埃里奇·伊萨克：《驯化地埋学》，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 页。

[①] 刘清泉：《山西古稀树木》，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 页。

人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持续发展，不但对生存生活在这块古老大地上的数千万山西人民充满着诱惑力，而且无疑对整个人类更好地驾驭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也当然具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五节　温泉与避暑地

含有多种有益于人类身体健康矿物元素的矿质温泉，还有可以供给人类短期栖息并避开炎夏酷暑的天然避暑环境，显然属于自然遗产生态资源的范畴之内。自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大规模的旅游度假和避暑度假这种极具时代特征的人类休闲活动以来，矿质温泉与各种特色的避暑地就成为各国旅游者和度假者追求的目的地与目的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在 1980 年 4 月中旬的时候，世界旅游组织合作成员委员会就曾特别设立过一个叫做“健康旅游”的工作小组。这个小组在此之后的几次工作会议上，首先将世界各地的一些温泉疗养地和有良好气候环境适宜人类健康状况的避暑度假地作为该工作小组的规划实施目标。正如当代法国知名旅游学家弗朗索瓦·韦拉所说的那样：“如果在气候宜人的条件下旅行，外出逗留，那么旅游对提高健康水平，效果尤为显著。十几年前，当温泉和理疗疗养的方式还不太发展的时候，到温泉和气候较好的疗养站去住一段时间，曾是一种令人神往的特别旅游方式。今天在许多国家，前往温泉疗养地和气候好的地方去逗留仍然是一种预防和治疗的好方式。”[①]中国自古以来在民间或是在皇室与官宦人家中，都有着利用温泉和气候凉爽之地进行疗养旅游度假或避暑旅游度假的悠久历史传统。本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当现代旅游度假休闲活动在我国蓬蓬勃勃迅速发展起来之后，至 1992 年 8 月后，我国政府又正式颁布了若干有关在国内各地兴办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法规与制度。各种有利于人类健康疗养和旅游度假的矿质温泉所在地和气候凉爽的避暑地，目前均已成为旅游业界和房地产业界投资开发的选择目标。

山西高原以其特有的自然地质条件和自然气候环境，从来就是一个矿质温泉和天然避暑地广泛分布的地域，见于历史文献记载或直至今天仍然保持良好自然原始面貌的温泉与避暑地，在全省范围内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1.温泉及其分布

我们目前确知分布在山西全境的温泉（包括历史上曾经发现出露并见诸于地方文献的）和现在仍在使用着的温泉，大概有如下许多（加带*符号的为今天仍在使用或正在开发者）：

瑶台温泉*，夏县；　　寺平安温泉*，盂县；
奇村温泉*，忻州市；　　顿村温泉*，忻州市；
汤头温泉*，浑源县；　　北池温泉*，新绛县；
大营温泉*，原平市；　　七级温泉*，稷山县；
神堂沟温泉*，太原市；　汤头温泉*，定襄县；

[①] 〔法〕弗朗索瓦·韦拉著，罗结珍等译：《国际旅游经济与政策》，旅游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7 页。

三里屯温泉，天镇县；　　鄂山温泉，乡宁县；
汤泉温泉，交口县；　　七星温泉，曲沃县；
圣阜山温泉，定襄县；　　福寿山温泉，原平市；
半亩青温泉，左云县；　　郭壁山温泉，晋城市；
韩村温泉，榆社县；　　伏甑山温泉，沁县；
寺坪温泉，盂县；　　石梯山温泉，[1]保德县。

我们在各地古代方志文献中，还发现有许多温泉既无专门名称，又未标明该温泉所在地名，所以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根据各方面的资料看，总的印象和结论是，山西高原在我国北方地区来讲，堪称为一个温泉较为密集的地域。在个别小区域中，历史上地热和温泉的出露可能还达到了十分显著的程度，甚至成片或成群落地出现，以至于影响到了该区域行政地名和自然地名的命名。例如在今原平市（即古崞县）东南和定襄县接境连壤的地方，曾经有成片的山峰被叫做“温泉山”；又如在盂县东部山区，有整条峡谷而被称为“温泉峡”，再如在今孝义市和交口县交界的地方，早在唐初武德三年（公元 620 年）时即因当地温泉驰名一时，所以特置所谓“北温州”，同时又置“温泉县”。古温泉县的县治之所在，就在今天交口县的温泉乡政府所在地温泉村。在整个自然界的荣衰与变迁中，沧海桑田，可说是千年尤如一瞬。和很多河流、名泉的消失与干涸一样，许多古时极有名声颇为旺盛的温泉到今天也都萎缩殆尽，只为我们今天的人类留下了一纸空名。当然也有个别是留下了某些蛛丝马迹和某些微弱的孑遗形态的。即如与原平古温泉山紧相毗邻的今原平市同河同川一带，虽然现在在此地已再难于寻觅当年的温泉山或古福寿山温泉，但是根据各种迹象观察，在这一片小小的河谷盆地中，似乎仍能觉察到地热储能所产生的作用。人称同川易长梨果之树，这应该即与当地地热丰富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温泉在山西高原不但分布较为普遍，而且被人类开发利用的历史也较为悠久。即如今天仍被我们利用着的盂县寺平安温泉和浑源县的汤头温泉，就早在约 1500 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已被人们作医疗洗浴所用。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记述：“又东合温泉水，水出西北暄谷，其水温热若汤，能愈百疾，故世谓之温泉焉。”[1]此处所讲的温泉，即是浑源县恒山南麓今天的汤头温泉。《魏书》中讲在北魏太祖拓跋珪天赐六年（公元 409 年）时，尚书左丞贾彝“请诣温汤疗病，为叛胡所拘执”。此处的温汤同样也是指浑源汤头温泉。《魏书》中另有一处记载得更为具体，说是在北魏文成帝拓跋珪兴光元年（公元 454 年）十二月时，文成帝从中山信都（今河北西部）返归，

---

[1] 在古方志中一般温泉并无专门名称，本书列举时根据温泉所在地名给予名称。例如石梯山温泉，即该温泉处于石梯山中，故名。

[1] 陈桥驿点校：《水经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36 页。

“还幸灵丘，至温泉宫”。[②]这更使我们确知， 1500 多年前的汤头温泉不但已为皇家所用，而且还专门在此建筑了皇帝御用的温泉行宫。至于今天盂县境内的寺平安温泉，我们同样从其他一些历史文献中获知，原来在北齐孝昭帝皇建元年（公元 560 年）的某一天，刚被废掉的 17 岁小皇帝高殷，也曾作为济南王到滹沱河畔的寺平安温泉作过一次医疗沐浴，而且病情还果然有所好转。

山西境内许多见诸于历史文献的古代温泉虽然今天都再也无法见到了，然而值得给予庆幸的则是，就在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数十年，我们却又陆续在山西境内发现了另外一批新的温泉出露。这些新发现的温泉在过去的古代文献中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任何记载和提示。比如忻州市西北郊外的奇村温泉和顿村温泉，又如新绛县汾水南岸处于峨眉塬北麓的北池温泉与稷山县的七级温泉，以及近些年来才在临猗具城附近发现的成群落的温泉和地热出露。这些新发现的温泉与地热资源的地域分布，几乎都集中在两个小地域之内。其中一处在忻定盆地的西南部小平原上，另外一处就是晋西南汾河谷地与涑水谷地南北夹持中的峨眉源南北两麓半坡地区。新发现的这些温泉无论是出水量，还是水温与水质，都分别达到了一定的指标。例如临猗县城附近温泉，水温达到了近 70℃，水中以含锶量为最高，达到 4． 23 毫克/升，同时还兼含镭、铀、钍、氡、钙、铁等 30 余种对人体有益的放射性元素及常规元素，据知对医治关节炎、皮肤病、贫血和各种癌症均有良好疗效。又如忻州奇村温泉，水温经常保持在 50℃左右，系弱碱性软水类，水内以含放射性氡为主，又兼含钠、硫化氢、钙和铁等矿物质，对解除疲劳，调整人体植物神经与平衡人的高级神经中枢，以及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病和各种过敏性疾病，则有更为显著的疗效。再如新绛县的北池温泉，水温高达 35—82℃，水质含氯、硫酸根稍高，同时还含有氟、钙镁溶解盐、铀、镭、钍、钾、钠、碳酸根、硝酸根与硅酸根等多种放射性元素及常规元素。开发利用 10 余年来，已充分证明此温泉不仅可供人类饮用，而且更可供人类沐浴医疗，对一些久治不愈的皮肤疾病、顽固性风湿病、抗药性神经衰弱以及癌类疾病，疗效均很显著。令人们感慨的是，像浑源汤头温泉和盂县寺平安温泉这两处已经发现并经人类使用了近 1500 年的古老温泉，至今竟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出水能力和出水质量。经近些年的化验测检，汤头温泉水温一直保持在 63℃，水中含有镭、氡等多种放射性元素和钾、钙、钠、镁等 10 余种常规元素。除了对皮肤病、关节炎和风湿病具有明显疗效外，尤其对胃酸过少、轻度心血管疾病、早期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等疗效则更为显著。位于盂县滹沱河畔的寺平安温泉，山环水绕，景色绝佳。泉水温度一直保持在 63℃以上，水质良好，内含铀、镭、氡、锂、锶、偏硅酸等多种放射性元素与稀有元素。少量饮用该温泉水，证明可以增强肝

[②] 《魏书》，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14 页。

胃分泌，并有促进新陈代谢、利尿、催眠、降低血压、强化白血球等作用；若沐浴，则对皮肤病、神经衰弱、关节炎、肠胃疾病以及外伤治疗等，皆有极好疗效。

作为一种珍贵的自然遗产生态形式，温泉资源无疑对未来发展山西的旅游度假及健身疗养事业有着重大意义。在山西境内，所有当前已经给予利用或者正在规划开发的矿质温泉，不但大多数都与本省的著名旅游风景区距离较近，而且一般温泉所在地的风景景观环境也趋于良好。这显然也会给这许多温泉的保护和利用带来莫大的好处。

2.避暑地及其分布

在中国大地上，及至炎夏季节，最使人难耐酷热的地方，莫过于目前京、津、冀、豫、苏、皖这几个处于华北太平原和江淮大平原上的省市。而在这几个省市地域内，最受酷热磨难者则是上亿数的城市人口。随着人们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休闲度假观念的普及，特别是还有由于人口急骤增长给这些城市人口普遍带来的环境压力，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不但在一般季节中已习惯于去寻找一个惬意的旅游目的地，而且每当到了酷暑季节时，更有许多人们百般渴望着能够为自己就近廉价地寻找一块躲避炎热和烦躁的清凉世界。于是，自然产生了这样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即是：酷暑季节那成千上万来自平原城市的避暑度假者们，该往哪里去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清凉之地呢？还是到庐山或是北戴河海滨去吗——早已是人满为患；要不到内蒙古塞外或者是青海湖畔——然而毕竟路途过于遥远；拟或就到江南山林之中去如何——更多的人则难于忍受那里的潮湿和蚊虫的叮咬。那么，究竟去哪里为好呢？

看来，山西高原是一个值得选择的好地方。

单就山西高原作为目前国内避暑度假目的地应该具备的若干条件而言，概略地讲，山西山地起码在如下一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1.拥有多处高山避暑地

至今为止，国内外许多著名的避暑度假区就都选择在滨海地域和高山多林地域。前者依托于大面积水域形成的凉爽气温，而后者则凭藉高海拔山体及其广袤的森林促成避暑环境的最终形成。我国人民熟知的北戴河与庐山，就分别属于这两种类型的避暑度假地区。

根据多年实地考察和了解，本书作者认为山西山地中，就拥有着多处这样的高山避暑地。这些高山避暑地起码应该属于如下一些地方：

五台县·五台山	浑源县·龙山
左权县·北天池山	壶关县·紫团山
陵川县·太行山	沁水县·历山
沁源县·灵空山	阳城县·析城山
宁武县·芦芽山	交城县·关帝山

太原市·天龙山

2.良好的避暑型气温

根据山西省近百个气象观测站连续 30 余年的观测记录，有充分资料表明，若与同纬度的华北平原众多城市相比，除了省境西南隅运城盆地之外，整个山西高原 90%地域的年平均气温，均比天津、北京、石家庄、邯郸、德州、安阳、新乡诸城市要低出 3—4℃左右。再以山西高原的年平均气温和郑州、德州以南江淮平原上的诸城市如蚌埠、合肥、南京、清江、阜阳、许昌等相比，则更要低出 5℃以上。特别需要给予说明的是，这里还仅仅是以山西全境的年平均气温和以上平原酷热城市相比，如果要以我们列举出的 10 多处山西高山避暑地的暑期气温再和以上平原酷热城市相比的话，两者之间就会更加悬殊。这主要是因为，根据其实际情况，事实上在暑期时我们所选择的 10 多处高山避暑地的气温都要比本省一般地区的气温还要低出 5—6℃以上。换句话讲，也就是说山西各高山避暑地的暑期实际气温若与同期平原酷热城市相比，气温所低度数应该要在 10℃左右。即如果南京市的暑期气温高达 37℃左右时，五台山或是芦芽山高山避暑地的气温则可能只有 27℃左右。

山西的高山避暑地不但具有良好的避暑型气温，而且因为地处高山（除天龙山海拔为 1 430 米外，其余各山海拔高度均在 1600—2000 米以上），森林密布，所以大气循环质量很高，湿度适宜。几乎所有这些高山避暑地地域内不但在暑期内降雨十分频繁，同时还保持着充足的日照。一般这些山地中的暑期降雨多在午后 14 时至 15 时之间。多疾雨但时间短促，雨过天即放晴。多雨而不潮湿，阳光充足但无燥热不适。空气新鲜流畅，处处清爽可人，这可谓山西高山避暑地拥有的最显著的特征和特点。

3.丰富多采的观赏游览环境

在避暑度假期间，同时就近寻求一种观赏游览的环境，这是所有现代避暑度假者的正当要求。以上列举出的 10 多处山西高山避暑地，大多都处于已经设立的国家森林公园中心地区或者与附近的文物及风景名胜区紧相毗邻。本书有关章节都已有过较多介绍，在此不赘。

4.较为方便通畅的交通环境

本书以上列举出的 11 处山西高山避暑地，其中除了灵空山、芦芽山、关帝山、龙山和天龙山 5 处位于省境腹地以外，其余 6 处则都坐落在省境东部和南部与华北平原紧相交界的位置。这 6 处高山避暑地与京原（北京——山西原平市）铁路、陇海铁路、京广铁路之间的距离均未超过百公里以外，而另外 5 处高山避暑地中的芦芽山、天龙山、灵空山，与贯穿山西全境的南北同蒲（大同——风陵渡）铁路之间的距离，则更未超过 60 公里的范围。到目前为止，山西高原上已经有 7 条干线铁路（大同至北京、大同至秦皇岛、原平至北京、太原至石家庄、长治至邯郸、太原至郑州、侯马至河南月山）向东穿越过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早已畅通，而且还有另外两条新的铁路干

线（山西朔州至河北黄骅港、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也正在加紧施工，即将也要向东跨越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相连起来。加上近期业已竣工的太原至旧关高速公路以及其他若干条公路，可以认为，这无疑对今后引进来自华北平原与江淮平原的避暑度假客源并加速开发利用山西的高山避暑型自然生态资源，显然都有着巨大的实际意义。

1400 多年前，北齐文宣帝高洋虽然将其都城定在华北平原的邺地（今河南安阳北），但他却和他的父亲高欢一样，每年暑期却都要回到晋阳城外的天龙山避暑行宫来躲避酷热。同样是 1 400 多年前，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政权，建都于黄河西岸的长安之地，然而他和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却耐不住都城的炎暑，而要在千里之外的汾河源头另建天他汾阳避暑行宫。另有 800 多年前的一件事情，金元交替时的著名诗人元好问，虽然只是少年儿时随其父亲在太行之巅的陵川县度过了短短几年时光，但直到他壮暮之年时却仍不能忘怀这一块宝地。于是他就留下了诸多赞颂陵川为“清凉圣境”的美好诗文。

作为自然界的造化，清心凉爽的山林间气候无论于今于古，对难耐暑热的人来讲同样都具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而稍有不同的是，古人仅仅只以自然之心寻求个人的自然之举，今天的人们却能将这种有益于人类身心健康的自然生态视作为经济资源，力求将其供给全社会所用，这无疑是一种标志了时代特征的进步。山西高原上的这许多高山避暑地，必将在未来的社会进步中越来越被更多的人们所认识和保护，进而有更多的利用。

第五章　山西遗产生态环境与遗产资源的保护利用

正确地认识与评价一个地域中的遗产生态环境，从而由此确定一系列对该区域遗产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方针及方法，这是所有遗产分布区健康发展遗产事业的必由之路。

第一节　山西遗产生态环境

所谓遗产生态环境，实际是指以具体时间为特征的遗产存在历史和以具体空间为特征的遗产存在地域共同组成的一种特殊环境形态。任何一个地域内的遗产生态环境都隶属于这个地域的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系统，它应该也只能是当地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系统中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正由于这一点，无论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遗产生态环境都不可能独立置身于当地的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系统之外，而这个地方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的优劣与否都时刻影响着该地遗产生态环境的质量。无视遗产生态环境的存在和重要性，或者将遗产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强调到一种脱离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系统的不恰当位置，都是不适宜的。所有地方的遗产生态环境，最终都要和当地的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系统共同协调发展。

就全国范围而言，山西古老大地上的遗产生态资源无疑是博大中华这部遗产生态巨著中的一个充满独特个性魅力的精华篇章，故而探索当前的山西遗产主态环境问题并就此寻求有效的保护利用发展对策，就显得格外必要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综观山西高原上的遗产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和在国内外其他许多地方已经发生与正在发生的严峻状况一样，也正如 1972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会议期间颁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时业已注意到的：

>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受到破坏的威胁，一方面因年久腐变所致，同时变化中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使情况恶化，造成更加难以对付的损害或破坏现象。[①]

尽管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国家与当地政府的努力，使有些“损害或破坏”在山西这块土地上有所缓减（如在控制森林面积迅速萎缩方面即有显著成绩），然而总体讲来，遗产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状况，却并没有停止下来。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事情发生。概括说，从本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到目前为止，山西遗产生态环境的总体持续恶化趋势在大约 60 余年时间中，表现出了如下一些突出特征。

1.原始自然林系植被形态持续向高山腹心地区萎缩

有资料表明，直至 19 世纪末期，在山西省境内许多海拔高度约千米左右的山地间仍保留着相当茂密的原始自然林系植被。而仅仅是 100 年的时间，当这个世界即将踏入 21 世纪时，山西大地上的现有原始自然林系植被，却几乎完全萎缩退入到中条、太行、太岳、吕梁、恒山等几大山脉海拔达 1 500—2000 米以上的高山腹心地区。造成这种残酷现实的原因固然很多，但 1937—1945 年期间，日本侵略军对山西森林资源的疯狂掠夺，以及本世纪 50 年

---

① 《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69 页。

代后期直至 70 年代末持续 20 余年的毁林造田，却是现代人类强加给山西大地自然遗产生态肌体的两次最大规模的灾难性破坏。人们最终不得不深深感悟到，森林在山西大地的失去，将使山西在各个方面祸起多头。诸如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河流萎缩，地下水下降，气流循环紊乱，风沙侵蚀，等等。人们最终还将认识到，山西山地森林不但是山西自然遗产生态的根本维系，而且也是山西总体综合生态系统的根本维系。山西山地的现有森林遗产如果可以得以维持或者可以逐步恢复扩大，它不但最终可以使山西大地上已经枯竭或正在枯竭的河流水系重新发育，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必将对华北平原的水文与大气循环质量的好转产生极大影响。

2.原始自然水系形态同样面临继续萎缩的趋势

由于自然地质构造及自然地形的巨大作用，历史上的山西曾经存在过一个地表清水径流十分发达的自然水系系统。今天许多在历史上曾经四季清流不断的河水之所以变为季节河和洪水河，又有许多河流干脆沦为干谷，应该说是原始自然植被严重萎缩促成的直接恶果。如果说山地自然林系萎缩是山西自然水系形态萎缩的发端，那么，山西自然水系的萎缩则无疑就是山西自然遗产生态环境甚或总体综合生态环境产生恶性循环状况的开始。无论如何应该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山西自然遗产生态环境和总体综合生态环境的“链条”上，自然水系遗产和自然林系遗产作为两个根本环节，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目前，山西省境内几条大河（如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的年径流量总的来讲仍然处于逐年下降的状态。其中有许多河段时常处于濒临干涸断流的境况之中，多数情况下反倒不如一些小型但近林的河流（如陵川南峪河、垣曲沇西河、夏县泗交河、壶关郊沟河）可以四季常流。面对如此环境困扰，与其把它看作是水生态问题，倒不如说它本质上是一个林生态问题。从山西自然遗产生态环境的保护角度看，林与水事实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林生态作为保证，水生态将最终失去根本环境依靠；如果不将现有水资源的萎缩趋势给予有效地控制和整治，林生态也就终究会失去能够藉以恢复生机的最基本的环境条件。再假若山西的自然林系遗产与自然水系遗产仍旧继续像目前这样交叉萎缩下去的话，受到危害的已不仅仅限于自然遗产生态本身，而是整个山西综合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

3.文化遗产生态所遭受的种种侵害

当前列入我们保护范围或受到我们保护的许多文化遗产，事实上被我们接受和保护的只是它们的建筑形式，这当然是因其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美学方面的价值和科学方面的价值，或者仅仅因为它已是历史上其种文化物质形态遗存下来的唯一幸存物和稀有物（例如五台山南禅寺大殿），而并非包括它最初在历史上所代表或体现的某种政治内容与文化内容。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以前，它们都曾经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受保护的文化完整体，但在封建皇权崩溃之后，展现在此后人类面前的，却常常仅剩一种完全外在的形式或物质外壳。这种巨大的变化意味着，今天在我们眼中已被视作遗产的许

多东西，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前除了自然灾害与战争可以加害于它们，除此之外则再无被损害之忧虑。自从皇帝下台，人们敢于喊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时起，就产生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究竟什么该留下来，什么该革掉其命？这个问题至今已经困扰了我们将近百年之久。百年尤如一瞬。在此期间，许多曾经保留了数百年或上千年的历史遗存物，就在人们还没真正弄清它们的价值或者是有无保留价值的时候，它们却已经在一次次的战争和革命热浪中被毁于一旦。“泼脏水却倒掉了孩子”的故事在许多地方和许多时间中不止一次地重复发生。

许多事实都表明，在刚刚过去的 60 余年时间中、山西高原曾经是中国各省区中损失历史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一个省区。这其中有抗日战争时期侵略者野蛮的文化掠夺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有本世纪 50 年代后期至 70 年代末持续 20 年之久的极左潮流给许多珍贵文化遗产带来的种种厄运。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宁武汾源雷鸣寺的被毁即属一例。清末光绪二十五年（公元 1899 年）夏，当时的山西巡抚湖北天门人胡聘之曾任总纂，他将那时仍然存世的 700 余通古代碑刻辑录汇编为《山右石刻丛编》。 700 余通古代碑刻分属于从北魏至元的 840 余年时间，堪称为一笔无价之宝。对于这批珍贵的古代文化遗产的下落，正如刘舒侠先生所言：“《丛编》问世 86 年了，沧海桑田，变化巨大， 720 通石刻存亡情况，尚无资料可循。概括言之，无非以下几种命运：有的散佚无考；有的公然破坏；有的移作它用；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埋入地下；即使幸存下来的，除少数保存完好外，多数已经漫漶不清。至于见于《丛编》著录而幸存的石刻，究竟保有多少，只有经过认真核查，逐碑登记，才可能了解 86 年来的变迁和研究如何整理与保管问题。”[①]舒侠老人自 80 年代后离休以来，一直致力于对山西文化遗产的保护整理与研究，其中对山西古代石刻的研究贡献尤见心血。他 1990 年前对《山右石刻丛编》中辑录之山西古代石刻遗产存亡现状的分析与统计，事实上应该也是对近百年来山西遗产生态环境的一种冷静而又客观的评价。

尽管就目前而言，山西遗产生态形势仍然存在着极为严峻的一面，然而从 80 年代初期以来这十几年时间中，由于各级立法机构不断建立健全遗产保护的各种法律制度，加上政府各主管部门（如林业、建设、文物、水利等）的重视，以及诸如退耕还林和重点文物修复保护等措施的持续实施，还有对偷伐林木和偷盗文物、盗挖古墓等犯罪行为的严厉打击，确实也逐步形成了一个有利于山西遗产生态环境恢复发展的初步局面。就像宜林的地质时代并没有远离我们这块土地而去一样，对山西的遗产事业来讲，应该说，阵地和机会还是仍然存着的。

[①] 刘舒侠编：《〈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 页。

第二节　山西遗产资源与山西旅游业

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自然遗产资源与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旅游业，已被国内外许多成功经验所证明，这是一条既可发展旅游事业又能发展遗产事业的可行之路。早在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世界上很多著名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就已经成为旅游胜地。例如 1818 年发现的南斯拉夫波斯托伊那岩溶洞穴， 1872 年就在其长约 24 公里的洞体内修建了供游客游览时所用的小铁路；再如位于希腊首都雅典城东南的阿克罗波利斯博物馆，早在 1878 年时即因在当地出土大批历史文物而兴建，而到本世纪初时，在国际游客的眼中它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旅游观光目的地之一。就如历届国际旅游组织总裁向人们多次推荐过的一部叫做《旅游学》的著作中所讲的那样，一个地区的文化遗产是常常记载在历史文献中的，但许多旅游胜地却都兴盛于著名的历史遗迹之上。“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博物馆的管理水平，对于旅游业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熟悉一个地区的历史与史前史、考古学，是开辟这个地区旅游业的极大动力。”[①]在短短的不到 20 年的时间中，中国国际旅游业的长足发展，使 1996 年来华国外游客的人数迅速增长到了 2600 余万人，业已成为目前全世界接待国际游客人数最多的 5 个国家之一。无疑这与中国旅游业界成功地发挥了诸如张家界、九寨沟那样的自然遗产与北京故宫、甘肃敦煌那样的文化遗产的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山西省历来被认为是长江以北的文物三大省（陕西、河南、山西）之一。从 80 年代初旅游业刚起步时起，山西省就开始注意对地上文物遗产资源的利用。最早被用于山西旅游业的文物遗产景观有大同的云冈石窟、上下华严寺、善化寺，浑源悬空寺，应县木塔，太原崇善寺、晋祠、双塔寺，交城玄中寺、卦山天宁寺，芮城永乐宫，解州关帝庙，洪洞广胜寺、明代监狱和平遥双林寺，镇国寺等。 1984 年以后，利用文物遗产资源发展山西旅游业的步伐更为加快，相继又有五台山寺庙群、洪洞古大槐树处、永济普救寺、临汾尧庙、平遥古城、祁县乔家大院、太原天龙山石窟、代县鹿蹄涧杨家祠堂、夏县司马光祖茔、万荣东岳庙、稷山金墓群、平定娘子关、忻州元好问墓和晋城青莲寺等对国内外游客开放。

与文物遗产资源较多地利用于旅游业相比，近 20 年来，山西潜在的自然遗产景观却一直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更未得到旅游业的广泛利用。这与多少年来省内外旅游业界人士在这方面缺乏起码了解和调查，以及景观所在地区人们未能向外作好介绍宣传有着很大关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许多人甚至认为山西的旅游景观资源是天然的结构单一，亦即认为山西省是从来就缺少自然山水景观。而事实上，根据本书作者 10 数年的专门考察，若从全国范围讲，山西高原以各种自然遗产生态景观为特征的自然旋游资源

[①] ［美］罗伯特·麦金托什、夏希肯特·格波特：《旅游学》，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6 页。

的综合指标（不是单项或单位指标）水平，完全可以排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前七八位的位置上。在江淮以北的北方诸省中，山西现有的山水旅游景观则更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个别类项如石灰岩岩溶洞穴景观、峡谷景观等，无论是数量、规模或质量，则应居于江淮以北诸省区的首位。山西从古以来就以名山众多而著称于世，这是因为有占全省总面积 65%以上的山地面积作为雄厚的基础。在全国同时拥有五岳之一、五大镇山之一和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省份唯有山西一家。

山西山地所拥有的自然遗产生态景观（例如山、水、林、洞、峡等）总量，表明山西山地应该是中国山地旅游资源中的一个重要单元。山西的山地峡谷构造十分丰富，其中尤以晋东南接近冀豫平原地区的山峡隘谷地貌雄奇险峻。山西山地大峡谷中峡体规模最长者是壶关县境内的马鞍驼峡和陵川县境内的磨河峡，长度均在 30 公里以上；景观最为险奇者是沁水与阳城县交界处的历山东西双峡，其峡体长度也在 10 公里左右，从峡首至峡尾的自然落差则高达 500 米以上。目前，壶关县境内太行大峡谷已被列入国家森林公园序列，历山东西双峡则已在 80 年代中期时成为当地发展旅游业的重点景观开发目标。

因为水系萎缩和省境四周有三边（东、西、南）海拔高度都低于山西高原，所以山西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大面积水面景观极不易得。本书作者认为，在山西目前的高山近林河流源头地区，存在着极为适宜的可蓄水环境。首先在这些地区具备水源条件，因为它们大多是河流源头滋生地；其次具备地貌条件，这些地方多峡谷地貌和山间峡盆，许多小盆地其实就是早期地质时代的湖泊遗址；再者，这些地方具备较好的生态环境，它们周围多密布森林植被，地表上层封锁良好，极易形成山、水、林一体的自然风景景观；第四，这些地方目前多已被列入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序列，且当地固定居民甚为稀少，实施大面积蓄水，可以使社会负影响保持于最微层次。在高山近林源头区实施大面积蓄水，一方面可以缓解山西高原目前干旱缺水的环境困扰，另外一方面又可以使现在的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增添水面景观资源，用以发展山西旅游业。山西境内的沁河、浊漳河、壶流河、清漳河流域等，即应该存在这种人工造景的环境条件，也自然存在着利用人造水面景观发展旅游业的希望与美好前景。

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的著名的《兰亭集序》中，曾经有这样几句描写自己旅途胸臆的抒情之语，他说：“仰视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里王羲之道出了一个极为精到的真确哲理，那就是在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人们心目中，所有天地之间的事物存在，均可以成为我们获取知识和陶冶情操的观赏考察的目的与对象。换一句现代语言来讲，即可以理解为旅游资源应该是存在于人类视觉能够达到的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在这里，文化与自然遗产生态资源无疑就是旅游资源中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从某种角度而言，假如我们丧失了文化与自然

遗产生态资源的存在，那么现代旅游业必将无法存在和维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 1978 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组织的，几乎与此同时，国家又把旅游业以往的接待经营体制开始转变为产业经营体制。旅游业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被正式列为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旅游业在中国业已成为一项重要经济产业，无数文化遗产景观和自然遗产景观，无疑就成为支撑这一新的经济产业的重要的经济资源。从 1980 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兴的国际旅游业，每年的年创汇数额以惊人的速度迅猛递增：

1980 年	6.1 亿美元
1984 年	11 亿美元
1990 年	22.2 亿美元
1991 年	28.4 亿美元
1992 年	39.5 亿美元
1994 年	73 亿美元
1995 年	87 亿美元
1996 年	100 亿美元

在短短 16 年时间中，中国的国际旅游创汇额增长了 16 倍还要多。在这一方面，按照国际旅游组织公布的数字，中国在 1995 年时即已排在了全球第 9 创汇大国的位置上了。1996 年的中国旅游业，不仅仅在国际旅游创汇方面突破了 100 亿美元，而且在国内旅游收入上也取得了 1600 亿人民币的好成绩。经济界权威人士纷纷指出，旅游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新的增长点不但业已成为人人皆见的事实，而且，更可以将这一新兴产业作为中国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进程中尤为重要的一支生力军。

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大潮，目前正在由沿海发达地区向内陆中西部相对贫困落后地区迅速扩展推进。令世人瞩目的是，遍布了各种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与自然遗产资源的山西高原，就正处于这一经济社会发展大潮向西推进的地理要冲位置上。许多国内外的有识之士均已深刻地认识到并已明确指出，山西在继续发展能源重化工和其他传统产业的同时，必须准确地看到并把握住发展机遇，真正做好产业结构调整，发挥山西丰厚的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潜力，发挥旅游业在山西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山西是一个煤炭资源大省，同时又是一个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大省。然而，同样作为经济资源，煤炭一经开发即不可再生，而且对环境生态产生极大负值效应；但对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来说，无论是在生态环境的协调方面，还是在资源本身的可持续利用方面，它无疑都具有着很明显的优势。

正如本书一开始就讲到过的，现代旅游业与现代遗产事业永远是互惠互利的。遗产事业为旅游业提供了使用不尽的可用资源，旅游业则使种种遗产形态重新焕发出青春光彩。作为一个遗产资源大省，随着旅游业的持续发展，山西的遗产事业也必将蓬勃兴旺。

第六章　山西遗产生态事业前景展望

截至 1996 年年底之前，山西省境内已经拥有了一大批由国家公布的各类项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单位。其中各类项的数量分别为：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6 处；
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34 处；
历史文化名城 5 处；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5 处；
省级风景名胜区 5 处；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处；
省级自然保护区 1 处；
国家森林公园 18 处；
省级森林公园 9 处：
国家古生物化石重点保护区 1 处。

以上 10 个类项共计 539 处。除此之外，平遥古城目前正在申报世界遗产保护名录。另有国家旅游度假区和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网两个类项本省暂缺。

据知，在以上山西各类项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单位里，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和国家森林公园的数量，在全国各省区之中都属于数量较多的省区。如至 1996 年底之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公布过 4 批计 750 处，山西省计 56 处。山西省的国家森林公园至 1996 年底前共 18 处，总面积已接近 600 万亩，占到全省现有国有林地面积 3041.3 万亩中的近 1/5，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比数则已接近 3%的水平。

在这里，我们还要再一次地特别指出，山西大地上现存的所有文化和自然遗产形态，无论是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整体考察而言，还是对我国江淮以北的综合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变迁而言，毫无疑问它都具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与地位。这种价值与地位的重要性，集中表现在山西高原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的历史坐标与在自然生态变迁历程中的地理坐标两个方面。人们将利用现代科学手段通过对山西高原上存在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生态资源的种种考察及剖析，而去获得许多新的历史密码与自然密码，从而进一步取得一系列对未来人类文明及自然生境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

山西省无疑在文化遗产生态资源和自然遗产生态资源方面都拥有着极大的蕴藏潜力，这就需要包括专业工作者在内的全社会的力量，能对山西的遗产事业给予关注，对各种潜在的遗产生态资源的发现与发掘以及保护利用工作给予支持与关心。如果说在世界各国过去的历史上，都存在过一段让文化与自然遗产资源任其自行存在而又自行消亡的历史的话，那么，　20 世纪

的终结，也即应该是这段让宝贵的遗产资源自存自灭历史的真正终结。山西的遗产生态事业应该在这种全人类的觉醒和变革中寻求到自己的位置和责任。

作为遗产，尤其是历史文化遗产形态，就其遗产本身而言，并非全都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然而从利用它们的存在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去创造许多“化腐朽为神奇”的奇迹来呢？须知，我们在此所讲的遗产生态事业，其中相当量的工作，即是要努力去使那些历史的废墟和长满荒草的千万年前的遗址、遗迹，重新焕发出一种全新的光彩来。如果说现代的遗产生态事业有一个最终的目的的话，那么，这个目的就是要使历史（包括人类文化史与自然变迁史）上所遗留下的任何一种物质形态，都能够为我们现代人类社会所用。遗产生态中蕴藏着无穷的可开发潜力，遗产生态也为现代人类的社会生活提供着一种特殊的希望。

在此，潜力意味着现实与理想世界之间的差距，消除现实与理想世界之间那种差距则标志着希望与前景的实现。本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大量篇幅是对山西山地中蕴藏着的各种文化遗产生态资源和自然遗产生态资源的介绍，而且大多是一种泛泛的并非深入的介绍。这种泛泛的介绍不仅距离对山西潜在着的大量遗产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还十分遥远，甚至距离人们对该类事物的真正认识也还很遥远。例如将遗产生态作为资源给予认识，而且要将此类资源均都用于当今世界最为热门的旅游经济的发展，从遗产生态资源到真正的旅游商品之间，就又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距离。因为资源毕竟并不是商品。从资源到商品之间存在着一个极为复杂的商品化过程，而这种极为复杂的商品化过程，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资源开发的过程。正如一块刚从某古文化遗址检出的陶器不能简单地把它称作旅游商品一样，而只有经过各种规范化的鉴定与分类以及考证诠释，然后送入博物馆的展柜或托架之上，直至呈现在众多的买过门票的游客面前时，它才能算作完成了商品化过程的旅游商品。

山西在此之前已经早就有了一个“地上博物馆”的美誉。本书作者认为，使山西的各种遗产生态资源逐渐都得到应有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使它们最终都能得到进入这个“地上博物馆”展台的机会，这无疑即是山西遗产生态事业所要追求的美好前景。

当代人类不但负有继承和保护世间应予保留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生态资源的义务，而且还同时担负着向后世人类传承这些文化与自然遗产生态资源的重大责任，这同样也是实现人类社会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条件。让我们记住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那许多国家政府首脑共同签署的“地球宣言”吧，去保护好分布在这个星球上的所有文化与自然遗产生态，使其能和我们人类共同迈向新的世纪，这其中当然就包括本书所介绍的山西高原上的那许多充满历史魅力的文化与自然遗产生态资源。

后　　记

从生态经济的角度去探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这仅仅是一种尝试。在浩瀚的生态世界中，给人类的文化遗产和与人类共存过的自然遗产一席位置，这应该毫无问题。只是由于作者本人知识水平所限，谬误之处肯定无法避免。为此，乞望读者能为指正。

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均受到陈家骥研究员、刘清泉先生、胡辅华先生和张可兴先生以及其他编委们的鼓励和指导；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李元庆研究员曾对书稿提出了很珍贵的意见；特别是赵建廷同志和张惠君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精力。在此作者一并表示真挚谢意。

杨晓国

1996 年 12 月 28 日